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著名幽默演说精粹



前言

天道恢恢，岂不大哉！
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
——司马迁：《史记》

近年来，幽默作品争奇斗艳，千姿百态：幽默小品、幽默小说、幽默散文、幽默绘画、幽默歌舞……真可谓洋洋大观。摆在您面前的这本集子，却要另辟蹊径，试图抛砖引玉，引起您对“幽默演讲”的注意。您也许会问，演讲和幽默有什么联系？

一篇优秀的演讲应能引起听众深深的触动和共鸣，点燃人们心灵中追求真善美的火花，激发起新的生命力和新的创造力，从而跃向生活新的高度。然而，有的演讲为什么达不到这种效果，相反使听众兴味索然？读了这本集子，您定会恍然大悟：演讲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正是幽默。演讲的宗旨能在幽默的内涵中找到反映。

演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化释、开解人们心中的疑惑、烦恼，激起人们对生活的信心。演讲者若能穿插幽默，把看似障碍重重、看似无望解决的问题，换一个角度思考，则定能使听众豁达贯通，茅塞顿开。这样的解决往往无需长篇大论；寥寥数语的调侃，有时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演讲大多需要有一个宽松、随意的听众氛围。演讲若一直处于节奏紧张、情绪高昂的亢奋状态之中，就会像读一篇没有标点符号的文章，使人产生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产生冗长、拖沓、乏味的感觉。演讲者若能借助幽默，则不仅可以舒缓、调节听众的大脑神经，有张有弛，而且可以审时度势，营造最佳气氛。

无论哪种类型的演讲，都想达到引发听众思考和行动的效果。最容易激发听众自觉思考的方法，莫过于提出带有趣味性的问题。由幽默引申出的问题全都融化在哈哈一笑之中，事后又让您回味无穷。听众在笑声中领悟到的问题，总会经久不息地盘旋于脑际，逼自己去思索，直到探求出答案方肯罢休。

无论哪种类型的演讲，照本宣科不会使听众静心，唯有面对面和听众交流，才能使他们聚精会神。这样，就为讲者提供了与听者双向沟通的可能，提供了随时注意听者反应的可能。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讲者见境恩情，临场即兴的幽默发挥往往能激发出新的思路，迸发出新的智慧火花。这种由幽默所促成的涟漪式思维效果使演讲添辉加彩。

幽默在演讲中的这些神奇效果，都能在这本集子中找到印记。一篇出色的演讲缺少不得幽默。幽默使演讲风趣感人；幽默使演讲心旷神怡；幽默使演讲启智明心；幽默使演讲锦上添花。古今中外智者名家的演讲浩如烟海，我们撷取了中、英、美、法、德、俄、日、斯里兰卡等国近 50 位演说家、政治家、教育家、企业家、金融家、作家、艺术家饶有风趣的演讲共 68 篇，按发表年代的次序融为一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19 世纪世界级幽默大师马克·吐温；擅于以幽默抓住读者心理的英国作家狄更斯、萨克雷；惯用幽默取笑政敌、解决棘手问题的英国政治家丘吉尔，法国政治家戴高乐，美国政

治家史密斯、里根；把讽刺作为武器反对官僚主义的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幽默文学运动的发起人林语堂、鲁迅、老舍，以及中国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孙中山……等等。

应当指出，幽默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因而必然带有时代的、民族的和阶级的烙印。我们希望大家在品读这些演说时能注意这一点，一起来培育和浇灌健康向上的、符合时代精神的幽默之花。最后，还应当承认，尽管我们选材的宗旨是“幽默”性强，然而在实际编译过程中，却并无“幽默”可言。资料来源有限，本书的篇幅也有限，再加上水平有限，难免有遗珠之恨和疏漏之痛。错失缺憾，祈盼读者惠于指正。

王建华 杨伟民
1994年12月于上海

总序

周谷城

演说就是向听众发表对某个现实问题的见解，或阐明某种事理。每个人一辈子要听许多次演说，也要作不少演说，可见演说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活动。

演说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活动。四千多年前，古埃及的法老就说演讲比打仗更有威力。在古代希腊、罗马，演说是社会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产生过希腊的伊索格拉底、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罗马的昆体良、西塞罗等一大批演说家，还办了“演讲学校”。在我国古代，演说也曾经辉煌。所谓“左史记言”，《尚书》中就有不少演说名篇。《国语》、《战国策》中之言，颇与古希腊之演说词相似，亦治政治、历史、文学及雄辩术于一炉者也。《论语》其实是孔子向三千弟子传授知识时的演说精华。孟轲、商鞅、苏秦、张仪俱为雄辩的演说家。在《盐铁论》中，则可以读到西汉政治家桑弘羊精彩的经济演说。据此，窃以为演说之在中国，实有久于希腊、罗马者。

演说不仅源远流长，且有重要作用。一篇好的演说，或事实有据、逻辑严密，或慷慨激昂、豪气凌云，或声情并茂、引人入胜，或机智幽默、妙趣横生，或数者兼而有之，足以使人坚定对崇高理想之信念；足以使人增加知识，明白道理；足以动人心弦，催人奋发；足以给人欢乐，得到美的享受。历来名家演说，不仅风靡当时，且对后世实有深远影响。

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进行两个文明建设，要做好各项工作，都离不开演说。各级党政领导、各行各业负责人开会做报告，科学家的学术报告，群众大会上的动员报告，教师向学生讲课，检察官提起公诉，律师为当事人辩护，这些都是演说。此外接待来宾，介绍经验，发布消息，讨论问题，无不要用到演说。演说要有好的效果，就不能照本宣科，而必须掌握演说的艺术。掌握演说艺术别无他途，除了从实践中学习外，再就是借鉴前人演说的成功经验。由此而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暨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共同组织力量，翻译和汇编古今中外演说名篇，成套出版《世界著名演说文库》，以飨有志于演说者，此举确系一种有益的尝试，且为文化积累所不可少。

古今中外的演说名篇数量甚多，要想一下子收集得齐全，并同时出版，难免旷日持久，甚至是不可能的。不妨成熟一批，先拿出一批来。“草鞋没样，越打越像。”这样分期分批积累起来，相信反倒易于较快、较好地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演说文库。

至于每个分册的选录范围，无妨不拘一格。既可拿演说性质作标准，如就职演说，竞选演说，外交演说；也可以演说者的身份为标准，如将帅演说、律师演说、作家演说、科学家演说。既可着眼于演说之历史影响，也可着眼于演说之趣味性，如幽默演说。凡此种种，均不成问题。

此等演说，就其演说艺术而论，固有可供借鉴者。然不独止此。历来演说名篇，或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或反映时代风貌，或阐发深刻哲理，或含有丰富知识，实已成为重要历史文献，成为文化遗产。唯其如此，鄙意以为阅读这些演说，非独有助于掌握不同性质、不同体裁、不同形式、不同场合下

的演说艺术，抑且有助于了解历史，丰富知识，提高素养，陶冶情操。

这些演说既成历史文献，即有其时代烙印，需要读者独具慧眼，善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特别有几种演说，由于性质关系，尤其如此。如演说有足以影响历史者。观夫《礼运大同》，则可知人类之追求理想社会，固不自今日始；观夫伯里克利、柏拉图之演说，则可知西方政治制度之由来。其影响历史者，均可谓至深且远。然而有正必有反。历史不断进步，亦必有曲折。只讲进步，不讲曲折，则历史不完整。演说有促进历史发展者，亦必有促退历史者。只见前者而不见后者，则演说不完整。故适当选录一些具有反面意义的演说，以证历史道路之曲折，社会发展之艰难，人类前进之不易，实亦有其必要。不揣冒昧，即以为序。

世界著名幽默演说精粹

威廉·萨克雷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生于印度加尔各答，6岁丧父后返回英国。1829年进入剑桥大学，次年退学，去法国、德国学习法律、艺术。随后家道中落，遂为报刊撰稿，卖文为生。主要著作为：1847年至1848年按月分册出版的小说《名利场》，1848年至1850年出版的自传性连载小说《彭登尼斯》和1852年出版的历史小说《亨利·埃斯蒙德》。作品忠实于生活，刻画细腻，以描述和对话的生动风趣赢得读者喜爱。

1851年，他以“英国幽默作家”为题，在伦敦等地讲学。1852年去美国，在纽约讲学，继续论述“英国幽默作家”。本篇是他于1852年在纽约一次慈善募捐大会上为一家慈善组织所作的讲话。本着他认为宣讲道德训诫是作家重要职责的一贯主张，提出：“最好的幽默含有最大的人性，并以柔情和善意贯穿其中使之生色”。此语深中肯綮，揭示了检验幽默作品的一条重要标准。讲话词锋锐利，极尽揶揄讥刺之能事，锋芒所向直指那些假仁假义的伪君子：“一位绅士在文章中摆出一副总眉善目时，完全不必作出任何牺牲；沉溺于最美丽、最辉煌的豪情壮志是一种奢侈行为，但决不会使人损失一个便士。”这是严正的贬斥，也是高品位的幽默。此外，他与当时另一小说家狄更斯本是齐名的，人们常将他们相提并论；他在本篇中却对狄更斯的仁慈和天才表示真心的敬重，这种博大胸怀备受读者和文学界的赞扬，这篇讲话也因此常被引用。

慈善与幽默

1852年

我们的幽默作家们，这些不在安息日也照样诲人不倦的布道者，除了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获取乐趣，进行无害于人的嬉笑玩闹，摒弃虚假矫饰，鄙弃伪善行为，启发我们认识真理，热爱诚实，懂得生活，并机敏处世外，还一贯多方支持这个使你们聚集在此、为你们所拥护的神圣事业——爱心和仁慈的事业；穷人、弱者和不幸者的事业；一项出于爱、和善、使人彼此和睦相处、善意相待的可爱的工作。那些可敬的人在安息日以流利的口才和生动的事例向你们宣讲的主题，幽默作家则以其自己的方式和魅力向你们讲述，他们是日常生活和行为举止的评论家。

你们抱着行善的目的聚集在这里，在门口为帮助那些应该得到帮助的人捐款，因而我希望并相信，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对慈善事业是有所贡献的，至少是以友好的话语和思想，在予人幸福和做好事方面是有帮助的。幽默作家若以不在安息日也照样布道自许，那么他们的布道是否给人带来了好处？人们在读过艾迪生、斯梯尔、菲尔丁、哥尔德斯密斯、胡德和狄更斯的作品后，是否比以前快乐，为人更好些，与邻居相处更和睦些，更愿做出于善心的工作，更愿厚以待人而严以律己，更有宽容精神和同情心？我希望如此，也相信确是如此，而且设想他们是以慈悲为怀而从事写作的，是在以上帝赐予他们的本领，来推动实现使你们今天聚集在此的这个目标。

对人的爱是一种十分空洞、模糊的品德。取得这种美名并不费事，而且

一己行事之际完全不必因担了这种名声而有所收敛检点。据说慈善家在外施恩行善，回家之后就一点也不比邻居强。达尔丢夫之流不断谈论高尚情操，而其品德却不比他们所指斥、所欺骗的人高尚，这类人物自然不应受到信任，而应加以讽刺。可是，他们的伪善固然是一种施恩讨好的行径，却又如一句老话所说，邪恶也会化为善举，带来好的结果。一个人可能孜孜然劝人为善而自己全不实行；一个法利赛人可能出于伪善和炫耀而在施舍盘里放上几块金子，但是坏人的金子和好人的金子一样都能养活孤儿寡妇。肉店老板和糕饼店店主关心的是主顾们的钱，而不是他们买肉、买饼的动机。一个具有幽默特性的文人必定具有慈悲心肠，所以感情丰富，易受感动而苦恼、而欣喜，能敏锐地体察周围人们种种不同的性情脾气，与他们共享悲喜爱恨。比如，这种人是仁慈的，生来能爱别人，而那种人满头红发，身高六英尺，就很可能暴躁易怒。因此我不想硬说文人具有行善的才能是什么特别的优点，他们中有些人就是喜欢那样做。一位绅士在文章中摆出一副慈眉善目时，完全不必作出任何牺牲；沉溺于最美丽、最辉煌的豪情壮志是一种奢侈行为，但决不会使人损失一个便士。我从自己的经验得知，文人一点也不比别人强；写过一本书的人不比一个管一本分户帐或一个从事任何其他职业的人好或坏。不过，我们还是要称赞他，就像我们称赞一个百万富翁在慈善布道会上向施舍盘里放上 100 英镑一样。他从来不放过赚钱的机会。通过一次顺利的投机买卖，他转手之间即可赚进一大笔钱，而在花钱时，他心里明白他在银行里的存款余额几乎用不完，而且付出这笔钱还可赚进更多。但是，在评价这项善举时，我们对于行善者还是多少有点感激的。对于那些天才人物同样如此，他们得天独厚，在付出他们的思想财富时十分大方，至少我们可以友好地、赞许地看待他们，而且感谢上帝的恩赐，他们不过是这种赐予物的分配者。我曾在某处说过——尽管我不知道其正确性如何，因为不论什么定义都决不会是全面的——幽默就是风趣加上爱；我确信，最好的幽默含有最大的人性，并以柔情和善意贯穿其中使之生色。这种爱并不要求不停地吐露和具体地表述。比如，一个好父亲在和子女和妻子谈话时，不会总是拥抱着他们或反复声明他对他们的爱；又如，一个男人在与情妇交往时——至少就我所不得不相信的而言——不会总是紧握她的手，在她耳边呻吟：“我的心肝宝贝，我真爱你！”在实际生活中，男子用他的行为和忠诚，用他要使自己所爱的人快乐的真挚愿望表现他的爱；在她出现时，他嘴上不说，双眼却闪出爱的光芒；她在场或不在场，这种爱都充溢于他心中；这种爱影响着他的全部言语和行动，布满于他全身；它使父亲整天高高兴兴地工作，支持他在外出期间或旅行途中度过沉闷乏味的时光，在对妻子儿女的思念中欢欢喜喜地回到家中。

这种爱不是突发一阵子，而是持续一辈子。毫无疑问，它使人在合适的时候亲吻爱抚；但是真情的心总是在深情地、忠实地跳动着，即使妻子不是手拉着手坐在他身旁或孩子们不是紧挨在他膝边。出于爱心的幽默也正是这样：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真诚的作家的生存习惯，就是这个仁慈的、温和的

法国剧作家莫里哀同名喜剧中的人物。身无分文，阴谋夺占一家富户的财产，后该国王识破，这个伪装虔诚的家伙原来是一个罪行累累的恶棍。

法利赛人，原指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犹太教中墨守传统礼仪的一派，后被用于指称拘泥形式，自以为讲求道德的人和伪善者。

心灵观察世界的方法——洋溢于他心中和表现于他风格中的甜甜的友情。尽管在那一页上也许看不出什么能激起感情浪花的风趣或机智，尽管并不要求你以哭或笑来赞扬他的天才，你还是认出了它。引起这个人或那个人激动的那种观念的撞击必定是偶然的。它们必然像我刚才说过的爸爸的拥抱一样，只能是间或有之的，不能指望他整夜吻着子女。作家的笑话和情趣，他的感情的奔放，他的灵气的勃发，必然不会过于频繁。对于每一个句子都闪射出思想火花的一页，对于经常从他的眼睛里或你的眼睛里像使用水泵那样地抽出眼泪来的感伤主义者，人们会感到厌烦的。人们会怀疑这种眼泪的真实性，这种幽默是否自然；一个人的眼泪和幽默都应该是真实的、诚恳的，就像他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应该是真实的、诚恳的一样；无论哭或笑，如果不在其时或过于频繁，都会令人失去尊严。

说起狄更斯先生的慈悲心肠，他给予我们大家的极大的爱，我们难道不该感谢这位仁慈的朋友吗？他长期以来抚慰我们的伤痛，使我们高兴起来，把乐趣和甜蜜的笑容带给千家万户，使儿童们快乐，他给予我们大量体恤别人的想法、美好的想象、温柔的同情和衷心的喜悦。狄更斯的创作使我获益良多，其中的人物十分可爱，与他们相识使人心旷神怡，恍如置身于一群优秀男女之中。这些人物周围的气氛有益于身心健康；你会感到有幸能与他们交谈是出于对你的好意；你与他们接触后分开时会觉得一切都较前更好；你与他们握手后会觉得你的手更干净了。还有比狄更斯的《圣诞欢歌》更好的慈善布道吗？它在全英国激起了深厚的好客友情；它是在圣诞节点燃千百处仁爱之火的工具；它带来了圣诞特有的美好感觉，以及潘趣酒、烤火鸡和烤牛肉。至于这个人给予孩子们的爱，他那和蔼可亲的、诚实的脑袋必定具有精灵才有的那种魔力。所有的孩子都喜欢他。我知道有这样两个孩子，他们对自己父亲所写的冗长沉闷的书只读一遍，对狄更斯的书却要读十遍。我知道一个女孩，高兴时，她读《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不高兴时，她读《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疲倦时，她读《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躺在床上时，她读《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无所事事时，她读《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读了一遍，又读一遍。这个年仅十岁的坦率的小评论家说：“爸爸，我喜欢狄更斯先生的书，他的书比你写的那些书好得多。”她还常常表示一种愿望：爸爸应该写出一本像狄更斯的著作那样的书。可是，谁能做到？每一个人都是以他自己的语言、他自己的方式说出他自己的思想的，若能具有像狄更斯那样的天赋，那就真是幸运，那种天赋把全世界的孩子都召集在他身边而且喜欢他。

对于狄更斯先生的写作技巧，我可能千百遍地加以挑剔，对于他的天才，我却只能感到高兴和惊讶。我以敬畏的心情说，我从他的天才里认出了一项神圣的使命：要从每一个人的眼睛里拭去每一滴眼泪。我满怀感激之情地从这爱与仁慈的盛宴中领取我的一份，那是这个和蔼的、慷慨的、仁慈的灵魂献给世界幸福的。我领取并喜爱自己的一份，为这一餐进行感恩祷告。

节译自《世界著名演说集》
何百华 译 容平校

查尔斯·狄更斯

1812—1870

英国著名作家，生于贫苦职员家庭，当过童工、缮写员和新闻记者。1836年应一家出版公司之约，为一套连环画写文字说明，次年将故事情节加以扩展，用喜剧笔法嘲讽资本主义社会，发表《匹克威克外传》，一举成名。此后佳作迭出，如《雾都孤儿》、《艰难时世》、《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作品从人道主义出发，鞭挞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主张用改良主义手段变革社会，被誉为批判现实主义大师。

狄更斯也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文如其人，他的演说幽深静远，耐人咀嚼，而且用语诙谐，有一种特殊的美感。本篇是他二度访美即将结束时，在纽约新闻界为他举办的告别宴会上的讲话。当时，南北战争刚结束不久的美国百废待兴，民族文学蓬勃发展，英美两国的文化交流趋于活跃。为了传播友情，增进了解，消除成见（世纪之初曾有过英美之战），狄更斯和一大批知名学者相继访美。因此，狄更斯在演说中首先谈到了他和美国友人之间的“为时已久的、自然的”交往，把自己的成功归于曾经在新闻工作上受到“锻炼”，并诙谐地给自己“规定”了宣传美国的“责任”。然后，他把话锋一转，从个人之间的友谊谈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并举了两个非常生动的例子，论述“英国人对美国的友情”。在结束演说时，他以极其夸张的语句表达了自己的主张：英美两国应该世代修好，而不能再度对立。

英国人对美国的友情

1868年4月18日

先生们，我最好是学你们杰出的主席__的样，首先谈谈他提到的关于你们和我之间的、为时已久的、自然的交往。在我接到纽约新闻界人士要我与他们共进晚餐的邀请时，我以对我曾从事过的职业的愉快回忆，和我在内心从未抛弃过的对报界同仁的真诚关心，接受了这一好意。我经常把我早年的成功，归因于我年轻时曾在严格的新闻工作中受到有益的锻炼，今后我的儿子们会证实，父亲始终坚定地为他曾借以上升的梯子感到自豪。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就只会得到他们对于父亲的很差的评价，但整个看来，大概我不至于得到那样的评价。因此，先生们，在任何情况下，这样的聚会都是令我分外感到有趣和愉快的。不过，我原以为这次聚会，像《天方夜谭》里仙人们的帐篷一样，只不过能容纳少数人，但我发现，就像是那一顶伸缩自如的帐篷，竟然容纳了一大群人，这使我为有幸成为你们的客人而倍感高兴；因为你们很快就会相信：我的款待者在美国新闻界的代表性越高，我所感受到的这一巨大机构对我的好意和感情就越深。

先生们，从今以后，我要给自己规定这样一项责任：不仅在这里，而且在任何地方的每一个适宜的场合，表达出我对第二次访美时所受到的款待和高度感激之情，提供我对这个国家的慷慨、高尚行为的公正证明，并且表明我是如何被我所看到的各方面惊人变化所震惊。请相信我，我决不会狂妄自负地认为我在25年来没有变化，以致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东西，没有产生足以纠正我第一次访美观感的强烈印象。

先生们，我自己对美国的感情和兴趣，看来可以很自然地转变为我的同胞们的感情和兴趣，但是，不管怎样，我是以一个公开的目的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的。大约在去年圣诞节，就在纽约，有人问我：美国人，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英国是不是会处于某种不利地位。把在英国的美国人视为外国人，以这种眼光去考虑他、谈论他，这样的观念在我看来是非常不恰当的和荒谬的。在那次谈话中，我表现得过分严肃。在恢复了正常的严肃性后，我说，多少年来我希望像任何一个活着的英国人一样，有着同样多的美国朋友，同样多的美回来访者，并且希望他们的经验会加强我的一条不变的经验：一个美国人在英国到处都会充分地受到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关心。关于这一点，我可以立即说出两个人的情况。其中之一是一位很有艺术修养的美国绅士。某一星期日，他来到一座以收藏绘画而名垂史册的英国城堡的墙外。根据关于星期日的严格规定，起初不允许他进入城堡。但是仅在他说明自己是一名正在旅行的美国人以后，不但画廊，连整个城堡都立即让他入内参观了。另一个是一位女士，她在伦敦非常想看一看著名的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她借住的那家人家告诉她这事很遗憾办不到了，因为博物馆停止开放一星期，而她在伦敦只能再停留3天。这位女士后来告诉我，她独自走到博物馆门前，自我介绍是位美国女士，大门就神奇般地敞开了。我虽不情愿但不得不补充说，她当然十分年轻，而且特别漂亮。不过，博物馆看门人是个大胖子，而且据我认真观察，他是一个不易被人打动的人。

这里，先生们，我附带提到这些小事是为了向你们肯定：如我所希望的那样，英国人对美国人像对英国本国人一样诚恳，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反对的观念。在两个伟大的民族之间，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不一致的地方。然而在英国广泛地传播着、洋溢着这样一种感情：这两个伟大的民族实质上是一家人，他们共同负有高举盎格鲁-撒克逊旗帜的责任（这一点我们的主席已经谈到了），还要把她的一切成就展现在全世界面前。如果我对我的同胞们还是有所了解的活——他们相信我是了解一些情况的——如果我对我的同胞们有所了解，先生们，英国人的心已为星条旗的飘扬而激动了，尽管除了自己的旗帜外，他们一般不为其他任何飘动的旗帜所激动。如果我了解我的同胞，我知道他们不像安东尼·艾布索列特爵士所说的，像恋人们惯常表现的那样，英国人起初“略带厌恶”、却又深怀好感与尊敬来对待他们同美国的一切关系；不论当时有过什么样的小情绪，也不论现在、将来、这里、那里会有什么样的小小的官僚脾气和官僚政策，请相信我的话，英国人普遍给予美国人的持久的、极大的关心是一种富有正义的思想。

最后，先生们，我讲一个问题请予指正。我的确认为，在大西洋两岸众多的、诚实的、有思想的人中，不会没有这样一种看法：让地球被地震震碎，被彗星烧毁，被冰山撞翻，把它扔给北极的狐狸和熊，也比在描述英美两国时，把它们再度对立起来好，因为这两个国家通过各自的方式，抓住各自的时机，努力而成功地争取了自由。先生们，对于你们的主席和你们大家如此友好、亲切地对待我的健康和我所讲的一些肤浅的意见，我感激不尽，但请相信我，我的确是以我的心灵所能具有的最大的热情来感谢你们的。

节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何百华 译 井力 校

马克·吐温

1835—1910

美国小说家，幽默大师。生于密苏里州佛罗里达镇，原名塞缪尔·克莱门斯。11岁丧父，13岁辍学。当过排字工、领航员、士兵、记者，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1863年用马克·吐温的笔名开始写作，发表轻松幽默的短篇小说集《卡拉维拉县驰名的跳蛙及其他》，名声大噪。此后，至1910年4月溘然长逝，写过大量幽默随笔、幽默散文和幽默小说，还作过大量幽默演说。他的作品不但以幽默讽刺见长，而且语言简练生动，具有鲜明的美国民族特色。

这里选了他的4篇最有代表性的幽默演说。《新英格兰的天气》是在纽约新英格兰学会第71届年会午宴上的讲话，把当地的气候特点描绘得淋漓尽致，通篇妙趣横生，令人捧腹。《婴儿》发表于芝加哥军人俱乐部。当时，田纳西陆军军团600名退伍军人欢聚一堂，为巡访欧亚归来的格兰特将军接风洗尘，于是，马克·吐温欣然登台，以“婴儿”为题发表了这篇广为流传的祝酒词。《女人，上帝保佑她！》是在新英格兰学会宴会上发表的又一篇令人绝倒的演说，虽然马克·吐温以“女人”为题的幽默讲话不下数十篇，但以此篇为最。《七十岁生日感怀》充分表现了他的后期演说的特点。如果前几篇是纯粹的幽默，为幽默而幽默，那么，这一篇则是幽默加上讽刺，加上自嘲，再加上对现实生活的愤恨和批判。

新英格兰的天气

1876年12月22日

先生们：

本人虔诚地相信，造物主创造了我们大家，创造了新英格兰的一切——就是没有创造出天气。〔笑声。〕我不知道创造新英格兰天气的是何许人，但我想，这些人一定是风伯雨师工场里的新学徒。他们为衣食而在新英格兰做实验和学习，然后，被提拔去专为需要优质服务的地区研制天气，如果达不到目的，他们就把当地的生意拉走。〔笑声。〕

新英格兰的天气种类繁多，令外乡人不胜感叹——和遗憾。〔笑声。〕天气总是忙个不停；总是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业务；总是拿起新时装，试着往人们的身上套，看看反映如何。〔笑声。〕春季的业务最忙，据我统计，24小时内共有136种不同式样的天气。〔笑声。〕在庆祝美国独立一百周年的博览会上，某人展出了他奇迹般地收藏的各种天气，令外国人惊叹不已。但是，使此君出名和发财的是我。他原打算周游世界，采集各种天气的标本。我对他说：“别那样干！找一个晴朗的春日到新英格兰来吧。”我告诉他我们能做些什么；从天气的风格，到天气的种类，再到天气的数量。〔笑声。〕他果然来了，而且只花了四天，就完成了收藏工作。〔笑声。〕关于种类——呵，他承认有好几百种天气是他前所未闻的。至于数量——啊，在挑选并剔除了所有被污损的部分之后，他不仅数量充足，而且还有盈余，可供外借、出售、储存、投资和接济穷人。〔笑声、掌声。〕

新英格兰人虽有忍耐和克制的天性，但对有些事情却偏偏不能忍受。年复一年，他们都要扼杀许多讴歌“美丽的春天”的诗人。〔笑声。〕一般来

说，这些诗人都是漫不经心的游客，他们从异国他乡带来了春天的概念，自然也就无法知道当地人的感受。因此，他们所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永远失去了了解新英格兰人的感受的机会。〔笑声。〕古老的概率论因其准确的预测而声名卓著，它完全应该享有这份荣誉。你拿起报纸，就能注意到它多么干脆和自信地核对未来的天气并一一打勾——从太平洋沿岸，到南方各地，中部各州，再到威斯康星地区；它对自己的能力沾沾自喜，顾盼自雄，直到抵达新英格兰，它才变得垂头丧气。〔笑声。〕它不知道新英格兰未来的天气如何。它讲不出来，就像讲不出合众国明年将有多少个总统。〔笑声。〕经过反复考虑，它终于得出了以下大致结果：可能是东北风，时而偏南、偏西、偏东或哪儿部不偏；气压或高或低，而且因地而异；某些地区可能有雨，有雪，有冰雹或出现干旱，之后或之前有地震，还伴有电闪雷鸣。〔哄堂大笑和喝彩声。〕为防不测，它又从纷繁的思绪中，草草整理出一段补充说明：“但十分可能的是，全部预报内容也许会随时改变。”〔大笑。〕

是的，新英格兰的天气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就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的不确定性。只有一点可以确定——你可以肯定天气将变幻无穷。〔笑声。〕这真是一个总结性的意见。然而，你却永远无法知道变化的顺序。你为迎接干旱作了安排，你把雨伞束之高阁，并拿起喷水壶冲出门外，但十有八九，你会被洪水淹没。〔喝彩声。〕你断定快要发生地震了，于是，你抓牢某样东西稳住自己，但到头来你却遭到了雷击。〔笑声。〕这些都非常叫人失望，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笑声。〕那儿的闪电也很奇特，它专打有罪之徒。它击中某人，并不留下足够多的残骸供你们辨认——嗯，你们会以为被击中的人一定很有价值，其实是一位国会议员。〔哄堂大笑和喝彩声。〕

再说打雷。雷公开始调试乐器了，他拨拨这件，拉拉那件，上紧琴弦，准备演出。这时外乡人会说：“怎么搞的，你们这儿的雷声太糟糕了！”但是，当雷公举起指挥棒，真正的音乐会开始后，你们就会发现那个外乡人躲进了地窖，还把头伸进了垃圾桶。〔笑声。〕

至于新英格兰天气的规格——我指的是长度——它与这块小地方根本不成比例。〔笑声。〕当新英格兰最大限度地布满了某种天气以后，你们有一半时间会发现，这种天气会撑破边界，向邻近各州延伸数百英里。〔笑声。〕新英格兰甚至无法容纳自己的天气的十分之一。各位到处都可以见到裂缝，那是它在极力容纳时留下的伤痕。〔笑声。〕

我虽可大谈特谈新英格兰天气的不近人情，但只想举一个典型例子。本人喜欢聆听雨水落在铁皮房顶上发出的声音，所以就在房顶上盖了一块铁皮，期待着能尽情享受一番。唉，先生们，各位以为雨下在铁皮上了吗？错啦，先生们，每次都正好错过了铁皮！〔笑声。〕

各位请注意，我的演说仅仅是想对新英格兰的天气表示敬意；任何语言都难以公正地对它评判。〔笑声。〕但是，新英格兰天气中至少有一两样东西（如果各位愿意，也可以说是它的产品），我们作为居民是不想放弃的。〔笑声。〕我们的秋天尽管没有令人陶醉的落叶，我们还是该赞赏它，因为它有自己的特色，而且这个特色弥补了它的反复无常。这就是冰暴。当寸叶不挂的大树从树梢到树根都披上一层水晶般明澈纯净的冰，当每根枝条挂满冰珠和冰凌，她就犹如波斯国王闪烁着银色寒光的钻石羽毛。〔掌声。〕然后，风儿轻摇树枝，太阳出来了，成千上万颗冰珠变成了棱镜，闪烁着五彩缤纷的火花，从青到红，从红到绿，从绿到黄，瞬息万变。她成了一道闪光

的喷泉，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珍珠。她婷婷玉立，表现出极其完美的艺术或天性，令人着迷，令人心醉，令人无法抗拒！我们无论用怎样的词句来描述也不为过分！〔经久不息的掌声。〕

月复一月，我心中积满了对新英格兰天气的怨恨。但是，当冰暴终于来临，我说：“好吧，我现在饶恕你了；咱们的帐清了；你不欠我一个子儿；走吧，再去作孽吧；你那些小毛小病算不了什么；你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天气！”〔掌声、笑声。〕

译自《马克·吐温演说集》

王建华 译 井力 校

婴儿

1879年11月13日

主席先生，各位先生们：

“为婴儿祝酒！”真是妙不可言。

我们并非都能有幸做过女人；我们也并非都做过将军、诗人或政治家。但是，轮到为婴儿祝酒，我们就有了共同点——因为我们都做过婴儿。〔笑声。〕几千年来，世界各地在举行宴会时竟完全忽视了婴儿，好像婴儿一点也不重要。这大不像话！先生们。如果各位静思片刻——如果各位回到50年或100年前，回到婚后不久的岁月，并再度凝视你们的第一个小宝贝——各位就会记起他非常重要，而且岂止是重要。〔笑声。〕

你们军人都知道，当那个小家伙来到你家的大本营，你就得递交辞呈。他掌管了全部指挥权。你成了他的随从，他的保镖。你还得侍奉左右，恭候吩咐。他这个司令官不考虑时间早晚，距离远近，天气好坏，或其他任何情况。不管有无可能，你都得执行命令。而且，他的战术教范只有一种行军方式，那就是跑步。〔笑声。〕他对你百般蛮横，百般无礼，而你就算浑身是胆，也不敢吭声。你可以面对多纳尔森和维克斯堡的死亡风暴并奋勇反击；但是，当他抓你的胡子，扯你的头发，拧你的鼻子，你却不得不忍气吞声。

〔笑声。〕当战争的雷声在你的耳际响起，你迎着炮火迅猛前进；但是，当他像印第安人那样开始发出令人恐怖的战斗呼喊，〔笑声〕你却大踏步地后撤，而且你还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当他嚷着要喝止咳糖浆，你敢脱口说出自己的意见吗？你敢说有些服务项目不适合一位军官和绅士吗？不，你会起身去拿糖浆！如果他吩咐你去拿奶瓶，但瓶里的奶不热，你会顶嘴吗？不，你会行动起来，你会去把奶热一下！你在“仆人工作室”里竟然如此屈尊俯就，以致于亲口尝尝那不冷不热的玩意儿，看看是否正好！嗯——3份水，1份奶，加一点糖来减轻“肚子疼”，再加一滴薄荷油来防止那顽固的呃逆。我至今还记得那玩意儿的滋味！〔哄堂大笑。〕

你这样下去学会了多少东西哟！多情的年轻人仍然笃信一个古老的传说：婴儿如果在睡梦中微笑，是因为天使在对他讲悄悄话。太美了，但是太不可信了——那只是肠胃发出的嘀咕声而已，朋友们。〔笑声。〕如果你的小宝贝提议在老时间，即在凌晨两点半散步，你难道不立即起身，并说你正

指美国内战期间，格兰特指挥的军团在多纳尔森和维克斯堡两地大败南军。

想提议这样做吗？哦，你是训练有素的！你身穿“便服”，〔笑声。〕怀抱宝宝，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踱步；你不顾尊严地、咿咿呀呀地信口胡扯；你甚至还亮出军人的嗓门，努力唱上一曲“宝宝乖——宝宝睡——”。田纳西军团真是出足洋相了！而邻居也真是苦恼透了！因为在一英里之内，并非人人都喜欢在凌晨3点欣赏军乐。〔笑声。〕你这样持续了二三个小时，而你的茸头小上司却示意，操练和歌声对他再合适不过，并建议在这条战线上打到底，即使要打一个整夜——继续战斗吧！你怎么办？你只能继续战斗，直到筋疲力尽倒下为止。〔笑声。〕

我喜欢“婴儿一点也不重要”的想法！为什么？因为一个婴儿只会把整幢房子都占为己有，并搞得一团糟；一个婴儿就会使你和你的内务部忙个不停；他勇于进取，难以控制，往往目无法纪；无论你采取什么手段，都无法使他恪守常规。一个孩子就够你受的了。如果你还有理智，千万不要祈求生双胞胎。双胞胎意味着骚乱不已，而三胞胎无异于造反。〔大笑。〕

现在，在全国三四百万个摇篮中，有几个摇篮将被我国视为神圣的文物而世代地保存起来——如果我们知道是哪几个的话。因为在其中一个摇篮中，一位迷迷糊糊的未来的法拉格特此时正在出牙——各位想一想出牙时的情景吧——他还非常热切地咕哝了一句什么，虽然口齿不清，但是情有可原；在另一个摇篮里，未来的天文学家正没精打彩地对着闪烁的银河眨眼，思忖着另一位叫做奶妈的人的下落；在第三个摇篮里，未来的大史学家正躺在那儿，无疑要躺到这平凡的使命完成为止；在还有一个摇篮里，未来的总统并不在为国家大事而操劳，却在为头发这么早出了问题而烦神；〔笑声〕在一长列其他摇篮里，大约有6,000名谋求官职者，现在正准备再向这位未来的总统提供解决这一老问题的机会！在美国国旗下的某地还有一个摇篮，里面躺着美军未来的总司令，他此刻并不在为将来的威严和责任犯愁，而是开动着他的全部战略头脑，想方设法把大脚趾伸进嘴里——这并非对今晚显赫的贵宾有何不敬，而是说，56年前他也曾把注意力放在这件大事上！如果说从小看到大，三岁看到老，那么，只有极少数人才会怀疑他取得了成功。〔笑声、经久不息的掌声。〕

译自《马克·吐温演说集》

王建华 译 井力 校

女人，上帝保佑她！

1882年12月22日

祝酒对象一般都包括女性；只要看到有女人，人们就会考虑周到地向妇女祝酒。让我们考虑一下女人的方方面面吧。

首先是衣着问题。这是应予考虑的最重要的事，必须首先处理好，然后

此话曾出自格兰特将军之口，为内战期间向部队下达的战斗命令。

听众中坐着屡建战功的谢尔曼将军，他刚刚有了一对双胞胎。

美国海军上将，在内战中立下显赫战功。

Milkyway，直译为“牛奶路”，与下文的“奶妈”相映成趣。

指格兰特将军。

才能聪明地进一步研究这个题目的更深奥的方面。为了紧扣这个题目，让我们看看两种截然相反类型的衣着——中非未开化妇女的衣着和生活于我们现代高度文明中的有教养姑娘的服装。在一个名叫范族的黑人部落中，妇女无论在家，还是外出购物或访友，除了她自己一身皮肤外什么都不穿。〔听众大笑。〕她穿的就这些，她的全套服装就这些。〔笑声。〕那是世界上最轻便的服装，是以颜色最黑的材料制成的。〔笑声。〕它常常被人误认为是丧服。〔笑声。〕那是现在流行的最整齐、最简洁、最优雅的服装；它穿起来很舒服，永不褪色，不怕被弄脏，所以你不必把它送到街上去洗，不必担心会被熨斗烫焦，把钮子烫掉，或被浆得太硬，被小牛嚼碎，被醋腐蚀，或者被换成其他顾客的那些除了外观神圣庄严外别无优点的衣服，或者送去 1 打衣服，有 10 件收费过高，剩下 2 件却又丢失了。〔大笑。〕而且它永远是合身的，是衣服中最合身的。〔大笑。〕它是整个时装范围内最方便的服装。它总是现成的，总是“做好了”。在你去拜访一位范族妇女，拿出名片时，女仆决不会说：“请坐，夫人正在更衣打扮，她将在 3 刻钟后下来。”不，夫人总是衣冠楚楚，可以随时接待客人；你还没走到擦鞋垫跟前，她已来到你面前。〔笑声。〕因此，同样的道理，范族妇女不必上教堂去看别人穿什么，也不会回家来描述那套衣服并加以低毁。〔大笑。〕

至于每天的梳妆打扮，未开化的黑人姑娘也极其简单。因为，说来奇怪，她竟与文明的白人姑娘有着某种联系——后者也常“没有什么好穿戴的”；这两种类型迥异的妇女在一个共同基础上一致起来了。是的，范族妇女就是这样以其简单的、朴素无华的日常打扮出现于人前的。不过在正式场合中她就讲究些了。赴宴时，她戴手镯；听讲时，她戴耳环，束腰带；参加舞会时，她穿长统袜——而且，由于女性天生喜欢炫耀，她把袜子套在手臂上〔笑声〕；在丧礼上，她穿着柏油色和灰色的上衣〔笑声〕；在婚礼上，有钱的新娘还会穿上裤子。〔大笑。〕这样，未开化的黑人姑娘和文明的白人姑娘又一次在共同基础上一致起来了，她们的天性使她们的整个世界亲近起来。

现在我们要考虑其他方面的服饰。文明姑娘的一大部分是她的服饰——事情原应如此。某些文明妇女如果没有服饰会失去一半魅力，有些会失去全部魅力。〔大笑。〕一个最大限度打扮起来的现代文明姑娘，是以精致、优美的艺术和金钱造就的奇迹。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所有艺术都被贡献出来，让她打扮自己。她的内衣裤来自贝尔法斯特；她的睡袍来自巴黎；她的网眼织品来自威尼斯，或西班牙，或法国；她帽子上的羽饰来自遥远的南非；她的毛皮衣服来自冰山和极光的故乡；她的扇子来自日本，钻石来自巴西，手镯来自加利福尼亚，珍珠来自锡兰，多彩浮雕宝石来自罗马，小饰物来自被湮没的庞贝，其他一些优美饰物是仿照埋在上中已 4,000 年的埃及式样制成的；她的手表来自日内瓦，名片夹来自中国；她的头发来自——来自——我不知道她的头发来自何处；我永远找不出那个地方。〔笑声。〕我是说，她的另外一种头发——她抛头露面时的那种头发，她星期日的头发；我不是说她睡觉时的那种头发。嗨，你们应该知道我所说的这种头发，那就是她称之为假长发的东西。它像柔软的鞭子，又像砖块，或猎枪，或你在惩治别人时所用的东西。那就是卷起来一圈圈地盘绕在她头上形成一个蜂巢，然后把末端塞在蜂巢下面，用发夹像鱼叉叉鱼般地将它夹住。这倒使我想起了一个小事。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在一节普尔曼豪华卧车的地毯上扫上一眼，就可以捡起一枚发夹。只要你不想保全自己的性命，你尽可试试看使车厢内任

何一位妇女承认那枚发夹是她的。这不是很奇怪吗？可这是真的。那些一辈子从未背离过忠诚老实的硬性原则的妇女，面对这种严峻考验，必定会否认那枚发夹是她的。〔笑声。〕她会在100个证人面前否认。我曾愚蠢地想找出普尔曼式卧车内一枚发夹的主人，从而遇到了比我一生中因其他有失检点的行为所招致的麻烦还多的烦恼，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好，你们看到了文明姑娘打扮起来后是什么样子，也看到了不打扮的未开化的姑娘的模样。这就是从服装方面来看的女人。我现在还得考虑到女人的更高尚、更尊贵的方面——把她们视为母亲、妻子、寡妇、离了婚的妇女、岳母、女仆、电报员、电话接线员、王后、售票员、奶妈、继母、老板、有职业的富态女性，有职业的机灵女性，有职业的美女，等等，等等。〔笑声。〕

我且说这些——让其余的妇女在我们下次再谈前暂时留在遥远的隐居地吧。应该首先放在祝酒名单上的，我们应该向之表示感激的，是这样一个女人——啊，天哪，我已经谈了3刻钟！请原谅我1000次。但你们自己知道我承担了一份艰巨的任务。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完成了一些，我已经讲了我的题目。如果在下一次祖先纪念日，再以这样一个亲切而高雅的话题所应得到的恰当而赞赏的口吻谈论一番，我就十分满意了。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让我们像开始时那样结束，不开玩笑而十分诚恳地说：“女人——上帝保佑她！”〔鼓掌。〕

译自《马克·吐温演说集》
何百华 译 井力 校

七十岁生日感怀 1905年12月5日

我一生度过许许多多生日。我清楚地记得第一个生日，而且想起来就生气。一切都那么粗俗，那么没有美感，那么原始，和今晚迥然不同。没有起码的准备；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对于一个生来就具有高超、精妙本能的人，嗨，甚至连摇篮都没有给他粉刷一下——一切都毫无准备。我没有头发，没有牙齿，没有衣服，我不得不出席我的第一个宴会。人们蜂拥而至。那是密苏里森林中的一个小乡村——甚至称不上是乡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落。那儿似乎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村民们兴致勃勃倾巢而出。他们仔仔细细地打量我，要看看我身上有什么新鲜东西。嗨，那个村子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我是那儿很久以来唯一的实实在在发生的事。虽然我对自己说实际上并非如此，可我仍然是那个村子两年多来发生的唯一真实的大事。于是，人们来了。他们怀着乡土气十足的好奇心，怀着同样乡土气十足的坦诚来了。他们从头到脚审察我，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并没有人问他们。假如有人夸我，我也不会在意，可是没有人夸我。他们的看法全都充满妒忌和偏见，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听凭他们评头论足——你们知道我很谦虚，我全都忍住了。我忍了一小时，然后，蠕虫反抗了。我就是蠕虫，轮到我反抗了。我果然反抗了。我十分清楚我的地位所具有的力量；我知道，我是全村唯一没有沾染缺点的

即12月22日，为美国纪念清教徒前辈移民在普利茅斯登陆的日子。

西方民谚，意即逼人太甚，最温顺者也会反抗。

纯洁而清白的人。于是，我挺身而出，直言不讳。他们目瞪口呆。事实就是如此。他们脸红了，他们不好意思了。嗯——那就是我平生所做的第一次餐后演说，我想那是在餐后。

从第一次演说到今天，相距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以为，那次是我的摇篮曲，而这次是我的绝唱。我习惯于绝唱；我已经唱过多次了。

今天是我 70 岁生日。我很想知道，诸位是否都了解 70 寿辰这个词的实际范畴，是否认识这个命题的全部意义。

70 寿辰！这是人们获得一种新的、令人敬畏的尊严的幸福时刻。这时，你可以把压抑自己达 30 余年的故作深沉弃之一旁，无所畏惧，泰然自若地站在人生的七级顶峰向下观望，教诲他人而不会受到指摘。你可以向世人讲述自己是如何到达那儿的——那是他们都要做的事。你将永远不知疲倦地讲述自己如何精妙绝伦地、百折不挠地攀登那块宝地的。你将以老年人的狂热，说明走过的道路，描述其中的细节。很久以来，我一直渴望说明我自己的方法。现在我终于拥有这个权利了。

我用通常的方式活到了 70 岁，我恪守一套足以置他人于死地的生活方式。这听上去言过其实，可确实是长寿的一条普遍规则。我们在考察任何一个喋喋不休的老人的生活安排时总是发现，导致他们得以长期依靠继承人的财产生活的那种生活方式，如乔特先生所言，会使我们提前退役。在这里，我提出一条可靠的座右铭：走别人的路不能长寿。

现在，我要说教了。我要把我的生活方式，提供给所有想利用我 70 年来击败医生和刽子手的方法进行自杀的人。某些细节听上去或许不太真实，可事实确实如此。我不是来这里骗人的，我是来教导人的。

40 岁以前，我们并未养成固定不变的生活习惯。40 岁后，生活习惯开始形成，很快就僵化了。于是，事情就来了。我打 40 岁以后，就寝和起床时间就一直很有规律——这是很重要的。我立了一条规则，在没有人陪伴时上床；我还立了另一条规则：在不得不起床时起床。这样就形成一条不可动摇的、没有规律的规律。这条规律使我延年益寿，却会伤害他人。

在饮食方面——这是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一向执拗于食用那些不适合我的食品，直到决出胜负为止。最近，我就占了上风。但在今年春季，我停止了午夜后吃碎肉馅饼的嬉戏。在那以前，我一直认为那不是负担。30 年来，我在早晨 8 点喝咖啡、吃面包，然后，茶饭不进，直到晚上七点半。11 个小时。这种生活方式完全适合于我，有益健康，因为我一生从未头痛过。但是，常患头痛病的人走这条路不会舒舒服服地活到 70 岁。他们如果想尝试一下，那就太蠢了。我要向诸位强调这一点——我认为这是明智的：诸位如果发现自己只有走一条不舒服的路才能活到 70 岁，那就别走这条路。如果他们把普尔曼式车厢开走，让你们退到充满异味的吸烟车厢，那就收拾起你们的物品，结好帐，然后在第一个有墓地的中途站下车。

我制定过一条规则：一次吸烟不超过一支。关于吸烟，我没有其他限制，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只知道那是在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因而我吸烟很谨慎。父亲于 1847 年初去世，那时我刚 11 岁。从那以后，我就公开抽烟了。作为他人的榜样，而不是要节制自己，我的规则一直是：睡着时，决不抽烟；醒着时，决不戒烟。这是一条好规则。我是指对我而言。但是诸

位中有人清楚地知道，它并不适合于每一个试图活到 70 岁的人。

我在床上抽烟，直到必须入睡时为止。夜间醒来——有时一次，有时两次，有时三次，我从不放弃这些机会抽烟。这个习惯对我来说太悠久，太可爱，太珍贵了，一旦失去，我的感觉就会像主席先生失去他所得到的唯一的宝贵东西时的感觉一样——我不是在指责谁。我想在这里承认，我曾有几个月不时地停止吸烟，但这不是依照原则行事，而只是为了炫耀；那是为了粉碎那些说我是习惯的奴隶，说我不能打破自己的桎梏的批评家们的谎言。

从我开始最大限度地抽烟，至今已整整 60 年了。我从不买那种带过滤嘴的雪茄。我早就发现那种烟对我来说太贵了。我总是买廉价烟——至少是价格适当，比较便宜的。60 年前，我花 4 美元买一筒烟，但后来我的品位提高了，现在我买 7 美元一筒的烟。6 美元或 7 美元。我想是 7 美元。是的，是 7 美元。但包括圆筒在内。我常在家里举行烟会，但来者往往是刚刚发过誓要戒烟的人。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至于喝酒，我没有制定过有关规定。别人喝酒，我喜欢助兴；不然，我滴酒不沾。这是出于习惯，也是出于爱好。滴酒不沾无损于我，但很容易伤害你们，因为你们不同。你们就随它去吧。

我从 7 岁以来很少眼药。但是在 7 岁以前，我以对抗疗法所用的药品为主食。不是我需要吃那些药，我认为我并不需要，而是为了节约。我父亲盘了债户的一家药房，这样一来，鱼肝油就比其他早餐便宜了。我们有 9 桶鱼肝油，我整整吃了 7 年。以后我就“断奶”了，而我家其他人不得不吃大黄根、吐根等诸如此类的药。因为我是宠儿。我是第一个“美孚鱼肝油托拉斯”。鱼肝油都是我的。到药房吃空时，我的体格已经定型，从此安然无恙。但是，诸位明鉴，让一般儿童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向 70 岁迈进是愚蠢的。这件事恰恰适合我，可它纯属偶然，一个世纪内不可能再度发生。

除了睡觉和休息，我从来不运动，我也从不打算进行任何运动。运动令人生厌。当你疲劳时，运动没有一点好处；而我总是疲劳。但是，让另外一个人来试试我的方式，看他会有什么后果。

现在我想重复并强调一下那条箴言：走别人的路不会长寿。我的生活习惯保护了我的生命，但会要你们的命。我过的是一种严格遵循道德规范的生活。但是，如果别人也尝试过这种生活，或者我建议大家采用这种生活方式，那就错了。很少有人会成功：你们必须储备大量的道德；你们拥有的道德不能一鳞半爪；你们必须完备地拥有，并置于自己的宝盒之中。道德是一种获得——如同音乐，如同外国语，如同虔诚、扑克和瘫痪——没有人生来就拥有道德。我本人就是这样，我开始时很穷，毫无道德。这幢房子里几乎没有人比我那时更穷了。是的，我就是这样开始的——面对世界，没有道德，甚至连一种保过险的道德都没有。我能记得我所得到的第一个道德。我能记得当时的景色、气候，……我能记得所有情景。那是一个老道德，老的，二手的道德，不管怎么说，一切都失修，一切都不合适。但是，如果你们关心这样一件东西，置之于干燥处，留着它参加队列行进，参加肖托夸夏季教育集会 和世界博览会等，不时为它消毒杀菌，间或为它粉饰一新，你将会惊讶地看到，她经久耐用，甜美如初，至少不伤害人。当我得到那个陈腐的老道德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流行美国的一种类似暑期学校的活动，常在野外举行，寓教育于娱乐之中。因创始于纽约州的肖夸托而得名。

时，她已经停止生长了，因为她没有运动。经过这样的培育，她的力量和身材难以置信地渐渐增加了。她为我服务得很好，在 63 年中成了我的骄傲和欢愉。接着，她开始同保险公司的总裁们交往，渐渐消瘦，失去了个性。她看上去让人难受，并且不再胜任工作了。她是我的一大损失。然而并非全部损失了。我卖了她——啊，可怜的骷髅，她成了一具骷髅——我把她卖给了比利时的海盗利奥波德；他又把她卖给了我们的大都会博物馆。博物馆得到她感到很高兴，因为她不穿衣服，有 57 英尺长，16 英尺高，他们认为她是一条雷龙。是的，她看上去就像一条雷龙。他们相信，培育她的配偶需要 19 个地质期。

道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每个人生来就充满罪恶的细菌，唯一能够消灭这些细菌的就是道德。现在，你们选择了一个无菌基督徒——我的意思是，你们选择了我这个无菌的基督徒，因为只有这一个……亲爱的先生们，希望你们不要用那样的眼神看我。

70 岁！这是基督教《圣经》神圣地定下的人生大限。从此，你们不再需要服役了；对于你们，紧张的生活已经结束，你们的服役期已满。用吉卜林的军事术语来说就是：你或好或坏地服了役，你退伍了。你成了共和国的荣誉成员，你解放了，强制手段不是针对你的，除了“熄灯号”外，其他号声都不是针对你的。如果喜欢，你可以支付那些过期的税单；如果愿意，你也可以不付，而且不会受到歧视，因为从法律上说，这些税是可以不收的。

40 年中给你带来这么多痛苦的“已与别人有约在先”的托词，你可以永远抛在一旁了；在坟墓的这一边，你永远不会再需要它。如果你因想到夜晚，想到冬季，想到参加宴会的晚归，想到空寂的大街上的灯光和笑声而退缩——这种孤寂现在不会像在过去 30 年中那样提醒你，朋友们已经入睡，你必须踮起脚轻轻走动，不要惊扰他们，而只是提醒你不必踮着脚走路，你再也不会打扰他们了——如果你在想到这些仍会退缩，那就回答说：“你们的邀请使我感到荣幸，使我高兴，因为你们还记得我。可我 70 岁了。70 岁了。我要舒舒服服地坐在壁炉边抽我的烟斗，读我的书。我要休息。衷心祝大家好。当你们也抵达人生第 70 号码头时，你们可以心境平和地登上下一班航船，心情愉快地朝着正在下落的太阳驶去。”

译自《马克·吐温演说集》
王寅 译 井力 校

乔治·柯蒂斯

1824—1892

美国共和党人，演说家，文官制度改革领袖。生于罗得岛普罗维登斯。曾在农场打工，后周游欧洲、埃及、巴勒斯坦等地。回国后成为《纽约论坛报》、《哈泼斯杂志》作者，频频发表游记和政治演说，声誉鹊起。亲友敦促其从政做官，一概拒绝。1871年接受格兰特总统任命，出任文官制度改革委员会主席，政绩斐然。晚年任纽约大学校长。本篇发表于纽约新英格兰学会举行的年度宴会，时值美国大选陷于僵局，各派政治势力激烈较量。作为一名共和党人，柯蒂斯必然要为本党总统候选人海斯效力，因而就有了这篇著名的“助选演说”。但是，由于演说者德高望重，且谈吐诙谐，所以会场气氛十分活跃，笑声、喝彩声、掌声此起彼伏。他把新英格兰、“扬基”、清教原则，与竞选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呼吁人民超越派别分歧，从而达到了预期目的。在稍后举行的投票中，海斯以一票微弱优势入主白宫。

清教原则和美国人

1876年12月22日

艾扎克·沃尔顿在其《垂钓者》一书中说，博特利尔博士有一句口头禅：“毫无疑问上帝本来会造出比草莓还要好的浆果，但毫无疑问他从未这样做。”〔笑声。〕我想，如果我说“毫无疑问本来会有比新英格兰更好的出生地，但毫无疑问这个地方并不存在”——我就说出了在此欢聚的人们的内心感受。〔掌声、笑声。〕

先生们，你们若要看一看说明这条清教原则的威力的真凭实据，你们只要想一想：新英格兰人特有的地区性雅号，现在已成为全体美国人的称号了。〔笑声、喝彩声。〕在座各位无论来自哪个州，对欧洲人来说都是“扬基”〔笑声。〕；合众国今天只是个大“扬基国”。你们问我清教原则是什么？你们问我这条原则是否像昔日一样有用？是否适用于每一次全国性紧急事态？是否适用于此时此地？我认为，我们既不必怀疑，也不必畏惧。从本质上说，清教原则就是个人自由，并由此萌发出宗教自由和政治平等。州政自由，教派自由，学术自由——这三条就是美利坚民族及其安全的三重盔甲。〔笑声、掌声。〕但是，清教徒尽管因其自由思想而超群绝伦，却历来把自由置于法制之下，从未使自由脱离法制。约翰·鲁宾逊在给扬帆起航的清教徒的信中说过这样的话——这些话不妨铸成金字，放在诸位提及的未来宴会厅的门楣上：“你们知道，法官肩负着上帝的尊严和权威，这一观念得到了无论多么平凡的人的尊重。”〔掌声。〕这就是清教徒的原则。这些清教徒代表了法制之下的自由。他们长期在风雪交加的大海上颠簸漂泊；他们在航程中思绪万千；他们知道，单纯的民众意向只是一阵飓风，它冲击着无舵无帆之船，使它在礁石上撞得遍体鳞伤。但是，法律之下的民众意志同样是一阵飓风，它依照舵手的指令鼓满风帆，使船只掠过张牙舞爪的海底深渊，安然入港。〔热烈鼓掌。〕

先生们，清教原则在我国已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能为可能出现的各种紧急情况提供合法的弥补措施。我作为英格兰人的后裔站在这里；我

的每根神经都说明，我是清教徒的孩子。〔笑声、喝彩声。〕伊丽莎白宫廷的绅士们曾风度翩翩地对一位想要创作不朽之歌的诗人说：“看看你的心中有什么，然后再落笔。”先生们和兄弟们，如果我此时看看我的心中有什么，我不妨认为，我心中的话就是家中白发老母的话，她此刻的声音将从清教徒之乡传向祖国首都的信息——就像帕特里克·亨利在听到康科德和列克星敦的枪声后，从弗吉尼亚传向马萨诸塞的信息一样：“我不是弗吉尼亚人，我是美国人。”因此，先生们，此时此刻我们不是共和党人，不是民主党人，而是美国人！〔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相信，新英格兰传向首都的信息是这样的：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不要固守派性十足的做法，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也不要这样做；两者代表着也只能代表着全体美国人民。两者将根据宪法和法律提供一种途径，使得总统一——不管他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得以毫无争议地当选就任。〔热烈鼓掌。〕啊，先生们，〔又一阵掌声。〕主席先生，别以为我忘记了场合或礼节，我是在追忆清教徒；我是在追忆普利茅斯石，以及使此石名扬四海的那些美德。但是先生们，正如我们的祝酒词所言，我们只有高出曾驻足此石的人们，才能效法这些美德。〔掌声。〕

清教徒的后代们，你们不是要夷平丛林，不是要同野蛮人和野兽开战，不是要征服一片大陆，甚至不是要创建一个州。我们的任务更高尚，更神圣。先生们，我们的任务，是要弥合一个民族，是要压制派性的狂热，是要让我们的政治生活处处充满高尚的男子汉气概，是要教育每一个儿童，然后让他们绝对自由地从任何学校走向任何教堂。〔喝彩。〕最重要的是，先生们，我们的任务是要保障贫民和富翁，最糊涂和最精明的人，都有绝对平等的权利；是要志同道合地挺身而出，犹如铜墙铁壁包围着故土，抗御暴力的疯狂袭击或骗子的致命腐蚀。〔热烈鼓掌。〕此时此刻，先生们，先辈们正召唤我们去完成这个崇高的任务，他们的威严的神灵在向我们俯身祝福。这个任务，兄弟和朋友们，这个任务就是要效法先辈的美德，使我们的时代像他们的时代一样光辉灿烂。〔热烈鼓掌，然后为演讲者三次喝彩。〕

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王建华 译 井力 校

查尔斯·艾略特

1834—1926

美国教育家。生于波士顿。185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哈佛、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867年赴欧洲研究教育制度。1869年起任哈佛大学校长，担任此职长达40年。期间，主张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并重，强调选修课，提高入学标准，终于使哈佛成为著名学府，而其他院校也群起效法。著有《教育改革》、《自传》、《哈佛古典作品》等。

这是一篇颇具学者风范的演说，发表于纽约新英格兰学会年度宴会。席间，有人提议为哈佛和耶鲁祝酒，艾略特欣然应答。他饶有兴趣地比较了这两所著名学府的异同，谈到了它们的历史，与宗教的关系，乃至对国会和议员的不满。篇幅不长而意味深远，轻松诙谐而又严谨得体，使这篇演说成了脍炙人口的佳作。

哈佛与耶鲁

1877年12月22日

主席先生、各位来宾：

谢谢我的朋友克拉克博士刚才对我的美言介绍。不过，我要恳求各位垂悯。哈佛和耶鲁！难道两校竟会有哪位学生，难道两校竟会有哪位新毕业生，能想得出会有谁为此语举杯吗？〔笑声。〕但是，既然到了台上，我就得尽量努力，谈谈哈佛和耶鲁欣然引为同道的几点。这倒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说的是新格兰的一个农夫，他自称他和琼斯老爷的牛比村里人的牛加起来还多。别人说他吹牛，他却说没错，因为琼斯老爷有45头牛，他有一头，而村里加起来也没有46头牛。〔笑声。〕

我们大家都主张，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应当有不同的大学，体现各异的基调、氛围，分处各自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相异的观点、治学之道和教育之术，但是，大家的最终目标则是一致的。〔掌声。〕有鉴于此，最近当我发觉哈佛与耶鲁之间原来的差异正在日渐缩小，我就不由得有些不安了。就拿多年前哈佛开始实行的选修制度来说吧，现在我就看到耶鲁大学的课表上有长长一串课程标明“择修”，给我的感觉是很像我们的选修课嘛。〔笑声。〕对了，我那当国务卿的老友曾偷偷向我提起过，他的父亲为什么要把他送入仕途，而他本人却并不情愿，对此，哈佛同人皆深感痛心。〔笑声。〕

话又要说到1700年的时候，一群身属国教的公理会牧师，（我们当然不会忘记除了公理教派，当时其他派别都不成气候），他们觉得哈佛对宗教问题太过宽容，所以尽管他们都是哈佛出身，却还是跑到康涅狄克州办了另一所大学，宣讲严厉得多的教规。哈佛学人私底下都盼望在这点上永远别跟耶鲁一样。〔笑声。〕可是，近来我察觉到很多迹象，说明这点区别很可能会彻底消失。比如，前几天我读了报纸，后来又得到了证实，说耶鲁选出了一名牧师，此人对重要的、关键的、基本的、关于永罚的教义居然心存疑虑。〔笑声。〕还有，我读了华盛顿教育部的年度报告，几年来哈佛一直被称为

“永罚”为基督教末世论用语，指世界末日将进行“最后审判”，被判进天堂者享永福，入地狱者受永罚。

不闹宗教派别的大学；此话不假，因为这项转变是我亲手促成的。〔笑声。〕从前，我还读到耶鲁大学是一所公理会大学，这也不会错，因为报告的起草人想来是波特先生。但是同一份报告现在却说耶鲁是非宗派性大学。那是个了不起的进步。实际上，哈佛和耶鲁都看到，在一个没有国教、没有显要教派的美国，大学不可能建立在教派的基础之上，而是应当建立在国家的基础之上。〔掌声。〕

各位，我们这两所最早创立的大学，在国民教育上还有其他共通之处。比如，最近总统发布公告说全国性大学是件好事。〔掌声。〕哈佛和耶鲁同声响应，但同时希望定义一下何谓全国性大学。〔笑声。〕如果说大学由国家资助，我们衷心赞成。如果说大学将教育本国青年热爱国家、献身国家，我们衷心赞成〔掌声〕；而且我们还要指出，哈佛和耶鲁在这方面一向出色，有史为证。〔掌声。〕如全国性大学指的是由合众国议会中聪明的议员们来掌管大学，那么我们都只有敬谢不敏。〔笑声。〕我们从不曾怀疑国会具有能力挑选并聘任拉丁语、希腊语和古代语言教授，因为我们看到国会里具有古典风范的演说家比比皆是，他们对所有拉丁民族的法规也都特别精通。〔笑声。〕但是说到其他不那么高贵的教学职位，我们可能抱些怀疑。比如，我们不敢完全保证议会已确信算术规则不容更改。〔笑声。〕我们也许担心他们是否有能力选一位历史教授。在他们看来，世上有一种“美国式”政治经济学，就好像世上还有“美国式”化学或者“美国式”物理学一样。〔掌声。〕最后，先生们，我们应该稍稍不信任国会挑选的伦理学教授。〔笑声。〕当然啦，至于授予教授们终身职位是否适当，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疑虑，因为国会两院精于此道。举世皆知，他们选人不分东西南北，只看称职与否，只要能够胜任，并且忠心耿耿，就会一直留用到底。〔掌声、笑声。〕

好了，先生们，我们也许该来回顾一下先辈移民了。〔笑声。〕我想说，哈佛和耶鲁都认识到，比起有些事情，大学就顿时变得黯然失色了。

言语皆虚，
伟绩方实。
英魂不灭，
世代永驻。

各位，在普利茅斯那片荒凉的土地上，有人开创过伟大的业绩，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正是为了纪念他们。那是一段艰苦岁月。他们长途奔波，忍饥受冻，拼命苦干，带着枪上教堂下农场，在第一个冬天就有一半人死去。此刻我们追思的并不是繁荣的年月。相形之下，我们国家目前的处境还算令人稍感欣慰。可怕的灾难虽在威胁着这个可爱的国家，但是请记住，后人将乐于回顾的并非安逸与富足的年代，而是勇敢抵御艰难困苦的岁月。〔掌声。〕

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吴简清 译 井力 校

威廉·吉尔伯特

1836—1911

英国剧作家，幽默作家。早年习法律，并获律师资格，后专注于创作。初期写过富于幽默感的打油诗，和旨在逗人发笑的作品。1870年与歌剧作曲家沙利文（1842—1900）结识，从此俩人合作无间，相得益彰，推出大量广受欢迎的轻歌剧，如《狄斯·比斯》、《禁卫队》、《威尼斯船夫》、《陪审团开庭》、《日本天皇》等，开创了讽刺时弊、寓教于乐的歌剧新风格。

1879年，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准备在美国上演新作《皮纳福》。本篇是他以此为题，在纽约市莲花俱乐部发表的讲话。这是一篇逗人发笑的演说，也是一次成功的广告。开场白非常精彩，维妙维肖地刻划了一个身在异乡、对成功没有把握的人的心情。接着，演说者煞有介事地用发表“声明”的形式，对外界的一些传闻，对自己与纽约经纪人的关系，对所谓“版权”问题，以及对“此行的目的”是否要教美国人如何演戏等问题，妙趣横生而又滴水不漏地作了解释。通篇跌宕起伏，用语谈谐，充分展现了一位著名幽默作家的风采。

《皮纳福》

1879年11月7日

主席先生、各位来宾：

今晚我和我的朋友沙利文驱车前来俱乐部时，俩人都感到异常忐忑不安。我们非常清楚自己才疏口拙，不善辞令。面对等待着我们的这场实实在在的严峻考验，我们给自己的处境打了个不恰当的比方：我们好比是两个剧作家，正驾车前往剧院观看自己作品的首演。想到这里不免有点令人烦恼。不过，我们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俩记得人们常说：一个人不会一辈子倒霉。〔笑声。〕然而，我们自己即将参加的表演却毫无成功的希望，只会以令人羞愧的失败而告终。

现在，我们就像两个取保候审的犯人，恳求诸位能给予极为仁慈的判决。也许，我还是应当以尽可能幽默轻快的语调，对主席先生刚才点名要我发表的这篇祝酒词作出响应。〔笑声。〕我几乎想说：各位，十分抱歉，这点我做不到；然而在实际上，我心里毫无歉意。像我们这样的人，受到当地文学艺术界头面人物的热烈欢迎时，会把这种热情视为荣誉，并报以一系列小小的幽默。然而，我俩对这份荣誉实在受之有愧。来到一个一直被称作“外国”的国家，要找一份真正“回家”的感觉，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掌声。〕但我们今天惊讶地发现，原来一直被视为异族的人们，却是我们亲密的朋友。〔掌声。〕他们所表示的友谊是如此的珍贵，因此，在这里我要一改过去晚宴之后的客套演讲，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且代表我的合作者，冒昧就一件涉及我俩的事为自己发表声明，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外界对我俩产生了一些误解。

我曾经在伦敦出版的几份期刊上读到过几段出于好意但失之慎重的文章。据称我俩对纽约的经纪人颇为不满，因为他们只上演我们的作品，却不付分文报酬。〔笑声。〕其实我们对他们并无怨言，唯一要抱怨的是目前还

没有一部国际版权法。〔掌声。〕剧本作者无法拥有自己作品的版权，就如同作家及其后代的版权早已过期一样无可奈何。我并不知道伦敦的出版商是否有此惯例，要去找瓦特·司各特爵士，或者拜伦勋爵，或者马利亚特上校的子子孙孙们，并将他们应该分享的版权所得，双手呈上。〔笑声。〕我也不清楚那些伦敦的剧院经理们是否还在为了支付上演《屈身求爱》、《和善之人》和《威尼斯商人》的票房分成，而四处寻觅奥立弗·哥尔德斯密斯、理查德·谢立丹和威廉·莎士比亚的至今仍健在的继承人。〔笑声。〕如果他们真的如此操劳，那也只是故作多情的一厢情愿罢了。〔笑声。〕鉴于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消息，我们可以暂且假设他们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相信，如果有一天这些伟人真的前来索要自己的版权所得，那他们得到的将是同样的答复，那就是他们的版权早已过期。〔笑声。〕

所以，如果我们向你们国家的经纪人提出相同的要求，那他们也会同样理直气壮地回答：“先生们，你们从未拥有过任何版权。”乍听起来，出现这样的问题好像全是我们自己的过错。

我们曾去咨询过纽约的一位律师。他告诉我们，虽然一位外国作家在美国无法享有著作权，但只要作品不出版，它们的所有权仍然属于作者本人，这样，也就没有必要去办理什么申请版权的手续。于是，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不必出版作品，而只要将钢琴乐谱和歌同卖给剧院和音乐出版商，就能得到比出版一部作品更高的报酬。

我们原以为这部作品中含蓄表达的思想感情具有典型的英国特点，事实上是岛国特点，这里的人们不会对它产生任何兴趣；但一系列事件表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应该受到责备的并不是其他人，而恰恰是我们自己。实际上，我们每一本书和每一份乐谱在伦敦的售价都高达 7500 美元。鉴于这一情况，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别人可怜。〔笑声。〕而我自己呢，也不必为了获得别人的同情，而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笑声。〕

我们目前正打算从 12 月 1 日起在第五大街剧院上演《皮纳福》。我之所以没有在这个剧名前加上任何令人不解的头衔，是因为我无意冒犯共和国公民的感情。〔笑声。〕。不过，我得告诉诸位，我曾在报刊上读到一些文章，称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来教你们如何演出此剧。在此，我要代表合作者和我本人否认这种无稽之谈。我们绝不是来此教授什么——我们无任何东西可教授——如果真的要教，恐怕也没人会来当学生。〔笑声。〕尽管我们目前没有版权，在美国也没有经纪人，但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只禁止我们在此上演该剧。〔笑声、掌声。〕

我认为，在座各位都会同意，我们上演该剧合情合法。我们无法得知这出戏以前在这个国家是怎么演出的，但我们知道此剧要比在英国上演时更加开放。你们知道，这也许是件好事，也许不是。〔笑声。〕

以后，我们还将建议上演另一部作品。就时间而言，上演的时间越长，也许对我们就越有利。〔笑声。〕我们准备以上演《皮纳福》的同样态度推出此剧。那是一种十分严肃的态度，即不能让观众看出台上的演员都已经意识到是在表演荒诞不经的事理。不管这种做法是对还是错，这出戏在伦敦就是这样演的。我们在此上演《皮纳福》并不是想教你们如何演戏，而是想告诉你们接下来一出戏快要上演了，我们必须让观众有所准备地来迎接这出极其荒诞的新戏。

我们今晚在此受到的热情款待使我有足够勇气去相信，也许你们不会认为我的这番解释是鲁莽无礼的和不合时宜的。先生们，我要讲的都讲完了。在此，我要衷心感谢各位对我俩的良好祝愿，并让各位放心，你们对我的赞赏，我个人虽然受之有愧，但仍然感到愉快。

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朱建新 译 井力 校

尤利塞斯·格兰特

1822—1885

美国第18任总统，共和党人。生于俄亥俄州普莱森特的一个制革匠家庭。自幼性格刚毅，沉默寡言，精干驯马。西点军校毕业后，参加过美国墨西哥之战。南北战争爆发后，组建第一支联邦志愿军，投身于保卫联邦。由于智勇双全，带兵有方，得到林肯总统赏识，并委以重任。他不负所望，运筹帷幄，指挥美军协同作战，终于击败南军，结束内战。1866年被授予“五星上将”军衔；1868年当选为美国总统。

格兰特虽是一位叱咤风云的著名战将，却不谱演说，至于“幽默演说”就更少了。本篇是仅有的几次“幽默演说”之一。当时，已近晚年的格兰特仍壮心不已，欲在纽约发展房地产业。这也是他乐于接受邀请，并一反常态地频频发表演说的主要原因。在本篇演说中，他首先风趣地谈到了纽约市区的大发展，继而赞颂了美国早期移民的优秀品质，最后婉转地批评了那些贬低这种品质的人。演说篇幅不长，但充满情趣，听众的气氛也十分热烈。

新英格兰人

1880年12月22日

主席先生、纽约市新英格兰学会的会员们：

在这种场合，我想诸位一定希望我能谈谈贵学会，谈谈新英格兰的民众以及第一批在普利茅斯海岸登陆的移民。昨天晚上，我有幸参加了一个在纽约港主要城区举行的类似于今天的宴会。〔掌声、笑声。〕我是到了目的地（布鲁克林）以后，才知道原来那里就是主要城区〔笑声〕——纽约港的主要城区。正是由于它的不断向外扩展，才造就了今天的曼哈顿岛。约占邻州三分之一（如果不到一半）人口的剩余劳力纷纷渡过北河，在岛上建起了漂亮的房屋和热闹的商业街。这一切表明，一个蒸蒸日上的郊区已展现在我们眼前。〔掌声。〕

我已说过，能参加创始组织的宴会我感到十分荣幸。〔笑声。〕所有其他社团都诞生在你们这个摇篮里，其中一个社团现在正在新墨西哥州的拉斯维加斯召开其一周年诞辰的庆祝会呢。〔笑声。〕我在那里曾发表过几句演说。在演说中，我试图表明自己所关心的是早期移民继承的清教徒的特殊品质：简朴、勇敢、勤劳。这些优秀品质不仅造就了一代新英格兰人，而且随着他们移居全国各地，这些品质又为我们整个民族乃至整个国家增添了个性，带来了繁荣和成功。〔掌声。〕今天，我仍然坚持自己那天发表的一些看法〔阵阵笑声〕，并有理由相信我的判断决不会错。只是那天在我后面的演讲者在赞誉新英格兰人时找到了更好的话题，冲淡了我的一些观点。〔又一阵笑声。〕

我现在要自称是新英格兰人似乎已经不可能了，那得要追溯到好几代人以前。而那天发言的几位先生却都是新英格兰人，他们是在成年后来到我正在谈论的这座伟大城市的。但他们告诉我，那些清教徒移民并没有什么了不

起，所谓的优秀品质都是我们后人加到他们身上去的。〔笑声。〕清教徒那么做完全是迫于当时登陆地点的贫瘠和恶劣的气候。〔阵阵笑声。〕那时老天爷对他们实在不友好，一年里有9个月是冬天，剩下的3个月却又寒气逼人。〔笑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从土地中获取赖以生存的食物，男人和女人一样，只得使出浑身的力气拼命干活。于是，在艰苦奋斗的同时，他们便养成了勤劳俭朴的生活习惯。也许这才真正是老移民的伟大之处。〔笑声。〕有些人甚至暗示，如果先辈们踏上的那块土地并不那么贫瘠，气候也不那么恶劣的话，那么，他们现在说不定还在贫困中懒散度日。〔笑声。〕不过，我坚持认为他们要比我们想象的好得多。我相信，刚才发表过演说的斯多思牧师，会认为我一开始对他们作出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

然而，玩笑归玩笑，我认为我们应该为这块土地上的新英格兰人以及他们的后代感到自豪，我们希望他们能在这块国土上继往开来，继续保持其在自己成长的那块贫瘠土地上形成的良好传统。〔掌声。〕我们希望看到他们能够继承独立自主的性格、自力更生的精神、学术自由的倾向、勤学好问的学风和勤劳朴实的美德，并教会与他们一起生活的人们走向繁荣。〔掌声。〕在这里我要深深感谢刚刚呱呱坠地的新英格兰学会的先生们，〔笑声。〕感谢他们盛情邀请我和诸位今晚前来参加这个宴会。我会记住这一愉快的时刻，并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再次应邀前来。〔经久不息的掌声。〕

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朱建新 译 井力 校

卡尔·舒尔茨

1829—1906

德裔美籍政治家、军官、新闻记者。生于德国科隆。1848—1849年在波恩大学求学期间参加德国革命，后被迫流亡。1856年定居美国。曾为林肯竞选总统奔走呼号，内战中参加过多次战役，衔至少将。内战结束后历任《纽约论坛报》记者，国会参议员，内政部长，全国文官制度改革同盟主席等职。值得一提的是，舒尔茨常被作为“美国大熔炉”一说的典型例证。

本篇发表于纽约市商会举办的一次宴会，是一篇别具一格的、优秀的祝酒词。演说者有意把旧世界（欧洲各国）和新大陆（美国）交织在一起，以此展开自己的话题，因而本身就具有一种幽默效果。他从奠定美国革命胜利的约克镇战役谈起，通过回顾“旧世界”对美国革命的支援，以及“新大陆”在繁荣后对欧洲各国的物质支持，别开生面地阐述了“新旧世界紧密相连”的主题。在一片喝彩声和笑声中，演说者在结尾时巧妙地谈到了大洋两岸的经济摩擦，并传递了双方不要争执不休、不可干涉内政的口信。

旧世界与新大陆

1881年11月5日

主席先生、商会的先生们：

如果你们像我一样经常应邀为“旧世界与新大陆”举杯祝酒，那你们肯定同样会发现，对于一个依然崭新的旧世界，或者一个并不陈旧的新大陆，无论说什么都是困难的。〔掌声。〕

我年龄越大，这种窘迫之感就越强烈。你们大家迟早也会有这种感觉。不过，我的好友埃瓦茨先生大概是个例外。他已决心绝不衰老，他的那些情趣横溢的话语也总是新意盎然。〔笑声。〕不过，先生们，我们最近几个星期亲眼目睹的却具有某种新的灵感。我们一直在庆祝一场伟大的战斗——它的伟大不在于多少人为此送掉了性命，而在于多少人从此获得了幸福。它不仅使这个国家现有的5,000多万人获得了幸福，而且还使旧世界各国的人民比以前更幸福了。这样，两者相加，获得幸福的人数可谓空前庞大。〔掌声。〕

1776年7月4日，诞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费城宣布美国独立。但实际上，美国独立是在约克镇战场上通过我所说的那场战斗才取得的。在那里，旧世界向新大陆伸出了援助之手。〔掌声。〕当然，旧世界里有一部分人，其中有英国士兵，对不起我要说，还有德国士兵，他们千方百计试图压制新大陆的愿望，但他们那样做是奉命行事，出于无奈；而旧世界里站在美国一边进行战斗的那部分人，却是出于自由意愿，作为志愿者到这里来的。〔喝彩。〕

可以说，大多数法国正规军也是奉命前来，不过，人们不会忘记，不仅

参见本书收录的埃瓦茨的演说。

指庆祝约克镇战役100周年。此役，华盛顿亲率法美联军迫使英军投降。

拉斐德 是出于年轻人对美国事业的热情而来到这里的，而且法国本身，这一旧世界的强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的。〔喝彩。〕同样，还有一些志愿者是以个人名义前来为新大陆事业效劳的。骁勇的施托伊本便是其中的一员。他是一名伟大的组织家，在他的训练下，美国军队走向了胜利。作为那个国家的杰出代表，他的丰碑不仅耸立在数以百计的战场上，更为令人骄傲的是，还树立在更加广阔的思想战线上。〔喝彩。〕在他们中间还有为美国独立献出了生命的波兰人普拉斯基 和迪卡尔布 ，以及更多的法国人、德国人、瑞典人和荷兰人，甚至还有不肯屈服于邪恶势力的英国人。〔喝彩。〕因此，可以这么说，新大陆的事业也就是旧世界的事业。在和平时期，就像在战争时期一样，它仍然是一项志愿者的事业，因为从和平降临之日起，我们已迎来了几百万这样的志愿者，而且现在每星期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源源不断地踏上这片国土；先生们，现在我荣幸地宣布，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位。〔喝彩。〕

今后，大量的志愿者还会源源不断地涌来，因为吸引他们来美国的不仅仅有战争带来的兴奋，更有和平带来的喜悦。因此，庆祝这场战争的盛大聚会，更准确他说应该成为在约克镇战役古战场上举行的一次和平庆典。这是很自然的。这里到处充满着一片和平的气氛：和平洋溢在人们幸福的笑脸上；和平呈现在勤俭、繁荣和富裕中；和平在威风凛凛保卫庆典的民兵身上和他们的刀枪上闪着光辉；和平在新大陆人民欢迎旧世界来宾的隆重而热烈的气氛中大放异彩。更值得一提的是，无论人们有多大分歧，只要踏上这片土地，和平便使他们成了朋友。刚才，斯托尔斯博士和埃瓦茨先生雄辩的口才，和人们向一百年前象征旧敌的英国国旗的默默致敬，又给和平增添了绚丽的光彩；而这份出自每位美国爱国者内心的敬意，已经在大西洋彼岸引起了回响：电报传来，在伦敦庆祝新市长上任的游行中，人们也高举美国国旗以示敬意。今天，在这一象征全世界和平的聚会上，所有旧世界的人民都派来了自己的代表，与我们一道为新大陆的繁荣和进步欢欣鼓舞。〔喝彩。〕

我想，没有什么能比那天为各位先生演奏的小夜曲更能充分体现这种和平协调的精神。那天晚上抵达纽约的各位客人，都是来自施托伊本将军的故乡——都是旧世界的代表。乐队先为他们演奏了一曲《眺望莱茵河》，接着又演奏了《马赛曲》和《上帝拯救女王》。当这些出自旧时代的战歌乐曲刚停，就传来了欢呼和平胜利的曲调《欢呼，哥伦比亚》和《扬基歌》。〔喝彩。〕

这种将新旧世界紧密相联的真挚感情，在所有文明人类对这个伟大国家最近蒙受巨大不幸时所表达的悲痛中显得如此动人，如此真切，如此美妙，

拉斐德（1757—1834），法国君主立宪派将军，曾任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以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荣立战功闻名。

施托伊本（1730—1794），原为德意志军官，1777年抵美，在独立战争中任大陆军少将，曾主持陆军训练工作，编著有《美军队列条令》。

普拉斯基（1747—1779），波兰将领，1777年赴美支援独立战争，任骑兵团司令。

迪卡布尔（1721—1780），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军中的杰出将领。

依次为德国、法国和英国国歌。

均为美国爱国歌曲。

指美国第20任总统加菲尔德遇刺身亡。

而且这种真挚感情定将随着旧世界各位尊贵客人的来访得到巩固和发展。〔喝彩。〕

现在，他们已经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的人民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们中大部分人也许是第一次来访，但我毫不怀疑他们已经得出了一条相同的结论：拉斐德、施托伊本和罗尚博 等人为之奋斗的国家是一个美好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是善良的人民〔喝彩〕；美好的国家和善良的人民值得世界上每一位最崇高的人士为之奋斗。同时我也相信，这些先生启程回国时，心里一定感到无比欣慰，因为他们那些曾为美国独立和自由冲锋陷阵的祖先的名字，已和许多美国最伟大的人名一起，深深地印在了每个美国人的心中。虽然约克镇大捷距今已有百年，但美国人民心中的那份感谢之情，依然像康华里当年降旗时一样火热，至今未变。〔掌声。〕

先生们，在我看来，我们似乎已经形象地表达了我们的感激之情。他们帮助我们取得了独立，美国因此成了一个强大、进取而繁荣的国家。当旧世界陷入缺衣少食的困境时，新大陆人民一直非常愿意，甚至急不可待地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今后，我们还可以将其它工业产品输送出去，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掌声。〕

事实上，我们在这方面一直非常慷慨。结果，大洋彼岸的一些朋友认为我们过于大方了，现在正在谈论要以征税手段来制止我们的慷慨。〔笑声。〕当然，我们不会这样轻易地被难倒。我们已不满足于贡献出物质产品，我们还时常给他们送去我们的智慧。比如，几个月前，埃瓦茨先生就曾千里迢迢前去向他们讲解有关双重标准的问题——这些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而且知道得比他们多得多。〔笑声。〕如果他们愿意以金换银，那我们也许会将库存的银子分文不留地全都给他们。〔喝彩。〕但是这种慷慨不一定会得到恰当的赏识。在这方面，他们也许更喜欢旧世界的精明。〔笑声。〕

然而，我们不应该总是为此争吵不休。其实，说真的，用做生意的眼光来看，新旧世界的人们必须、也只能互为客户，共同得利，这样双方的商业交往才能与日俱增，一年比一年更加富有成果。同时，我们还应当以一句古老的格言作为双方交往的座右铭：“你要活，也得让别人活。”〔喝彩〕目前，没有任何危险足以威胁到新旧世界的友谊和双方的交流理解。我们之间真诚的国际交往和理解是建立在一个简单、自然而稳固的基础上的。我们会为旧世界所取得的一切成功、繁荣和幸福感到万分欣喜；我们也会对他们所遭受的种种不幸表示深切真诚的同情。但有一点我们大家都应当时刻牢记在心，那就是决不干涉别国内政。

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像过去一样，对我们所取得的成功和遭受的不幸做出应有的反应。但我们希望，他们永远不要干涉大洋此岸的内政。〔热烈喝彩。〕新旧世界的界线已经十分明确，毫无疑问，所有公正明智的政府都不会试图打破这些界线。只要新旧世界不相互干涉，我们就能永远生活在一个充满和睦的星球上。〔喝彩。〕

我们已经达成共识，没有什么能比大西洋两岸国家的友谊和美好愿望更重要。我们之间存在的唯一危险，可能只是出于多愁善感的一方对另一方的过分钟情，就像恋人之间时常会产生嫉妒而发生争吵。也许我的这番话会引

罗尚博（1725—1807），法国陆军元帅，率法军支援美国独立战争，在约克镇大败英军。

康华里（1738—1805），英国将军，在约克镇战败，被迫率部 7 千人向美法联军投降。

起一些客人的不满，他们会抱怨说，我们的善意简直使他们受不了。但不管怎样，让我们希望一百年以后，我们的后代能再次在此相会，缅怀我们之间的真挚友情。当这一天果真来到时，他们一定会发现，美利坚合众国已拥有 3 亿人口，而纽约也住有 1000 万居民；在市内十层高的德尔莫尼科大楼顶上会有一座飞机场，供往返欧美大陆的飞机起降。或许到那时，我们的客人还有望在约克镇偏僻的小村里找到舒适的旅馆和体面的生活设施。

我们非常高兴旧世界的贵宾们今晚能应邀前来出席晚会。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为此永远感到自豪，因为他们的名字不仅将永远载入新大陆历史上最灿烂的史册，而且也将永远活在充满感激之情的新大陆人民的心中。〔热烈的掌声。〕

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朱建新 译 井力 校

托马斯·赫胥黎

1825—1895

英国博物学家。幼时学习勤奋，靠刻苦自学成才。1845年获皇家医学院资格证书，任“响尾蛇”号军医，随舰赴澳大利亚研究海洋生物。1859年积极支持和宣传达尔文学说，自称“达尔文的随从”和进化论的“总代理人”。1871年任皇家学会秘书，稍后任会长。著有《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进化论与伦理学》（即严译《天演论》）等要籍。

赫胥黎既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众所周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问世后，曾在英国引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论战。在论战中，达尔文像一个腼腆的学生，而赫胥黎则是一位仗义直言的勇士。论战的结果当然是科学的发展和壮大，但反对科学的势力依然很顽固。因此，作为皇家学会的会长，赫胥黎努力抓住一切机会宣传科学。本篇演说虽为宴会即席演说，他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义务。他对反对科学的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称其为“生于前科学时代”；在谈及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时，他巧借《圣经》典故，说艺术之神安德洛墨达公主对“科学之龙”不胜钦仰，并奉劝欲与科学决战的“帕修斯”三思而行；最后，他用奖章的正面和反面作为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科学和艺术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依存的关系。通篇幽默风趣而不失严谨，堪称演说中的精品佳作。

在皇家学会年度宴会上的讲话

1883年3月5日

感谢诸位襟怀恢廓，独具慧眼，接受了为科学而祝酒的提议。在今天这样的会上听到这个建议，更使我感激不已。因为近年来我注意到，在那些被戏称为生于前科学时代的人中，出现了一股日益强大的、把科学视为侵略势力的倾向。他们以为，一旦科学得逞，就会把其它行业统统逐出宇宙。我想，现在有许多人都认为我们时代的这个新生事物是一头怪兽，它是从现代思潮的海洋中冒出来的，它的目的是要吞噬艺术的化身安德洛墨达。于是，一位帕修斯就会不时出现。他脚上穿着写作便鞋“登云靴”，头上戴着社论“隐身盔”，也许还长着装满漫骂之词的“美杜莎脑袋”，摆出了欲与科学之龙决一胜负的架势。诸位，我希望这位帕修斯三思。〔笑声。〕第一要为自己着想。因为龙头很坚硬，龙下巴也很结实，而且一段时间以来，它在对付一切绊脚石方面已大显身手。其次要为公正着想。因为我向诸位担保，依本人愚见，如果没有人去惹这头怪兽，它是非常温文尔雅的。〔笑声。〕至于艺术的化身安德洛墨达女士，科学对她不胜钦仰，而且别无他求，只盼她幸福地安家落户，年年生儿育女，个个招人喜爱，就像诸位见到的周围的孩子那样。〔喝彩。〕

但是，撇开上述比喻不谈，我实在弄不懂，一个具有人类知识的人，怎么能以为科学的进步竟会威胁到艺术形式的发展。如果我对此尚有一得之

典出希腊神话。安德洛墨达公主因貌美得罪海怪，被锁囚于大石旁，后为杀死蛇发女妖美杜萨的宙斯之子帕修斯所救，并与之结为夫妻。

典出希腊神话。美杜莎是三十蛇发女怪之一，凡看她一眼的人都会变成石头。

见，我以为，科学和艺术乃是自然这枚奖章的正反面。两者都表达事物的永恒秩序，但艺术用的是感情，科学用的是思维。当人们不再有爱恨之心，当苦难不再引起同情，当叙述宏图大业不再使人震慑，当点缀田野的百合花不再比得上身披盛装的所罗门，当人们不再对雪峰和深渊感到惊叹，那时，科学确实有可能占据世界，但不是因为怪物吞噬了艺术，而是因为人类天性的另一个方面已经死亡，因为人类丢掉了古往今来所拥有的那一半天性。

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秦文勇 译 井力 校

典出《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该篇第6章第7节写道：“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亨利·比彻

1831—1887

美国基督新教神学家。生于康涅狄格州利奇菲尔德，父亲为著名牧师。1837年从辛辛那提莱恩神学院毕业后，即从事布道工作。1817年起为纽约州布鲁克林普利茅斯公理会牧师，直至去世。毕生反对蓄奴，关心社会疾苦，主张用进化观点解释基督教义，并从科学角度考证《圣经》。著有《对青年人的七次演讲》、《进化与宗教》等。

比彻也是一位深孚众望的演说家，他的布道演说由于切中时弊，常常引起听众的共鸣。他在其他场合的演说也颇受欢迎。本篇是他应邀在纽约商会晚宴上发表的即兴祝酒词。他从商人和牧师的职业特征谈起，阐述了真理、诚实和忠诚三大人生准则，并由此出发，对空谬的神学进行了揶揄，对社会丑恶进行了鞭笞，对善良和良知发出了呼唤。演说偶尔有布道色彩，但更多的是机智、诙谐、说理和沟通，因而是一篇成功的演说。

商人和牧师

1883年5月8日

会长先生，各位商界的先生们：

在同一句祝酒词中，将牧师和商人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扯在一起，似乎有点奇怪。我认为，其中部分原因是前者的职业是布道，而后者是依道行事〔笑声。〕两者在履行职责时有许多共同之处。商人总是精打细算，而牧师则是两手空空，通常不带礼物。〔笑声。〕商人在教会机构中挑大梁，而牧师则被派往各个教会和社团，随行的还有一个代表，目的是要牧师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为其承担一切费用。他们都是教会中很有用的人。〔笑声。〕不过，在道德上，他们有一些相同的作用。牧师的任务是讲真理，而商人则是照教义行事以赚钱。我坚持认为，全世界整个商业结构非常依赖于基本的道德，而教会更是这样。〔叫喊声：“说得对！”〕

这里有三个重要的，也是基本的要素，存在于世界各地在所有的人中间，在一切职业中，即：真理、诚实、忠诚。（掌声。）在很大程度上，我今晚的使命是要告诉诸位，我担心，教会可能忘了将这些基本点作为讲道的主要内容。由于教育和哲学上的探讨的影响，人们讨论了被认为是较高级的话题——神学。当然，对神学我无任何异议。〔笑声。〕但神学本身，不是建立在最基本的道德观上，而仅是一朵空洞而虚无飘渺的浮云，飘过夏日的晴空，并没给干旱的土地带来一丝雨水。不过我相信存在着一种与人类灵魂更高级的经验有关的神学，就同其他人一样，我对此深信不疑。

今天，我一直在移植木兰花树。我今晚是以威切斯特县的一个农夫的身份演讲的。〔笑声。〕我20年前种植的一棵木兰花树，如今已成了一个硕大的白色球体，我想，待那漫长的冬季过去后，50万朵杯状的木兰花将向上帝倾吐感恩之情。喔，无需有人告诉我们，扎根在土壤中的树根有多美，它的芳香并不亚于树上的花球。但我知道，一旦那些沾满泥土的根系和盛开的花朵的联系被切断，这些露天的花朵将会是何种样子。根是树的生命之源，如果失去根系，树就失去了生命，也就没有鲜花。

假如从一切美的东西，一切想法，一切教义到基本的，共同的，真实的

道德之间有着一条清晰的通道，那么，神学和一切教义都将是美好的。〔掌声。〕所以，我认为，使人们做到讲真理，做到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种族之间充满诚恳与和平，而且值得大家信任，这对传教和经商都有利。〔掌声。〕

讲真话实际上不是人的本能。〔笑声。〕人并非生来就会讲真话，就如同他们并不是生来就会开枪一样。事实上，一个人一语中的的机会很少，更多的人根本不能中的。〔笑声。〕讲真话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真话，做一个诚实的人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摈弃幻想，然后称其为真理。我们抛弃利益，然后称其为真理。我们经常失去良知，也将其称之为真理。〔笑声。〕

为什么以上这些是基本的道德标准呢？为什么这些准则对

人们的商业利益显得那么重要呢？其原因是，如果人们无法信任的话，轻者会使商业受损，重者则会导致整个商业活动彻底毁灭。〔掌声。〕这种情况在小群体中就能发现，而企业愈大，该情况就越明显。这也证明这一点：即地球上绝大多数人们，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即他们之间不愿彼此以诚相待。假如某人将数十万美元投资到大洋彼岸或其它遥远的国度中去，而那里的人民并不懂我们的文字，这就证明人和人之间，顾客和商人之间有相互的信任。这是因为在人们的行为中，在相互一致的情况下，经验会创造出可以相互信任的可能性。如果人们之间互不信任，他们决不会将大量的资金投资到中国，日本或墨西哥去。信任是可靠的保险公司。商船船长必需得到信任，政府官员必需得到信任，世界范围内的不断发展和增长的贸易也无声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人们会说谎，但尚未达到因此而互相分离的境地。〔笑声。〕

现在，我想让你们对一种令人不快的情形引起注意。有些人深得人们的信任，人们将大量的钱财托付给他们，到头来发现他们很脆弱，根本不可靠。对此，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做收款员或是董事长并不会导致一个人变坏，以致于他们经不起诱惑。我承认所有的人都是很脆弱的，就像一根木料。橡树可以承受住松树无法承受的压力，但是世界上没有一棵在某种压力下不会断裂的橡树。世界上决无那种生来在一定压力下不会垮掉的人——当然不总是在一个地方。许多人可以不为金钱所诱惑，但是会被阿谀奉承所击倒。许多人不吃马屁，于是被社会偏见所包围。许多人用赤金是诱惑不了的，但他们可以被宴会或社交所诱惑。不是在这方面就在那方面，人都是可以征服的。在圣经的祈祷词中有“不要领我们进入诱惑”这篇简朴的祈文，其中寓意深刻。

由于自身的弱点和易受诱惑的性质，无人知道自己会做什么。但是做一个坏蛋竟也需要虔诚，这倒是十分奇怪的事。〔笑声。〕看起来似乎一个人必须先做主日学校的监管，才有资格去新新监狱。〔笑声。〕何以虔诚的人要借监狱发财呢？何以教会的领导人要携10万或20万美金而逃之夭夭？换言之，宗教只是做无赖的外衣而已。现在是商人和牧师站到一起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的时候了。依我看，现在是我们应该回到讲坛上对公共道德进行老生常谈的时候了。

喔，先生们，至于在神学的广大领域中，其实没人知道神学是什么东西。〔笑声。〕一个人在他飘入云端时，可能言而有误而自己并不察觉，但是在

地面上，人们相互见面，利害相关，摆脱不了诱惑的追逐，世俗的考虑——贪婪、自私，交错并行。我们必须提醒每个人每周一次在教堂里，每日一次在家里要讲真话，讲诚实和忠诚。这是些简朴的道理。在这三个方面接受了教育，就能在生活中不为各种诱惑所动。但他不必一定是个完美无缺的人。因为他对神学一无所知。但是我认为，撇开所谓神学的教义，教育可以比任何高级教会和教义能将更多的人带入天堂。〔掌声。〕

那么，我们要做些什么呢？依我看有三件事必须要做。首先，对家常事我们必须尽责。我们从父母那儿学来的东西是一辈子不会忘却的。〔笑声。〕它们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简直成了本能，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在家中就学会爱，尊重讲实话，直到我们开始像别人一样憎恶污秽一样去憎恶谎言，憎恶阳奉阴违——如果这点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头脑里，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感觉带到生命的终点，这是生命中最宝贵的旅程——如果我们不涉足政治的话。〔笑声。〕

其次，我认为这种真理、平等、忠诚的说教，必须在教会的讲道中形成比现在的教义更富教义的部分。经常有人问为什么教会这么小，人们为何不去教堂。当人们能在教堂里听到他们想听的东西——当他们能够得到希望、启示及正当生活中应有的激励，教会就受人们欢迎了。人们会去教堂，去了再去。如果教会建立在其他基础上，那就是不合常理的。教会必须哺育饥饿的灵魂。当人们饥饿时而得到了所需的食物，他们就会天天去获取这样的食物。〔掌声。〕

再则，在一切诚实的商人中必须形成一种舆论，对邪恶，对国内外商务中一切违背真理，公正与忠诚的行为一律给予唾弃。〔掌声。〕这三种品德对商业的繁荣是必不可缺的。有了它们，有了激励，有了事业心及机遇，以及我们手中的各种方法，美国就能赢得整个世界。〔掌声。〕如果少了它们，少了这些商业基础，那么我们会搞得像别国一样糟，最终，就像别人一样，遭受同样的灾难。〔掌声。〕

因此，先生们，这回“商人和牧师”的祝酒词，根本不是一种奇怪的组合。你们是商人，而我是牧师。我已向你们讲述了一大堆道理：你们呢，在此静坐良久，并听完了我的全部演讲。有了这个简单的证据，有了这个为你们未来的昌盛所打下的基础，我只需说一句：如果你们习惯做摩西法律中明智地禁止的事，那你们就不能将麻条和羊毛混织成毛线。你们做生意的，在编织毛线时，不应该将谎言和聪明编织在一起。因为生意中每撒一次谎，就是织物中的一根腐烂的毛线。初织时虽然很好看，但穿在身上后，迟早会出现一个破洞。〔掌声。〕

先生们，有人要我就垄断讲几句。凭心而言，我倒希望有几个人能垄断说谎，把谎言都给自己留着。〔掌声。〕现在再回到我最初的论述上。教会和商会面临一个共同的任务，即打下健全的道德基础，以作为现世繁荣的基础，其余的发展就不谈了。牧师和商人有一个相同的利益，牧师看在上帝的份上，人类的份上，而商人则为了自己，都要使得在舆论中，甚至在报纸中——报纸也许跟其它生命的功能一样不受偏见和错误的影响〔笑声〕——应该将说谎列入有害东西的行列中去。〔掌声。〕

所以，先生们，在接受我的祝福的同时，希望各位对此重要的话题多加思考。〔掌声。〕

节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吴毅 马文龙 陈敏 译 井力 校

詹姆斯·罗威尔

1819—1891

美国诗人，文艺评论家，外交家。生于马萨诸塞州新英格兰一个名门望族家庭。毕业于哈佛大学，并在该校任教 20 余年，做过《大西洋月刊》和《北美评论》主编。1877 年起任驻西班牙公使，1880 年起任驻英国大使。代表作有《比格罗诗篇》、长诗《大教堂》，另著有评论但丁、莎士比亚的论文，以及大量宣传废奴的文章。

本篇是罗威尔担任驻英大使时，在伦敦举行的一次晚宴上的即席演说。此类演说通常无明确的主题，但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要通过即兴发挥，尽量营造欢愉的气氛。罗威尔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首先，他在开场白中故意夸大餐后演讲的难度，使自己获得了随意发挥的自由；然后，他抓住 7 月 4 日这个日子（美国独立节），在“歌颂祖国”一事上大做文章；接着，他把话锋一转，利用自己的外交官身份，引出了英美两国在交往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趣闻逸事；最后，他绕了一个大圈子，重又谈起了餐后演说的特点。通篇首尾呼应，一气呵成，起承转合自然流畅，听众的气氛也非常热烈。

餐后演讲

1883 年 7 月 4 日

柯勒律治阁下，各位勋爵，女士们，先生们：

我坦白地说，此时此刻，我有点如释重负。阁下，您已经间接提及餐后作演讲的难度。我得说我也像有的人一样，此种演讲做得越多，我的感受也越强烈。〔笑声。〕我认为，挡道的困难颇多，主要有三个。首先是有太多的话要说。这样，急于要脱口的词汇互相倾轧，互相践踏，结果什么也讲不清。第二，当别人期待我们消除听众脑中的空白时，却又无话可说。最后，我认为第三个，也是最难的，是必须接在一个已将你想说的一切都说了的人后面，而且说得比你还好！因此，我们常常跟着过去的语法学家叫道：“把那些家伙都吊死，所有动听的话都让他们先说了！”〔笑声。〕

7 月 4 日这个日子已多次被间接提到。我相信，一般人都认为，在这个纪念日，某种特定的鸟（纹章学方面的鸟类学家——我相信除了他们便无他人，称其为“张翼鸟”）的神灵进入了每个美国人的心坎。不管他们是否乐意，在神灵的催促下，都要讲一大堆对祖国自夸的颂词。〔笑声和喝彩声。〕这一点，要我说，就是那种普遍的迷信。我希望我的言论多少能够起到矫正的作用。在此，我想问在座各位，是否还有谁要将今年要讲的对祖国的颂词只局限于某一天。〔笑声。〕

请允许我对个人经历说一点看法。命运注定我像尤利西斯那样，看到一样多（或许更多）的城市和各地的风情。这样，我就有机会观察到一个很普遍的现实，即：那些描绘我所处的地方的优点的词，都是些按地区特征加以

英国大法官。

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

划分的形容词。如果我身处小人国，那么我听到的都是该国的优点，并听到勇气这个词，听到常识这个词；我还听到叫做政治智慧的那个东西。如果我跨入隔壁的巨人国——自斯威夫特那时起，它已成为共和国——我听到那些活突然间都变为描绘巨人国所具有的优点了。〔笑声。〕

我很高兴能够在此感谢柯勒律治阁下。我相信，他是第一次将美国总统的大名和女皇陛下的名字在这种场合联系在一起的人。在阁下所说的话中，及今晚我们贵宾所说的话中，有一个词不断出现，虽然我认为它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形容词，但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即“讲英语的”这个形容词。现在，我们不断听到一些“讲英语的民族”，“讲英语的人口”的说法。我认为这些说法不是要我们忘记，或是让我们忘记在“英国人”或“美国人”之间存在着竞争和本民族的自豪感。相反，这些说法表明，在具有同一血缘和语言的人们之间，有着某种永恒持久的相互同情。〔喝彩声。〕我确信，阁下，您所说的有关我们的贵宾将在美国受到欢迎及款待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他作为一个演员所具备的杰出才华，他能确保从伯比奇时代以来活跃于英国舞台上的那些杰出演员所具有的那些传统的，高贵的——也许我可称其为超众卓越的姿态和方法，一定会像在贵国一样，在美国也会备受青睐。〔喝彩声。〕

我确信，我还可以说，英国法官将受到美国律师界的欢迎（我本人为后者的一名小卒），而如果不是去开业的话，那他将更受欢迎。〔笑声。〕他会发现美国的法律得到很好的执行，我相信他会同意我的这个说法。但我要遗憾地说，执法的法官却是一些坐着不戴英国传统的假发套的人。〔笑声。〕自从我来到这里后，我听到一些朋友悲伤地对我说，作出这样的改变太大了，一定会出现衰败的。我用一个从我父亲那儿听来的小故事作答。我父亲还记得新英格兰最后一个仍戴假发套的牧师。一开始人们倒是觉得很奇特，可到后来他便成为一个怪物了。最终，这位先生也将假发套扔了。但在其教区内有一位可怜的妇人对比很悲叹。一次，当牧师从教堂内走出时，那妇人挡住他说：“喔，可爱的先生，过去，我总是深感安慰地听您讲道，总是深受启发。可现在您不戴假发套了，什么都没有了。”〔笑声。〕在我用这个小故事安慰我的英国朋友之后，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但我必须克制自己不再喋喋不休。我相信餐后演讲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即简洁二字。不过，这使我又想起了一个故事。〔笑声。〕大法官阁下已告知各位什么是餐后演讲的组成部分，它们包括笑话、引语和老生常谈。真正的成功的老生常谈，依我的判断，要求有极为优秀的天赋。我相信我还没有引用过谁的话，这使我又想起了一个故事〔笑声〕，是我很小的时候听到的——讲的是美国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他在一个野营布道会上布道，讲了约书亚的故事。他是这样开头的：“信徒们，太阳的运行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向前或者说是径直的运动；第二种是后退或者说是向后的运动；第三种即在我们的经文中提到的——静止不动。”〔笑声。〕先生们，不知你们是否明白这个故事的寓意，希望你们明白了。今晚的餐后演讲者首先是走径直的方向——即太阳向前的运动。然后他又返回，开始重复自己——即太

源出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所著《格列佛游记》，又及“巨人国”。

指亨利·欧文（1838—1905），英国著名演员，演过300多部戏和400多个角色。

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著名演员，以扮演莎翁剧作中的各种人物闻名。

《圣经》故事人物，摩西的继承者。

阳向后的运动，最后，凭着良好的方向感，将自己带到终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太阳静止的运动。〔在欢笑声中，罗威尔重又入座。〕

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吴毅 马文龙 译 井力 校

威廉·埃瓦茨

1818—1901

美国共和党人，律师，纽约律师协会主席。生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毕业于耶鲁大学。1841年起在纽约开业当律师，稍后成为著名的查尔斯·巴特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1868年，在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遭弹劾一案中出任主要辩护律师，并获成功。同年出任司法部长，1877—1881年任国务卿。

1885年6月19日，法国军舰伊泽尔号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航行，将自由女神像安全地送到纽约。为庆祝这一盛事，并对法兰西人民表示感谢之情，纽约商会于6月24日举行盛大宴会，款待军舰随行人员。于是，埃瓦茨应邀发表了这篇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不愧为一个雄辩的律师。他从自由女神的来历谈到自由女神的意义；从运输自由女神像的过程谈到自由的斗争历程；再从自由女神像的结构谈到国家制度的结构。他时而热情奔放，时而严肃深沉，热情中透露出机智和诙谐，严肃中包含着信念和哲理。会场气氛也十分热烈，充分表现了人类对自由的热爱和憧憬。

照耀世界的自由女神

1885年6月24日

会长先生，各位先生们：

请允许我在一开始稍微谈谈大洋这边的我们对取得这项巨大成就所分享的喜悦。这是一项辉煌的、圆满的成就，现在全世界都为之欢呼。

这个伟大的设想表达了法国人民对美利坚的友谊，表达了他们对我们取得的胜利所感到的喜悦，表达了他们对自己不屈不挠的热爱自由的精神所感到的喜悦——法兰西要自由，美利坚要自由，全世界要自由。当这个设想诞生后，他们以火一般的热情解囊捐赠，犹如为这个自由圣坛投放乳香的没药，以使香火千年不灭，万世飘香，并使人世间的空气得到升华。〔掌声。〕

艺术上的巧夺天工，加之法兰西的爱国精神和法国人民的热情——约有十几万人、也许二十几万人捐款——造就了这尊世界史上无与伦比、在设计的天才和胆识上前无古人的铜像。〔掌声〕

此时此刻是多么伟大！多么崇高！多么美妙！它落成的时刻和它为此后所标志的时代是多么令人振奋！如果我国和法国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继续扩展和增进这个光辉灿烂的文明世界，我们就可以确信：如果我们的后代在财富、力量和艺术上超过我们，并且像我们一样热爱自由，他们不会说这个胜利配不上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但是，如果邪恶势力不幸玷污了我们的文明和声誉，而到此观光定居的人们发现，我们的后代的力量衰落了，对自由的热爱程度下降了，他们已成为贫困交加和没落的民族，那么，他们会如何看待一个已消逝和失落的时代所留下的纪念碑呢！他们只会认为，那是众神的创造，而无人在那个时代生活过。〔喝彩。〕

指铸造自由女神像的建议，由法国历史学家拉布莱尔提出，著名设计师埃菲尔进行设计，巴托尔迪主持建造。

乳香和没药均为燃烧时散发芳香的树脂。

那么，对于这几位法国先生，对于这位将军和这位舰长，对他们善意的来访，对他们的温文尔雅，对他们在接受款待时表现出来的愉悦和诚挚，我们如何表示感谢呢？为什么将军阁下没放一枪〔笑声〕——我要说这个胜利比他动用海军力量所能取得的任何胜利都要辉煌——来到纽约就卷起了风暴呢？〔笑声。〕至于德索纳舰长，他做成了世界历史上，至少是世界现代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和统治者做成的事情：他把“照耀世界的自由女神”在甲板下关了30天。〔笑声、掌声。〕

英国曾有人作此尝试，但“照耀世界的自由女神”削去了国王的脑袋。继而又有人尝试，但她把斯图亚特王朝永远赶出了那个自由的海岛。〔喝彩。〕法国曾有人企图镇压她，但她连根拔掉了古老的君主制，并击溃了想镇压她的多种势力。即使在实行了温和、有限的君主制之后，法兰西仍不愿屈从，因为这是对自由的压制，于是经过两次反复，帝国政府统治下的“照耀世界的自由女神”又从甲板下破仓而出。〔掌声。〕

但是，德索纳舰长不仅是勇敢平息“舰船上叛乱”的镇压者，〔笑声〕而且是个伟大的、足智多谋的航海家。他没有这样说，但他制定了这项计划，一项缜密周详的计划！他于6月17日即邦克山纪念日 抵达这里，从而避开了18日即“滑铁卢日”。〔笑声、掌声。〕

先生们，这是一次壮举，这是文明世界的伟大胜利。它确实包含着许多教诲和真理。毫无疑问，在现代史上，“照耀世界的自由女神”已从这里点燃的火炬中找到了最杰出的例证；但我们永远也说不清，我们的先辈从法国的“人类平等”哲学原理和热情中汲取了多么大的热忱和勇气，才得以在这里建立起平等自由的制度。现在，我们两国至少都已同样立足于把自由和法制幸运地结合起来——自由受法制的管束，法制受自由的启迪。这尊伟大的铜像建筑包含着无穷无尽的内容，她是一种象征，一种榜样，一种准绳，但这种象征、榜样和准绳是三位一体的产物：包括自由的精神和热情，那尊优雅的铜像，及她屹立于其上的、我们自己的、庞大结实的花岗岩底座。〔掌声。〕

自由只能由坚实合理的制度来支持，并像建立在磐石上那样建立在法制基础上；假如自由荡然无存，那么起支撑作用的坚实合理的结构只能变成一堆丑陋不堪的东西，因而不值得尊敬，而必须加以粉碎，直到能够更好地重新建设成自由的安身之地。〔热烈鼓掌。〕

节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王建华 译 井力 校

1775年6月17日，北美大陆军在邦克山重创英国殖民军。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大败于滑铁卢。

亨利·斯坦利

1841—1904

英国探险家，记者。原名约翰·罗兰兹。1859年随船队到美国，稍后改为现名，并加入美国籍。曾多次赴非洲探险，以救出另一名探险家利文斯通和考察刚果地理而闻名。著有《我怎样找到利文斯通》，《穿过黑暗大陆》等。

本文是斯坦利在纽约市莲花俱乐部为他举行的庆贺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全文叙述了他的记者生涯，尤其讲述了他在非洲大陆探险的传奇经历。1871年，他由《纽约先驱报》派往中非，找到了久无音讯的利文斯通。1874年，他继续利文斯通的中非探险计划，从非洲东海岸桑给巴尔岛出发，深入大陆，环绕维多利亚湖至坦噶尼喀湖，第一个完成了刚果河的全程探险，消除了世人对非洲大陆的许多模糊认识。1879年，他受比利时国王委派再次深入中非探险。通篇风趣诙谐，妙语连珠。然而，演说词的某些段落也反映了斯坦利及其所处时代的偏见，即认为非洲大陆是愚昧的“黑暗大陆”，而欧洲的白人给非洲带去了文明的曙光。

穿过黑暗大陆

1886年11月27日

主席先生、莲花俱乐部的先生们：

在今天这样的时刻，一个人要表达心中的情感，也许要说上长筒大论才能说清自己的理念和想法。可以说，我周围的人在我还是微不足道的时候已经很伟大了。我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还默默无闻的时候，被现正坐在我对面的朋友乔治·汤森德先生派去报导一次讲演会。我仍记得他说话时的那种气派。他说：伽利略说过“地球在转动”，地球的确在转动，在圣路易斯商厦的平台上，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发生了。〔笑声和喝彩声。〕另一个让我抛头露面的美妙时刻是我被派去桑威奇岛，报导马克·吐温的一次演说。现在，我的眼睛正注视着左面。我看到了安德森上校。就是那张特别的脸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也许贝纳特已收到几份电报，并正考虑派我去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地区，执行险恶的使命。〔笑声。〕

当然你们明白，完全是因为报社老板和总编，我才不得已脱去了新闻记者的和平外衣，穿上了非洲旅行者的服装。追究老板的动机不是我这个报界无名小辈的事，老板是个能干的编辑，非常富有，极为专横。〔笑声。〕他指挥着一支伟大的游动的记者队伍。他们是国际新闻界的佼佼者；从大西洋底到最高的山顶，他们无处不到，无事不知；他们随时准备给予国会内阁成员以忠告，也随时准备给予最小的治安法庭以忠告。〔笑声。〕我属于游动记者的行列，我发自内心的话语是：我要以不懈的努力去尽责，百折不挠地献身于我的职责，任凭世间万物频繁交替，我赖以生存的仍是靠自己的努力。〔笑声。〕可能你们以为一个能干的编辑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报纸发行量为满足的，而我的不屈不挠的和矢志不移的动机却是——如果我不健忘的话——

夏威夷群岛的旧称。

《纽约先驱报》经纪人兼总编。

—以自己全部的努力去尽责，力争赢得总编的厚爱；借用英国国教教义的说法，“召唤我上帝也会高兴的”。〔笑声和掌声。〕

老板第一次派我去阿比西尼亚，是从密苏里直接去阿比西尼亚。先生们，这是多么大的跨越呀！〔笑声。〕我想，关于阿比西尼亚的许多知识，住在密苏里两岸的人几乎不了解，诸位先生可以给我作证，但对于贝纳特先生来说似乎是非常平静的事，对于伦敦的代理商来说，似乎也是极为平常的事。当然我也照此办理，我以非常平常的心情去了阿比西尼亚。由于某种原因，或许好运伴我，我的电文比英国政府早一个星期报导了马格达的垮台。尽管伦敦报纸说我是个骗子，但人们却说我得干得好。〔笑声。〕

我意识到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受命偷越封锁线去克里特岛，从克里特人方面和从土耳其政府方面报导克里特反叛事件；随后又派我去了西班牙，从共和政体方面和从西班牙王室正统派方面加以报导，完全不带偏见。〔笑声。〕

非常突然，我被召到了巴黎。贝纳特先生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对我说：“我要你去寻找利文斯通。”就像我对你们说的，我的角色只不过是一个报纸记者，我不敢对人说我的灵魂是属于自己的。贝纳特先生不屑一顾地说了声“去”，并给了我一杯香槟酒。我受宠若惊；我去了。〔笑声。〕我去是对他尽责任。好运随即而至，我找到了利文斯通。〔笑声、持续喝彩声。〕

像一位好公民所应做的那样，像一位好记者所应做的那样，我回来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然后，我到了亚丁，提出了一份请求，允许我去中国之前能访问文明世界。〔笑声。〕我来到了文明世界，你们以为结果如何？出乎我意料，我发现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我的话。〔笑声。〕我的天哪！要是我对这件事情还有什么值得自豪的话，那就是我所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好”。〕我怎么说就怎么做，尽我的可能去努力，就像许多出色的人先前已做过的那样，就像我的前辈已经做过的那样，准备捐躯殉职，这就是我想要说的。〔大声喝彩。〕

如果我不曾被怀疑过，我不相信我会重返非洲，我就会去适应环境，尽全力去获取李德先生——贵俱乐部一位保守成员的认同。〔笑声。〕我就会安居乐业，如你们周围的一些爱国者一样；不再冲动，不再冒犯上司；我就会请客做东，周末晚上还会拿出点雪茄招待贵客，或许还会开一瓶香槟与友人共享。然而事情并非如此。我离开纽约去了西班牙，不久阿散蒂战争爆发了，幸运之神再次伴随着我，在所有人之前我先弄到了和平条约。当我正准备从阿散蒂战场回英国时，从圣文森特岛发出的一份电报送到我手中，说利文斯通死了。我回电说：“我的天哪，这对我意味着什么？纽约人不相信我。怎样才能证明我所说的是真的？乔治阁下，我将去完成利文斯通的工作。我会作出证明，找到利文斯通算不了什么大事，我将证明我是一个有作为和真正的人。”这就是我要去做的。〔热烈喝彩声。〕

我陪伴着利文斯通的遗体去威斯敏斯特教堂墓地，我眼看着遗体被掩埋。我离开他已经16个月，而我的生活仍然没有充满希望和欢乐。《每日电讯报》的老板打电报给贝纳特问：“您是否愿意参加我们为斯坦利去完成利文斯通的考察而举行的欢送会？”贝纳特在纽约收到了电报，他思考了片刻，然后抓起一张白纸写下了：“我参加，贝纳特。”那就是我的使命，我出发

今埃塞俄比亚。

地中海中一岛屿，属希腊。

去非洲打算完成利文斯通的考察，同时要解决诸如尼罗河的发源地问题，维多利亚湖是否只存一个湖，抑或由好几个浅湖组成。此外，还要探索一下塞缪尔·贝克爵士考察过的阿伯特·尼安塞湖，找出坦噶尼喀湖的出口，随后要查明是哪一些奇妙而神秘的河流引诱利文斯通走向死亡，或许是尼罗河、尼日尔河，也可能是刚果河。《亚洲曙光》一文的作者埃德温·阿若德对我说：“你认为你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吗？”“不要问我这种似是而非的问题。拿出筹款，对我去那儿，这就行了，”于是，他劝劳森拿出筹款，我即去了。

首先我们解决了维多利亚湖的问题。那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湖，并非由一串簇拥在一起的浅湖或沼泽组成的，面积是 21,500 平方英里。当我们力图解决塞缪尔·贝克爵士的阿伯特·尼安塞湖的问题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湖，比阿伯特·尼安塞湖更美的一个死湖——劳克斯特湖。在此同时，戈登·柏斯哈派遣他的中尉去探险，环绕阿伯特·尼安塞湖航行，发现这只能足 140 英里毫无收获的旅程。因为贝克爵士以热情勃发的神态站在了一块高地的陡坡上，俯视着阿伯特·尼安塞湖的深蓝色湖水，带着一种浪漫情调喊道：“我看到这湖在西南方向延伸出无数支流！”先生们，“无数”这个词不是一个地理学家的表达方式。〔笑声。〕我们发现坦噶尼喀湖没有出口，尽管那是一个淡水湖，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日夏一日，当我们进入这个奇妙的曾引诱利文斯通走向死亡的河，不禁与利文斯通一样产生了疑虑。他在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要不是为了这不朽的尼罗河，我才不愿把自己作为黑人桌上的肉食呢。”

经过 400 英里的旅行，我们来到了斯坦利瀑布。在它的对面，我们看到河流折向西北面，此后又转向西方。接着，视野所及能看到楼屋，城镇，陌生的部落，陌生的国度，以后就全靠我们的想象力了。我们不知道还会看到什么。我们感到疑惑，当河流转向西方时，我们的想象到此结束了。我们看到，此刻河流直接对着刚果流去。我们拿出深红色的念珠和磨光的金属丝——特意加工了的，用以谋取所遇到的土著人的好感。我们说：“这是给你们回答问题的酬谢，能否告诉我们这是条什么河？”“它当然就是这条河。”那并不是一个答案。需要做一些说服工作，才能一点一滴从他们的酋长的脑子里挖出东西，促使他能用响亮的声音讲出来：“这是‘可吐亚’刚果。”“原来是刚果大地上的一条河。”啊！为了我们永恒的梦。啊！为了克劳菲泉和莫菲泉——希罗多德所描绘的神话般的泉水。啊！为了河的两岸——那里是法老女儿找到摩西的地方！这是突然冒出来的刚果。随后我们在河上航行，经过陌生的国度，食人部族，没有经过那些高度戒备的部族地区，经过了 1100 英里，直到我们到达了这河的环形的延伸部分，我的坚持到最后的伙伴喊了起来：这就是斯坦利水潭。于是，在 5 个月之后，我们结束了旅行。

此后我春风得意回到了美国，像乌干达皇后那样说：“看！我怎么对你们说来着？”但你们知道，命运之神不允许我在 1878 年被人理解，就在我踏上欧洲大地的当天，意大利国王为我安排了专列，送我去了法国；就在我在马赛下车的那一时刻，比利时王国有三个外交官请求我再返非洲。“什么？”

英国探险家。

今蒙博特湖，位于刚果境内。

古希腊历史学家，“史学之父”。

回非洲？永远也不！”〔笑声。〕“我已来到了文明世界，我已得到了欢乐，得到了爱。为了生活，为了希望，我不回去。让那些从未到过非洲的人去吧！我已经受够了。”“那么，或许不久以后再去？”“嗨，我不清楚不久将会发生什么事，就眼前，我肯定不去，肯定不去！即便为了继承罗特希尔德的财富也不去！”〔笑声和掌声。〕

我得到巴黎地理协会的接纳，这时我才开始有了“嗨，毕竟我已做了些事，不是吗？”的感觉。我感觉好极了，〔笑声〕但你们知道，我历来把自己看作共和党人，我藏有许多弹痕累累的旗帜，布满箭孔的旗帜——许多星条旗。在非洲，我带着这些星条旗找到了利文斯通，跨越了非洲大陆，我对这些旧旗帜从心底里表示崇敬。现在我把这些旗帜带到了伦敦，放在秘密隐蔽的柜子中，留神照看着。我仅允许最亲密的朋友观赏，假如你们中有谁光临敝舍，我定会把旗帜拿出来给你们看。〔喝彩。〕

在完成了《穿过黑暗大陆》一书后，我开始用书上的内容讲学：“我已经穿过了非洲大陆最大河流所流经的区域，这块土地没有主人。对富于智慧的人来说，寥寥数语就足够了。你们有布匹、金属器皿、玻璃器具和火药，而成千上万的土著人有象牙、树胶、橡胶和染料，易货贸易利润一定看好。”〔喝彩。〕

比利时国王委派我去了刚果。我的探险从海岸开始，起初有 300 个有色人和 14 个欧洲人参加。当我回来时，却带回了 300 名受过训练的黑人和 300 名欧洲人。起初，一年向我提供 5 万美元经费，但到事情结束时已达到 70 万美元的经费。你们瞧，这就是文明的进步。当我们发现刚果时，那里仅有独木舟，而今天那里已有了 8 艘蒸汽轮船。最初有这么一种说法，利奥波德国王是个梦想家，他梦想着他能使非洲野蛮人团结起来，结成联盟，成为自由国家。但到了 1885 年 2 月 25 日，欧洲列强和美国也批准了一个法案，承认了我们所获得的领土是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刚果。或许，贵俱乐部的成员如果对利文斯通和利奥波德所作所为的价值略加思索，他们就会同意说，那些在有生之年在这个世界上尽了自己的责任的人，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无论如何是不会徒劳的，他们所曾做出的牺牲是为了使成百万非洲人摆脱愚昧。〔热烈鼓掌。〕

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蒋皓 译 井力 校

欧洲 19 世纪著名银行家，5 个儿子也是银行家。
即利奥波德二世（1865—1909），比利时国王。

约翰·沃森

1896—1897

英国作家，以幽默笔调和笔名“伊恩·麦克莱伦”著称。沃在到美国各大学讲学，发表了这篇大受欢迎的演说。他不但论述了苏格兰人的幽默，驳斥了所谓苏格兰人没有幽默，“需要通过外科手术，才能把笑话塞进苏格兰人的脑袋”的谬论，而且从更广阔的角度比较了英国、法国、爱尔兰和美国的幽默特征。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幽默与其民族性格、历史传统、地理环境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各民族的幽默只存在表现形式上的不同，而决无高低贵贱之分。他认为，法国人最为风趣，爱尔兰人善于解嘲，英国人喜欢逗乐儿，而苏格兰人偏爱讽刺；法国人的幽默具有“贵族气派”，美国人的幽默“博大而奢侈”，而苏格兰人的幽默则显得“严厉和苦涩”。总的来说，这是一篇十分清新可读、引人入胜的佳作，使人一笑之余有所获益，因而不忍掩卷。

苏格兰人的幽默

1896—1897年

女士们、先生们：

我很高兴对诸位谈谈我国人民性格中的一些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幽默。我们是——我希望是信奉基督的人民；但我可以肯定，我们的基督教信念已经屡屡受到西德尼·史密斯所说的那句格言的考验——需要通过外科手术，才能把笑话塞进苏格兰人的脑袋。

最近有一位作家断言——我不知道这位作家是谁，也不想知道他是谁——我们的幽默没有任何轻灵、巧妙和优美的感觉。而是显得十分严厉和笨拙，令人厌倦和不快。先生们，各个民族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对待幽默的，有的表现为欢快，有的则是严肃，但若论认真二字，那就非苏格兰人莫属了。

英国人老远见到一个笑话，立即会全盘接受并开怀大笑。他把笑话带回家，让全家都乐一乐，也许，邻人透过门窗也听到了这个笑话。然后，接连好几天，他与同车的乘客共享这个笑话，也许还会使乘客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苏格兰人不同。当一个笑话发生时，他的脑子里会闪出疑问：“这到底是不是个笑话？”他会仔细地进行分析。如果过了24小时，它似乎仍然是个笑话，它才会被恭恭敬敬地接受下来。即使到那时候，它可能还不会引起笑声。就像过分悲伤反而欲哭无泪，人们在欣赏有些幽默时也会不动声色；同样，就像所有的土地长不出相同的果实，因此，每个国家也有自己的特定的幽默。要理解一个国家的幽默，就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性格和传统，甚至还要有所深入地了解它的悲伤。

如果你想摘取最美丽的幽默之花——风趣，你就必须到法国去。法国人的风趣，尤其是巴黎人的风趣，最为微妙、精致和完美。在那里，你可以发现不妨称之为贵族气派的风趣。

举一个例子。有一天，两个人骑马穿过巴黎，一个聪明绝顶，另一个愚

西德尼·史密斯（1777—1845），英国作家，圣公会神职人员，曾任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牧师，鼓吹议会改革，力主解放天主教徒。

笨无比。像往常一样，后者成了谈话的主角，就在笨人的喋喋不休几乎要使聪明人忍无可忍的时候，聪明人看见远处街上有一个人在打呵欠。“瞧，”他叫起来，“我们的话被别人偷听到了！”

这个故事可以试出一个人的水平高低。有一次，我对一位苏格兰女士讲了这个故事，她问：“既然离得很远，他们的话怎么能听得到？”“夫人，”我回答说，“我从未想到这个问题。”

苏格兰人没有风趣可言。对他们来说，生活是紧张而艰苦的搏斗，不可能产生法国式的幽默。他们也不善于解嘲，因为解嘲把人的理解能力颠倒过来，常常逆向思考问题。这是爱尔兰人的属性。但我不是指北爱尔兰人，他们仅仅是生于爱尔兰的苏格兰人；而是指南爱尔兰人，他们常常倒过来看待事物。正因为具有解嘲的天性，这些可爱而善良的人们才变得不可压制。

有一次，一个爱尔兰人去送一只活兔子，可是兔子逃了，开始奔向自由了。那个人没有追赶。他一边大笑，一边说：“你跑吧，不停地跑吧。跑有什么用？你又没有地址！”

我们苏格兰人不善“逗乐儿”，尽管这是最民主的幽默形式。逗乐儿似乎是英国人的属性，是约翰·布尔所说的幽默，不需区分智力高下。它切合实际，人人都懂。不仅如此，它把各阶层人士联系在一起，甚至还使政治生活变得盎然有趣。要研究英国幽默的基础形式，你必须观察学童。逗乐儿始于恶作剧，但需顺其自然，否则在英国人看来，就无幽默可言。在一个英国家庭里，逗乐儿无时不在进行，整幢屋子其乐融融。父亲回家了，全家人各显其能，津津乐道；双关语、俏皮语、大实话、空话废话满天飞，人人尽情享受。苏格兰人没有这种性格，美国人恐怕也没有。

如果我有权给予各民族幽默，那么我不给予他们解嘲，因为那不切实际；也不给予他们风趣，因为那过于贵族派头，以致多数人无法理解；我要心满意足地给予他们逗乐儿，即不分智力高下，没有隐晦曲折，无论老少或受教育与否都能享受的英国式的自然幽默。

让我告诉诸位为什么英国人只讲一种语言。英国人坚信，英语是各国人民都应该讲、而且迟早都会讲的语言，因此，学其他语言有什么用呢？他还认为，上帝已委派他成为全人类的主宰。从苏格兰人的立场来看，英国人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他是属于统治民族的信念。他虽然不想把各国人民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但是，既然贤明的上帝让他这样做，他就必须尽到责任。这种理论没有使他对其他人、包括对他一样的人变得亲切可爱，但那不关他的事。他之所以不学其他语言，因为他知道自己说得很糟，唯恐别人耻笑，而像他那样重要的人是万万不能成为别人的笑柄的。

有一次，一个英国人与一个德国人谈论起这个话题。那个德国人问，为什么英国人讲法语不如德国人讲得好，那个英国人答道：“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如果拿破仑两次来到我们的国家教法语，我们就会讲得同你们一样好。”

这里还有一个英国幽默的例子。有一次，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把威灵顿公爵介绍给一位元帅，元帅的部队曾遭到威灵顿的鞭打。元帅粗暴地拒绝了威灵顿的手，转过身就走。这时公爵说：“让他走吧，陛下，我教训过他了。”

约翰·布尔（1562—1628），英国管风琴演奏家，因创作大量琴曲而闻名。

威灵顿（1769—1852），英国陆军元帅，后任首相，曾在滑铁卢战役中大败拿破仑，号称“铁公爵”。

如果我可以斗胆说一说美国幽默，我就把它归纳为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博大。贵国的幽默是一种气派很大的幽默，我以为，这是因为从旧金山到纽约有 3000 英里的缘故。我们生活在一个义小又穷的国家，我们的幽默也很节约；贵国又大又富，所以贵国的幽默也很奢侈。第二个特点是省略。这也许是因为贵国太辽阔了，以致你们无法在白天走完全程。所以，你们的幽默总是给出开头和结尾的若干内容，就像你们乘火车穿过辽阔的国土，大部分时间在睡觉，却又常常惊醒。不过，诸位是否想过，你们美国人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民族？比如，贵国的连环画报就几乎没有真正的逗乐的成分。它们有一种苦味；娱乐是为着某种目的，而且辛辣无比，近乎恶毒。各期内容不但引人发笑，而且令人深思，从不缺乏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你们太忙碌了；你们太全力以赴了；你们的生活太紧张了，以致不能像我国的《笨拙周报》那样，纯粹地为逗乐而逗乐。

到现在为止，我还有一个部分没有谈到，也许这是思想性最强的部分，这就是讽刺。在讽刺中，事物表现出似是而非，不可逆料，苦乐并存，无法明察。苏格兰文学和生活中特别富于讽刺，这与苏格兰人民目睹过许多荒唐和谬误，因而悲愤填膺有关。因此，苏格兰人的笑是一种悲愤的笑，不是挂在脸上，而是发自内心的笑。讽刺是最深沉的幽默，在这方面，苏格兰人是无与伦比的。苏格兰人不得不在山石比泥土多的土地上耕种，他们不得不在暴风雪的间隙收割，长达 3 个世纪的加尔文主义跟随着他们，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斗争和意外，所有这一切，都教会他们生活就是讽刺。

有一次，一个英国人和一个苏格兰人在一起戏谑。英国人问，为什么那么多苏格兰人远走他乡，从不思归。苏格兰人回答说，那样做对世界有好处。接着，他进行了反击。他告诉那个英国人，就在边境外不远处有一座苏格兰城市，城里住着 3 万英国人。那个英国人感到大惑不解，这时，那个苏格兰人才接着说，那座城市名叫班诺本，在那里，英国人已居住了几个世纪之久，他们一直是苏格兰最热爱和平的、最守法的公民。然后，那个苏格兰人要求单独呆一会儿，品味一下刚才说那番话的乐趣。

苏格兰人的幽默历来是严厉无情的，因为他总是接触到生活的悲惨一面。有一次，一个苏格兰人去打高尔夫球，他的前面有一个动作缓慢的球手。他发火了，于是，他叫球童把球杆收拾好，准备回俱乐部，因为他不想花一整天跟在送葬队伍后面。球童想了一想，说：“啊，别走！不能着急！他也许打不到 3 个洞就会倒地死的。”世界上难道还有另一个认为天意一直在对自己起作用的民族吗？

苏格兰幽默永远是苦涩的，而不是甜蜜的；永远是刺人的，而不是安慰人的。有一次，一位苏格兰妇女的丈夫生病了，她虽然是到诺曼·麦克劳德神父的教堂做礼拜的，但她却请了另一位神父来为丈夫做祷告。神父来了，发现她丈夫患的是伤寒。他问她到哪个教堂做礼拜，她说她到诺曼的教堂。

“那么你为什么他不叫他来呢？”

“哎呀，”女人回答说，“您认为我们因为伤寒就会冒险让诺曼人来吗？”

我所听到的最无情的苏格兰式幽默，是一个关于被判死刑的罪犯的故

英文名称为 Punch，为伦敦一家著名幽默刊物。

公元 1066 年诺曼底公爵威廉曾率兵征服英格兰，史称“诺曼征服”。

事。在执行死刑前，律师前去看他，以便让他快活起来。律师告诉他，判决已经宣布了，而且是完全公正的，所以他不能指望得到饶恕。接着律师问可以为他做些什么。犯人表示感谢，说律师非常善良，还说他只有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律师问。

“我想请您把我衣橱里的黑色安息服拿来。”

“你要安息服干什么？”

“我希望穿上它，表示对死者的尊敬。”

节译自《历史上的著名演说：古代和近代演说选》

王建华 译 井力 校

温斯顿·丘吉尔

1874—1965

英国首相（1940—1945，1951—1955），保守党领袖。生于贵族世家，毕业于桑赫斯特军事学院。1895—1900年先后参加侵印战争和英布战争。1900年起历任自由党或保守党议员，及殖民、贸易、内政、海军、军需大臣等职。二次大战爆发后两度出任首相。

丘吉尔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而且是当代公认的最雄辩、最有文采、最富于幽默感的大演说家。他毕生发表过2300多篇演说，分为8大卷出版。这里收录了他的3篇演说。其中，《第一次政治演说》是他初涉政坛时在巴斯市发表的，言词尖刻而辛辣，一方面歌颂自己所属的保守党，另一方面无情地嘲弄其他党派，充分展现了他的才华和机智。《写作的乐趣》发表于伦敦市作家俱乐部，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作家的职业特点、生活习惯和社会责任，妙语连珠，令人叫绝。《政治画家》是丘吉尔成名后应邀在皇家科学院发表的演说，篇幅不长，然而言近旨远，对英国政界的风云人物作了点评，其中的隐喻、双关耐人寻味。

第一次政治演说

1897年7月26日

假如一个演说家以老生常谈和屡见不鲜的“我不习惯于当众讲话”的谦词作为开场白是可以原谅的话，那么我的开场白也是可以原谅的了，因为此刻我能对同胞们作这番演讲深感荣幸，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此殊荣。〔喝彩。〕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非常乐意接受斯克林先生的邀请，来到巴斯这座古城，尽我绵薄之力促进樱草联盟的工作。〔喝彩。〕

但是每一种乐趣都有其障碍，正如每一束玫瑰都带刺一样。现在的问题是，要找一个合适的题目真是大困难了。在过去几星期里，大家都那么忠诚爱国，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欢乐已经死亡远去，结果，人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再对任何事情充满热情。〔笑声。〕即使是议会也被一种沉闷所影响。因为政治是极其沉闷枯燥的，没有激动人心的辩论，没有势均力敌的派系，没有猛烈场面打破众议院的平静，没有激烈的演讲打破这个国家的宁静——一切都是静止的，昏昏欲睡的，舒适的，祥和的。〔笑声。〕就像流行歌曲中唱的，各位想必都听到过：

每一双眼睛紧闭，
整个世界安睡，
懒洋洋地，昏昏欲睡地
在这午日的阳光里。

〔笑声。〕但是睡意也好，舒适的平静也罢，我必须提醒各位，它包含了寂静、舒适的进步，最终导致了惬意的繁荣。因此，尽管对演说者来说平静是无益的，但对人民来说则是有利的。议会是沉闷的，但并没有闲着。〔对，

保守党外围组织，创于1883年，丘吉尔的父亲为创始人之一。

对。〕对这个国家的工人来说，他们的面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案。〔喝彩。〕假如你们认为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太放肆，我冒昧地希望你们归因于青年的顽强热忱。〔笑声。〕这个议案是用来保护工人的，使他们在危险行业中一旦为老板卖命而不幸受伤时免遭贫穷之灾。〔好啊，好啊。〕当激进党提出的议案失败后，他们把它叫做“雇主责任法案”。现在来看看托利党人办这件事是多么出色。〔对，对。〕我们把这个法案叫作《劳工补偿法案》，这个名字好听得多了。〔笑声。〕此议案是一项伟大的改革措施，它与之搏斗的弊病是这样的大，以致于只有那些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才能了解。〔喝彩。〕据预测，英国各行各业中每年有 6000 人死亡，25 万人受伤。这个令人膛目的数字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战争的伤亡数字都要大。〔是啊，是啊。〕我不是说，在过去的岁月里劳工们没有受到雇主们的悉心照料，而是说该法案使这个问题脱离了流沙般的慈善，并把它置于法律的稳固基石之上。〔喝彩。〕迄今为止，该法案只应用于危险的行业中。激进党人对自由党人永远不会满意，但他们总是自由地花他人的钱财。〔笑声。〕他们问为何此法案不运用于所有行业中。这就是十足的激进党人——鲁莽，无选择，轻率的激进政策。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人，此人听说通风是一件好事，于是就打碎了房间里的每一块玻璃，最后死于风湿病。〔笑声和喝彩声。〕这不是保守党的政策。保守党的政策是一种基于尝试的政策——一种三思而后行的政策；它是一种假如有梯子可下，决不会跳下的政策。〔笑声。〕因为我们的进步是缓慢的，可靠的和连绵不断的〔对，对。〕而将要采纳的这个议案表明了托利党人立法的趋向。它向千万个国人说明，托利党人不仅愿意帮助他们就业，而且也有此能力；英国工人更应寄希望于托利党代表的民主大潮，而不是激进党的日益干涸的排水管。〔笑声和喝彩声。〕

我不无遗憾他说，一件事如果朝一个方向发展，就不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我指的当然是技师们的大罢工。劳资双方的战争已经爆发，最终结果必然是留下一片可怕的荒凉，〔对，对〕并给千百万人带来不幸。不管孰对孰错，不管是老板还是技师——双方实际上都错了；不管谁最终会赢，双方必遭损失。〔对，对。〕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输家没有一席之地。每个人和团体无疑都有权在最便宜的市场买最好的商品。假如英国制造商不能在贸易市场上生产出最低价格的出口商品——这是英国人的骄傲和外国人的羡慕——人们就会转向德国皇帝或一些别的并不出色的个人。〔笑声和掌声。〕政治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怎样避免劳资间的争端。〔对，对。〕我最终的希望是，劳工能成为他所在行业的持股人，那样他就不会不愿意忍受萧条年代的压力，因为他分享兴旺年代的利润。但是这个方法只能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同时，每个有影响力 and 有机会的人，都有责任将这些旷日持久的争论做个了结。每个政治组织都有这个责任，面对樱草联盟，来说，它比任何其他政治组织部更有责任。

樱草联盟在以往 15 年中确实干了许多艰巨工作。它始终教育大不列颠人民牢记帝国的辉煌，宪法的实质及舰队的重要性。但是现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必须对使我国繁荣的好制度进行普及工作，这样才能使我们永远保持骄傲的地位。〔喝彩。〕这是一个重任，但我们会得到奖励的。帝国的情操，团结一致的愿望，在女王统治 60 周年之际实现的独一无二的帝国的荣耀，这一切都是与樱草联盟的原则和情感相吻合的。〔喝彩。〕我不想太过分他说这完全是它的成果，因为那样是过于夸大了，而好事是不需要夸大的。

〔对，对。〕但我们可以公平他说，我们为所有与帝国运动有共鸣的人提出了号召，对热情投身于此的所有人提供了活动场所，我们收集了遍布全国的公众意见，集中成明确的行动目标。既然我们担负了我们的一份工作，我们就可以要求我们的一份荣誉。〔对，对。〕

这些回顾对许多像斯克林先生和执政大臣赖特上校那样的人来说是愉快的。他们从樱草联盟的草创时期就一直关注着它。最初，我们的联盟被认为只不过是“第四党”的一个花招，受到激进党派的蔑视和托利党的怀疑。联盟生存于一条窄缝中。但是现在它成长了，在奚落声中和反对声中壮大起来了。它分布于这片国土上的几乎每一个村镇，它的影响渗透到各个阶层，现在它已是政治机器中最复杂的部分之一，成了举世瞩目地矗立于宪法权力下的最巨大丰碑的组成部分。〔喝彩。〕

1880年，托利党曾被打垮过，它四分五裂，心灰意冷。它的伟大领袖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气息奄奄，它的原则不再流行，它的成员寥寥无几，已经濒临灭亡。然而请大家看看今天的托利党。〔喝彩。〕托利主义的奋斗精神已使英国政府发展成为现代最强有力的政府。〔喝彩。〕1889年的自由党曾是生机勃勃的，团结一致的，最高级的，现在却萎缩成由一些信誉扫地的狂热分子组成的四分五裂的派系，没有人员的增加，没有政策，没有一致行动，没有凝聚力，只有爱尔兰自治运动像个大磨盘吊在他们的脖子上。〔喝彩。〕在这公众意见发生巨变的过程中，樱草联盟担负了它的一份工作。它孜孜不倦地工作，把托利党的原则灌输到英国人民的头脑中，尽管这个任务重，持续时间长，我们还是干完了，有了光荣的回报。〔喝彩。〕激进党则被时代所击倒。它躺在地上，接下来是联盟的事了，要让它永不翻身。〔笑声。〕樱草联盟经受了讥讽的考验，忍受过失败的考验，它继续存在，现在就看它能否经得住胜利的更大的考验。我们必须再接再厉。离下次竞选还有3年时间。让我们挑选目标——激进党某一要人把他打倒，镇住他，直至威风凛凛地把他带到投票处。到那时，1901年的竞选就会像1895年英帝国竞选那样荣耀了。〔欢呼。〕

不少人说，帝国在60周年时已达到荣耀和权力巅峰，现在要开始走下坡路了，就像巴比伦、迪太基和罗马一样。不要相信这种不祥预言，我们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生命力是不会衰退的。我们的决心是作为英国人，坚持我们从父辈继承的帝国，使我们的国旗高高飘扬在海洋上空，让我们的声音传遍欧洲议会，我们的君主被热爱她的臣民所拥戴，我们的事业被一双万能的手指指着继续前进，把和平、文明和良政带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热烈喝彩。〕

译自《温斯顿·丘吉尔演说全集》第1卷
吴英 译 居宗雍 校

写作的乐趣
1908年2月17日

保守党内的反对派，为区别于自由党、保守党和爱尔兰自治党，自称“第四党”。
即本杰明·迪斯累里，后两度出任首相。

在我看来，世上幸运的人——世上唯一真正幸运的人，是那些工作也是其乐趣的人。这个阶层的人并不多，还没有人们常说的那样多。也许，作家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就幸运而言，他们至少享受着生活中真正的和谐美。依我看，能使工作成为乐趣，是世人值得为之奋斗的阶层标志；而且，我毫不怀疑别人会羡慕这些幸福的人，因为他们在思绪驰骋的畅想曲中找到了生计，对他们来说，每劳动一小时，就是享受一小时，而休息——无论多么有必要——是令人讨厌的插曲，甚至度假也几乎成了一种损失。无论写得好坏，写得多少，只要在意，就可尝到谋章布局的乐趣。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临桌而坐，整整4个小时不受打扰，有足够数量的雪白稿纸，还有一支“挤压式”妙笔〔笑声〕——那才叫真正的幸福。全心全意地投入一项令人愉快的职业——此愿足矣！外面发生什么事又有何妨？下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上院也可如此。〔笑声。〕异教徒可以在全球各地大发作。美国市场可以彻底崩溃。证券可以下跌；女权运动可以兴起。〔笑声。〕没有关系，不管怎么说，我们有4个小时可躲开这个俗气的、治理不善的、杂乱无章的世界，并且用想象这把钥匙，去打开藏有大千世界一切宝物的小橱。〔喝彩。〕

说到自由，既然自由自在的人为数不多，难道作家还不算自由？既然获得安全感的人并不多，难道作家还不算安全？他作业的工具极为平常，极为便宜，几乎不再有商业价值。他不需要成堆的原材料，不需要精密仪器，不需要有人效犬马之劳。他的职业不靠任何人，只靠自己；除了他自己以外，任何事都无关紧要。他就是一国之君，既自给，又自立。任何人都不能没收他的资产。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的从业资本；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违心地施展才华；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他按自己的选择发挥天赋。他的笔就是人类和各民族的大救星。〔笑声。〕他的思绪在自由驰骋，任何锁链束缚不住，任何贫困阻挡不住，任何关税限制不住。〔笑声〕，甚至“泰晤士”图书俱乐部〔笑声〕，也只能有节制地对他的收获泼一点冷水。无论作品是好是糟，只要已经尽力而为，他就会感到欢快。在变幻无常、扑朔迷离的政坛活动中，我每每以此信念自励：我有一条通向安逸富饶之地的退路，在那里，任何无赖都不能追踪，我永远不必垂头丧气或无所事事，即便没有一丁点权力。确实，在那时，我才为自己生来就爱好写作而真诚地感到欣慰不已；在那时，我才对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所有勇敢而慷慨的人充满感激之情，因为他们为确立如今无可争议的写作自由进行了斗争。〔喝彩。〕

英语是多么崇高的媒介！我们每写下一页，都不可能不对祖国语言的丰富多彩、灵巧精深，产生一种实实在在的喜悅。如果一位英国作家不能用英语，不能用简单的英语说出他必须说的话，请诸位相信，那句话也许就不值得说。英语没有更广泛地得到学习是何等憾事！〔听啊！听啊！〕我不是要攻击古典教育。凡自命对文学有一丁点鉴赏力的人，都不可能对希腊罗马的吸引力无动于衷。但我承认，我们目前的教育制度却使我忧心忡忡。我无法相信这个制度是好的，甚至是合理的，因为它把唯有少数特权人物和天才人物才能欣赏的东西，一古脑儿摆在很不情愿而又很不理解的人民大众面前。对公立学校的广大学童来说，古典教育从头至尾都是一些冗长的、毫无用处和毫无意义的废话。如果有人告诉我说，古典课程是学习英语的最好准备，那我就回答说，迄今为止，大批学生已完成了学业，而这个准备阶段却仍然很不完善，未能收到它所保证的任何好处。

即使那些无缘成为大学者、但对古代作家有所了解的人，难道可以说他们已经掌握英语了吗？究竟有多少从大学和公立学校毕业的儒生，能够娴熟地写下一段拉丁诗文，使坟墓中的古罗马人闻声而动？〔笑声。〕能写出几行佳句的人何其少矣！更不要说能用简单的、正确的和练达的英语写出几个精彩段落的人了。不过，我倒是极为仰慕古希腊人——当然，我得仰仗别人把他们的情况告诉我〔笑声〕——我想见到我们的教育专家至少能在一个方面效法古希腊人的榜样。古希腊人是如何使自己的语言成为人类迄今所知最典雅、最简炼的表达方式的呢？他们花毕生时间学习希腊语以前的语言了吗？他们不知疲倦地坚持探索已消失的世界的原始方言了吗？根本没有！他们只学习希腊语。〔喝彩。〕他们学习自己的语言。他们热爱它，珍惜它，装饰它，发展它，因此，它才能延续下来，成为所有后代人的楷模和乐趣。毫无疑问，对我们来说，既然英语已经为自己在现代世界赢得了如此无与伦比的疆域，我们至少能从古希腊人那里学到一个道理，在数年教育中稍微操点心并拨出一些时间，去学习一种也许将在人类未来进步中起到主导作用的语言。

让我们都记住，作家永远可以尽最大的努力。他没有任何借口不这样做。棒球巨星也许会状态不佳。将军在决战之日也许会牙疼，或者他的部队很糟糕。〔笑声。〕舰队司令也许会晕船——我作为晕船者满意地想到了那种意外。〔笑声。〕卡鲁索也许会得粘膜炎，哈肯施米特也许会得流感。至于一位演说家，想得好和想得正确是不够的，他还需想得快。速度至关重要；随机应变越来越成为优秀演说家的标志。所有上述活动都需要行动者在一个特定时刻倾其所能，而这一时刻也许决定于他完全无法控制的种种事态。作家的情况不一样。不到万事俱备，他永远不必出场。他永远可以发挥最大的能力，他并不依赖于自己在某一天的最佳一刻， he 可以把 20 天的最佳时刻加起来。他没有理由不尽最大努力。〔听啊！听啊！〕他的机会很多；他的责任也很重。某人说过——我忘记了此君是谁——“话语乃唯一持久不灭之物”。依我看，这永远是绝妙的思想。人类力量的最伟大的杰作，即人类用石块垒起的无比坚固的大厦，也会夷为废墟，而那脱口而出的话语，那思绪起伏时转瞬即逝的表述，却延续了下来，但它不是过去的回响，不是纯粹的建筑奇迹或神圣的遗址，它力量依旧，生命依旧，有时候远比初说时更坚强有力，它越过了 3000 年时光的峡谷，为今天的我们照亮了世界。〔喝彩。〕

译自《温斯顿·丘吉尔演说全集》第 1 卷
王建华 译 井力 校

政治画家

1932 年 4 月 30 日

皇家科学院果然是侠义心肠，偏偏从有幸与会的所有政治家中挑出了内政大臣和我——两个离开会场就最不为人理解的政治家。〔笑声。〕我俩在这里找到了庇护所。我不敢奢望对皇家科学院院士的艺术说三道四。门外汉

卡鲁索（1873—1921），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

哈肯施米特（1877—1968），俄裔英国自由式摔跤运动员。

也许会那样做，但作为一个谦卑的业余爱好者，我对杰出的艺术大师们无比尊敬。我想对诸位讲另一个“科学院”，它不仅是“皇家科学院”，而且目前也是“全国科学院”，它坐落在威斯敏斯特，今晚有许多客人都来自那里。

本届国民政府与皇家科学院有许多相似之处。它虽不像后者那样源远流长，而且也许不如后者长寿〔笑声〕，但它也要迎合公众的明确需求，也要容纳——我不能肯定“容纳”一词是否贴切，姑且用之——政治艺术的各种风格和流派。

我要对诸位谈谈几位名列前茅的政治画家。第一位当然是首相。听说他的健康状况大为改观，我们是多么高兴。〔喝彩。〕他的作品非常出名，遗憾的是，我们在国内却不能更经常地见到。最近，他屡屡在国外展出，以致我们非常惦记他在国内的佳作。〔笑声。〕我相信，目前他在欧洲大陆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作品仍然令人不快地尚未完稿〔笑声〕，我们盼望这些作品能够问世，也盼望他的归来。

许多年来，我一直在留意首相的风格和技巧，而且我不妨说一句，我一直认为他的画中朱红色太多了。〔笑声。〕资本主义已放射出灿烂夺目的晚霞；我高兴地发现，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风格。在他新创作的所有绘画中，我们发现了钴蓝、法兰西佛青、普鲁士深蓝和各种各样的蓝色〔笑声〕，当然，我要高兴他说，还有真正的英国蓝〔笑声〕——我们都赞赏不已的神圣的蔚蓝。我认为，首相在绘画中使用蓝色时酷似已故的约翰·萨金特，即不仅用蓝色烘托气氛，而且用蓝色确定基调。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他的现代风格，而不是他的早期风格。

下一位是枢密大臣鲍尔温先生。我可以向诸位保证，他仍然是我院的一位杰出画家，如果一定要我批评几句，我就说他的作品缺少一点色彩，他对前景的景物也缺少一点严格的定义。〔笑声。〕他在晚期不仅改变了风格，而且改变了主题。我们都非常怀念他在过去创作的令人欢快的古英国画卷——“伍斯特农庄”、“红花草丛中的猪”、“秋日的花椰菜”等。〔笑声。〕最令人怀念的却是除了他的画笔就无人能充分表现的主题——“酿造审计麦芽酒”。〔笑声。〕公平他说，我必须承认，在鲍尔温先生的绘画中，他的中间调是非常令人舒服的。〔笑声。〕

下一位就是我院的殖民地大臣托马斯先生了。他是我不妨称之为卓有成效的主体主义流派的代表。〔笑声。〕有些人认为这个流派个人震惊，另一些人则说它不能令人信服。批评得很严厉，是不是？尽管如此，它肯定对我国的绘画作出了非常有趣的贡献。

我相信诸位会问，我为什么这些日子不展出自己的作品。〔笑声。〕我为什么不在科学院的画展上占有重要一席？我要对你们坦率直言，我不作任何隐瞒：我同委员会——选拔委员会——有点儿意见不合。〔笑声。〕幸运

指 1931 年英国组成联合内阁。

伦敦泰晤士河北贵族居住区，英国政府所在地。

即詹姆斯·麦克唐纳（1866—1937），当时为联合内阁（又称国民政府）首相。

指麦克唐纳首相曾持工党观点。

约翰·萨金特（1856—1925），长期侨居美国的美国画家，擅长肖像画、水彩画、壁画。

指鲍尔温在出任财务大臣期间卓有成效。

的是，就我而言，他们的权力有限，今年我并不打算向他们提交任何作品。

〔笑声。〕

我已经加入教师的行列。我们在威斯敏斯特有一所“平板套色学校”。学员们年轻有为，热切向上，前程无量——要学、要闯。〔笑声。〕我想帮助他们获得议会政治的技巧和知识。我自己的画板上也有一些东西，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向公众汇报。我肯定，在向诸位谈了我们的政治科学院之后，大家一定会同我一起为你们自己的提议而干杯。

译自《温斯顿·丘吉尔演说全集》第5卷

秦文勇 译 井力 校

巧借“平板套色工会”的名称。

亨利·欧文

1838—1905

英国著名演员，导演。酷爱戏剧，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戏剧上。1856年第一次获准向戏剧投资100英镑，用于购买假发、剑及服装等道具，并得到了业余演员的职位，参加在皇家索赫剧院演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上演那天，他采用了艺名欧文。初次上演即告成功，从此踏入戏剧界。他曾主持伦敦兰心剧院，以扮演莎士比亚剧中的哈姆雷特、奥赛罗和麦克佩斯等角色著称。著有《表演的艺术》等。

本篇是亨利·欧文在伦敦戏迷俱乐部的年会上作的演讲。他阐述了戏迷和演员的关系，戏迷和演员经纪人的关系，以及戏剧面临衰退，必须作一番改革的设想。他特别强调戏剧在文明时代的重要性，主张戏剧应该像煤气和水一样必不可少，应该像图书馆和博物馆一样受到市政府的关注，从而成为都市文明的一个象征。通篇幽默风趣，令人捧腹，却又发人深省。

论戏剧

1898年2月14日

主席先生及各位来宾：

自从我有幸与诸位一起在此聆听令人欣慰和有助消化的演讲已有5年了。这些演说在餐后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笑声。〕在这5年中，我敢说我们在观点上有许多不同。戏迷和演员总是不能达成共识，更何况与那个倒霉蛋，那个可怜的经纪人了。但是无论你们现在说我什么，尽管用词不像刚刚主席先生那么动听，我还是会感到满意的。因为我仍然拥有你们的敬意和好意。从某种感觉上说，你们是经纪人的选民。你们虽然不能采用像议会程序那样的直截了当的方法把他从办公室扔出去，但是你们可以离开剧院，那样也就是等于排斥了他的戏。〔笑声。〕总之，尽管站在演员的角度我知道那只是一种假设，但这是一种比激烈的批评更使人难堪的方法。〔笑声。〕无论如何，你无法和四散离去的戏迷争个没完。

在此我不想作任何指责——我只是注意到具有经营头脑的戏迷俱乐部仍保持着生命力，我还注意到像这样和你们见面具有滋补强身的功效。〔笑声。〕这点我可以向一些常给报刊写文章的先生们竭力推荐。〔笑声。〕有一份杂志登过一篇长篇通讯——是份季刊吧——谈到了戏剧界的情况。我想这是一位著名作家，他把剧评的作用与海军监察人的责任相提并论。他写道，英国戏剧的不幸衰退是党派政府造的孽。那当然是一种很有创见的想法，但我以为这位作家如是说，想必是误会了。他把戏迷俱乐部当作了作战部或是英国海军部了。即使我们也许没有预期到任何戏剧娱乐的革命会来自英国宪法最彻底的改革，我们还得感激这位先生揭示了戏剧不断衰退的一种全新的理由。〔笑声。〕

在我所收到的公众来信中，有许多谈到了有必要办一所戏剧公立艺术学校之事。假如这样一个机构能在这个国家扎根的话，无疑会有许多优点。几年前，我曾冒昧地建议市政系统可以为剧院做些什么，就像欧洲其他国家所做的一样。然而，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个重要的问题被提上郡政务

会的议事日程，而任何主张改革的行政人员也没有认识到，戏剧的确应该像煤气和自来水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笑声。〕与一些欧洲国家不同的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尽管人才济济，也没认识到市属剧场应与市属图书馆或博物馆一样成为有益健康的生活中的一部分。〔“是啊！是啊！”〕是否这种发展就要来到我不得而知，但是我能想象到，某种社会效益必将会从戏剧公立艺术学校这样的机构中产生。它能有效地控制那些不具备表演才能的人蜂涌而入戏剧专业。有些剧评作家和专栏作家天性喜欢美化人的隐私，把一些不实之词强加于我们，这些文章是否对我们有益令人怀疑。除非舞台监察承担责任，这种事才可成为戏剧宣传的重要部分。

这样不像话的文章每周都有。许多演员因而被这样那样的轶闻骚扰至死。〔笑声。〕有时候你会读到一些一本正经的文章，谈论演员的贪得无厌的虚荣心。我们无论如何要感激这样的作者，好像虚荣心是人类的一种特有财产似的。但是，这类有组织的闲话却真正表现了搜罗这种资料的先生们的勤奋，和发行此类报刊的煞费苦心。“我们知道这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极端的断言，频繁的飞短流长和造谣惑众，我以为，有责任心的记者，都会加以抵制。不过，抵制恐怕是不容易的，因为又会引起另一阵风波，这一切都被看成是理想的复制品。〔笑声。〕

当然，先生们，戏剧正在衰退——自从罗修斯时代以来，自从著名的大象拉贾在麦克里迪的剧团里担任主演，自从《恒河大奔流》里的真水池使约翰·肯布尔和西登斯夫人增添魅力之后，戏剧已过了兴盛时期。正如几天前我在报上读到过的，当演员们徒劳地朗诵二十行自由诗——当我们被告知，机械的努力和众多的军队及群众角色促成了历史剧的产生——病理学的剧情总是受欢迎——“精神病学的”（管它是什么）——〔笑声。〕总是成功——而皮内罗和格伦迪的戏剧的先进思想却反而不被人接受，我们自己显然陷入了一种异常的状态中。

在所有痛惜戏剧衰退的原因中，有一条是要重申的：长期惨淡经营的影响。假如经纪人不是一个世俗的、心智不健的人，他应该在戏剧的鼎盛时期取一杯成功之羹以在低谷期开始一种新的实验。〔笑声。〕但是，他却沉溺于卑微的商业主义而不能自拔，他竟然同情那些想要让自己的剧作连演百场而不是只演二十场的剧作家。我不知道这种贪婪精神怎样才能被抑制。虽然剧院开始时观众倍增，但长期上演必然观众寥寥。

我希望你们不要指责我对戏剧抱着这样沮丧的观点。相信我，我对戏剧是充满希望的。诚然，我们有时听到有人说莎士比亚快完了，某某诗人的智商被估计过高了等等。最近一位可尊敬的先生在汉普斯特德宣布，他打算完全取缔戏剧。〔笑声。〕汉普斯特德的气氛像醉人的琼浆；对某种固执已见的头脑来说，无论如何这是有强刺激效应的。这种偏执遭到了一位出色的英国教会的光彩人物的鞭答。他就是迪安·法勒。他认为，对付攻击戏剧的人最好方法是“以毒攻毒”。好了，这段时间对戏剧的误解使得戏剧很不太平。我想它会从这纷争中走出来的，它有重新振作、坚韧不拔的生命力，这极大地归因于你们的不懈同情和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鼓励。〔喝彩。〕

英国演员，经纪人，在舞台艺术技巧和舞台制作方面颇有建树。

均为英国演员，前者扮演过哈姆雷特等角色，后者有“悲剧女皇”之称。

节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涂友良 译 井力 校

孙中山 1866—1925

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一度行医。1905年在日本组织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确立三民主义学说，在中国第一个全面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和政纲。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国民党。他的许多思想、主张都以演说的形式表达，是位出色的演说家。

这里介绍他的3篇演说。其中，《中国人和日本人》是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上发表的，言辞恳切，情感激昂。他呼吁中日两国亲善、友好，建立唇齿相依的兄弟关系。他用温和、谈谐的口吻把中国描述成保守的，日本是进取的，又用“足力不济”作比喻，说明中国“只有依靠扶助才能站起来”。通篇语句贴近生活，不落俗套，抽象的道理被他讲得通俗易懂，体现出轻松活泼的幽默旨趣。《说知难行易》是他赴桂林组建北伐大本营时，在当地教育界欢迎会上所作的演说。他没有泛泛而谈“知难行易”的深奥哲学道理，而是广征博引、纵论横比，对旧观念的嘲讽、对人心理的妙析都有浓浓的幽默感。《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发表于岭南学生欢迎他的大会上。他以大科学家用毕生精力从事研究，终成大事的实例，形象透彻地阐明自己的立志观。他避开了与旧立志观的直接相碰，而是通过剖析想当皇帝的人的反常心理，使听众在对比中得出结论。演讲赢得了听众的阵阵笑声、掌声，效果很好。

中国人和日本人 1913年2月15日

诸位：今晚有机会参加如此盛大的欢迎会，藉以倾述拙见，我感到莫大的荣幸。同时有一件事使我无比感动，此非别的什么，而是我们现在在此聚集了这么多人，假如欧洲人、美国人也在此就座，他们究竟能分辨出谁是日本人、谁是中国人吗？

我多次到欧美旅行，在途中数度被人误认为是日本人。贵国人看见我，问我是不是日本人，甚至连中国人也以为我是日本人呢。有一次去夏威夷，那里的日本人以为我是日本人，用日语与我交谈。到了美国，去中国人开设的商店里购物，他们同样把我错认为日本人，并用英语询问我。我用中国话回答说，我是中国人，他们听了都很惊奇。我们不仅有这样深厚的人种关系，而且在这20年中我浪迹天涯，其间在中国居住的时间甚少，而在日本居住的时间则远为更长。因此，我把日本当成第二故乡。今晚在此与诸位相会畅谈，决非卖弄辞藻，表面应酬，同时也无意深究理论或发表政策上的演说。换句话说，我打算像小别回家一样，同家人亲友欢聚一堂，共话家常，但愿诸位勿嫌厌耳。

综观东亚形势，在文明或接近文明的国家中，被世界公认其地位的，只有中国和日本，且两国都地处东亚，但维持东亚和平最有力者其为日本。所幸日本在40年前进行了维新大改革；鉴于世界大势，无论在欧美宪法与法律方面，抑或在政治、经济、实业、科学等所有领域，皆取其所长、补我所短，大力输入其文明，吸取其进步因素。结果，日本发达成为今日之强国。以日

本的国力，谅必可以维持今日东洋和平。

回顾 40 年前的世界大势，欧美各国伸及东洋的势力，不像今日这样咄咄逼人，因此日本利用了当时的机会，遂使维新大业得以完成。假如日本当时尚未觉醒，像中国今日一样，国民才从中惊醒，起来进行革新运动，那么可以想见，东洋的天地，恐怕早已不在东洋人的手中了吧？今日列强在东洋的势力颇为强大。中国立国久远，中国人多顽固保守，所以迄至今日国势仍极为衰微，但自前年到去年逐渐觉醒，试图一扫几千年陈腐的空气，开始进行文物、制度等各方面的改革。但一旦想起列强正在欺压东洋，我便感到中国今日之现状不但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是险象环生，危急万分。

我每次旅行欧美，与各国人民交往，其中提倡人道主义或富于世界主义思想者甚多。他们屡屡向我提出忠告，说中国需要革命，但难于成功。因为欧美列强必然会乘中国革命之乱干涉中国，或占领中国领土，或夺取种种特权。如果列强采取这种态度，中国将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因此，说什么中国要进行改革，非提出革命之外的方法不可。

上述西洋人的说法，至为合理，本当予以听取。但十分遗憾，不能侧耳恭听。经进一步考虑，我深信定能将革命进行到底。那么，为什么能坚定革命精神呢？这是因为我心中确信，中国革命一旦成功，便能给亚洲以大力援助，所以我同样从心底确信，我进行的革命必将获得亚洲的大力支援。我愿为中国革命舍身奋斗，努力不懈。而在东亚，国力强大者当首推日本帝国。日本是大帝国、大强国，实与我们同种同文，而且两国有着深厚历史关系。我深信，既然何这个大帝国存在于东亚，就必定可以借助这大帝国的力量，完成革命大业，维持东洋和平，故我毫不踌躇，专心一意为革命而奔走。

有个土耳其国，在亚洲的西部，两三年前，该国爆发了革命，不论这次革命成功如何，今日实处于悲惨的困境。而最近中国也同土耳其一样，在进行革命，相信不致于重蹈土耳其的覆辙。理由何在？盖因亚洲东部有日本这个强国与中国相毗连，况且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又是亲善邻邦。而相比之下，土耳其则没有如此强大的邻邦，这就是中、土两国革命唯一不同之点。亚洲人所持信赖日本的观念乃是一大事实，我本人便是如此，一直持有这种想法，因不得机会，迄于今日才加以发表，实在遗憾之至。

日本在过去 40 年中进行维新大改革，输入欧美文明，使国势日益发达。在回顾东亚形势时，看到与日本相邻的中国尚在昏睡中，中国若不振作，独由日本一国维护东洋和平，实无把握，一定要使中国从 50 年的迷梦中觉醒，注入世界文明，世界思想，保全四百余州大陆。从中日两国唇齿相依的关系，计议亲善合作。此种思想已在一部分有识之士中竞相传布。我前次到日本，适逢近卫（笃磨）公设立同文会。同文会即据此思想成立，旨在使中国成为与日本相同的文明国，使四亿人民同沐于和平幸福，为此，诸位弹精竭力，才使同文会宣告成立，而巨迄今仍为中国尽力始终不渝。在当初便赞成它的宗旨，今日在此谨表深切谢意。

中国与日本正如兄弟二人一般，但这兄弟俩，一个充满进取气象，具有进步思想，致力于文明事业，使之繁荣昌盛；而另一个则是保守主义，思想也陈腐，凡新鲜事物，刚一萌芽，便横加阻挠。进步的哥哥见保守的弟弟颓靡不堪，自是忧虑重重，想方设法，使弟弟摆脱腐败状态，以期互相协作走向富强。但弟弟一方，久睡不醒，仍为腐败思想所羁绊，对哥哥的行动亦毫无反响。这样，一方不求进步，另一方则无法使之进步。这种状态持续下去，

兄弟之间的感情就不会融洽起来，甚至由此引起误解。误解之上又生误解，兄弟间就会不断出现隔阂。最近的形势已发展到令人忧虑的地步了。不过，从前年开始，我们中国也在议论自己的不是，明白自己距离世界大势甚远。从此，才开始觉悟到，必须效法兄长，维新大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全面改革。但是，这只是如梦初醒，看到革新的曙光。而手脚远未像脑袋那样动弹起来，也还是懒洋洋地赖在床上一动不动。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今日仍一如既往，把日本看作是最可信赖的友邦。中国的足力不济，只有依靠扶助才能站立起来。日本为什么不从速伸出援助之手呢？因为日本担心，倘若明显地对中国表示友好态度，欧美各国看见，势必忧虑起来，不平不满，再者，日本在这以前无从向中国发出忠告，而中国也根本不会听取日本的忠告。现在，中国开始觉悟了，别人又会不会怀疑是真正的觉醒呢？中国人大都有这样的想法。

然而，中国毕竟从梦中猛醒过来，只是如前所述，足力不济，步履艰难。尽管如此，头脑总算开始活跃起来，要不就有逆于人之常情了。但中国实际上身体衰弱，而身体衰弱者容易陷于神经过敏，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当有人玩弄中伤离间诡计时，就会皂白不分，信以为真。譬如新闻报道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中国报纸往往不加考虑地刊载形形色色的臆说或失实的消息。而日本方面不论对事实的识别，或是对论据的分析，都缺乏判断力。因此，中文报纸若发表了中伤或臆测的报道，日本人读后便误以为这是中国人的想法，继而又传到日本。这样，本来已误解中国人的想法就完全被日本人误解了。

亚洲毕竟是亚洲人的亚洲，中日两国人民交往上不应互相猜疑，不但不应轻信他国人之妄说，且应断然避免对他国报以类似的歪曲。保卫亚洲和平是亚洲人应尽的义务，尤其是中日两国必须相互合作。中国时下对保卫亚洲和平尚欠实力，故日本的责任非常重大。特别是希望日本尽量关心中国，与中国同心协力，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愿望，恐怕也是全中国人所热诚希望的吧！

我们亚洲是一家，一家里面中日是兄弟，假如这兄弟二人交恶，亚洲一家终究不能保持和平。日本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中国则是东方最大的国家，两国如能互相协作，东洋和平，进而世界和平，易于得到保障。对此，我深信不疑。

然而，如何才能谋求两国亲善，增进合作呢？我以为，兄弟二人真心相见实为必要。兄长了解弟弟的心意，弟弟亦体察兄长的心意。这样心意相通的时候一旦到来，两国就可望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协作关系。但今日，中日两国之间并未充分疏通彼此的心意，双方都不知应以何种政策来增进两国关系，因而会听信第三者意见，这实在是万分遗憾的事。我此次访问贵国，沿途耳闻目睹，知道凡日本人皆关切东洋和平，爱我中国。我归国之后，必将日本人士的好意转告我国国民。

今晚，承蒙举行如此盛大的欢迎会，得以将我素所怀抱之一端相告，实为生平最愉快之事。愿今后两国人民披沥诚心，相互疏通意见，以亚洲作自己的家，而中日两国间首先要增进情谊，同心协力，以此保障东洋和平，这就是我热切的愿望。

说知难行易

1921年12月9日

欧美的文明，不过是二百多年的事，最好的文明，尤在近来几十年。再拿日本来说，50年以前，他们的文明是很黑暗的，近来四五十年便进步得很快。又拿暹罗来说，近20年来文明的进步，也是中国不及的。中国的文明，古时进步很快。欧美的文明，近来进步很快。日本和暹罗的文明，也是近来进步很快。推求这个进步很快的原因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有着正当的学术，有着正当的思想。中国近两千多年文明不进步的原因，便是在学术的思想不正当。不正当的地方，简单的说，便是大家以为行是很难的，知是很易的。这种思想便误了中国，便误了学者。

就中国近来的情形说，一般学者在学读书的时候，10年窗下，辛辛苦苦，便觉得艰难的了不得。到了有点成功，出而应世，去实行的时候，遇到社会上的人，都说“知是容易的，行是艰难的”。这两句话，真是误了学者不！何以误了学者不浅呢？因为求学的时候，10年窗下，费尽脑力，耗尽心血，所求的学问是很不容易成功的。若是有一点儿成功，出去实行，便有人说：“哼！你求学的时候难，实行的时候更难呢！”大家听到这句话便吓怕了，便不敢去行。不去行，便无法可以证明所求的学问是对与不对；不去行，于是所求的学问没有用处。到了以为学问没有用处，试问哪一个还再情愿去求学呢？就中国从前的情形说，周朝以前的进步是很快的，到了周朝之后，文化便很老大，由于老大的结果，便生出怕事的心理。怕画是好是坏呢？队好的一方面讲，是老成持重；从不好的一方面讲，是志行薄弱。总而言之，人到了怕事，便遇事畏难，不去做艰难的，只找容易的事去做；好像倒一盆水到地下，总是向没有抵抗力的低下部分去流，是一样的道理。人到了畏难，就不敢轻于尝试，试问文化上怎么能够有进步呢？推究这个原因，根本上的错处，便是在“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以难的为不难，以不难的为难，这个便是大错。我们要除去这个大错，归到正面，便应该说“知是难的，行是不难的”。我们中国人的心理，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以为行是难的，知是不难的。把极容易做的事，视为畏途，不去实行，求一点实际的结果，把极难知的事，看得太容易，不去探求。所以二千多年来，对于一切人情物理，都不能登峰造极。至于科学知识极普遍的欧美人，便没有这个心理。譬如本大总统从前和朋友正在研究“知难行易”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工学博士进到房内，他说他在美国学校的时候，一天，有一个美国先生告诉他，说知是很难的，行是不难的。这位工学博士是中国人，早有中国学说之“知易行难”的老成见在心，便很带怀疑，和美国先生辩论起来。那位美国先生说：“你不要和我争，我告诉你一段故事自然可以明白。我从前知道有一个人家的自来水管坏了，那个人家的主人，请一个工人去修理，那工人稍为动一动手，就修好了。主人便问工人：‘你要多少钱呢？’工人说：‘50元零几毫。’主人说：‘你稍为动一动手，便修好了，像这样容易的工，何以要许多钱呢？且你不要50元或者51元，何以单要50元零几毫呢？这个工价数目，真是奇怪的很！’工人对主人说：‘你看到我修好了之后，这个工作是很容易的。但是从前何以不自己去修理呢？你从前自己不去修理，要请我来修理，自然是由于你不晓得怎样修理的原故。我晓得怎么样修理，所以一动手便修好了。这哪晓得怎么样修理的知识，是很难的，所以我多要一点价值，那50元便是

知识的价值；至于动手去实行修理是很容易的，所以我少要一点工钱，那几毫便是我动手的工钱。’主人听了这番话之后，便一面点头，一面对工人说：‘你所讲的话很有道理呀！我给你50元零几毫罢。’”照这件事看来，就可证明知是很难的，行是容易的。中国人的思想就错在这里，所以中国的文化，几千年都不进步。这里不进步的错处，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所以中国人的错，便是走错了路。

诸君今天欢迎本大总统，要欢迎本大总统的性质。〔鼓掌。〕本大总统的性质，生平是爱革命。〔鼓掌。〕诸君要欢迎本大总统革命的性质。〔鼓掌。〕本大总统想要中国进步，不但是对于政治，主张要革命，就是对于学问，也主张要革命；〔鼓掌〕要把全中国人几千年走错了的路，都来改正，所以主张学问和思想都要经过一番革命。〔鼓掌。〕就中国革命的历史说，汤武是主张革命最早的，人人都说是“顺乎天应乎人”。本大总统从前主张革命的时候，人人都说是“造反”。说到学问思想上，要去推翻他，就是要把思想反过来。〔鼓掌。〕所以古人说：“知之非艰，行之维艰。”本大总统便要说：“行之非艰，知之维艰。”〔鼓掌。〕诸君如果赞成本大总统学理上的革命，都应该说：“知之维艰，行之非艰”。〔鼓掌。〕

就知和行的难易之先后说，凡百事情，知了之后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当中必走许多“之”字路，经过很多的错误，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不避去那种错误的艰难？因为知是很难的。如果要等到知了才行，那么行的时候，便非在几百年、几千年之后不可，恐怕没有定期了。所以我们人类，有时候不知也要去行。譬如点灯的电，传电报的电，说电话的电，我们中国人现在有几个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呢？但是我们中国的大城市，现在没有哪一家不用它的。这个用它便是行，可见行是容易的。又如中国的指南针也有电的道理，用过了的时代和数目，不知有多少了。这个东西，有的说是黄帝发明的，有的说是周公发明的。无论是哪一个发明的，都是在外国人发明电之先，外国人向来没有的，中国便早早的行了。试问中国人究竟不知道电呢？学者为四民导师，中国的社会是很崇拜的，人有不知道的事情，要告诉他们去行才好。

选自《孙中山集外集》

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1923年12月21日

诸君：现在受教育的时候，预想将来学成之后，有一种贡献到社会上。究竟应该做些什么事呢？诸君现在还未毕业，知识不大发达，学问没有成就，自然不能责备诸君，一定要做些什么事。但是在没有做事之先，应该有什么预备呢？应该要注意些什么事呢？依我看来，在这个时期之内，第一件是要立志。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一件事。中国人读书的思想，都以为士为四民之首，比农、工、商、贾几种人都要高一些。二三十年以前的学生，他们有一种立志，就是在闭户自读的时候，总想入学、中举、点翰林，以后还要做大官。我今天希望诸君的，不是那种旧思想的立志，是比那入学、中举、点翰林、做大官的志，还要更大。中国几千年以来，有志的人本不少，但是他们那种立志的旧思想，专注重发达个人，为个人谋幸福，和近代的思想大不

相合。近代人类立志的思想，是注重发达人群，为大家谋幸福。用事实说，我们中国青年应该有的志愿，是在什么地方呢？是要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的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我们现在的文明，都是从外国输入进来的，全靠外国人提倡，这是几千年以来从古没有的大耻辱。如果我们立志，改良国家，万众一心，协力奋斗做去，还是可以追踪欧美。若是不然，中国便事事落在人后，永远不能自己发达，永远没有进步。推其极端，中国便非沦于灭亡不可。所以现在的青年，便应该以国家为己任，把建设将来社会事业的责任，担负起来。这种志愿究竟是如何立法呢？我读古今中外的历史，知道世界上极有名的人，不全是从政治事业一方面做成功的。有在政权上一时极有势力的人，后来并不知名的。有极知名的人，完全是在政治范围之外的。简单的说，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如果一件事业能够成功，便能够享大名。所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什么是叫做大事呢？大概的说，无论那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比如从前有个法国人叫做柏斯多，专用心力考察普通人眼所不能见的东西。那种东西极微妙，极无用处，为通常人目力所不及。在普通人看起来，必以为算不得一回什么事，何必枉费工夫去研究它呢？但是柏斯多把它的构造性质，和对于别种东西的关系，自头至尾，研究出来，成一种有系统的结果，把这种东西便叫做微生物，由研究这种微生物，便发明微生物对于各种动植物的妨害极大，必须要把它扑灭才好。现在世界人类受知道扑灭这种微生物的益处，不知道有多少。比如从前的人，不知道蚕有受病的，所以常有许多蚕吐丝不多，所获的利益极微。现在知道蚕也有受病的。蚕受了病，便不能吐丝。考察他受病的原因，是由于有一种微生物。消灭这种微生物，便可医好蚕的病，乃可多吐丝。现在广东每年所出丝加多几千万，但许多还有不知道医蚕病的。如果都知道消灭害蚕的微生物，更可增加无限的收入，那种利益该是何等大呢！现在全世界上由于知道消灭害蚕的微生物，所得的总利益，又是何等大呢！便是当柏斯多立志研究微生物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有这样大的利益。用这件故事证明的意思，便是说微生物本是极微极小的东西，但是研究它关系于动植物的利害，有一种具体结果，贡献到人类，便是一件很大的事。柏斯多立志研究的东西，虽然说是很小，但是它彻底得了结果，便是成了大事，所以他在历史上便享大名。我们中国从前的人，都不知道像柏斯多这样的立志，只知道立志要入学、中举、点状元、做宰相，并且还有要做皇帝的。〔欢笑。〕比如秦始皇出游的时候，刘邦、项羽都看见了，便各自叹气，表示自己的志愿。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也。”他两个人的口气虽然不同，但是他们的志愿，毫没有分别。换句话说，都是想做皇帝。这种思想久而久之，便传播到普通人群中。所以从此以后，中国人都想做皇帝，〔欢笑〕便不想做别的事。自民国成立以来，不是像袁世凯想做皇帝，便是像一般军阀，想做督军巡阅使，那也是错了。因为要达到那种地位，是很不容易的，障碍物是很多的。因为他们立志，一定要达到那种地位，所以弄到杀人放火，残杀人类，亦所不惜。诸君想想，那种志愿是好是坏呢？一定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消灭那种志愿。至于学生立志，注重之点，万不可想要达到什么地位，必须要想做成一件什么事，因为地位是关系于个人的，达到了什么地位，只能为个人谋幸福。事业是关系于群众的，做成了什么事，便能为大家谋幸福。近代人类的思想，

是注重谋大家幸福的。我从前已经说过，大家又知道，许多做大事成功的人，不尽是在学校读过了书的，也有向来没有进过学校，能够做成大事业的，不过那种人是天生的长处。普通人要所做的事不错，必要取法古人的长处才好，所以我们要进学校读书，取古今中外人的知识才学，来帮助我，做一件大事，然后那件大事，便容易成功。

诸君又勿谓现在进农科，学耕田的学问，将来学成之后，只是一个农夫，不知道耕田也是一件大事。从前后稷教民稼穡、树艺五谷，因为稼穡是一件很有益于人民的事。他不怕劳动，去教导百姓，后来百姓感恩戴德，他便做了皇帝。说起出身来，后稷还是一个耕田佬呀！〔欢笑。〕那个耕田佬也做过了皇帝呀！〔欢笑。〕古时候做过皇帝的人，该有多少呢？现在世人都把他们的姓名忘记了，只有后稷做过耕田佬，所以世人至今还不忘记他。〔欢笑。〕现在科学进步，外国新发明的农科器具比旧时好的多。事半功倍，只用一人之耕，可得几千人之食。诸君现在学农科的，学到成功之后，就是像外国农夫的，能够一人耕而有几千人之食，也不可以为到了止境。必要再用更新的科学道理，改良耕田的方法，以致用一人耕，能够有几万人食，或几百万人食，那才算是有志之士。总而言之，诸君现在学校求学，无论是哪一门科学，像文学、物理、化学、农学，只是自己性之所近，便拿一门来反复研究把其余关系于那一门的科学，也去过细参考，借用他们的道理和方法，来帮助那一门科学的发展，彻底考察，以求一个成功的结果，那么就是像中国的后稷教民耕田，法国柏斯多发明微生物对于动植物的利害，都是功德无量的大事。

我再举一件故事说，从前有个英国人，叫做达尔文。他起初专拿蚂蚁和许多小虫来玩，后来更考察一切动物，过细推测，便推出进化的道理。现在扩充这个道理，不但是一切动物变化的道理包括在内，就是社会、政治、教育、伦理等种种哲理，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之外，所以达尔文的功劳，比世界上许多皇帝的功劳还要大些。世界上的皇帝该有多少呢？诸君多有不知道他们姓名的，现在诸君总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达尔文的。所以达尔文的功，实在是驾乎皇帝之上。由这样讲来，无论什么事，只要能够彻底做成功，便算是大事。所以由考察微生物得来的道理是大事，由玩蚂蚁得来的道理，也是大事。不过我们读书的时候，必须用自己的本能做去才好。什么是本能呢？就是自己喜欢要做的事，就自己喜欢所做的事，彻底做去，以求最后的成功，中途不要喜新厌旧、见异思迁，那便是立志。立志不可有今日立一个什么志，明日便要到一个什么地位。从前做皇帝的思想，是过去的陈迹，要根本的打破它。立志是拿一件事，彻底的成功，为世界上的新发明。如果有了新发明，世界上的地位多得很，诸君不愁不能自占一席。

选自《孙中山全集》

安德鲁·卡内基

1835—1919

美国企业家，图书馆事业赞助者。生于苏格兰，家境贫寒，幼时随父母迁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进过棉纺厂，当过邮递员，业余时间发奋苦读，终于成才。1854年后时来运转，通过兴办铁路，开采石油，建造钢铁厂，组成钢铁托拉斯，迅速发迹，有“钢铁大王”之称。晚年热心于公益事业，尤其是文化事业。曾捐数百万美元在贫困地区兴办公共图书馆，资助美国图书馆系统培训管理人员，并捐资在部分英语国家发展图书馆事业。另外，还创办了卡内基基金会和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

1914年，巴拿马运河胜利竣工，运河工程负责人乔治·戈瑟尔斯将军（1858—1928）载誉而归，受到热烈欢迎。本篇是卡内基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为欢迎戈瑟尔斯而举办的宴会上的讲话。卡内基虽已年近八十，然而谈锋甚健。他叙述了巴拿马运河工程的由来和发展，热情赞扬戈瑟尔斯将军完成了一项宏图大业，并顺便对国会的办事效率进行了奚落。他的语调平稳、含蓄，富于幽默感，听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戈瑟尔斯将军和巴拿马运河

1914年3月5日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我从未料到会得到如此慎重地给予的殊荣，竟要接着刚就座的那位杰出的演讲者发表讲话。〔掌声。〕

时隔很久，世界上才能出一位独领风骚的人物。为完成使命，他历尽磨砺而鲜为人知；但现在，世人将永远不忘记你们今晚的这位贵客，他改变了山河，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天才。法国曾担当起开凿这条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航行水道的艰巨任务。在付出数年辛劳之后，这个任务被放弃了。人们渴望已久的计划似乎注定要失败了。在这要紧关头，我国政府挺身而出，买下了开凿权，使这项看似无望的计划获得了新生。这就到了关键时刻。究竟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不是随便哪一个——可以放心地托付此项充满风险的任务的人呢？需要找到一位组织工作的天才。周围似乎找不到这样的人。天才难求，但你们今晚的贵宾被选中了，于是我们开始考察他的履历。他是贵地的幸运儿。他生于布鲁克林区，这对纽约来说非常幸运，因为我们对布鲁克林的一切珍宝都声称拥有合伙关系。〔掌声、笑声〕

我们的贵客研究了摆在自己面前的诸多问题。他不久发现，刚才他说过的那些成功条件，在开始时与建筑计划都没有太大关系。他的大敌是卫生条件太差，这个敌人既已征服了——如果不说击败了——他的先行者，肯定也会征服他。就在这时候，上帝从全世界人口中选出了一个人放在他的近旁——陆军准将戈格斯。

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天才总是吸引天才。〔掌声。〕不过，我们

巴拿马运河于1881年动工开凿。1903年，美国政府通过它强加给巴拿马的不平等条约，廉价“购买”了运河开凿权和对运河区的租让权。

美国军医，巴拿马运河区首席卫生官，消灭了运河区黄热病，控制了疟疾，使运河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不能说稀世奇才只是因为太多了才聚在一起。〔笑声。〕据我的经验，我并未发现他们乐于那样做。

这样的一批人合作共事，个个出类拔萃，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长期以来，我国在让陆海军军官参与和平建设方面一直很引人注目。比如，费尔南迪纳防波堤，匹兹堡附近的河道工程，密西西比河大堤，还有五大湖区的运河工程，我看到，所有这些艰巨任务都是在陆海军军官掌握下进行的。我相信我国在这方面独占鳌头。据我所知，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想到要把陆海军指挥官用于如此有益的工作。这使我想起布赖恩先生讲过一个故事。我问他，他在国会呆了很多年，听到的演说哪一次最吸引人。他本人就可以讲一个好故事。“哦，”他说，“那是宾夕法尼亚州荷裔前州长的演说，这位州长曾接二连三地入选国会。当时国会正在对首次把拨款用于改善淡水湖的提案进行辩论。许多议员认为，国会根据宪法无权进行淡水改进工作；各州必须进行这项工作；国家拨款只限于改进海水。这位州长任众议员两三年来从未吭过一声，所以，当他缓缓起身时，举座皆惊。议会厅里鸦雀无声。究竟要发生什么呢？于是，就有了这段简短而又中肯的演说——‘议长先生，我不大知道与宪法“作梗”，但我知道一条：对于一部在淡水里不能像在海水里一样经得起洗刷的宪法，我一分钱也不给’。”〔笑声。〕

我刚才说了“一分钱”。我理解州长使用了简化的拼写方式。〔笑声。〕当然，整个议会厅震惊了，拨款提案被一致通过。我们的宪法就这样通过笑声，而不是通过立法被改变了。一阵朗朗笑声有时也能建功立业，这很使人感到惊奇。

先生们，你们今晚的这位贵客曾有许多困难要克服，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而他总是能够解决。他像州长那样挺身而出，并像那位荷裔州长一样大获全胜。州长改变了宪法。而您，今晚的贵客，改变了山河旧貌。不仅您的国家，而且全世界都对您感激不尽。〔掌声。〕祝您长寿，未来的总督，并安享世界繁荣。〔掌声。〕

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王建华 石淑芳 译 井力 校

指詹姆斯·布赖恩（1830—1893），共和党人，曾任众议院议长和国务卿。

指戈瑟尔斯即将出任运河区首任总督。卡内基在此巧用英语单词“Govern-er”，此词兼有“州长”和“总督”之义，

欧文·科布

1876—1944

美国幽默作家，生于肯塔基州帕迪尤卡市。凭借南北战争结束后南方的生活经历、敏锐的洞察力和通俗流畅的文风，16岁就成为新闻记者，19岁当编辑。而后，为《路易斯维尔邮报》和《纽约太阳报》写报道。1905年至1911年为《纽约世界报》执笔，是国内薪金最高的记者。1911年起为《星期六邮报》等报刊定期提供幽默文章。幽默作品有《有效力的演讲》、《可靠的真理》等。

本篇是科布在纽约市爱尔兰历史学会所作的演讲。作者明示了自己是爱尔兰人后裔。并以此深感自豪。他回忆了爱尔兰民族在政治、军事、教育、文化、医学、创业等方面的伟大成就，歌颂了爱尔兰人不屈不挠的性格，充分肯定了爱尔兰人在美国历史上留下的不朽功绩。他最后风趣地指出：移居美国或其他国家以后，爱尔兰“部落”并没有消失，他们的精神永存，他们的热情、潇洒、好胜、正直、勇敢、爽朗、慷慨等品质永远为后世所称道。

我是爱尔兰人

1917年1月6日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我要坦诚地告诉诸位，我今晚宁愿在此面对爱尔兰血统的男男女女和后代发表演讲，也不愿置身于地球上任何一个宴会大厅，因为我是爱尔兰人。从前我并不知道，现在既然知道了，我觉得这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值得我自豪，除了我是个美国公民以外。

众所周知，北爱尔兰虽然培育了那个小岛的名商、名制造商和神学家，但遗憾地说，它也产生了这样一批人，他们无视爱尔兰人在人类有同等机遇的每个地方都能排除万难、脱颖而出、不屈服权势的事实，却死抱住爱尔兰不能自治的理论不放。

我母亲是苏格兰的黑色道格拉斯的后代。犹如苏格兰常见的杂碎布丁及起义士兵一样，他们都是跟随邦尼·普林斯·查尔斯出生入死的人的后裔。我外祖母居住在北卡罗纳的一个乡村。迟至1820年，这个乡村是仍将盖尔语作为街头语和官方语的5个乡村之一。就在这里，还住着在独立宣言问世一年前就草拟、撰写并签订了梅克伦堡宣言的人。梅克伦堡宣言是美国独立之前的第一次战斗呐喊。

在我父亲的一方，我通过调查发现，我父亲的血缘可一直追溯到威克洛山脉中一个绿坡上的草屋。他和一些在戈尔韦、都柏林的亲属一起，沿袭着祖国的习俗，习惯于先喝茶，然后再战斗。〔掌声、笑声。〕我还发现我有一个远房祖先，他在1898年带着一支长矛出门，因反对英联邦政府而以不端行为和重大罪行被捕、受审，并被判处绞刑。也许上帝会宽恕他，但他被绞死了。我相信上帝会宽恕他的，因为他的灵魂在前进，他的精神传给了人们，而我很自豪地能成为这些渴望反抗压迫和暴虐的人们中的一员。〔掌声。〕

道格拉斯是苏格兰家族的族姓，于12世纪形成。黑色道格拉斯是第9任伯爵。

我有过三个曾祖父，两个是爱尔兰人，一个是苏格兰人，他们都是革命战士。

我有过一个当南部联邦战士的父亲。这些我都很引以为豪，因为我找到了我的血缘，一种要么试图去管理政府，要么试图去打倒政府的爱尔兰血缘。

〔笑声。〕

你们这些居住在美国北方的爱尔兰血统的人，常为爱尔兰移民之子希尔兹感到骄傲。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帮助指点过3个州的命运，并当过这3个州的参议员。但我却喜欢想起另一个爱尔兰人，一个地位低下的威克洛农民的儿子，名叫马修·莱昂。因为他，一个圣公会教徒，敢于扯开嗓门，举起臂膀去保卫他的天主教邻居和威克洛郡亲属的权利。他曾被作为奴隶贩卖到新英格兰种植园。他买到了自由，后来成为佛蒙特的参议员，并投了决定性的、违背选民意愿的一票。这一票使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的票数超过了艾伦·伯尔，并改变了我们国家的历史进程。当他因攻击丑恶的《惩治敌侨法》和《镇压叛乱法》在佛蒙特被关押时，他提出了与美国总统决斗的挑战。释放后，他移居肯培基，成为一名国会议员。后来，他与所有的邻居吵遍，就移居到阿肯色，被提名为阿肯色州第一个赴华盛顿的代表。要不是年龄关系，他本可以进一步西移，并在更多的政府机关任职。他在七十妙龄时从骡上摔下，脊骨损伤致死。我喜欢想起马修·莱昂及其一生，因为他也是我的一个长辈。〔掌声、笑声。〕

如我刚才所述，我开始追溯我的爱尔兰家世。在这个过程中，我在远房亲戚中发现了一个机灵的助手，他没有被美国南部的盎格鲁-萨克逊的迷信冲昏头脑。他使我夜以继日地查看家庭档案，实际上，他对我影响极大，以致于我有时想我本可以把自己视为我国一个小镇上的有色人种的兄弟，而这位兄弟在地方选举中是他那个种族投民主党票的唯一成员。移民局感到这样的忠诚理应嘉奖，于是成立了街道清洁部——一个迄今在社区中闻所未闻的机构——由领班和一名顶梁柱组成。领班职务当然归白人；至于那位可尊敬的黑人，则被授予顶梁柱的殊荣。现在，他坚持认为，即使较文明的种族也会持这种理论：机关职务意味着荣誉多、酬劳多，但干活少。然而作为一种形式，他每天早上仍扛着一把锹去报到。但是，凌驾于他的白人对于职责却有着不同的意见。黑人每扫完一堆碎石子，领班马上就找出另一堆，并还有好几堆排在后面等着黑人去对付。当精疲力竭的黑人直起腰擦试额上豆大的汗珠、吹拂掌心的血泡时，已是下午四点钟了。最后他说：“领班，你只安排我的活，你自己没活干吗？”“对，”白人说：“让你干个不停——这就是我的活。”黑人说：“好吧，老爷，这样的话，你明天就别干了，这样你高兴了吧！”〔笑声。〕

但是，我继续工作，并发现了很多关于爱尔兰人在美国南部的踪迹。我出生的肯塔基州被称为美国盎格鲁-萨克逊人种的发源地。据说，那个州的山脉，连同它的象征着最纯正血统的伊丽莎白·乔塞演讲法，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被发现的。〔笑声。〕现在，让我们看看是否当真。我也调查过这件事，我告诉你们，在南部山区和肯塔基、弗吉尼亚的居民中，至少50%的人是从弗吉尼亚种植园逃跑的、订有服役契约的爱尔兰人的直系后裔。我知道，在肯塔基的一个山村，一半以上的人在取名时用了以下三个名字中的一个，他们要么叫梅约斯，要么叫帕特里克，要么叫波威士。我曾经听到过一位演讲家站在那些梅约斯、帕特里克和波威士面前，为他们纯正的英国血统而向他们祝贺，而他们居然深信不疑。〔笑声。〕

我希望你们能原谅我再次追溯我的前辈，因为它是能证明我权利的证
据。在我父亲方面，我是一群从新英格兰到肯塔基去的人的后裔，这些人的
名字是莱昂和科布（丹麦语奥康纳的讹音），以及梅琴、克伦德宁、奥哈拉
和格伦（格林的讹音）。一群多么激动人心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啊。〔笑声。〕

阿勒格尼山脉那边的第一批讲英语的基督教居民不是在北部，而是在南
部和我们自己的肯塔基州落户的。他们把最伟大最博学的教士之一给予这个
国家之后，今天又造就了斯波尔丁主教。〔掌声。〕肯塔基先驱的孩子们，
几乎毫无例外地在陌生但赋有才能的人的教育下，在小木屋里上了第一课。
漫游四方的爱尔兰小学教师创立了历史悠久的南方露天小学，对他们来讲，
南方是最受惠其文化的方。

肯塔基、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等州的爱尔兰人，在 1812 年抗
击英国的西线战役中首当其冲。在泰晤士和雷辛的灾难性战斗中，肯塔基的
爱尔兰人损失惨重。这块地方留下了受尊敬的爱尔兰人的骨灰，成了美国的
爱国主义神祠。肯塔基爱尔兰人理查德·约翰逊上校，即后来的美国副总统，
亲手杀死了伟大的特库姆塞。在新奥尔良，爱尔兰裔士兵站在安迪·杰克逊
用棉花包垒成的胸墙后，扫倒英将帕克南率领的久经沙场的老兵，并使他们
的红外套在侵略的鲜血中染得更红。他们是好样的肯塔基和田纳西州的爱尔
兰人，真正的爱尔兰人。他们与老山核桃争吵，从而证明了自己的爱尔兰人
禀性，因为老山核桃否认他们在战斗中取胜的全部荣誉。而老山核桃也与士
兵对着吵，因为他也算是个爱尔兰人。〔掌声、笑声。〕

今晚，你们听到了给北方小菲尔·谢里登的一支颂歌。但我想起了另一
个人可以与之媲美，他就是南北战争中最勇敢的领袖之一，一个南爱尔兰难
民的儿子，即阿肯色的帕特·克莱伯恩。〔掌声。〕帕特·克莱伯恩仅穿着
袜子在最血腥的为基督教义而战的战场上倒下了。那天早上，当他骑着马去
参战时，看到一个爱尔兰小战士赤足走在冰雪交加的玉米田沟道上，身后留
下了一串鲜红的脚印。于是他脱下靴子，命令小战士穿上。但 15 分钟后，他
自己只穿着袜子就去见上帝了。《圣经》中说，罗刹将他的外套留在女皇贝
斯面前，使自己的骑士品质永存；但我认为，最显贵的行为却是勇敢的爱尔
兰人帕特·克莱伯恩表现出来的那种。因为前者是在王威面前卑躬屈膝，后
者在心目中只有对凡夫俗子的体贴和博爱。

女士们、先生们，爱尔兰南方“部落”没有消失。就像飞越英吉利海峡
的爱尔兰“野鹅”没有消失一样。他们没有消失，就像马克马洪去了法兰西，
奥唐奈去了西班牙、西蒙·博利瓦尔和奥希金斯去了南美洲，奥费勒尔和奥
布赖恩去了古巴，但都没有消失一样。因为，他们的爱尔兰血缘是永远不会
灭绝的。谢天谢地，这种血缘今天仍在南方人民的性格、风俗和传统中，尤
其在他们的共同特征方面得到体现。这一点，我认为也许可以用不久前在汽
车里听到的一个关于爱尔兰人的故事所证实。故事说：这个爱尔兰人在星期
天听到一个牧师在进行世界末日的说教。牧师说：当号角吹响时，古人和今
人都将聚集到上帝面前，根据自己在世时的所作所为接受审判。牧师讲完后，
这个爱尔兰人对牧师说：

“教父，我请教一个问题，你今天究竟讲了些啥？你真的认为世界末日
那天，每个人都会在那儿吗？”牧师说：“那是我的理解。”

即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后为美国第 7 任总统，因性格倔强而被称为“老山核桃”。

“该隐和艾贝尔 会在那儿吗？”

“肯定在。”“那么，大卫和歌利亚 呢？他们会在那儿吗？”“那是我的看法和信念。”“布赖恩·博勒和奥利弗·克伦威尔 呢？”“毫无疑问他们会在场。”“教父，”教区居民说：“第一天就不会作出什么判决。”〔掌声、笑声。〕

节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徐仲君 译 井力 校

源出《圣经》：该隐和艾贝尔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哥哥该隐是耕夫，弟弟艾贝尔为牧羊人。不料供祭品时，上帝接受了艾贝尔的供品，却拒收该隐的供品，盛怒之下，该隐不顾上帝的警告，杀死了艾贝尔。此注及以下两注均含讽刺意味，与爱尔兰的反英情绪有关。

源出《圣经》：歌利亚是位身材巨大的腓力斯英雄，向索尔国王统治下的希伯来人挑战，要在 40 天内决定其民族至高无上的权威。小男孩大卫在索尔国王授意下勇敢迎战。结果，他轻而易举地用弓射死了歌利亚，并用后者的佩剑割下了这位巨人的头颅。

均为英国内战的议会派将领，后者后来又成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

胡适 1891—1962

中国现代学者。早年受赫胥黎学说影响很深，信奉进化论。曾在美国留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工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人之一。胡适也是一位很有天赋的演说家，不仅口才好，还热衷于演讲术的研究，曾发表过《演说之道》等专论文章。他的演讲让人听后难忘。不少老人至今仍记得胡适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说风采。

这里收录了他的两篇演说。《大宇宙中谈博爱》是他在美国中西部留美同学夏令大会上的讲演。这么大的一个题目，让胡适谈来轻而易举，千把字已足矣。他把东方和西方、古代和当今、天上和地下统统纳入他的视野中加以类比，为后面的阐述做了良好的铺垫。然后，他把“博有”聚焦在当今范畴来论证，点明宇宙再大，爱要从自身开始的观点。语词灵悟，类比颖活，幽默油然而生。

《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是胡适在天安门前所搭露天讲台上作的演说。当时，蔡元培先生组织部分教授每天围绕一个题目在此演讲。

一般人都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归功于协约国（文中称协商国）的武力解决，胡适一反常规，认为是“解决武力”所致。表面上仅是一种修辞调整，实际上透露出内容的深刻意趣，妙不可言。

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 1918年11月15日

许多愚人还说这一次欧战的结果，完全是“武力解决”的功效，这是大错的。

我说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完全大胜，不是“武力解决”的功效，乃是“解决武力”的功效。

“武力解决”是说武力强权，可以解决一切争端。德国就是打这个主意的。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人，是打这个主意的。

“解决武力”是说武力是极危险的东西，是一切战争兵祸的根苗，不可不想出一个怎样对付武力的办法。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美国所以加入战团，全是因为要寻一个“解决武力”的办法。协商国因为要得美国的助力，故也同心合意的赞成美大总统“解决武力”的政策。要不是这个“解决武力”的主意，美国决不加入。美国若不曾加入，协商国决不能得如此之大胜利。

所以我说，这一次的大胜全是“解决武力”的功效。

如今且说美大总统所主张，协商各国所同声赞成的“解决武力”的办法是什么。原来从前也有人想过“解决武力”的法子，大概有两条：

一、用以毒攻毒的法子。你用武力，我也用武力。你练兵，我也练兵。你造铁甲船，我也造铁甲船。你造飞机，我也造飞机。二、用不回手的法子。你用武力，我决不回手。你打我一个嘴巴，我把脸凑过来，请你多打两下。你拿了我的东三省，我拿内外蒙古一齐奉送。这两个法子都是有大害的。一、以毒攻毒的法子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武力是没有限制的。英国总算强

了，然而打不过德国；德国的武力总算天下第一强了，然而德国到底打不过世界各国的大联军。这叫做“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终怕恶人磨。”武力到底是不行的。二、不回手的法子，也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对国家，所关系的很大，不但关系自己国内几千万人或几万万人的生命财产，还要带累旁的国家。如这一次大战开始时，德国要通过比国去攻法国。比国是极小的国，若是不回手，就让德国通过，那时德国立刻就打到巴黎，英国法国多来不及防备，德国早就完全大胜了。幸而比国抵住一阵，英法的兵队，方才有预备的功夫。只此一件事就可见不回手的法子，不但自己吃亏，还要连累别人。所以也是不行的。

那么，现在各国所主张的解决武力，是怎样一个办法呢？他们的办法有几条要紧的主意，可以分开来说：

第一，他们公认现在世界的大祸根，在于各国只顾用自己的武力来对付别国的武力，这种武力的办法，有许多害处：

（一）大家斗着加增军备，花了几万万万的金钱，只苦了几千万万的百姓。

（二）各国都有了军备武力，正如地雷火炮都安好了，碰着一根小小的火柴，立刻就要爆发。这是最可怕的危险。

（三）这种各国私有的武力，互相对抗，半斤对八两，一拳敌一脚，都抵消了，都白白的糟蹋了，到底不能做什么有益处的好事。枉费了几万万的金钱人命，却不能有什么益处，这不是傻子干的事吗？

第二，他们公认要解决武力这个问题，须把各国私有的武力变成世界公有的武力。这就是说，要把互相对敌互相抵消的武力变成互相联合的武力，武力同向一个方向去尽力，这个共同尽力的方向，就是全世界的和平，就是万国公法，就是世界公理。我且说两个比喻：

（一）比如我这两个拳头，这边有二十斤气力，那边也有二十斤气力，我若用两个拳头对打，这边的气力被那边的气力抵消了；两边的气力都白用掉了。我若是用两个拳头联合起来，可举起四十斤重的东西，这便是两边的气力同向一个方向尽力的大功效。

（二）再比如北京城的警察，你看全城的警察何尝不是武力，但这些武力是用来向一个方向去尽力的。这个方向便是北京人民的治安，便是中国的法律。因为他们同心合力做一件事，故中区可以帮助左区、左区不妨害右区，故北京全城的百姓都受他们的益处。这便是公用的武力的大功效。

第三，各国因为公认上文所说的两条道理，故要在这次和平会议时把世界各国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和平大同盟。这个和平大同盟的办法如下：

（一）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可加入。

（二）同盟各国，大家公举出一个大法庭，各国有关争论的问题，不许用武力解决，都要送去，请这个大法庭审判，判决之后，各国均须遵守。

（三）各国如有不听大法庭审判的，由同盟各国联合武力去惩罚他。

（四）一国有争端，不先去起诉，却先用武力，也由同盟各国联合武力去惩罚他。

（五）武力之外，还要用旁的法子。可以禁止不守法的国家，不许他通商，不用他国的货物。

（六）这个办法，把各国私有的武力变成了世界公有的武力，就是变成了世界公有的国际警察队了。这便是解决武力的办法。

选自《胡适讲演》

大宇宙中谈博爱

1956年9月17日

“博爱”就是爱一切人。这题目范围很大。在未讨论以前，让我们先看一个问题：“我们的世界有多大？”

我的答复是“很大”！我从前念《千字文》的时候，一开头便已念到这样的辞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宇宙是中国的字，和英文的 Universe, World 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抽象名词。

宇是空间 (Space) 即东南西北；宙是时间 (Time) 即古今旦暮。

《淮南子》说宇是上下四方，宙是古往今来。宇宙就是天地，宇宙就是 Time—Space。

古人能得“Universe”的观念实在不易，相当于今日的科学。

但古人所见的空间很小，时间很短，现在的观念已扩大了许多。考古学探讨千万年的事，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学等等不断的发现，更将时间空间的观念扩大。

现在的看法：空间是无穷的大，时间是无穷的长。

古人只见到八大行星，二十年前只见九大行星。现在所谓的银河，是古代所未能想像得到的。以前觉得太阳很远，现在说起来算不得什么，因为比太阳远千万倍的东西多得很。

科学就这样地答复了“宇宙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

现在谈第二点：博爱。

在这个大世界里谈博爱，真是个大问题。广义的爱，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最终目的。墨子可谓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可说是宗教创立者 (Founder of Religion)，他提出“兼爱”为他的理论中心。兼爱就是博爱，是爱无等差的爱。墨子理论和基督教教义有很多相合的地方，如“爱人如己”、“爱我们的仇敌”等。

佛教哲学本谓一切无常，我亦无常，“我”是“四大”（土、水、火、风）偶然结合而成的，是十分简单的东西，因此无所谓爱与恨——根本不值得爱，也不值得恨。但早期佛教亦有爱的意念在：我既无常，可牺牲以为人。

和尚爱众生，但是佛教不准自食其力，所以有人称之为“叫化”（乞丐）宗教。自己的饭亦须取之于人，何能博爱？

古时很多人为了“爱”，每次登坑（大便）的时候便想想，大想一番，想到爱人。有些人则以身喂蚊，或以刀割肉，以自身所受的痛苦来显示他们对人的爱。这种爱的方法，只能做到牺牲自己，在现代的眼光看来，是可笑的。这种博爱给人的帮助十分有限，与现代的科学——工程、医学……等所能给我们的“博爱”比起来，力量实在小得可怜。今日的科学增进了人类互助博爱的能力，就说最近意大利邮船 Andrea Doria 号遇难的事吧，短短的数小时内就救起千多人。近代交通、医学……等的发达，减少了人类无数的痛苦。

我们要谈博爱，一定要换一观念。古时那种喂蚊割肉的博爱，等于开空

头支票，毫无价值。现在的科学才能放大我们的眼光，促进我们的同情心，增加我们助人的能力。我们需要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博爱——一种实际的博爱。

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把自己弄好。我们应当先把自己弄好，然后帮助别人；独善其身然后能兼善天下。同学们，现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要空谈高唱博爱；但应先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到我们有充分能力的时候才谈博爱，仍不算迟。

选自《胡适讲演》

弗拉基米尔·列宁

1870—1924

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和学说的继承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苏维埃俄国的奠基人。列宁还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著名演说家。他的演说极富鼓动性、号召力。

列宁在庆贺他五十寿辰大会上的这篇讲话语言活泼、中肯、幽默、泼辣，没有空洞的说教，没有虚情假意的谢辞，句句都实实在在地谈革命问题。演讲刚开始，他感谢大家的祝贺。接着，为了反对形式主义的祝寿方式，他突然来了一句：“更感谢你们使我没有听祝寿演说。”他机智的风趣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随后，他引用机会主义者考茨基在1902年的一段原话，借以提醒人们不能上他的当，使俄国陷入骄傲自大的境地。列宁的语言像匕首一样凌厉，充满了讥讽型的幽默感。同时，该演讲对新生俄罗斯的挚爱溢于言表，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期望渗透在言辞之中，别具魅力，感人心扉。

在庆祝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1920年4月23日

〔热烈鼓掌〕同志们！首先，我自然应当感谢你们，第一、感谢你们今天对我的祝贺；第二、更感谢你们使我没有听祝寿演说。〔鼓掌。〕我想，这样我们也许会逐渐创造出一种更合适的祝贺仪式，来代替以前流行的那种有时竟成了绝妙的讽刺对象的祝贺仪式，当然，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创造出来的。请看，这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为讽刺这种祝贺仪式而画的一幅漫画。这幅画是我今天同一封非常亲切的信一起收到的。由于同志们的盛情，使我没有听这种祝寿演说。我拿这幅漫画来给大家看，是为了让我们今后根本免去这种祝贺仪式。

其次，我想略微谈谈布尔什维克党的现状。使我想起这一点的是一位著作家在18年以前，即1902年写的一段话。这位著作家就是卡尔·考茨基，我们现在应该同他断然决裂，同他进行斗争，但是，他以前在同德国机会主义作斗争时，曾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之一，而且我们曾经同他合作过。那时还没有布尔什维克，但所有同他合作的未来的布尔什维克，都对他评价很高。请看，这位著作家在1902年那时写了些什么：“现时”（与1848年相比）“可以认为，不仅斯拉夫人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的重心越来越移到斯拉夫人那里去了。革命中心正从西方移向东方。19世纪前半叶，革命中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1843年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新世纪开始时所发生的事变，意味着我们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即移向俄国……俄国从西方接受了这么多的革命主动性，也许现在它本身已足能作为西方革命毅力的源泉了。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也许会成为最有效的手段，足以铲除在我们队伍中开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狭隘小气的政客作风，重新使斗争的渴望和对我们伟大理想的赤诚燃起熊熊的火焰。俄国早已不再是西欧的反动和专制的堡垒了。现在的情况也许恰恰相反。西欧正变成俄国反动派和专制政体的堡垒……俄国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同时必须跟沙皇的同盟者、欧洲资本作斗争，也许早就把沙皇

打倒了。我们希望，这回他们能够把这两个敌人一起打倒，希望新的“神圣同盟”比它的前驱崩溃得更快一些。不管俄国目前斗争的结局如何，那些烈士们——不幸，牺牲的烈士实在太多了——所流的鲜血和所受的苦难，决不会是白费的。他们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培育了社会革命的幼苗，并使它们长得更茂盛、更迅速。1848年，斯拉夫人还是一股凛冽的寒流，摧残了人民春天的花朵。也许现在他们注定要成为大风暴，冲破反动势力的冰层，以不可阻挡之势给人民带来新的幸福的春天。”

看，这位杰出的、但今天我们必须同他断然决裂的社会主义者，在18年前关于俄国革命运动是怎样写的呀！这段话使我想起我们党目前可能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即陷于骄傲自大的境地。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在它失败和衰落之前，往往会骄傲自大。其实，我引证的我们当前最凶恶的敌人对俄国革命所表示的这番希望，未免过高。我们在此以前，获得过辉煌的成就和辉煌的胜利，可是要知道，这是由当时的情况造成的。那时我们还不能解决主要的困难，那时我们担负着军事任务。同地主、沙皇、将军的反动势力进行着最深刻、最激烈的斗争；因此，组织同每天每时冒出来的小资产阶级自发性和分散性作斗争，即同一切退向资本主义的东西作斗争，便使我们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暂时搁下来了。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我们都把这些任务搁下来了，因为我们没有可能来妥善地解决这些任务。因此，对上述引证提醒我们的那种危险，全体布尔什维克，无论就个人或整个政党来说，都应当加倍地估计到。我们应当懂得，我们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无论如何必须执行，这就是说，我们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工作，要求我们比以往作更大的努力。

最后，我希望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使我们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党的地步。〔鼓掌。〕

选自《列宁全集》

蔡元培 1868—1940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1898年投身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1902年发起创立中国教育会，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主张教育应从造成现世幸福出发，而以达到实体世界（即观念世界）为最终目的。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因参与五四运动而被迫辞职，赴欧美考察教育。本演说是他考察前在湖南所发表。

他别开生面地把教育分成科学和美术两门类。建筑、雕刻、图画等归于静的美术；诗歌与音乐属于动的美术。动静之间是舞蹈。独到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精神大振。枯燥的学术论题被他娓娓谈来，充满趣味感。他像剥笋似的反自己的思想轻轻地层层剥开，最后露出的笋尖也让听众出乎意料：他批评了中国人不注意都市美化和不肯合力设计博物院。全篇内容泛而不乱、言简意赅。他循循善诱的演讲艺术风格始终把握住听众，顺着自己的思路去作一次美术进化史的漫游。本篇演说的幽默脱胎于智慧。

美术的进化 1920年10月29日

前次讲文化的内容，方面虽多，归宿到教育。教育的方面，虽也很多；他的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科学的重要，差不多人人都注意了。美术一方面，注意的还少。我现在要讲讲美术的进化。

美术有静与动两类：静的美术，如建筑、雕刻、图画等，占空间的位置，是用目视的。动的美术，如歌词、音乐等，有时间的连续，是用耳听的。介乎两者之间，是跳舞，他占空间的位置，与图画相类；又时间的连续，与音乐相类。

跳舞的起源很简单，动物中，如鸽、雀，如猫、狗，高兴时候，都有跳舞的状态。澳洲有一种鸟，旦特别用树枝造成一个跳舞厅。到跳舞之进化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非、澳、亚、美等洲的未开化人，都有各种跳舞，他那舞人，必是身上画了花纹，或加上各种装饰；那就是图案与装饰品的起源。跳舞的地方，有在广场的；但也有在草舍或雪屋中间的，这就是建筑的起源。又如跳舞会中，必要唱歌，是诗歌与他种文学的起源。跳舞时，常用简单的乐器，指示节拍，这就是音乐的起源。似乎各种美术，都随着跳舞而发生的样子。所以有人说最早的美术就是跳舞，也不为无因。

未开化人的跳舞，本有两种：一种是体操式，排成行列，注重节奏。中国古代的舞，有一部分属于此类，如现在文庙中所演的。欧洲人的跳舞会，也是此类。不过未开化人的跳舞，男女分班。男子跳舞时，女子组成歌队。女子的跳舞会，男子不参加。欧人现在的跳舞会，却是男女同舞的。欧人歌剧中，例有一段跳舞，全由女子组成，也是体操式的发展。

未开化人的跳舞，又有一种，是演剧式，或摹拟动物状态，或装演故事，这就是演剧的起源。我们周朝的武舞，一段一段演武王伐殷的样子，这已经近于演剧。后来优孟扮演孙叔敖，就是正式的演剧了。我们正式的演剧，元以后始有文学家的曲本。直到今日，还没有著名的进步。最流行的二黄、梆

子等，意浅词鄙，反更不如昆曲了。欧洲现行的戏剧，约有三种：一是歌剧，全用歌词，以悲剧为多。二是白话剧，全用白话，亦不参用音乐；兼有悲剧喜剧。现在中国人叫作新剧的就是这一类。三是小歌剧，歌词与白话相间，与我们的曲本相类，多是喜剧。以上三种，都出自文学家手笔。时时有新的著作，有种种的派别：如理想派，写实派，神秘派等。他们的剧场，有专演一种的，也有兼演两种或三种的，但是一日内所演的剧，总是首尾完具，耐人寻味的。别有一种杂耍馆，各幕不连续。忽而唱歌，忽而谐谈，忽而舞蹈，忽而器乐，忽而禽言，忽而兽戏，忽而幻术，忽而赛拳，纯为娱耳目起见，不含有何种理想。闻英国的戏场，多是此类，不过有少数的专演名家剧本，此亦英人美术观念，与意、法等国不同的缘故。我们的剧场，虽然并不参入幻术、兽戏等等，但是第一注意于唱工戏、武戏、小戏等如何排列；第二注意于唱工戏中，生、旦、净、末的专戏，应如何排列；纯从技术上分配平均起见，并无文学上的关系，尚是杂耍馆一类。

最早的装饰，是画在身上。热带的未开化人用不着衣服，就把各种花纹画在身上作装饰。现在妇女的擦脂粉，戏子的打脸谱，是这一类。

进步一点，觉得画的容易脱去，在皮肤上刻了花纹，再用颜色填上去。大约暗色的民族，用浅的瘢痕；黄色或古铜色的民族，用深的雕纹。我们古人叫作“文身”，或叫作“雕题”。至于不用瘢痕，或雕纹的民族，也有在唇上或耳端凿一孔，镶上木片，叫他慢慢儿扩大的。总之都是矫揉造作的装饰，在文明人的眼光里，只好算是丑状了。但是近时的缠足，束腰，穿耳，也是这一类。

进一步，不在皮肤上用工了，用别种装饰品，加在身上。头上的冠巾，头上的挂件，腰上的带，在未开化人，已经有种种式样。文化渐进，冠服等类，多为卫生起见，已经渐趋简单。但尚有叫作“时式”的，如男子时式衣服，以伦敦人为标准；女子时式衣服，以巴黎人为标准。往往几个月变一个样子，这也是未开化时代的遗俗罢了。

再进一步，不限于身上的装饰，移在身外的器具了。武器如刀、盾等，用器如舟、橹、锅、瓶等，均有画的或刻的花纹，这就是纯粹的图案画。起初是点线等，后来采用动物的形式，后来又采用植物的形式。

更进一步，不但装饰在个人所用的器具上，更要装饰在大家公共的住所了。穴居时代，已经有壁画，与摩崖的浮雕。到此时期，渐渐的脱卸装饰的性质，产生独立的美术。

器具不但求花纹同色彩的美，更求形式的美。如瓷器及金类、玉类等器，均有种种美观的形式。

雕刻的物像，不但附属在建筑上，演为独立的造像。中国墓前有石人、石马；寺观内有泥塑、木雕，玉刻、铜铸的像。虽然有几个著名的雕塑家，如晋的戴颙，元的刘玄，但是无意识的摹仿品居多数。西洋自希腊时代，已有著名造像家，流传下来的石像、铜像，都优美得很。自文艺复兴时代，直至今日，常有著名的作家。

图画也不但附在壁上，演为独立的画幅，所画的，也不但单纯的物体，演为复杂的历史画，风俗画，山水画等。中国的图画，算是美术中最发达的，但是创造的少，摹仿的多。西洋的图画家，时时创立新派。而且画空气，画光影，画远近的距离，画人物的特性，都比我们进步得多。

建筑的美观，起初限于家庭。后来推行到公共建筑，如宗教的寺观，帝

王的宫殿。近来偏重在学校，博物院，图书馆，公园等。最广的，就是将一所都市，全用美观的计划，布置起来。

以上都是说静的美术，今要说动的美术，就是诗歌与音乐。

在跳舞会上的歌词，是很简单的。演而为独立的小调，又演而为三派的文学。一是抒情诗。如中国的诗与词，起初专为歌唱。后来渐渐发展，专用发表感想，不过尚有长短音的分配，韵的呼应。到近来的新体诗，并长短音与韵也可不拘了。一是戏曲。起初全是歌词，后来参加科白；后来又有一体，完全离音乐而独立，通体用白话了。一是小说。起初是神话与动物谈，后来渐渐切近人事。起初描写的不过通性，后来渐渐的能表示特性。起初全凭讲演、语言与姿态同时发表，后来传抄印刷，完全是记述与描写的文学了。

跳舞会的音乐，是专为拍子而设；或用木棍相击；或用兽皮绷在木头上。由此进步，演为各样的鼓。澳洲土人有一种竹管，用鼻孔吹的；中国古书说音乐起于伶人取竹制筒，大约吹的乐器，都由竹管演成的。非洲土人，有一种弓形的乐器，后来演成各种弦器。初民的音乐重在节奏，对于音阶的高下，不很注意；近来有种种的曲谱，有各种关于音乐的科学，有教授音乐的专门学校；有超出跳舞会与戏剧而独立的音乐会，真非常的进步了。

观各种美术的进化，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由附属到独立；由个人的进为公共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衣服，宫室，园亭，知道要美观；不注意于都市的美化。知道收藏古物与书画，不肯合力设博物院，这是不合于美术进化公例的。

选自《蔡元培美育论集》

梁启超 1873—1929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康有为弟子，曾参加组织“公车上书”。1896年任《时务报》总撰述，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主张兴学校，育人才，开民智。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主张君主立宪，曾大量译介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引起知识界极大反响。辛亥革命后回国，出任过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晚年任教于清华大学。

这里收录了他的两篇演说。《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的观点，并把生活得没有趣味的人比作“行尸走肉”，丧失趣味的社会比作“痨病的社会”，见解独特、深刻。接着，话锋一转，从学的趣味、教的趣味谈起，进一步说明他把“趣味”当作目的的教育思想。内容饱满含蓄，语言率真直露。演讲中比拟手法运用贴切，别具一格。多次引用古代贤哲话语、古代文人轶事，由此衍生出的有趣话题，造成一次次的幽默效果。另一篇《学问之趣味》是他在南京东南大学为暑期学员作的讲演。一上来，大学者诙谐地用化解自己姓名的办法来证明他是个里里外外、彻头彻尾的趣味主义者，使听者忍俊不禁。接着，他简单明了地提出界定“趣味”的标准、性质。这种把自己的论点完全用调侃语气抒发的表达法在一般演讲词中实为罕见。随后，他紧紧抓住听众心理，层次分明地指出走趣味学问之路的四种方法。其中，他把学问比喻成人的胃，把做学问比喻成“摩擦生电”，深入浅出的词语缩短了说与听的距离，造就了产生幽默的环境，使他“为学问而学问”的思想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渐渐被人们所领悟。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1922年4月10日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趣味的反面，是于瘁，是萧索。晋朝有位殷仲文，晚年常郁郁不乐，指着院子里头的大槐树叹气，说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一棵新栽的树，欣欣向荣，何等可爱！到老了之后，表面上虽然很婆娑，骨子里生意已尽，算是这一期的生活完结了。殷仲文这两句话，是用很好的文学技能，表出那种颓唐落寞的情绪。我以为这种情绪，是再坏没有的了；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再不会有长进。何止没长进？什么坏事，都要从此产育出来。总而言之，趣味是活动的

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汽来，任凭你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停摆过后，机器还要生锈，产生许多毒害的物质哩！人类若到把趣味丧失掉的时候，老实说，便是生活得不耐烦，那人虽然勉强留在世间，也不过行尸走肉。倘若全个社会如此，那社会便是痨病的社会，早已被医生宣告死刑。

“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所创造，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我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简单说一说我的意见：

第一，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这是不错。但趣味的性质，不见得都是好的；譬如好嫖好赌，何尝不是趣味？但从教育的眼光看来，这种趣味的性质，当然是不好。所谓好不好，并不必拿严酷的道德论做标准；既已主张趣味，便要求趣味的贯彻，倘若以有趣始以没趣终，那么趣味主义的精神，算完全崩落了。《世说新语》记一段故事：“祖约性好钱，阮孚性好履，世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量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簏，以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诣孚，正见自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緉屐。’意甚闲畅；于是优劣始分。”这段话，很可以作为选择趣味的标准。凡一种趣味事项，倘或是要瞒人的，或是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间相续的，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严格说起来，他就根本不能做趣味的主体；因为认这类事当趣味的人，常常遇着败兴，而且结果必至于俗语说的“没兴一齐来”而后已，所以我们讲趣味主义的人，绝不承认此等为趣味。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进；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固然容易如此；教育教得不如法，学生在学校里头找不出趣味，然而他们的趣味是压不住的，自然会从校课以外乃至校课反对的方向去找他的下等趣味；结果，他们的趣味是不能贯彻的，整个变成没趣的人生完事。我们主张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这种教育办得圆满，能够令全社会整个永久是有趣的。

第二，既然如此，那么教育的方法，自然也跟着解决了。教育家无论多大能力，总不能把某种学问教通了学生，只能令受教的学生当着某种学问的趣味，或者学生对于某种学问原有趣味，教育家把他加深加厚。所以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摧残趣味有几条路：头一件是注射式的教育：教师把课本里头的东西叫学生强记；好像嚼饭给小孩子吃，那饭已经是一点儿滋味没有了；还要叫他照样的嚼几口，仍旧吐出来看；那么，假令我是个小孩子，当然会认吃饭是一件苦不可言的事了。这种教育法，从前教八股完全是如此，现在学校里形式虽变，精神却还是大同小异，这样教下去，只怕永远教不出人才来。第二件是课目太多：为培养常识起见，学堂课目固然不能太少；为恢复疲劳起见，每日的课目固然不能不参错掉换。但这种理论，只能为程度的适用；若用得过分，毛病便会发生。趣味的性质，是越引越深。想引得深，总要时间和精力比较的集中才可。若在一个时期内，同时做十来种的功课，走马看花，应接不暇，初时或者惹起多方面的趣味，结果任何方面的趣味都不能养成。那么，教育效率，可以等于零；为什么呢？因为受教育受了好些时，件件都是在门口一望便了，完全和自己的生活不发生关系，这教育不是白费吗？

第三件是拿教育的事项当手段：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有句通行话说他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我们若是拿学问当作敲门砖看待，断乎不能有深入而且持久的趣味。我们为什么学数学，因为数学有趣所以学数学；为什么学历史，因为历史有趣所以学历史；为什么学画画，学打球，因为画画有趣打球有趣所以学画画学打球。人生的状态，本来是如此，教育的最大效能，也只是如此。各人选择他趣味最浓的事项做职业，自然一切劳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越劳作越发有趣。反过来，若是学法政用来作做官的手段，官做不成怎么样呢？学经济用来做发财的手段，财发不成怎么样呢？结果必至于把趣味完全送掉。所以教育家最要紧教学生知道是为学问而学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能领会得这个见解，他的趣味，自然终身不衰了。

以上所说，是我主张趣味教育的要旨。既然如此，那么在教育界立身的人，应该以教育为唯一的趣味，更不消说了。一个人若是在教育上不感觉有趣味，我劝他立刻改行，何必在此受苦？既已打算拿教育做职业，便要认真享乐，不辜负了这里头的妙味。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那第三种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的意思是说教育家比皇帝还要快乐。他这话绝不是替教育家吹空气，实际情形，确是如此。我常想：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趣味，莫过于种花；自然界的美，像山水风月等等，虽然能移我情，但我和他没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他的美妙处，我有时便领略不出；我自己手种的花，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简直并合为一；所以我对着他，有说不出来的无上妙味。凡人工所做的事，那失败和成功的程度都不能预料；独有种花，你只要用一分心力，自然有一分效果还你，而且效果是日日不同，一日比一日进步。教育事业正和种花一样：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生命是并合为一的；教育者所用的心力，真是俗语说的“一分钱一分货”，丝毫不会枉费；所以我们要选择趣味最真而最长的职业，再没有别样比得上教育。

现在的中国，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没有那件说起来不令人头痛；但回到我们教育的本行，便有一条光明大路，摆在我们前面。从前国家托命，靠一个皇帝，皇帝不行，就望太子；所以许多政论家——像贾长沙一流都最注重太子的教育。如今国家托命是在人民，现在的人民不行，就望将来的人民；现在学校里的儿童青年，个个都是“太子”，教育家便是“太子太傅”。据我看：我们这一代的太子，真是“富于春秋典学光明”，这些当太傅的，只要“鞠躬尽瘁”，好生把他培养出来，不愁不眼见中兴大业。所以别方面的趣味，或青难得保持，因为到处挂着“此路不通”的牌子，容易把人的兴头打断；教育家却全然不受这种限制。

教育家还有一种特别便宜的事，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学问是分离不开的：自己对于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这种快乐，也是绝对自由，一点不受恶社会的限制。做别的职业的人，虽然未尝不可以研究学问，但学问总成了副业了；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学问，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职业是一重趣味，教育家是两重趣味。

孔子屡屡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门生赞美他说：“正唯弟子不能及也”。一个人谁也不学，谁也不诲人，所难者确在不厌不倦。问他为什么能不厌不倦呢？只是领略得个中趣味，当然不能自己。你想：一面学，

一面诲人，人也教得进步了，自己所好的学问也进步了，天下还有比他再快活的事吗？人生在世数十年，终不能一刻不活动，别的活动，都不免常常陷在烦恼里头，独有好学和好诲人，真是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若真能在这里得了趣味，还会厌吗？还会倦吗？孔子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诸君都是在教育界立身的人，我希望更从教育的可好可乐之点，切实体验，那么，不惟诸君本身得无限受用，我们全教育界也增加许多活气了。

选自《梁启超文选》

学问之趣味

1922年8月6日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认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运动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但怎么样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像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他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力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诸君听我这段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学问的趣味，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句话我不能回答。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你。佛典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问我这水怎样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词说尽，也形容不出给你听，除非你亲自啜一口。我这题目——学问之趣味，并不是要说学问如何如何的有趣味，只要如何如何便会尝得着学问的趣味。

诸君要尝学问的趣味吗？据我所经历过的有下列几条路应走：

第一，“无所为”（为读去声）：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别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例如学生为毕业证书而做

学问，著作家为版权而做学问，这种做法，便是以学问为手段，便是有所为。有所为虽然有时也可以为引起趣味的一种方便，但到趣味真发生时，必定要和“所为者”脱离关系。你问我“为什么做学问”？我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我便答道：“为学问而学问”；或者答道：“为我的趣味”。诸君切勿以为我这些话掉弄虚机；人类合理的生活本来如此。小孩子为什么游戏？为游戏而游戏；人为什么生活？为生活而生活。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

第二，不息：“鸦片烟怎样会上瘾？”“天天吃。”“上瘾”这两个字，和“天天”这两个字是离不开的。凡人类的本能，只要那部分搁久了不用，他便会麻木会生锈。十年不跑路，两条腿一定会废了；每天跑一点钟，跑上几个月，一天不得跑时，腿便发痒。人类为理性的动物，“学问欲”原是固有本能之一种；只怕你出了学校便和学问告辞，把所有经管学问的器官一齐打落冷宫，把学问的胃弄坏了，便山珍海味摆在面前也不愿意动筷子。诸君啊！诸君倘若现在从事教育事业或将来想从事教育事业，自然没有问题，很多机会来培养你学问胃口。若是做别的职业呢？我劝你每日除本业正当劳作之外，最少总要腾出一点钟，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一点钟那里不消耗了？千万别要错过，闹成“学问胃弱”的症候，白白自己剥夺了一种人类应享之特权啊！

第三，深入的研究：趣味总是慢慢的来，越引越多；像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假如你虽然每天定有一点钟做学问，但不过拿来消遣消遣，不带有研究精神，趣味便引不起来。或者今天研究这样明天研究那样，趣味还是引不起来。趣味总是藏在深处，你想得着，便要入去。这个门穿一穿，那个窗户张一张，再不会看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能有趣味？我方才说：“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嗜好两个字很要紧。一个人受过相当的教育之后，无论如何，总有一两门学问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经懂得大概可以作加工研究之预备的。请你就选定一门作为终身正业（指从事学者生活的人说）或作为本业劳作以外的副业（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说）。不怕范围窄，越窄越便于聚精神；不怕问题难，越难越便于鼓勇气。你只要肯一层一层的往里面追，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

第四，找朋友：趣味比方电，越摩擦越出。前两段所说，是靠我本身和学问本身相摩擦；但仍恐怕我本身有时会停摆，发电力便弱了。所以常常要依赖别人帮助。一个人总要有几位共事的朋友，同时还要有几位共学的朋友。共事的朋友，用来扶持我的职业；共学的朋友和共顽的朋友同一性质，都是用来摩擦我的趣味。这类朋友，能够和我同嗜好一种学问的自然最好，我便和他研究。即或不然——他有他的嗜好，我有我的嗜好，只要彼此都有研究精神，我和他常常在一块或常常通信，便不知不觉把彼此趣味都摩擦出来了。得着一两位这种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我想只要你肯找，断不会找不出来。

我说的这四件事，虽然像是老生常谈，但恐怕大多数人都不曾会这样做。唉！世上人多么可怜啊！有这种不假外求不会蚀本不会出毛病的趣味世界，竟自没有几个人肯来享受！古书说的故事“野人献曝”；我是尝冬天晒太阳的滋味尝得舒服透了，不忍一人独享，特地恭恭敬敬的来告诉诸君。诸君或者会欣然采纳吧？但我还有一句话：太阳虽好，总要诸君亲自去晒，旁人却替你晒不来。

选自《梁启超文选》

郭沫若
1892—1978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诗人、历史学家、戏剧家、考古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不仅是遐迩闻名的大学者，一生著述颇丰，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他的演讲总是充满激情、不落俗套，本篇演讲可窥见其风格之一斑。

这篇对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讲，尽管听上去像是严肃的学术问题，然而他却谈得充满了幽默的机敏、睿智的风采。他开篇就提出“艺术精神”的命题，接着将认识的探钻伸向艺术的分类、“天才”的定义，继而笔锋一转把艺术的精神归结为“忘我”“无我”，不由得使听者幡然醒悟：大学者在这儿并非局限在谈表面化的艺术问题，还触及到深层次的做人道理的问题。郭沫若的嬉笑诙谐都在听者不经意中缓缓产生。南齐谢赫的画法理论、唐朝王维的诗歌都成了他说明中国艺术比西洋先进的论据，而《庄子》中那段梓庆削木为鐻的有趣故事，使听者对艺术家的成功在于“忘我”、“无我”不言自明。

生活的艺术化
1923年4—5月

今夜的讲题为《生活的艺术化》。提到这个题目，各位一定会联想到英国的19世纪末期的唯美主义的运动上来。他们的主张就是要用艺术来使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美化那很有名的王尔德，他便是这项运动中的一位健将。他曾经穿着很奇怪的服装，在伦敦街市上游行，逗得当时的人们注目，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这当然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化”，不过是偏于外部生活去了。我今晚所说的与此稍微不同。我的意思是要用艺术的精神来美化我们的内在生活，就是说把艺术的精神来做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要养成一个美的灵魂。

那么，艺术的精神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们先从艺术讲起吧。各位都是知道的，艺术有“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两大类。譬如，绘画所含者有平面，有长有阔；雕刻、建筑所占者为立体，有长有深远有深度，这都是属于空间的。其次如舞蹈、音乐、诗文，是时间上的表现，故属于时间艺术。古时的人多趋重时间艺术，而轻视空间艺术；如希腊的司美的女神有九个，但所管者仅舞蹈、音乐、诗文三种。至于建筑、雕刻、绘画则无神司其事。就是后来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把艺术分为几种等级。他以所含观念的多寡定它们等级的高下。他的等级是：建筑、雕刻、绘画、舞蹈、音乐、诗文。（依次升级，诗文最高。）本来照现代的时空论上说来，时间和空间原是相互关系而存在的，绝对不能划然分开。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的这样分别，乃至要勉强的定出高下的等级来，只算是历史上一件有趣的事罢了。近代艺术已把这种无味的分别打破了。如英国的裴德的《文艺复兴》上有句话说得好：“一切的艺术都趋向于音乐的。”这便是说一切空间艺术打破了静的空间的界限，趋向于动的方面。譬如现代绘画中的后期印象派、未来派、表现派，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在努力表现动的精神。未来派画马不画四脚要画20只脚，画运动不画成直线要画成三角形，这都是动的精神的表现。看来，西洋的绘画是由静而动，动的精神便是西洋近代艺术的精神。从这一点来说，

我觉得中国的艺术实在比他们先进了。那很有名的南齐的谢赫，他所创的画的六法，第一法便是“气韵生动”。这便与西洋近代艺术的精神不谋而同。动就是动的精神，生就是有生命，气韵就是有节奏。唐朝的王维，这是谁也知道的，他是个诗人，也是个画家。人们称他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不过我觉得诗中无画，还不十分要紧，因为诗最重节奏，就是要“气韵生动”。如果画中无诗，那就不成其为真的艺术了。我们说画中有诗，并不是说画中有什麼五言诗、七言诗或四言诗，乃是指画中含有诗意。这诗意便是“气韵生动”。凡是“气韵生动”的画，才是一张真的画；因为艺术要有动的精神，换句话说，就是艺术要有“节奏”，可以说是艺术的生命。何以我们不重视照片而重视绘画？又何以我们不重视报纸上的新闻而重视诗词和小说？其原因就在这里。

从古到今的诗人画家，很多很多，而不朽的大诗人，大画家，却又为什么只有这么几个呢？那便是艺术的生命不容易把捉的原故。艺术的生命究竟怎样才可以把捉？这实是一件很难说明的事。一般人因其难以说明，便把他归于“天才”。批判哲学的开山始祖康德也说：“艺术即天才之作品。”但是天才又是什么呢？是天上落下来的吗？是生来便与人不同吗？近代精神分析学家龙布罗索说，天才就是疯子！这也和说天才就是“天才”一样，同一莫名其妙。其实天才并不是天生成的，也不是什么疯子，仍旧和常人没有两样，不过我们不曾探求得它的秘密罢了。《庄子》上有段很有趣的故事，我可以抄引下来：

梓庆削木为鐻，见者惊若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

（《周礼·冬官考工记》：“梓人为笋虚”，鐻字就是这个虚字。梓人即雕刻师。笋虚是钟磬之架，横柱曰笋，竖柱为虚。上面刻有虎豹、飞禽、龙蛇等形象。）

这一段文字，我以为可以道尽一切艺术的精神，而尤其重要的，便是其中的“不敢怀庆赏爵禄，不敢怀非誉巧拙，辄然忘吾四肢形体也”这几句话。这便是天才的秘密，便是艺术的生命所在的地方。我们的艺术家，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就是能够置功名、富贵、成败、利害于不顾，以忘我的精神从事创作，他的作品自然会成为伟大的艺术，他的自身自然会成为一位天才。所以我说天才不是天生成的，也不是疯子，他并没有什么秘密。他的秘密就在前面说过的这几句话里面。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天才即纯粹的客观性，所谓纯粹的客观性，便是把小我忘掉，融合于大宇宙之中，——即是无我。

艺术的精神就是这无我，我所说的“生活的艺术化”，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要时常体验着这种精神！我们在成为一个艺术家之先，总要先成为一个人，要把我们这个自己先做成一个艺术！我们有了这种精神，发而为画，发而为诗，自然会有成就；即使不画画，不做诗，他的为人已经是艺术化了。无论政治家、军人或其他，倘若他们的生活都具有艺术的真精神，都以无私无我

为一切生活的基本，那么这个世界便成了一个理想的世界了。至于艺术上的技巧，如诗之音韵、画法之远近、音乐声调之高低，人人都是可以学习得到，但也当以无我的态度进行学习。

选自《郭沫若论创作》

詹姆士·巴里

1860—1937

英国小说家，剧作家。生于苏格兰安格斯郡的一个织匠家庭。1882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1885年移居伦敦，当自由投稿的新闻记者。1913年受封为男爵。1919—1922年任圣安德鲁斯大学校长，1928年当选为英国作家协会主席。1930—1937年受聘为爱丁堡大学名誉校长。他的作品，长于以幽默和温情的笔调描述苏格兰农村的风土人情。

本篇演说是在伦敦印刷界年度宴会上发表的。巴里以他在文学界的德高望众，被推举发言。在演讲中，他结合新任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祝酒词，“为文学和报刊干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幽默的语言阐述了文学和报刊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观点。

文学和报刊

1924年

亲爱的亚斯托，女皇陛下，先生们，特别是丘吉尔先生〔笑声〕：

让我焦虑不安的是面前桌子上的两个可疑的东西。〔笑声。〕（指放在餐桌上的两个麦克风）我不知道它们为何物。但若假设其中一个代表文学，那么另一个就代表报刊了。〔笑声。〕我认为，我们应该感激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的到来，并对我们谈论文学和报刊，特别是在我们的国家面临大选的前夕〔笑声〕——我指本次竞选。〔笑声。〕但是，尽管丘吉尔先生说得很好，我仍然明白我被推举来答复他的祝酒词的真正原因。因为我是这里最年长的一个。我记得许多年前，在美国的《机智》杂志中，我的名字被冠以“有趣的耄耋老翁”一词。〔笑声。〕因此，我认为我该做的就是对各位讲讲很久以前的文学。〔笑声和喝彩声。〕我想，恐怕有时候我分不清过去和现在，分不清父亲和儿子。但此刻我注意到，今晚你们在犯着同样的错误。〔笑声。〕刚才你们祝贺丘吉尔先生荣任财政大臣，但显然这是他父亲最该做的。〔笑声。〕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知道得很清楚，丘吉尔先生最近发生了什么事，而且我深信他是唯一能获此殊荣的人。〔喝彩声。〕但今晚，我们应该把丘吉尔先生和他父亲联系起来，而这位父亲一定会为他的儿子自豪无比。〔好哇！〕

我猜想，目前在写回忆录的那些人，一定占了你们中的绝大多数。〔笑声。〕我想提醒你们，现在回忆录没多大用处，除非你们能先回忆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笑声。〕我见到斯蒂文森是在爱丁堡，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谁。那是1879年的冬季，我清楚地记得那个下午，我夹着笔记本，冒着刺骨的寒风，动身去爱丁堡大学上古典文学课。当我穿越普林塞斯街拐角时，与一个匆匆赶路的人撞了一下。我抬起头，看见一个身体极单薄的年轻人，他的眼睛、头发都近乎黑色，穿一件天鹅绒夹克衫。是他撞了我，可他却一言不语走开了。我忘记了周围来往的车辆，伫立在街中央，轻蔑地盯着他走远。

他一定感觉到了什么，因为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我仍然盯着他。他走了

一小段路，又转过身来。我还是盯着他。于是他走过来，并友好地对我说：“你看，那是上帝让我干的。”〔大笑。〕我说：“上帝也开始粗心大意了。”〔大笑、喝彩。〕他举起了手杖，但没有落在我身上，他又说：“我认识你吗？”说此话时，他的表情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于是我若有所思地回答说：“不，但我希望你早就认识我了。”〔笑声。〕他说：“那就让我们假装认识。”于是我们一起走进莱斯街角的小酒馆。在那儿，我们喝了“三个火枪手”最喜欢喝的葡萄酒。〔笑声。〕末了我们都想付帐〔笑声〕，可力不从心，因为我们俩都没带钱。〔笑声。〕

我们不得不留下他的天鹅绒外衣和我的书。当我们走出小酒馆时，雪下得很大，可我们全然不顾，边走边为苏格兰的玛丽女皇争论不休，〔笑声。〕我记得就在那个雪夜，他追逐我长达数小时，跑遍了爱丁堡的所有街道。〔笑声。〕这是我唯一一次回忆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即使如此，我敢说这样做还是会给我带来麻烦。〔笑声。〕

“为文学和报刊干杯！”没有比这句祝词更高贵、更贴切不过的了。因为文学和报刊都离不开他们共同的朋友——印刷商。〔喝彩声。〕报刊的一切似乎都不错。我们今晚围坐在主席周围，所谈的一切都离不开报刊，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就是引起所有国家羡慕的、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富。”〔热烈喝彩。〕如今的报刊、正如丘吉尔先生所言，正使世界踏上正轨。现在我不能看着丘吉尔先生，因为我被告知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这两个东西上（两个麦克风）。〔笑声。〕一个是已故的贵族大臣，另一个是当今财政大臣，我不知道丘吉尔先生是否开始对我接下去要说的感到有些紧张。〔笑声。〕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要对报刊进行赞美——就像穿上了礼拜天的盛装〔笑声〕——而他们父子俩，就是报刊骄傲的胸襟上的两颗光彩夺目的钻石。

文学的号角已经吹响——丘吉尔先生对文学和报刊有许多话要说，他发现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回事。他认为文学和报刊之间没有任何分界线。我倒想只用几句话对这条分界线下个定义。〔笑声。〕文学曾经是一只安静的鸟儿。我认为文学界的情况很不错，我认为一切都很好，尤其年轻的作家，文学已走出了朦胧阶段，变得更加勇敢了。在这方面，女人毫不逊于男人。毫无疑问，女人在内阁里也应有一席之地。为那些年轻作家干杯吧！为他们欢呼吧！为他们祝福吧！他们热血沸腾，肩负着让千万个文学夜莺鸣唱的重任。他们虽对老一辈有些简慢无礼，但既然我们为他们骄傲，我们就该原谅他们这一点。

节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陈顺忠 译 井力 校

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

1893—1930

前苏联诗人。他为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作的长诗《好！》以及深切悼念和热情歌颂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长诗《列宁》是代表作。他还用作画、朗诵、演讲等多种方法歌颂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他的讽刺喜剧《臭虫》、《澡堂》曾是苏联人民家喻户晓的作品。

这里收录了他的几篇演说。其中，《艺术滚开，生活万岁！》是诗人在基辅列宁剧院即兴发挥的。人们原定请他作有关左翼阵线情况的报告，谁知他被某些离经叛道的诗人所激怒而改变主意。他克制住冲动的情绪，以解嘲的口吻谈到了有些人对创作所持的轻视态度；以浅显的比喻对艺术和生活的关系作了戏谑的说明。我们能感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戏谑其实是“哀”与“怒”的异化。《向上帝进攻》寥寥数语，用词洗炼而不乏幽默，语带伤感而不失辛辣。他告诫人们要警惕敌人以宣传宗教为幌子破坏革命。通篇的幽默感体现在讽刺和嘲笑很有分寸，恰到好处。《讨论“澡堂”时的发言》是马雅可夫斯基在讨论他的《澡堂》一剧的三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这部创作于20年代的讽刺喜剧公演后，产生了轰动效应。这出戏揭露了小市民心理，勾画了钻进政府机关官僚主义者的种种丑态，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有所创新，因而引起了褒贬不一的评价。面对观众说三道四的议论，诗人一一作出了解释。他选取不同角度巧妙回答许多现场提问，诙谐语言比比皆是，显示了诗人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十分精熟的演讲能力。

艺术滚开，生活万岁！

1924年1月16日

今天到剧场来的无论是母亲也好，大婶、父亲也好，个个都会当着自己熟人的面吹夸一番自己的儿女或侄女，说他们会缝制靴子，会烧可口的饭菜，在命名日那天还会在纪念册上题两行诗，画个小猫头什么的。处处地方人们都会这么夸赞。前面说的缝制靴子、烧菜我们称之为“简单劳动”，是由工人去干的；而后者称之为“艺术创作”，那可是要由挑选出来的“知识分子”去从事。情况就是这样明摆着。

今天也同样如此：不劳动者不得食。艺术在某些地方正在变成“挑选出来者的劳动”，而在我们这里（左翼阵线）变成“一般性劳动”。

“艺术创作”正在被今天基本消费者的需求认可为不可或缺的劳动。它并非等同于“休息”、“消遣”一类的词语，而是将那些能促进、调遣我们生命活力的词语进行再加工。

在艺术创作的战线上，遗憾的是供给依然几十倍地超过需求。这需要坚决改正。

谈及当今文字工作者（语言组织者）的任务，我们必须仔细琢磨旧时所储备的文字材料，从中创造出能描述现时生活的新语言。活生生的当今语言我们必须留存下来，剩余的全都扔到污水坑里去！

同语就像社会结构、就像生活、衣服和空气一样，它需要“通风”、“清刷”和“洗涤”。

艺术应该和生活紧相交融（后者对它有强化功能），艺术要未和生活融为一体，要未死路一条。

译自《马雅可夫斯基全集》
杨伟民 译 红帆 校

向上帝进攻 1929年9月23日

同志们，苏联作家协会委派我向第二届无神论者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同志们，接受这样的委托我很难为情，本想回绝，因为这样来祝贺我觉得多少有点空洞。倘若他们交给我两三部反宗教题材的剧本，或是10到15部同样题材的长篇小说，那也许我会爽快而来。我会把这些书朝讲台上一放，瞧，这就是我们给你们们的贺词。同志们，非常遗憾，我们反宗教的作品尚很贫乏。我们曾出现过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伟大无比的上帝的反叛者；像托尔斯泰那样无比伟大的寻神派和造神派；我们还有过简直是还要伟大的信神狂，无以计数多情善感的芸芸众生应声虫似地跟着附和：

至亲至高的上帝，
给我降下一点爱的甘霖，
为你的奴仆搭建好
树叶铺成的最后墓床。……

我们尽管能十拿九稳地识破天主教长袍下法西斯的驳壳枪，也可以百发百中地从牧师的法衣后面辨别出富农的短筒枪，但该死的神秘论用成千上万其他的手腕花招，经过艺术的包装来禁锢我们的思想。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披着长袍奸污少女的天主教神父已经算不了什么，最可怕的还是那些不穿法衣，妖言惑众的平民化牧师。我们会用自己的作品来响应代表大会的号召。我们今天应该完全负责地说，对于无头无脑便给自己灌输宗教感情的教民，数十年来，如果说我们多少有点理解的话，那末我们就该把那些仍在自觉为散布迷信而写作或热衷于此的作家划归为骗子、傻瓜一类。

同志们，革命前，有神论者集会时，总是以“上帝保佑”的颂词作为结束语。今天我们的代表会议将以“向上帝进攻”而降下帷幕。这就是我们当今作家的口号。

译自《马雅可夫斯基全集》
杨伟民 译 红帆 校

讨论《澡堂》时的发言 1929—1930年

（在第一模范印刷厂俱乐部，1929年10月30日）

我想针对刚才几位同志的发言谈两句。首先应该申明：我从不把一部作品当成是完成了的，成功了的。据说是我已“为自己耸立起了一座非手造的

纪念碑。”我坚信工人阶级的创造力，并常常跑到他们那儿去求得帮助，让那座非手造的纪念碑改制成手造的。人们所有的意见我都重视，并尽量采纳。

利亚霍韦茨为此指出，我在嘲讽当前的困境。他援引波别多诺西柯夫向打字员口述的话来证实这一点：他说，从前电车票五个戈比，而现在要十戈比。然而我在这里讥讽的不是我们的困难，而是官僚主义的处理方法。官僚主义者仍然觉得没什么，一切都称心。可我们要说：以前坐车五戈比，现在要变成四戈比，我们该怎么办？当然，我们现在的电车票价定在十戈比也是从适合工人利益的角度来考虑的。我的整个剧本就好比这个例子，是拿它来抨击官僚主义者。我再举一个例子：伊凡·伊凡诺维奇，他的戏不多，总是千方百计给谢尔盖·尼季基奇挂电话，若不同意，便给尼坎德尔挂，再不同意，还有谢苗·皮拉米陀诺维奇。所有这些典型综合在一起，构成了官僚主义者的形象。

有人指出，丘达科夫发明的时间制造机是子虚无有的东西。不对，同志们，我们的五年计划要在四年完成，这件事本身就像某种时间创造机也参与了一样。四年完成五年计划，这是时代提出的任务。为达这一目标，我们调节好自己，安排好时间，等于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安装了一台加速器。

随后，有人说，我给自己的发明家起名叫“怪人”。我在发明家代表大会上曾有过一个发言，我知道发明家往往总是些古怪人。他们老沉湎于自己的设想，一些事务问题总希望其他同志能谅解、关照。他们只顾从事自己的研究，而官僚主义者常常成了他们研究的拦路虎。我不想把官僚主义者塑造成稀里糊涂的样子。

还有同志说，结尾欠完美。梅耶荷德也给我指出，用燃放烟火来解决矛盾也许过于简单了。这仅仅是表面华美而已。我却以为，结尾既要有宣传鼓动性，也要出其不意。我还想这将会很有意思，剧场至今没有采用过这种形式。我希望既能达到宣传目的，让官僚主义者曝光，又能在收场时放烟火，这样也不必去大剧院了，眼前的这块地方简直不是一般的剧场，而成了文化休息公园里的露天园场。这就是我的看法。然而，同志们，这并不意味着我在用廉价的效果遮掩重大的问题。我既希望宣传、鼓动，也希望能轻松愉快、有声有色。

我十分感谢柯罗节耶夫同志对我的鼓励。如果工人们不理解我，我想他们也会坐不住。而我看见的是：他们坐着、听着。作品中需要笑的地方他们也都笑了。这说明他们看懂了，否则干吗要笑呢？有些同志责怪我在综合技术博物馆作了两次发言后，方到这儿来，其实是误会。同志们也许以为我在综合技术博物馆对那些从索洛柯夫到这儿来一天的人作了报告？那里的听众也很有修养，我同样需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坐在那里的听众也都是苏联的职员、大学生、工人，其中有 150 个座位，由我自己来安排听众。因此，有人以为我会去巴结讨好某人，纯属不可能。我只是到了最后关头才到主人这里来。要是我来了，央求你们听一下，没人答应，则当作别论。我不会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你们：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我的的确确希望能看见和听见我所搞不懂的事。你们了解一些我所不知的事物，反之，我懂得的一些事物你们也许不明白。我非常感谢听众的关照，并保证在你们这儿朗读我自己的作品。

（回答听众小纸条上的问题）

问：你为什么把此剧称为正剧？

答：这是为了更引人发笑，其次，官僚主义者难道还算少？难道不能算作我国的正剧？

问：你的这部作品是写给谁看的？工人们理解不了你，不会去读它，知识分子却又在骂你。

答：这类纸条我无法接受。他们既然没读我的作品，又从何得知无法理解呢？如果他们说：“你的作品我读过了，可真糟。”这对我来说，可真要我的命了！因此，同志们，这类纸条对我没什么太大用处。而至于知识分子在骂我，别忘了，知识分子可以是句骂人话，也可以当作工人知识分子解释，那就当作别论了。

罗高斯卡娅刚刚发言道，《澡堂》比《臭虫》好。我是个无所谓的人。只是在我死后，你们才会说，死了一位多么精彩的诗人。我希望自己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进。如果有人对我说，马雅可夫斯基写得不错：在某年写了一部出色的作品，而今年又写了老一套，我看那就完蛋了。你们认为《澡堂》比《臭虫》强，那说明我的《臭虫》使你们的戏剧趣味稍有提高。

（在“无产者”俱乐部，1929年12月4日）

同志们，刚刚递上来一些条子，几位同志在讨论会上也发了言。有人说，官僚主义被曝了光，但站在它对立面的典型形象却没有，没有正面人物，这是最主要的。这也许的确是我作品的缺点。我想写，特别是在五年计划建设的时代。我不仅想写批评性作品，而且还想写一份充满朝气、充满激情的总结，来描述工人阶级怎样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看来，这不正是这部作品，而且也是我所有作品的缺点。同志们说，作品没有指出怎样去和官僚主义斗争。其实，党和苏维埃政权已经指明，用铁扫帚把党和苏维埃政权机构来个大清洗，把我们队伍中所有搭官僚主义架子、弄虚作假的人统统清扫出去。

我这部剧本并无新意，党也知道这一点。它只不过是那把清扫过垃圾的铁扫帚中的一根铁条而已。我不奢望能起更大的作用了。

会议深深触动了我，因为与会者都那么认真、热烈地研讨了我的作品。上届会议我的听众从职工工种来看，更有资格些。他们都是印刷工人、成天和书打交道。我原以为今天换了一个地方，大概会落入被冷淡的境地。

我无数次地把内心的这种不信任感克制住。同志们逐字逐句地给予我宝贵的指教，并且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这部作品。现在，我只想说一句：你们的关照使我精神大振。我明白了，最普通的听众和读者已经完完全全能理解我。在这部作品里如果我没把必须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那么下一次我一定会做到的。

（在出版界之家，1930年3月27日）

同志们，我的躯壳生存了35年，所谓的创作生涯也已度过了20个春秋。在生存的每时每刻，我都在用自己肺部的张力，用自己嗓子的音量、朝气，声嘶力竭地证实着自己的观点。我不怕自己的作品被淘汰。最近酝酿着一种说法，认为我是公认的天才，而《澡堂》正把这种意见驳倒，我很高兴。我一边从剧场走出，一边擦拭自己饱满前额上的唾沫，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

《澡堂》观后，意见分成两类：一类是，“太棒了，从来没这么乐过！”；另一类则是，“真无聊，一出讨人厌的戏”。我也可以轻飘飘地说，我的剧

本不赖，是给演砸了。这样未免太轻率了，我不打算这样处理。这部作品优点、缺点的全部责任全由我一人承担。但也有另一种不可比较因素存在。例如，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说：“大家请看，纽约镇压共产主义游行示威要比英国煤矿工人罢工来得好。”这样的评价不是衡量事物的真正标准。首先应注意人们对这部或那部作品在当代的需要程度。如果它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品，便应该说：“这部作品没打响，真痛心！”如果它对我们有害，则应该为它的不成功而庆幸。

这出戏的基本意义并非包含于心理上的揣摩之中，而是着眼于诸多革命问题的解决。我把戏剧看作反映政治口号的舞台，试图寻求完成这一任务的形式。我首先要申明，戏剧是舞台，另外也是一项娱乐性事业，即应该是欢乐地谈论时政问题的舞台。

有人说，《澡堂》演糟了，《澡堂》失败了。失败在哪里？什么地方演糟了？难道就因为《共青团真理报》的某位仁兄偶尔尖声尖气地叫了句：没什么可笑，或者某人觉得海报画得不对劲，他不喜欢？我干这行20年，难道能以此为追求目标吗？不，我追求的是具有现实价值的文学、戏剧材料。它们都存在于形形色色的事物之中。这类材料对我来说，价值何在呢？价值首先在于宣传，它以朗读台词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价值还体现在所有滑稽可笑对话的背景上，剧本从头至尾都作了这类处理，我很清楚，我所写的每一句台词，从开始第一个字到结尾最后一句话，都犹如在写最美的诗篇，一丝不苟。恰罗夫在证明我写得不俏皮时，引用了三句台词，刚好都是演员临场即兴发挥的语句。

从戏剧效果看，要处理演出问题，我们感到舞台空间的不足。我们拆毁了厢座，拆除了四面墙壁，如有必要，我们还要拆去顶棚。我们想把六场或七场中的个人表演转变成群众场面。我可重复唠叨十遍，在这方面我将不得不跟观众、跟旧戏剧观发生冲突，这是可预料的。我明白，想必梅耶荷德也懂，如果我们严格遵照作者的提示来布置舞台，那末我们的剧场效果会更好一些。而现在我们是以游艺演出的形式来取代心理剧的。今天工人们在《莫斯科晚报》上批评了我，有一位说：“这是滑稽戏！”另一位说：“是木偶戏！”巧的是我正希望它又是滑稽戏又是木偶戏。还有一位说：“毫无艺术性。”我太高兴了，我不希望有什么艺术性，我力求没有艺术性。

我们从来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先锋派艺术家，但也从来不是尾巴主义者。我一直认为，苏联提出的思想是最先进的思想，在戏剧领域我们代表了主流。在创作道路上我们会犯几十几百个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对我们来说，要比表现男女通奸题材旧式戏剧的成功经验更为有用。

译自《马雅可夫斯基全集》
杨伟民 译 红帆 校

鲁迅

1881—1936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在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了“感而能谐，婉而多讽”的独特幽默风格，塑造了阿Q、孔乙己等充满中国民族特色的幽默典型。他的《阿Q正传》在国际上获得很高声誉，曾被收入《世界幽默全集》。鲁迅不仅是当之无愧的幽默家，还是著名的演说家。他的演讲酷似他的杂文，既闪烁着深邃的思想火花，又洋溢着谐谑的幽默情趣。冷嘲热讽、揶揄戏弄是他常用的写作手法，在演说中也时有表现。

《未有天才之前》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上发表的。这篇演讲动人之处在于语言富有趣味。鲁迅先生把新思潮和旧思想比喻成“新马褂”和“旧马褂”，喻体新奇，谐谑浓郁；用“乔木”、“花”和“土”的关系，“拿破仑”和“兵”的关系来说明“天才”的成长需要民众的土壤基础，平常的事物，普通的词汇，经演说者的幽默体察，综合比拟，妙趣横生。

《魏晋风度及文章》是鲁迅先生用幽默家的笔触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建安时代文学风气的全景图。通篇语辞不多，几乎处处都融入了忍俊不禁的实例、比喻，使我们对当时文学繁荣、思想活跃的根源，“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文风的特点、形成原因有了感性认识。演讲临近尾声，孔融对曹操的讥讽、戏弄，形成了本篇生动、幽默的最高潮。

未有天才之前

1924年1月17日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

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绝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精神，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山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厂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

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选自《鲁迅全集》

魏晋风度及文章

1927年7月23日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而不见。

又如有一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夫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什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高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

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需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很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琳，应瑒，刘楨，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

选自《鲁迅全集》

威尔·罗杰斯

1879—1935

美国幽默作家，演员。生于俄克拉荷马，在父亲经营的牧场上长大。1902年参加“美国西部”剧团在阿根廷的演出，是一位熟练的骑士和套索能手，其摆弄套索的快速旋抛等绝技，后来成为轻歌舞剧的一种艺术。1905年随团至纽约演出，开始在固定剧目间插演时事评论，以敏捷的才智与诙谐语言出名。1915年在时事讽刺剧《举起手来》及其他活报剧中扮演重要角色。19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拍了《康涅狄格北方佬》、《国家市场》、《戴维·哈伦》等多部重要电影。1935年8月15日，在阿拉斯加巴罗角因飞机失事罹难。他的死震动了全国，因为没有一个美国幽默家像他那样在如此众多的观众中享有盛名，甚至经常被他戏弄的政治家也对他表示敬意。他说过的话常被人们引用，如“我所知道的刚巧是我在文件中读到的”；“每件事都是可笑的，只要它发生在别人身上”。他的作品主要有《文盲文摘》、《半成品外交官给总统的信》等。

如其幽默是出于本能一样，罗杰斯的演讲从不用稿纸。本篇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为纪念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逝世120周年而举办的一次宴会上的演讲。他以幽默的口吻，言简意赅地点明了财富与教育的关系，即清贫的学校给人以智慧，知识就是财富，可使人致富；反过来，富人应在道德驱使下扶持贫穷，资助教育，使学校有能力哺育更多的人才。

财富与教育

1924年12月4日

方才巴特勒校长在开场白中表扬了我，点了我的名，并把我的名字列在哥伦比亚毕业生的前头，为此我感到高兴。因为上星期我排行最差。那时，威尔士王子在讲述美国名胜时，提到了伍尔沃思大楼、地下铁道、屠宰场、威尔·罗杰斯和福特汽车厂等等，他至少可以将我排在猪的前面吧！

由此看来，事物的方方面面都要通过对比才能有结果。你要炫耀任何东西，你就应该有个对比。我今晚在此代表着贫穷。但恰恰在这张桌子旁，在这讲台旁就有足够的财富——我不知道富人们的良心会否有所触动——以致我们能还清国债。每个富人在发迹生涯中都一度有过这样的事，即当他们时来运转时，就开始将良心抛弃了。我听说在今晚的来宾中有些人就有这样的事。这也就是我今晚到此地来的原因之一。我很愿意在最适当的时刻出现在这里。

我们在此，不仅要同柯立芝一样保持冷静，而且要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表示敬意。后者是第一任财政部长，他所以能出任此职，是因为他同华盛顿在当时的美国是唯一能将自己的名字摆到支票上去的人。从此，在支票上签字就成了能否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首要资格。

我很高兴巴特勒校长在此用这种方式纪念汉密尔顿。当然，主要原因是他反对的这个人想当总统。汉密尔顿是普林斯顿的——抑或，我认为是哈佛

柯立芝（Coolidge）为当时的美国总统，他的名字与单词“冷静”（cool）是谐音。

的——反正是那些“小学”中的一个。在一次决斗中，他忘了我们在美国的人可以开枪射击。所以，他们中有一个人被不幸击毙了。这种事在英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因此，他们废除了决斗，因为维护名誉无可指责，但不能太过分。

倘若今晚你们在此谈财政问题，我相信你们不会比巴特勒校长考虑得更深入。巴特勒其人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挖钱”。20年前，哥伦比亚大学一无所有；现在，经他努力已有了一百多幢大楼和一块捐款人纪念碑。他是第一个在毕业生中游说，动员他们向母校捐款的人。他说，向哥伦比亚大学捐款既可以减少所得税，又可以流芳百世，何乐而不为也。汉密尔顿造了这些大楼，并使地产上升到9千万美元，其中一幢大楼我们命名为汉密尔顿大楼。我们学校的学生多于世界上任何大学，它是第一流的大学，设有3,200种课程。你可以在开头两年决定学什么课程，接下来两年寻找在哪幢大楼里开课，而在剩下的岁月里，你却但愿所学的是别的课程。他们有一个由学生组成的极好的团体，叫做校友会。学生们曾走进这所学校；但走出学校后，却组成了这个团体，反过来教育母校如何办学。

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徐仲君 译 井力 校

双关语，“primaryschool”既可指“小学”，又可指“重要学府”。

指汉密尔顿与艾伦·伯尔为维护个人名誉而决斗，结果前者中弹身亡。

洛德·塞西尔

1864—1958

英国政治家。1906年当选议会保守党议员，开始政治生涯。1915年任外交事务次官。1918年任外交大臣助理，次年出席巴黎和会，参加国际联盟的创建工作，是盟约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从1920年起多次出席国联大会，主管英国在国联的事务。后参加创建国际和平运动委员会，并任主席。因对和平事业的贡献，获1937年诺贝尔和平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曾多次访美，在促进英、美两国友好关系上起了重大作用。他对美国怀有特殊的感情，对英美关系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和研究，提出了英国和美国可能源自同一祖先的观点。因此在1925年1月25日，当他结束在美国的周游讲学后，作为嘉宾出席了纽约市英国清教徒举办的宴会，并作了本篇歌颂两国关系的演说。这里是演讲的开头部分。

英国人和英国人

1925年1月2日

迪皮尤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很显然，首先我得感谢贵主席的好意和对我的赞美。对他所说的一切，我都表示感谢。当然我得承认，当他从大洋彼岸的角度谈论我的讲学时，我有那么一丝不安的紧张和尴尬。〔笑声。〕我一点也不知道那个话题该怎么结束。〔笑声。〕所幸的是，在他诚心诚意的时候，礼节还是占了上风。〔笑声。〕

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今天的宴会。这次盛会太令我兴奋了，但也给我带来了一丝伤感，因为它提醒我，这是我在美国的最后一晚了。我深感遗憾，遗憾在美国的时间太短暂了。我深感遗憾的事太多太多了，其中最遗憾的是我无法接受从你们伟大国家的其他地方发出的邀请，尤其遗憾不能访问加拿大。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是很想去那儿的。我至今仍能感受到我上次去那里访问时，加拿大同行对我的友好和真诚。

当然我那么说是不太确切的，因为我从内心深处感谢贵国人民的殷勤和周到，凡是来访的客人都能体会到这种殷勤和周到。

美国人的好客是举世皆知的。我在想，如果根据一些国家的传统习俗来加以评论，比如你们所说的“美丽的法国”，“高贵的英国”，那么，我想你们一定会说“好客的美国”，我不用“王侯般慷慨的”这个词来描绘，唯一原因是怕有奉承王子之嫌。〔笑声。〕

请容许我不客套地说，那不仅仅是好客。我冒昧地说，它是从你们心底涌出的真诚，我很想看到这种高尚的品质更能体现在英国人身上而非其他人。我记得去年到这里时，荣幸地受到前总统哈定的热情接待。他以他在职期间众所周知的真诚和热情款待我，还询问我旅途情况，招待得如何。我毫不夸大地告诉他，我得到了友好的帮助。他解释了许多原因，但最后他说：“总之，最重要的原因是，您是英国人。”我必须承认，即使他遍寻语言中

美国政治家，律师，纽约州议员，本次宴会执行主席。

美国第29任总统，1923年在任内病故，通常被认为是“政绩最差”的总统。

所有恭维或取悦我的词儿，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词儿。

今晨，我很荣幸地受到贵国现任总统柯立芝先生的接待。谈话期间，他也充分表示对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很满意。也许这对一些人会认为是陈同滥调。但请容许我说，就是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存在一个额外的约定。就我们的首相和你们的总统而言，我们都拥有一个杰出的坦率的领袖，而他们的每句话都使我们信服。〔掌声。〕

当今早柯立芝先生对我说了那些如此友好的话语时，我已体会到，那是发自他的心底，两国之间的友谊也是真诚的。

我非常非常高兴各位刚听过一篇精彩演讲（指迪皮尤先生的那篇），它追溯了自根特条约后的我们的友谊。我总是独自想，这是我们的前大臣卡斯尔雷侯爵的成名作，因为他签署了根特条约。那篇东西写得非常棒，它证明了制定和平协约是很必要的，它将保证协约国间友好和平相处。

但我认为还有其他原因。你们的社会制度是原因之一，英美两国人民间日益相互了解对方的民族性则是另一原因。

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期，相比较而言，典型的英国人是骄傲自大，目空一切，除了自己别人都不行〔笑声〕；而典型的美国人，则具有好奇心，性情粗犷，冒失且狂妄不羁。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存在。我感到迷茫，但可以肯定，现在这样的人已像渡渡鸟一样绝种了。〔笑声。〕当然，比这更重要的是民族纽带的因素。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人源自同一祖先。如果确实如此。我们会深感自豪和高兴。此外，两国的理想和抱负，文化和历史，都是如此地相似。

莎翁的戏剧和《圣经》是英国和美国间存在着友好关系的重要原因。当然，尽管语言相通是另一个联结两国的纽带，但比这更重要的是观点上的一致，这种一致确实是以上我所列举的诸多事实的源头。

在过去几年里，我有幸或者说不幸参加了多次国际会议。所到之处，无论何时，我总能发现一些美国同行。无论我们讨论什么问题，无论最初我们的观点多么不一致，但稍后我们总能达成共识，这并不是因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而仅仅因为我们殊途同归，想到了一起。我深信，基本的共同点和思维的一致性与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往来的关系太大了，它的重要性远远甚于其他。

我还深信，我敢肯定对于所有这些有幸提到的原因中，还有一种应被提到而却被忽略的原因，那就是法律。最令人注目的是去年夏天，休斯先生作为美国律师协会的一名主要成员，和我一起访问了苏格兰。我想这与长期以来两国间的友好访问是一样的。我们常常发觉两国的立法原则是相同的；大洋两岸众多的法律名称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贵国的首席法官马歇尔和斯托里，也和我国的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和布莱克本一样执法公正，为人称道；我们诉诸同样的权威，我们的原则也回归于同样的事由；我们两国是由人类智慧建立的。分别在两国通行的最高法律结构方面，也有着共同的起源和同样的权威性。我深信，以上提到的相似点，对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具有长期的推动作用。

美国第 30 任总统，哈定的继承者。

1814 年 12 月 24 日签于比利时根特，规定两国结束战争状态，友好相处。

英国外交大臣，条约拟订人和签订人之一。

节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陈顺忠 译 井力 校

爱德华·福斯特

1879—1970

英国小说家。生于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摒弃 19 世纪末流行的繁缛辞藻和复杂的细节描写，采取流畅自如、口语化的写作风格，以现实主义批判著称。1910 年发表成名作《霍华德别业》。1912—1912 年二赴印度，10 年后推出名作《印度之行》。晚年转而探索诚与仁的价值，著有《天使不敢涉足之地》、《一间可以看见风景的房间》等。

本篇是他在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发表的关于小说连续讲座的第一讲节录，原标题为《真正的学术》。全部讲座的讲稿后来汇编成册，定名《小说面面观》，是 20 世纪“分析小说艺术的经典之作”。在这篇演说中，福斯特愤世嫉俗的心态表露无遗。他开门见山地指出，真正的学术乃是人类的最高成就，而真正的学者却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人都是“伪学者”。接着，他以“同情和尊敬”的态度，对伪学者的特征，伪学者出现的原因，伪学者的治学态度，以及伪学者目前的最新特点，都一一作了剖析。通篇语词辛辣，极尽嘲讽揶揄之能事，令人忍俊不禁。

关于的学者

1926 年

真正的学术是人类取得的最高成就之一。一个人选择了一个有价值的题材，并将这个题材本身的以及与其有关的主要知识统统掌握起来，这个人便是出类拔萃的了。到那时，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挥笔疾书。如果他的题材是小说，便能按照年代加以阐述，因为他已读完近四个世纪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以及许多不重要的小说，并对英国小说以外的有关情况拥有充分的知识。已故的华尔特·莱雷爵士（他曾主持过此讲座）正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他学识渊博，不仅能对“外来影响”作纵横谈，还可按时期分别谈论英国小说。至于学识未及他的后辈则要避免这样做。学者，像哲学家那样，可以对时间的河道进行仔细考察，但对它的全川就无能为力了。不过，他对流经身旁的一些东西和特性是能看清楚的，并能估量出这些东西和特性之间的关系。如果他得到的结论，对我们的价值就像对他自己那样的话，人类文明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模样。然而，他失败了。真正的学术是不能言传的，真正的学者更寥寥无几。今天，在听众之中，也有一些真正的学者，或具有学者潜能的人，但为数甚少，当然，连我这个站在讲台上的人也不是。我们大都是伪学者。所以本人打算以同情和尊敬的态度来考虑我们的特性，因为我们这个阶层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权力甚大，无论在教会内和社会上都很有地位。整个帝国的教育在我们控制之下。现在，报纸把我们崇为显要，宴会将我们视若贵宾。

从好的方面说，伪学是对学识的盲目崇拜，然而，它也有经济上的原因，我们对此不必过分责难。我们大多数人在 30 岁前都得谋求一份职业，不然就得投靠亲友为生。而获得工作的途径又必须通过考试。伪学者往往成绩甚佳（真学者常常考分不如），即使他考场失意，仍对考场的沿袭权威赞赏不已。因为考试是通向就业的门槛，掌握着你进出之大权。一篇论李尔王的论文，虽不像同名的戏剧那么感人肺腑，但也许能从中得到好处，它也许是进入地方政府大门的踏脚石。人们也许会常常这么自言自语道：“这就是做学问的

好处，它能帮助你找到工作。”他这时感到的经济压力往往是潜意识的。他所以去应试，原因是写一篇论李尔王的论文，尽管是一次难忍的可怕经历，但确是大有好处的。不管他是出于愤世嫉俗或幼稚无知，都不必责怪。只要做学问跟谋生活联系在一起，只要就业务必通过考试，我们就必须认真地对待考试制度。假如有另一途径可以获取职业的话，我们目前的所谓教育大部分要宣告结束。可是并没有谁因而会更愚蠢些。

有人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正如我目前所从事的工作那样——简直是在作孽。因为他用的是真学者的方法，而又缺乏真学者的素养。在尚未阅读或理解那些书籍之前便进行分类，这是他犯的第一大罪。他按年代分为：1847年以前写的作品，1847年以后写的作品，1848年以前或以后写的作品；安娜女皇统治时期的小说，前小说，原始小说和未来小说。更糊涂的是，他还按题材进行分类：法庭文学——从《汤姆·琼斯》开始；妇女运动文学——由《雪丽》开始；荒岛文学——从《鲁滨逊漂流记》谈到《蓝礁湖》；浪子文学——最令人意气消沉的一种，但这类小说到《众生之路》以后已销声匿迹；萨塞克斯文学（也许最能体现乡土气息了）；异常作品——一种严肃得令人厌烦的探究知识的文学，只有素养较深的伪学者才能从事此项工作。这类小说还涉及工业主义、航空技术、手足病治疗法以及气候等方面。多年来，我在阅读一本最令人惊愕的小说时，就看到作者谈到气候这回事。此书来自大西洋彼岸，阅后令我久久不能忘怀。它是一本文学小册子，名叫《小说的题材与方法》。我不愿提及这位素养较深的伪学者的姓名，他是按照小说的日期、长度、地方、性别及观点加以分类的，直至不能再分为止。原来他已作了各种应急打算，根据气候变化行事。他把气候分为九种，还煞有介事地给每一种变化举出一个例子。现在，就让我们看着列举了些什么吧。首先，这种气候可以是“装饰性的”——见《皮尔洛蒂》；可以是“功利性的”——见《福罗斯的磨坊》；可以是“解说性的”——见《利己主义者》；可以是“调剂性的”——见《费奥那·麦克李奥达》；可以是“感情对比性的”——见《巴兰翠主人》；可以是“对行为有决定性的”——吉卜林的某篇作品曾谈到由于一场暴风雨使一个男子向女伴求婚不遂；可以是“具有控制性的”——见《理查·弗活勒》；可以是“自身即主角的”——正如维苏维尔斯在《庞贝末日记》描绘的那样；最后，也可以是“不存在的”——像一本童话说的那样。但愿这位作者也投身于“不存在”之中吧。尽管他把一切都划分得十分科学、十分严密，但连自己也感到不大满意。所以他在完成这些分类之后，还得承认；当然，一个小说家还要有天才，光知道有九种气候还是没什么用处的。有了天才才能掌握气候的变化。他领悟到这个道理后，感到十分高兴。于是便按照语调把小说分为个人的与非个人的两类，并分别举例说明。接着，他深有感触地说：“是的，你还得有天才，否则，任何一种语调都没什么作用。”

目前，伪学者的另一特点是谈论天才。他爱谈天才，因为天才这个词可使他不用深究其含义。什么文学是出自天才之手，小说家都是天才。既然是天才，当然可进行分类，他真的这样做了。也许他说的一点没错，可惜毫无作用，因为他只是在书堆中来回转悠，但并没读进去。他不是没读过这些书，便是读书的方法不对头。书是必须读的——倒霉的是要费时甚多——要深究其内容，舍此别无他途。有些野蛮部落“吃”书，但西方世界却把“读”作为唯一的消化方法。读者务必独个儿坐下来与作者一起奋斗。对此，伪学者

是不愿做的，他只愿将一本书跟当时的历史、作者的生平、涉及的事件，尤其是跟某种潮流联系起来。只要一使用“潮流”这个词，他的精神便为之一振，因为读者们这时会垂下头来，还经常拿出铅笔将这一点记在本子上，满以为这样便轻而易举地顺应“潮流”了。

选自《国外文艺理论研究》

阿尔弗雷德·史密斯

1873—1944

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四度出任纽约州州长。生于纽约市，没有受过正规教育，靠刻苦自学成材。当过临时工、坦曼尼协会所属的陪审委员会调查员、纽约县法官、纽约市参议会主席。1919年出任纽约州州长。任内改进立法，体察民情，精简政务，政绩斐然，因而三度连任。1928年由民主党大会推为总统候选人，为美国历史上竞选总统的第一位天主教徒，但在角逐中败于共和党人胡佛。

本篇是史密斯为竞选总统在俄克拉荷马城所作的演说。众所周知，美国大选是党派势力激烈较量的时刻。为了击败对手，各方无不使尽浑身解数，甚至不择手段。在这次竞选中，史密斯因为信仰天主教而大受攻击。因此，他在这篇演说中一方面抨击对手造谣诬蔑，另一方面诉诸美国开国元勋的业绩，替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辩护。全文言辞犀利，时而嘲讽对手，时而坦陈己见，从而博得了选民的阵阵笑声和喝彩声。

宗教偏见与政治

1928年9月20日

我觉得，我能畅所欲言要归功于民主党。假如我听信了计较政治得失的地方议员们的话，就很可能保持沉默了，但我天生不是个沉默的人。[笑声、掌声。]

我从不隐瞒什么，我直言不讳。我觉得我不仅要感谢党，而且要感谢把这种反美宣传公诸于众的国家本身。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国家如果老是在宗教问题上四分五裂，就不可能获得成功。[掌声。]如果我们的人民屈从于自己的激情和偏见，如果他们思想偏执、心胸狭窄，让恶习得逞，那么，共和国的未来是危险的。打击反美东西的最好方法是将它公诸于众，因为任何反美的东西都不能在阳光下生存。[掌声。]

所有这些宣传来自何方呢？又是谁在为之支付费用呢？大约两周前，北卡罗来纳的一位女领导人在奥尔巴尼行政院对我说过：“州长，对选举材料费我有些看法，目前材料发行支出至少有100万美元已超出本州承受能力了。”钱从哪儿来呢？我认为我已找到了答案。那一天，一位跑进华盛顿国民大厦的妇女怯懦地走近一位负责人，说：“我想要一些史密斯州长的宣传品，要非政治类的。”负责人于是带她步下扶梯，坐进轿车，来到一间办公室。那儿正在出版一种《友谊论坛》报。这报纸近年来愚蠢、可笑、无聊地热衷于攻击天主教会和信教教徒。

全国竞选大会之前，阿肯色州的地头蛇写信给本州的一名代表。信中说，他在竞选时不会投我的票。他把坚持美国理想的前辈们的习俗踩在脚下。现在，大家想想，那些投靠三K党的个人和团体，那些标榜为百分之百纯美国人的人，他们忘掉了杰斐逊为之奋斗的伟大原则是人类的平等，忘掉了先辈早就明智地预见到了今天的情景，故而把“无论何时，信仰都不能作为竞

指民主党。

指共和党在大选中对史密斯的宗教信仰大做文章。

选公职的限制资格”的条款写进了国家基本法的事实。

想想吧！一个对千百万公民抱着敌意的人，却公然宣称信奉杰斐逊、林肯、罗斯福和威尔逊的学说。他们一边装作敬仰、热爱、崇拜基督在世时教诲的关于兄弟亲如一家的圣经箴言，一边却在焚烧信仰的标志、救世主的标志、基督为全人类奉献自己的地方——十字架。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卑鄙恶劣的了！

说这些就够了。[一个声音喊：“够了！”]

现在我们知道另一个煞费苦心的谣言正在全国传播。出乎意料的是，很多人居然还相信。要不是询问真相的信件雪片般飞向奥尔巴尼行政部以及我的办公室，我本来不会提及这件事。已经散布于全国的谣言是：自从我当了纽约州州长后，除了天主教徒外无人被委任过政府官职。[喧哗声。]

州政府内阁有 14 人组成，其中 3 人是天主教徒，10 人是耶稣教徒，1 人是犹太教徒。[掌声。] 内阁成员以外，州长任命 26 人组成了两个部门和委员会，其中 12 人是天主教徒，14 人是耶稣教徒。此外，州长还任命过 157 人，其中 35 人是天主教徒，106 人是耶稣教徒，12 人是犹太教徒。还有 4 人，我实在看不出他们信仰什么。[笑声、掌声。]

另外，本州郡县级任命的司法人员虽与州行政部门没有直接关系，然而由州长任命去补缺的职位共 175 名，其中 64 名是天主教徒，90 名是耶稣教徒，12 名我不知他们信仰什么。[笑声、掌声。]

现在，我再讲一个问题之后，就要结束我的演讲了。这件东西是由一个最低级、最狡诈的脑袋制作出来的，因为只有那种人才会做出这样卑鄙、这样肮脏的事来。这件东西是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共济会的会员送到我手中的。这是一份传单，声称得到了天主教会的支持，传单上写道：“我们已经控制了纽约！团结起来，我们将控制全国！”而且故意传至我州共济会中的每一个会员，因为那个团体中有许多人是我的朋友，并且近十年来一直支持我。

现在，我否认该传单与我有任何关系，民主党也否认该传单与其有关。我无权替全体天主教徒说话，但我还要斗胆地说：天主教徒中没有人愚蠢到会去干那号事。[掌声、笑声。]

让我彻底讲清楚。11月6日那天，我不愿意美利坚合众国的任何天主教徒因我也是一个天主教徒的原因而来选我。[掌声。] 在这个国家里，任何天主教徒如果相信，选胡佛就能最好地维持并改善美国的福利、保健事业、繁荣和发达，那末，他就应当去投胡佛的票，而不要选我。[掌声。]

但是，另一方面，我有权利说，在这个国家里，凡相信我能提高国家福利、相信我有能力在以后的 4 年里安全地驾驭国家之船前进，然而又仅仅因为我的宗教信仰问题而反对选我，这样的公民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坦诚的美国人。[掌声。]

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徐仲君 陈顺忠 译 井力 校

托马斯·曼

1875—1955

德国 20 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生于吕贝克城一个粮商家庭。年少时家道中落，做过学徒。1898 年进一家著名讽刺周刊当编辑，开始创作生涯。1900 年发表《布登勃洛克》一书，轰动德国文坛。1918 年发表《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对自己早期作品中的日耳曼民族优越论，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立场进行反思，提醒国人警惕邪恶势力的滋长。此后，频频在国内外发表演说，抨击纳粹，同情社会主义。希特勒上台后，被迫流亡国外，作品被禁。1938 年定居美国；1953 年移居瑞士。另著有《魔山》、长篇四步曲《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等。文风细腻，构思奇特，富于幽默讽刺和象征意义，常反映出生逢乱世、资本主义面临危机、文学艺术家因而茫然失措的主题。时隔 30 年，他的长篇散文体小说《布登勃洛克》得到各国文坛的认可，并于 1929 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本篇是他在瑞典皇家科学院领奖时发表的演说。一如他的文风，他细致入微地描绘了自己登台时诚惶诚恐的心情，倾诉了对历经坎坷的德国故土的钟爱之情，还表达了对北欧邻邦和瑞典人民的感激之情。全篇情理交融，感情真挚，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讲话

1929 年

现在轮到我来对各位道谢了，我不用说明自己是多么期待这个机会；只是，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真正来临的时候，我反而担心自己会辞不达意，因为一个天生不善言辞的人是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所有作家都属于天生不善言辞的一类；作家和演说家不仅不一样，并且还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因为他们的功业与效用是由不同的途径进行的。特别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作家，习惯了文学性的表达，而又不能免于临场的、简短的谈话时，终难免要出纰漏，只有伶牙俐嘴的演说家才能免除。而我现在的情况更复杂了——我没有料到贵国会赐给我这份殊荣，更没料到瑞典文学院的先生们为我安排这个壮观得让我心慌的盛典！确切地说，我所具有的特性是史诗性而不是戏曲性，为了求得一种平稳的生命和艺术的韵律，我希望自己的心绪能平静；毫无疑问，如果这个戏剧性的火花已经由我北方的邻国所撞开，并波及我平稳的生命与艺术韵律，那我的修辞能力便会降到平常的极限以下。自从瑞典文学院宣布这个决定以来，我整个人陶醉在神思恍惚的狂喜之中，我无法说出它对我的心灵有多大的震撼；我觉得歌德朗诵给爱神丘比特听的那句美妙的情诗颇能说明我此时的心情：“你更换了我舞台的道具，便造成了慌乱不堪。”所以说，诺贝尔奖已经在我史诗性的生命中掺入了戏剧性的成分——原谅我拿诺贝尔奖和平静生活中的激越行为相提并论，但我确信这样做不会太冒失。

然而，一个艺术家要大胆地去接受我现在所获得的荣誉并不简单；一般说来，一个不流俗又能自我要求的作家在这种情况下将会使自己的良心感到何等的惶恐呢？面对这种尴尬的处境，我认为只有超越个人之见才是上策，也才能叫人心安理得。歌德一度自负地认为：“只有三流的人才会谦虚。”

当然，这是一个大人物想摆脱虚伪的道德镣铐时所宣泄的诅语。不过，我敢对大家说，这句诅语并不全然正确；谦虚是含有智慧学问的，以目前我所获得的荣誉而感到骄傲和自满的人是不够明智的。我呕心沥血，才有机会从我的邻国得到这份国际驰名的大奖，由于我，敝国的人民今天几乎要达到欢腾的高潮！

经过这么多年，诺贝尔奖再度颁给德国，尤其是颁给德国散文体的作品，这表示了我常常被误解和伤害的祖国已经为人世的爱心所接受；对于这件事，我的感受是复杂的。

我用不着再进一步去揣测这份爱心的意义。15年来，德国的思想和艺术，在身心都优裕的条件下并没有什么伟大的成就，在安逸的环境里，没有任何工作会有成就的；尤其是思想与文化，原来就得生长在全面强烈的、悲怆的、离乱的痛苦中。在东方和俄国都陷入剧变的时候，德国却维护了西方和欧洲文化形体的尊严；就欧洲人来说，形式乃是荣誉的重点，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很欣赏新教徒直接和上帝沟通的方式，可惜，我不是新教徒，我的习俗和各位在场的的朋友一样。然而，我私下里喜欢一位名叫塞巴斯蒂昂的圣徒，这个圣徒正被四面八方来的矢石刀剑所伤害，但在险境中依然含笑——“神就在你受难的时候接近你”，这是塞巴斯蒂昂所代表的英雄风范。这个风范也许并不文雅，为了德国的心灵，为了德国的艺术，我还是极力主张这种英雄主义，而且我还认为诺贝尔奖颁给德国文学是在精神上赋予德国这个崇高的英雄风范。德国曾经在诗的创作上表现了这种风范，也保存了国家的荣誉；政治上的统一，不让它流于可悲的无政府状态；精神上结合了东方的苦难哲学和西方的形体原则，以便从痛苦中去创造出美感。

在基金会决定颁奖给我以后，我就告诉过最先几位来找我的代表，说我能从北方的邻国中获得这份荣誉是多么高兴和感动。作为一个吕贝克的子弟，我从小就养成和斯堪的纳维亚地方相似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作家，我对北欧的思想氛围怀有爱慕之心。年轻的时候，我的小说里甚至有一位青年像托尼欧·克罗格一样，在他身上，北欧和南欧的特性是那么富有创造性而又耐人寻味地结合在一起，小说里的南欧，意味着世俗和智慧之进取的本质，以及冷静的艺术热情的本质一方面，北欧却代表着心灵和中产阶级的故乡，代表着根深蒂固的情感和亲切温馨的人性。现在，这个心灵之乡的北欧，在这场光辉的盛典上拥抱着我；这是我有生以来一个最美丽、最富有意义的真正的节日，就像瑞典人所说的“欢欣的时刻”——请原谅我把这句话用得这么笨拙。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请允许我和各位一起向基金会表示最崇高的致意，并感谢它对全世界具有如此重大的恩泽，感谢它为我们安排了今天晚上这一美好的盛会。按照贵国的优良习俗，请和我一道再次为诺贝尔基金会齐声欢呼！

选自《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集》

早期基督教徒，因在军内传教被罗马皇帝处以乱箭射死。

林语堂 1895—1976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曾留学欧美，汉语、英文掌握得都非常好，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双语作家。“幽默”译名的首创者。自 20 年代起，运用幽默手法开展对旧文化、旧思想的斗争，创造了辛辣犀利的“语丝体”散文。他所创办的杂志《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都曾介绍过西方幽默作品，为 30 年我国幽默文学运动的形成酿造了适宜的氛围。他在创作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以“闲适、淡泊”为特点的林语堂式风格的幽默。

《中国文化之精神》，通篇围绕“中国文化之精神也就是人文主义精神”这一论点，对中西文化之优劣进行类比，用语温恬，充满调侃味道，字里行间真实而深沉地透露出宁静达观的幽默感，并使人感受到他炽热的爱国之情。最后，他针对中国文化主静不求动的弊病，列举几个例子，独具匠心地把听众推入幽默的高潮境界，人们为之哑然失笑。在《论读书》中，他不仅提出光凭兴趣出发的读书观，同时还对强求划一的教育制度进行嘲讽。生动形象的实例，简短谈谐的议论，充分表达出他对人生“我行我素，听任自由”的幽默见解。《论东西文化的幽默》发表于在汉城举行的第 37 届国际笔会，是一篇用小品文、小故事串连而成的演讲辞，尽管它总体上独立成章、互不沟通，但细细品味后，方知它有其独特的内在韵律、内在逻辑。我们在不经意中能掌握许多幽默的理论知识。这是一篇有虚、有实、庄谐相济的佳作。

中国文化之精神 1932 年

我认为，如果我们了解中国文化之精神，中国并不难懂。一方面，我们不能发觉支那崇拜者梦中所见的美满境地，一方面也不至于发觉，如上海洋商所相信中国民族只是土匪流氓，对于他们运输入门的西方文化与沙丁鱼之功德，不知感激涕零。此两种论调，都是起因于没有清楚的认识。实际上，我们要发觉中国民族为最近人情之民族，中国哲学为最近人情之哲学，中国人民，固有他的伟大，也有他的弱点，丝毫没有邈远玄虚难懂之处。中国民族之特征，在于执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虚理想。中国民族，颇似女性，脚踏实地，善谋自存，好讲情理，而恶极端理论，凡事只凭天饥本能，糊涂了事。凡此种种，颇与英国国民性相同。西塞罗曾说，“理论一贯者乃小人之美德”。中英民族都是伟大，理论一贯与否，与之无涉。所以理论一贯之民族早已灭亡，中国却能糊涂过了四千年的历史。英国民族果能保存其著名“糊涂度过难关”之本领，将来自亦有四千年光辉历史无疑。中英民性之根本相同，容后再讲。此刻所要指明者，只是说中国文化，本是以人情为前题的文化，并没有难懂之处。

尚使我们检查中国民族，便可发见以下优劣之点。在劣的方面，我们可以举出，政治之贪污，社会纪律之缺乏，科学工业之落后，思想与生活方面留存极幼稚野蛮的痕迹，缺乏团体组织团体治事的本领，好敷衍不彻底之根性等。在优的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历史的悠久绵长，文比的统一，美术的发达（尤其是诗词、书画、建筑、瓷器），种族上生机之强壮、耐劳、幽默、

聪明，对女士之尊敬，热烈的爱好山水及一切自然景物，家庭上之亲谊，及对人生目的比较确切的认识。在中立的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守旧性、容忍性、和平主义以及实际主义。此四者本来都是健康的征点，但是守旧易致于落伍，容忍则易于妥协，和平主义或者是起源于体魄上的懒于奋斗，实际主义则凡事缺乏理想，缺乏热诚。统观上述，可见中国民族特征的性格大多属于阴的、静的、消极的，适宜一种和平坚忍的文化，而不适宜于进取外展的文化。此种民性，可以“老成温厚”四字包括起来。

在这些丛杂的民性及文化特征之下，我们将何以发见此文化之精神，可以贯穿一切，助我们了解此民性之来源及文化精英所寄托？我想最简便的解释在于中国的人文主义，因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此人文主义的精神。

“人文主义”含义不少，讲解不一。但是中国的人文主义（鄙人先立此新名词）却有很明确的含义。第一要素，就是对于人生目的与真义有公正的认识，第二，吾人的行为要纯然以此目的为指归。第三，达此目的之方法，在于明理，即所谓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即儒家中庸之道，又可称为“庸见的崇拜”。

中国的人文主义者，自信对于人生真义问题已得解决。自中国人的眼光看来，人生的真义，不在于死后来世，因为基督教所谓此生所以待毙，中国人不能了解；也不在于涅槃，因为这太玄虚；也不在于建树勋业，因为这太浮泛；也不在于“为进步而进步”，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人生真义这个问题，久为西洋哲学宗教的悬案，中国人以只求实际的头脑，却解决的十分明畅。其答案就是在于享受淳朴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乐，（如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等）及在于五伦的和睦。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或是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村前，这样淡朴的快乐，自中国人看来，不仅是代表含有诗意之片刻心境，乃为人生追求幸福的目标。得达此境，一切泰然。这种人生理想并非如何高尚（参照罗斯福氏所谓“殫精力竭的一生”），也不能满足哲学家玄虚的追求，但是却来得十分实在。愚见这是一种异常简单的理想，因其异常简单，所以非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的头脑想不出来，而且有时使我们惊诧，这样简单的答案，西洋人何以想不出来。我见中国与欧洲之不同，即欧人多发明可享受之事物，却较少有消受享乐的能力，而中国人在单纯的环境中，较有消受享乐之能力与决心。

此为中国文化之一大秘诀。因为中国人能明知足常乐的道理，又有今朝有酒今朝醉，处处想偷闲行乐的决心，所以中国人生活求安而不求进，既得目前可行之乐，即不复追求似有似无疑实疑虚之功名事业。所以中国的文化主静，与西人勇往直前跃跃欲试的精神大相径庭。主静者，其流弊在于颓丧潦倒。然兢兢业业熙熙攘攘者，其病在于常患失眠。人生究竟几多日，何事果值得失眠乎？诗人所谓共谁争历月，赢得鬓边髭。伍庭芳使美时，有美人对伍氏叙述某条铁道造成时，由费城到纽约可省下一分钟，言下甚为得意，伍氏淡然问他，“但是此一分钟省下来时，作何用处？”美人瞠目不能答复。伍氏答语最能表示中国人文主义之论点。因为人文主义处处要问明你的目的何在，何所为而然？这样的发问，常会发人深省的。譬如英人每讲户外运动以求身体舒适，英国有名的滑稽周报 Punch 却要发问，“舒适做什么用？”（fit for what?）（原双关语，意为“配做什么用？”）依我所知这个问题此刻还没回答，且要得到圆满的回答，也要有待时日。厌世家曾经问过，假使我们都知道所干的事是什么，世上还有人肯去干事吗？譬如我们好讲妇

女解放自由，而从未一问，自由去做甚？中国的老先生坐在炉旁大椅上要不敬的回答。自由去婚嫁。这种人文主义冷静的态度，每易煞人风景，减少女权运动者之热诚。同样的，我们每每提倡普及教育，平民识字，而未曾疑问，所谓教育普及者，是否要替逐日邮报及 Beaverbrook 的报纸多制造几个读者？自然这种冷静的态度，易趋于守旧，但是中西文化精神不同之情形，确是如此。

选自《大荒集》

论读书

1934年

本篇演讲只是谈谈本人对于读书的意见，并不是要训勉青年，亦非敢指导青年。所以不敢训勉青年有两种理由：第一，因为近来常听见贪官污吏到学校致训词，叫学生须有志操，有气节，有廉耻；也有卖国官僚到大学演讲，劝学生要坚忍卓绝，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料想战国的土豪劣绅亦必好训勉当时的青年，所以激起孟子这样不平的话。第二，读书没有什么可以训勉。世上会读书的人，都是书拿起来自己会读。不会读书的人，亦不会因为指导而变为会读。譬如数学，出五个问题叫学生去做，会做的人是自己脑里做出来的，并非教员教他做出，不会做的人经教员指导，这一题虽然做出，下一题仍旧非指导不可，数学并不会因此高明起来。我所要讲的话于你们本会读书的人，没有什么补助，于你们不会读书的人，也不会使你们变为善读书。所以今日谈谈，亦只是谈谈而已。

读书本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向来算为清高。“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所以读书向称为雅事乐事。但是现在雅事乐事已经不雅不乐了。今人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讣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牒，抄帐簿；或为做相士，占八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实，皆非读书本旨。亦有人拿父母的钱，上大学，跑百米，拿一块大银盾回家，在我是看不起的，因为这似乎亦非读书的本旨。

今日所谈，亦非指学堂中的读书，亦非指读教授所指定的功课，在学校读书有四不可。（一）所读非书。学校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今日大学毕业的人所读的书极其有限。然而读一部小说概论，到底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二）无书可读。因为图书馆存书不多，可读的书极有限。（三）不许读书。因为在课室看书，有犯校规，例所不许。倘是一人自晨至晚上课，则等于自晨至晚被监禁起来，不许读书。（四）书读不好。因为处处受训导处干涉，毛孔骨节，皆不爽快。且学校所教非慎思明辨之学，乃记问之学。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礼记早已说过。书上怎样说，你便怎样答，一字不错，叫做记问之学。倘是你能猜中教员心中要你如何答法，照样答出，便得一百分，于是沾沾自喜，自以为西洋历史你知道一百分，其实西洋历史你何尝知道百分之一。学堂所以非注重记问之学不可，是因为便于考试。如拿破仑生卒年月，形容词共有几种，这些不必用头脑，只需强记，然学校考试极其便当，差一年可扣一分；

然而事实上与学问无补，你们的教员，也都记不得。要用时自可在百科全上去查。又如罗马帝国之亡，三大原因，书上这样讲，你们照样记，然而事实上问题极复杂。有人说罗马帝国之亡，是亡于蚊子（传布寒热症），这是书上所无的。

今日所谈的是自由的看书读书，无论是在校，离校，做教员，做学生，做商人，做政客有闲必读书。这种的读书，所以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人之初生，都是好学好问，及其长成，受种种的俗见俗闻所蔽，毛孔骨节，如有一层包膜，失了聪明，逐渐顽腐。读书便是将此层蔽塞聪明的包膜剥下。能将此层剥下，才是读书人。并且要时时读书，不然便会鄙吝复萌，顽见俗见生满身上，一人的落伍、迂腐、冬烘，就是不肯时时读书所致。所以读书的意义，是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固陋，不偏执。一人在世上，对于学问是这样的：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自认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大学生自以为心理学他也念过，历史地理他亦念过，经济科学也都念过，世界文学艺术声光化电，他也念过，所以什么都懂，毕业以后，人家问他国际联盟在那里，他说“我书上未念过”，人家又问法西斯蒂在意大利成绩如何，他也说“我书上未念过”，所以觉得什么都不懂。到了中年，许多人娶妻生子，造洋楼，有身分，做名流，戴眼镜，留胡子，拿洋棍，沾沾自喜，那时他的世界已经固定了：女子放胸是不道德，剪发亦不道德，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读《马氏文通》是反动，节制生育是亡种逆天，提倡白话是亡国之先兆，《孝经》是孔子写的，大禹必有其人，……意见非常之多而且确定不移，所以又是什么都懂。其实是此种人久不读书，鄙吝复萌所致。此种人不可与深谈。但亦有常读书的人，老当益壮，其思想每每比青年急进，就是能时时读书所以心灵不曾化石，变为古董。

读书的主旨在于排脱俗气。黄山谷谓人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须知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人很多，不但商界政界如此，学府中亦颇多此种人。然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在官僚商贾则无妨，在读书人是不合理的。所谓面目可憎，不可作面孔不漂亮解，因为并非不能奉承人家，排出笑脸，所以“可憎”；胁肩谄笑，面孔漂亮，便是“可爱”。若欲求美男子小白脸，尽可于跑狗场、跳舞场，及政府衙门中求之。有漂亮脸孔，说漂亮话的政客，未必便面目不可憎。读书与面孔漂亮没有关系，因为书籍并不是雪花膏，读了便会增加你的容辉。所以面目可憎不可憎，在你如何看法。有人看美人专看脸蛋，凡有鹅脸柳眉皓齿朱唇都叫做美人。但是识趣的人若李笠翁看美人专看风韵，笠翁所谓三分容貌有姿态等于六七分，六七分容貌乏姿态等于三四分。有人面目平常，然而谈起话来，使你觉得可爱；也有满脸脂粉的摩登伽，洋囡囡，做花瓶，做客厅装饰甚好，但一与交谈，风韵全无，便觉得索然无味。黄山谷所谓面目可憎不可憎亦只是指读书人之议论风采说法。若浮生六记的芸，虽非西施面目，并且前齿微露，我却觉得是中国第一美人。男子也是如是看法。章太炎脸孔虽不漂亮，王国维虽有一条辫子，但是他们是有风韵的，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简直可认为可爱。亦有漂亮政客，做武人的兔子姨太太，说话虽漂亮，听了却令人作呕三日。

至于语言无味（著重“味”字），都全看你所读是什么书及读书的方法。读书读出味来，语言自然有味，语言有味，做出文章亦必有味。有人读书读了半世，亦读不出什么味儿来，都是因为读不合的书，及不得其读法。读书

须先知味。这味字，是读书的关键。所谓味，是不可捉摸的，一人有一人胃口，各不相同，所好的味亦异，所以必先知其所好，始能读出味来。有人自幼嚼书本，老大不能通一经，便是食古不化勉强读书所致。袁中郎所谓读所好之书，所不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这是知味的读法。若必强读，消化不来，必生疴积胃滞诸病。

口之于味，不可强同，不能因我的所嗜好以强人。先生不能以其所好强学生去读。父亲亦不得以其所好强儿子去读。所以书不可强读，强读必无效，反而有害，这是读书之第一义。有愚人请人开一张必读书目，硬着头皮咬着牙根去读，殊不知读书须求气质相合。人之气质各有不同，英人俗语所谓“在一人吃来是补品，在他人吃来是毒质”。因为听说某书是名著，因为，要做通人，硬着头皮去读，结果必毫无所得。过后思之，如作一场恶梦。甚且终身视读书为畏途，提起书名来便头痛。萧伯纳说许多英国人终身不看莎士比亚，就是因为幼年塾师强迫背诵种下的果。许多人离校以后，终身不再看诗，不看历史，亦是旨趣未到学校迫其必修所致。

所以读书不可勉强，因为学问思想是慢慢胚胎滋长出来。其滋长自有滋长的道理，如草木之荣枯，河流之转向，各有其自然之势。逆势必无成就。树木的南枝遮荫，自会向北枝发展，否则枯槁以待毙。河流遇了矾石悬崖，也会转向，不是硬冲，只要顺势流下，总有流入东海之一日。世上无人人必读之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心境不得不读之书。有所应读，我所万不可读，有此时可读，彼时不可读，即使有必读之书，亦决非此时此刻所必读。见解未到，必不可读，思想发育程度未到，亦不可读。孔子说五十可以学易，便是说四十五岁时尚不可读《易经》。刘知几少读古文《尚书》，挨打亦读不来，后听同学读《左传》，甚好之，求授《左传》，乃易成诵。《庄子》本是必读之书，然假使读《庄子》觉得索然无味，只好放弃，过了几年再读。对庄子感觉兴味，然后读庄子，对马克思感觉兴味，然后读马克思。

且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出来。其景况适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亦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易》是一种味道，五十而学《易》，又是一种味道。所以凡是好书都值得重读的。自己见解愈深，学问愈进，愈读得出味道来。譬如我此时重读 Lamb 的论文，比幼时所读全然不同，幼时虽觉其文章有趣，没有真正魂灵的接触，未深知其文之佳境所在。一人背痛，再去读范增的传，始觉趣味。

由是可知读书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程子谓《论语》读者有此等人与彼等人。有读了全然无事者；亦有读了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之者。所以读书必以气质相近，而凡人读书必找一位同调的先贤，一位气质与你相近的作家，作为老师，这是所谓读书必须得力一家。不可昏头昏脑，听人戏弄，庄子亦好，荀子亦好，苏东坡亦好，程伊川亦好。一人同时爱庄荀，或同时爱苏程是不可能的事。找到思想相近之作家，找到文学上之情人，心胸中感觉万分痛快，而魂灵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George Eliot 自叙读卢骚自传，如触电一般。尼采师叔本华、萧伯纳师易卜生，虽皆非及门弟子，而思想相承，影响极大。当二子读叔本华、易卜生时，思想上起了大影响，是其思想萌芽学问生根之始。因为气质性灵相近，所以乐此不疲，流连忘返，流连忘返，始可深入，深入后，

如受春风化雨之赐，欣欣向荣，学业大进。

谁是气质与你相近的先贤，只有你知道，也无需人家指导，更无人能勉强，你找到这样一位作家，自会一见如故，苏东坡初读庄子，如有胸中久积的话，被他说出，袁中郎夜读徐文长诗，叫唤起来，叫复读，读复叫，便是此理。这与“一见倾心”之性爱同一道理。你遇到这样作家，自会恨相见太晚。一人必有一人中意的作家，各人自己去找去，找到了文学上的爱人，他自会有魔力吸引你，而你也乐自为所吸，甚至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亦渐与相似，这样浸润其中，自然获益不少，将来年事渐长，厌此情人，再找别的情人，到了经过两三个情人，或是四五个情人，大概你自己也已受了熏陶不浅，思想已经成熟，自己也就成了一位作家。若找不到情人，东览西阅，所读的未必能沁入魂灵深处，便是逢场作戏，逢场作戏，不会有心得，学问不会有成就。

知道情人滋味便知道苦学二字是骗人的话。学者每为“苦学”或“困学”二字所误。读书成名的人，只有乐，没有苦。据说古人读书有追月法、刺股法、又丫头监读法。其实都是很笨。读书无兴味，昏昏欲睡，始拿锥子在股上刺一下，这是愚不可当。一人书本摆在面前，有中外贤人向你说极精彩的话，尚且想睡觉，便应当去睡觉，刺股亦无益。叫丫头陪读，等打盹时唤醒你，已是下流，亦应去睡觉，不应读书。而且此法极不卫生，不睡觉，只有读坏身体，不会读出书的精彩来。若已读出书的精彩来，便不想睡觉，故无丫头唤醒之必要。刻苦耐劳，淬励奋勉是应该的，但不应视读书为苦。视读书为苦，第一着已走了错路。天下读书成名的人皆以读书为乐；汝以为苦，彼却沉缅以为至乐。比如一人打麻将，或如人挟妓冶游，流连忘返，寝食俱废，始读出书来。以我所知国文好的学生，都是偷看几百万言的三国水浒而来，决不是一学年读五十六页文选，国文会读好的。试问在偷读三国水浒之人，读书有什么苦处？何尝算页数？好学的人，是书无所不窥，窥就是偷看。于书无所不偷看的人，大概学会成名。

有人读书必装腔作势，或嫌板凳太硬，或嫌光线太弱，这都是读书未入门路，未觉兴味所致。有人做不出文章，怪房间冷，恐蚊子多，怪稿纸发光，怪马路上电车声音太嘈杂，其实都是因为文思不来，写一句，停一句。一人不好读书，总有种种理由。“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最好眠，等到秋来冬又至，不知等待到来年。”其实读书是四季咸宜。古所谓“书淫”之人，无论何时何地可读书皆手不释卷，这样才成读书人样子。顾千里裸体读经，便是一例，即使暑气炎热，至非裸体不可，亦要读经。欧阳修在马上厕上皆可做文章，因为文思一来，非做不可，非必正襟危坐明窗净几才可做文章。一人要读书则澡堂、马路、洋车上、厕上、图书馆、理发室，皆可读。而且必办到洋车上、理发室都必读书，才可以读成书。

读书须有胆识，有眼光，有毅力。胆识二字拆不开，要有识，必敢有自己意见，即使一时与前人不同亦不妨。前人能说得我服，是前人是，前人不能服我，是前人非。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要脚踏实地，不可舍己耘人。诗或好李，或好杜，文或好苏，或好韩，各人要凭良知，读其所好，然后所谓好，说得好的道理出来。或竟苏韩皆不好，亦不必惭愧，亦须说出不好的理由来，或某名人文集，众人所称而你独恶之，则或系汝自己学力见识未到，或果然汝是而人非。学力未到，等过几年再读，若学力已到而汝是人非，则将来必发现与汝同情之人。刘知几少时读前后汉书，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

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责以童子轻议前哲，乃“郝然自失，无辞以对”，后来偏偏发见张衡、范曄等，持见与之相同，此乃刘知几之读书胆识。因其读书皆得之襟腑，非人云亦云，所以能著成《史通》一书。如此读书，处处有我的真知灼见，得一分见解是一分学问，除一种俗见，算一分进步，才不会落入圈套，满口烂调，一知半解，似是而非。

选自《大荒集》

论东西文化之幽默

1970年

各位女士和各位先生，我得以《论东西文化之幽默》这个题目向本届会议所提出的主题发表演说，深感欣幸。记得伯格森说过，“幽默可使紧张的情绪疏散，神经松弛。”我希望我们在讨论这一主题之后，大家不至于再犯上过分紧张的错误。

幽默是人类心灵开放的花朵

一般认为哭是一切动物所共有的本能，笑却只是猿猴的特性；这种特性只有我们和我们的祖先人猿才有。我不妨补充一句，思想是人的本能，但对一个人的错误，以微微一笑置之却是神了。

我不否认海豚很会嬉戏作乐。至于象和马会不会笑，我却不知道了。即使他们会的话，似乎也不能很明显地表现出来。我认为幽默的发展是和心灵的发展并进的。因此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它是心灵的放纵或者是放纵的心灵。惟有放纵的心灵，才能客观地静观万事万物而不为环境所囿。

维多利亚女王的遗言

这可以算得是文明的一项特殊赐予，每当文明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人便可以看到他自己的错误和他的同人的错误，于是便出现了幽默。每当人的智力能够察觉统治人们的愚行；政客们的伪善面孔与陈腔滥调，以及人类的弱点与缺失；徒劳无益的努力与矫揉造作的情态，我们自己的梦想与现实之脱节，幽默便必然表现于文学。

故幽默也是人类领悟力的一项特殊赐予。我特别欣赏维多利亚女王临终前的最后遗言。当她知道她的死期已到，这位大英帝国统治者的最后一句话：“我已尽力而为了。”她知道她不是完人，只不过是已尽了这一生最大的努力。我喜欢那种谦虚，那种健全的热情的和具有人情味的智慧。这就是最好的一种幽默。

搔痒是人生一大乐趣

有时我们把幽默和机智混为一谈。或者甚至把它混淆为对别人的嘲笑和轻蔑。实际发自这种恶意的态度，应称之为嘲谑或讥讽。嘲谑与讥讽是伤害人的，它像严冬刮面的冷风。幽默则如从天而降的温润细雨，将我们孕育在

一种人与人之间友情的愉快与安适的气氛中。它犹如潺潺溪流或者照映在碧绿如茵的草地上的阳光。嘲讽与讥讽损伤感情，辄使对方感到尴尬不快而使旁观者觉得可笑。幽默是轻轻地挑逗人的情绪，像搔痒一样。搔痒是人生一大乐趣，搔痒会感觉到说不出的舒服，有时真是爽快极了，爽快得使你不自觉地搔个不休。那犹如最好的幽默之特性。它像是星星火花般的闪耀，然而却又处处弥漫着舒爽的气息，使你无法将你的指头按在某一行文字上指出那是它的所在，你只觉得舒爽，但却不知道舒爽在那里以及为什么舒服，而只希望作者一直继续下去。

朋友之间会心的微笑

因此，我们必须把幽默的真谛与各种作用混淆不清的语意加以区分，正如我们要将哄笑与冷笑，捧腹大笑和淡淡的微笑，或者嗤嗤的讥笑加以区分一样。我喜欢一个作家含有淡淡带哀恸的微笑，那会给我们一点甜蜜的忧郁，就像葛瑞那首《墓园的哀歌》。绝妙的一种微笑是两个朋友相对“会心的微笑”，即一般所谓“相视莫逆”、“心照不宣”的浅笑。当爱默生和卡莱尔初次见面时，他们未发一语，而只是像“心心相印”般地发出微笑。这便是中国人所最欣赏的“会心的微笑”。

佛祖与基督的爱与恕

各位女士和各位先生，我认为最精微纯粹的幽默便是能逗引人发出一种含有思想并发人深省的笑耍。如果我们是天使，便不需要幽默，我们将整天翱翔在空际吟唱赞美诗。不幸我们生存在这人间世，居于天使与魔鬼之间的境界。人生充满了悲哀与忧愁，愚行与困顿。那就需要幽默以促使人发挥潜力，复苏精神的一个重要启示。

它表现在一种广大无垠的哀怜中，——以一种悲恸且富有同情的态度来洞察人生。这惟有人类中最伟大的人物始克臻此，正如佛祖和耶稣。我想，佛祖的教训可用五个字总括，即“怜天下万物”。而耶稣对那个被捉住的淫妇正受犹太村民包围投石时说：“慢着！且让那些没有犯过罪的人投击第一块石头。”这就是表现出一种宽宏的哀怜并教众人反省的警惕。也就是崇高的洞察力，对全人类的一种包含着慈悲与仁恕的谅解。

且让我再举几个胸襟伟大的人所流露出来的一种幽默实例——一种由于承受这人世间所不可避免的事情，或者克服一种缺憾，藉以表现内在潜力的幽默。

苏格拉底泼辣的妻子

诸位都知道苏格拉底有一位泼辣的悍妻。苏格拉底每当受到太太一连串的骂责后，他就走出屋子去找宁静的地方。他正跨出门外一步，他的悍妻便把一桶冷水从窗口倒在他的头上，淋得苏格拉底混身滂湿。他却毫无温色，而自言自语地说：“雷声过后必然雨下来了。”这样，便泰然自若地走向雅典市场去了。

他常把结婚比拟为骑马。如果你想练习骑马，应当选择一匹野马，要是

你想驾御一匹驯良的马以策安全，那就根本不需练习了。

很少人明了希腊哲学中逍遥学派的兴起系由于苏格拉底太太的功劳。倘苏格拉底沉醉在一个疼爱他的妻子温柔怀抱里，恩爱缠绵，他决不会游荡街头，拉住路人问一些令人困窘的问题了。

林肯太太好吹毛求疵

另一个伟人林肯，大概也是由于他那个唠叨而又容易激动的妻子促使他做了美国总统。林肯经常坐在酒吧里跟别人开玩笑。据替他作传记的人说：每当周末的夜晚来临，大家都想回家，独有林肯是最不愿意回家的人。他宁愿在酒吧和人厮混，藉以增强他的机智。因而使他获得那种纯朴自然的幽默感，并成为精通英语的人。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报童送报纸给林太太，因为迟到了一刻，林太太就痛骂他一顿。吓得那报童抱头鼠窜而逃，奔向他的老板哭诉去了。那是一个小市镇，人人都彼此互相认识。日后报馆经理遇到林肯便说起这件事，而林肯回答地说：“请你告诉那小伙计不要介意。他每天只看见她一分钟，而我却已忍受十二年从苏格拉底与林肯这两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表现在他们幽默中的一种精神慰藉，任何一个能容忍他的妻子一桶水淋头的人便必能成为伟人。

老庄是我国大幽默家

在中国，有好多大哲学家都是富有幽默的机智。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便常向孔子开玩笑讲，因为孔子的主张要人经常修养不断地求进步。老子则主张反朴归真。在老子看来，像孔子那样忙着到处乱跑，满口仁义道德的人，不免显得有点滑稽可笑。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因此，他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说：“圣人不死，大盗大止。”

老子对孔子的批评虽很尖刻，但他的语调还是很婉转柔和，是从他的胡须里面发出来的。跟亚里斯多德同一时代，且为老子杰出门徒的庄子，他那种粗壮豪放的笑声，却使历代均深受其影响。

庄子看到当时政治混乱的局面，曾经说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庄子有一则关于寡妇的故事。使我联想起皮特罗尼斯（西历纪元一世纪罗马讽刺家）所著那本“艾菲萨斯的寡妇”。

一天，庄子从山林中散步归来，神情显得非常悲伤。他的门徒问道：“先生为何显得这么悲伤呢？”于是他便说：“我在散步的路旁，看到一个服丧的妇人跪在墓地上，手里拿着一把扇子用力扇一座新坟，而坟上的泥土还没有干呢。我就问她：‘你为何要这样作呢？’那寡妇回答说：‘我曾应允我亲爱的丈夫，我要等到他的坟土干了以后才会改嫁。现在你看，这可恶的天气！’”

我很快慰，我们有老子和庄子那样的圣人，如果没有他们，则中华民族早已成为一个神经衰弱的民族了。

孔子对挫折付之一笑

现在来谈谈孔子。孔子曾经被人描绘成一个道貌岸然、规行矩步的学究。其实他根本不是那种人。他能笑他自己所以失败和挫折的遭遇。孔子表面上虽像是个失败的人，他离乡背井，出国远行，周游列国十四年，想找寻一位乐意将他的主张付诸实施的统治者。他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他的门徒跟随着他，却一路上老是受到妒嫉他的小政客痛恨。有好几次他被敌人在路上加以拦截，甚至有一次被围困在郊外一家小客栈中，绝粮七日。当他的门徒开始发生怨声时，孔子却在雨下唱起歌来。孔子来郑国，有一天他和门徒走散了，孔子独自个站在城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黎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叠叠若丧家之狗。”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你们看他泰然自若的态度多有趣。

新儒家特别缺乏幽默

我想在结束这篇演说时再说明一点，每当人的精神颓废而退化，伪善而夸大的陈腔滥调，甚至残酷，便会再度抬起头来。孔子的容忍、幽默，和富于人情味的热情便被忘却了，于是一些新儒家便把他的教训纳入一套严厉的道德法典中，诸如女人缠足、寡妇守节，一个女子在其未婚夫于婚前夭折，即不得改嫁他人等等，竟成为一种崇尚的妇德，非常受到新儒家的鼓励和钦佩。在这些学者论道德的文章中，就找不出一丝人情味和幽默感。而在一些匿名作家或者不敢将其姓名签署于文学作品的作家所写的小说中，我们才再度找到幽默和一种比较能真实反映人生，符合一般人思想、知觉与情绪的东西。

选自《无所不谈合集》

威廉·菲尔普斯

1865—1943

美国教育家，评论家。1891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并在该校执教40余年，为普及现代文学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讲授的“现代戏剧课程”深受学生的欢迎，他的讲课方法和风度深深地吸引着学生，因而被誉为耶鲁大学“最有感召力的教授”。著有《我的写作生涯》等。

本篇是菲尔普斯1933年4月6日应一家广播公司的邀请所作的演说，短小精悍，语颇隽永。他犹如走进了自己的课堂，侃侃而谈，从读书的习惯谈起，讲述了藏书的目的、方法和益处，其间穿插着做人的道理和他本人的一些切身体会，使人恍如面对一位慈祥而循循善诱的老教授，在不知不觉中获益非浅。

论藏书

1933年4月6日

读书的习惯是人类学得知识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我们在阅读属于自己的书时所得到的乐趣，远远大于阅读借来的书时所得的乐趣。一本借来的书就像是家里的一位客人，必须小心翼翼地，以惟恐引起别人不高兴的一种拘谨态度来对待。你务必使它完好无损；使它在你家里时不遭破坏。你不能漫不经心地随手乱放，你不能在书里做记号，你不能折书页，你不能随便使用它。而且，有一天你得将它归还原主，尽管你很少做到这一点。

但是你自己的书是属于你的；你可以毫无拘束地用一种深情的亲昵态度来对待它们。书是为了用，不是为了炫耀；你所拥有的书不应该使你害怕做上记号，或害怕摊开来和翻过来放在桌上。在书内你所喜欢的段落标上记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样可以使你更容易地记住那些重要的话，很快地找到它们，若干年后再读到时，那就像重访一个你曾在树皮上刻过印痕的森林。你会有一种踏上了熟悉的土地的乐趣，回忆起思想上接触过的景色和你本人曾有过的自我。

每一个人都应该在青年时期就开始搜集和收藏书籍；人占有私有财产的这种基本的本能，在这里得以有百利而无一弊地加以培养。人们应该有自己的书柜，书柜应该没有门、玻璃窗或锁；它们应该是开放的、方便的，眼一见到即可伸手取得。最好的墙壁饰物是书，它们的颜色和外观丰富多彩，胜过任何墙纸，它们的图样设计也更有吸引力。它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集中了许多各不相同的名人，当你独自坐在室内炉火旁时，你会觉得身边围聚着不少知心朋友。你知道一眼就能看到他们，这是令人既激动，又振奋的。你不必读遍全部藏书。我的室内生活多半是在一间存放着6000册书的房间里度过的；对于陌生人提出的一个千篇一律的问题，我有一个常备的答案。“这些书你全都读过了吗？”“有些书读过两遍。”这个回答既真实，又出乎他们的意料。

我们最好的朋友当然是活生生的，能喘气的，有血有肉的男男女女；我对读书的挚爱从未使我成为遁世的隐士。这是怎么做到的？书籍是人所拥有的，由人使用的，为人服务的。文学是历史的永存部分；它是人的品格中最好的、最持久的部分。书籍朋友较之有生命的朋友有着这样的长处：任何时

候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接触到世界上最真实的气质高贵的人们。已故的伟人是无法亲身接触的，而活着的伟人通常几乎也是同样地无法接近的，至于我们个人的朋友和熟人，我们也不能经常看见他们，他们或许已经就寝，或许已经出门旅行去了。可是，在你的私人图书馆内，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同苏格拉底，或莎士比亚，或卡莱尔，或大小仲马，或狄更斯，或萧伯纳，或巴里，或高尔斯华绥交谈。而且毫无疑问，在这些书里，你可以看到这些人正处于他们的最佳状态。他们是为你而写作的。他们“展示了他们自己”，他们尽力以最好的东西使你高兴，给你一个好印象。就像观众对演员是必要的一样，你对这些作家是必要的；只不过你不是看见他们戴着面具，而是一直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最深处。

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何百华 译 井力 校

欧文·扬 1874—1962

美国国际金融专家。生于纽约州赫卡姆。1896年从波士顿大学毕业，留校任教。1913年被邀为通用电气公司总顾问；1922—1939、1942—1944年任公司董事长，期间兼任联邦储备银行行长。

欧文·扬十分热心于教育事业，对当时教育脱离实际的状况颇为不满，曾大力支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本篇是他在阿肯色州亨德里克学院发表的讲话节录。“三句不离本行”，他从灯泡钨丝的制作过程说起，论述了文化的“综合性”，以及做学问要融会贯通、要与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全文主题鲜明，比喻得当，有独到的见解。

论文化 1934年11月20日

我所说的文化不是指学究所概括和集中的那种东西，尽管他时常拥有可以形成文化的原料。我使用这个词的意义是，文化代表一种综合，即把一些事物放在一起，十分彻底地放在一起，致使合成物具有自己的特性。它可能只是一种混合物，若是一种化学化合物就更好了。文化不是以粉末形式存在的，不是若干无凝聚力的粒子的简单结合。

白炽电灯的关键部分是灯泡里的钨丝。发明这种灯的伟大创造力，在于发现了把金属性质的钨改变为丝的方法。人们熟知这种金属能长时间承受白炽所需要的高温而不会分解，但人们也知道钨是金属中最难对付的。每一个粒子都是与其邻居互不联系的粗野的个人主义者。它似乎根本没有社会交往意识。第一批钨灯含有那种“压出来的”细丝。把这种金属放入细槽，施以高压，使之成丝。人们发现如果运用足够的压力，这些粒子就会聚拢而成为丝，于是人们能把这种脆弱的丝放进灯泡。这些灯被放进软垫运往目的地，最后非常小心地插进插座。它们发的光很好，但我们这些年纪较大的人都记得，那时如果孩子们在餐室里围着桌子玩捉人游戏，会使所有的灯都熄掉。某一天，一些勇敢的、大胆的人作出了决定：这种顽固的金属应被征服。结果它被征服了。人们用高温和异常巧妙的方法改变了钨，使它能被拉成丝，而且这种丝比同样粗细的钢丝更牢固。

你们必须用白热把你们知识中的几个粒子熔化成为一种具有这种韧性和强度的元素：只有你们消失了，它才会消失。

让我说得具体一点。除非你能把希腊语言和文学中全部的美，引进你今天的思想和表达方式，否则研究希腊语有什么用处？除非你能通过拉丁语对使罗马变得既辉煌又可耻的那些大规模活动的盛衰，获得更好的理解和更全面的感受，否则研究拉丁语又有什么用处？除非通过法语给予你的更广的视野、更多样的接触，能更好地理解你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并欣赏作为良好习俗的基础的文雅风度，否则研究法语的用处何在？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如果学习历史而不将它同经济联系起来，这样的学习有什么用？如果研究经济学或政治学而不把它们同形成它们的方向的自然科学知识联系起来，这样的学习有什么用？你们只要看看校园以外的情况，就会看到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问题都来自世界上的研究工作者所制造的各种机器。

我的观点是，你们在与世隔绝的狭小空间内研究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各种语言和科学，是不够的。这些学科被当作一些单独的粒子而集中起来，仍然只是粉末，你们拿这样的东西连同文凭一起走到外面去，是不够的。必须把它们熔合起来成为一体。

译自《世界伟大演说》
何百华 译 井力 校

毛泽东 1893—1976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以及全人类进步事业的推动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诗人、历史学家和演说家。他的演讲有其独特的风格：逻辑思维缜密严谨、语言表达流畅幽默，有很强的鼓动性、号召力。

本篇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内容涉及极严肃的整风问题。但他没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相反显得很轻松自如、谈笑风生。演讲的巨大魅力不仅表现在内容的充实，还表现在形式的生动活泼。报告伊始，他一针见血地点穿了党八股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内在联系，戏拟地称党八股为我们的新创作，引起全场的大笑，气氛为之活跃。继而，他话锋一转，分析党八股的历史渊源，列数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条条罪状不是泛泛而论，而用一个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问题：“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毛泽东将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信手拈来，涉笔成趣，使演讲充满活力，使这篇声讨党内华而不实工作作风的檄文寓郁愤于戏谑，令人叫绝！

反对党八股 1942年2月8日

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

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那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6月22日，苏联进行那么

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7月3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么？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么，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问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

写成了“工”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𠄎”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那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么？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么？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么？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奇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用宣传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

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二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 ABCD，小 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 and 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上面所说的那些，一方面是由于幼稚而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责任心不足而来的。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个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这是专为影响人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

殃民。这两条意义自明，无须多说。这就是说，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到很坏的地步。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上面这八条，就是我们申讨党八股的檄文。

……

节选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

闻一多
1899—1946

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和爱国民主人士。代表作有诗集《红烛》、《死水》。他的诗表现了对祖国深挚的爱，对黑暗现实的恨。他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的学术研究也有较高成就。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发表了著名演说《最后一次演讲》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本篇是他在昆明诗人节上发表的演说。演说中所提及的两位诗人，均是30年代兴起的一批不满现状、追求进步、寻求出路、心怀苦闷的自由诗派的代表。艾青受法国象征诗影响颇深，而田间却追随苏联马雅可夫斯基诗风。闻一多以情与趣相结合的幽默感揶揄了两位青年诗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并以解嘲的口吻推崇了田间。闻一多对他的评价相当高，曾称他是“时代的鼓手”。

闻一多的即兴演讲，虽然仅几分钟，但却完全驾驭着听众的注意力，讲得风趣生动、挥洒自如。

艾青和田间
1945年6月22日

（在这讲演之前，两位联大的同学朗诵了艾青的《向太阳》和田间的《自由向我们来了，给战斗者》，听众都很激动，接下来，闻先生说：）

一切的价值都在比较上，看出来。

（他念了一首赵令仪的诗，说：）

这诗里是什么山茶花啦，胸脯啦，这一套讽刺战斗，粉刷战斗的东西，这首描写战争的诗，是歪曲战争，是反战，是把战争的情诸变转，缩小。这正是常任侠先生所说的鸳鸯蝴蝶派。〔笑。〕

几乎每个在座的人都是鸳鸯蝴蝶派。〔笑。〕我当年选新诗，选上了这一首，我也是鸳鸯蝴蝶派。〔大笑。〕

艾青当然比这好。他表现人民及战争，用我们知识分子最心爱的，崇拜的东西与装饰，去理想化。如《向太阳》这首诗里面，他用浪漫的幻想，给现实镀上金，对赤裸裸的现实，他还爱得不够。我们以为好的东西里面，往往也有坏的东西。

如在太阳底下死，是 *Settimental* 的，是感伤的，我们以为是诗的东西都是那个味儿。〔笑。〕

我们的毛病在于眼泪啦，死啦。用心是好的，要把现实装扮出来，引诱我们认识它，爱它，却也因此把自己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这一些，田间就少了，因此我们也就不大能欣赏。

胡风评田间是第一个抛弃了知识分子灵魂的战争诗人，民众诗人。他没有那一套泪和死。但我们，这一套还留得很多，比艾青更多。我们能欣赏艾青，不能欣赏田间，因为我们跑不了那么快。今天需要艾青是为了教育我们进到田间，明天的诗人。但田间的知识分子气，胡风说抛弃了，我看也没有完全抛弃。如“自由向我们来了，”为什么我们不向自由去呢？艾青说“太阳滚向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滚向太阳呢？〔笑，鼓掌。〕

艾青的北方写乞丐，田间的一首诗写新型的女人，因为田间已是新世界中的一个诗人。我们不能怪我们不欣赏田间：因为我们生在旧社会中。我们只看到乞丐，新型的女人我们没有看到过。

有人漫骂田间，只是他们无知。

关于艾青田间的话很多，时间短，讲到这儿为止。

选自《联合晚报》

黄炎培
1878—1965

中国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曾任国民参政员；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民主运动竭尽全力，发起创建民主建国会。长期从事职业教育事业，为改革我国旧教育体制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经常深入学校，宣传自己的教育思想。这篇演讲是为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毕业生作的，智言哲语，深受大家好评。

为了告诫即将走向社会的同学永远毋忘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没有大发宏论，而是娓娓谈来。他从对社会的看法谈起，戏谑地把社会不平归咎于知识、财力、地位甚至年龄的差别，它们都会导致与群众的脱节。他巧妙地以物理学概念“浮力”作比喻，表达这种脱节状况，十分贴切、形象。他还通过北京大学校长蔡子民的例子进一步表达主旨。蔡校长大度包容各派学术思想，对某些偏激看法一笑置之的态度正体现着强烈的幽默感。文中巧妙地引用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说法，肯定了群众中的是非观念，并将“是非”这一词语作类叠使用，不仅语感幽默，而且大大提高了表达效果。听众在听完演讲后发现“是是非非”在这里不是“说长道短”意思时，不由得发出会心的微笑。

坚定地是和是非非的群众站在一起
1948年3月21日

邹秉文先生适才所讲林肯和巴斯德两人成名的故事，不错，天下事绝对不是侥幸所能获致成功的。我以为我人首先对社会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其次提出一种合理的做法。先说我个人对社会的看法。

人类初生，并没有什么分别的，后来逐渐造成了不平。讲知识吧，有高低之分；讲财力吧，有穷富之分；讲地位吧，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种特殊的人来，所有权力也就随着集中在他们身上；再如年龄，老一些的，就可倚老卖老，占人便宜。造成种种不干的畸形现象，依我说来，这些都是不应该的。

天生我人，既然都是平等的，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畸形不平的现象呢？就为人类有一种向上的心理在作祟，求地位的向上，发展成为特殊的权力；求财富的向上，演成贫富悬殊；求教育机会的向上，便形成少数的特出人才，丢下大多数老百姓，做了一世的文盲。

人心向上，本来也无可厚非。可是利用了较高的知识，用巧妙的手段，一面掠夺财富，一面攫取高位，到权势造成的时候，早和群众完全脱离了，只觉得我有权可以支配你们一切的一切，你们所有的钱、所有的生命，都是我留给你们的，生杀予取的大权，都在我手里。

抗战以来，我在后方奔走，看到很多大洋房。这些大洋房是谁的呢？中国西部打了二十几年的内战，产生了很多大军人。这些大洋房，就是代表他们的财富。他们的财富，从哪里来的？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从每个士兵身上扣一点粮饷，积少成多；第二种就是吃空额，将士兵的数目，以少报多。大军人做了大富豪，就可以做政治大首领，就可以做大实业家、大金融家。

这种风气，慢慢地扩展到文官群中，就造成了不少贪官污吏，连带到素以清高自命的教育界，也不免有多少沾染。我为参政员，负责揭发贪污，时

常有人来向我告发。某次，一群学生来告发校长吃他们的公费额，几位教师也来报告他们校长将教师人数以少报多。我就在参政会上据实提出，明知这位校长有特殊势力，我并且认识他的，没有办法，当众说明。我爱朋友，我更爱国家，可是到底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这一类事情多得很。

一般人只要权力在手，就会与群众脱节。什么道理呢？中间有一件东西在作祟，物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浮力”，社会也有一种无形的浮力，好像在从中作祟的样子。做工厂经理的，浮了起来，便和工人脱节；做商店老板的，浮了起来，便和店员脱节；就讲学校，诸位看到一种学店么，学店的老板，早浮了起来，和一般学生脱节了，不但脱节，且成为敌对了。诸位同学：你们以后跑进社会里，千万要注意打破这种浮力，不要把一般地位、富力、知识不如你们的人，都变做你们的敌人。

我们学校对这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学校当局与学生打成一片，想用同甘共苦的精神，来克服一切问题。即如经济，也是这样。

做到一个机关的首长，要不和群众脱节，首须认识清楚群众的意思，大体上倒是不会错的。但有时情感冲动，可能做出过火的事情。做首长的要胸襟广阔，气量宏大，能接受群众的意思；站在群众中间的，也要了解当局的立场。各位同学毕业之后，请记住这几句话。

我有一位老师蔡子民先生，民国初年任教育部长，后来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的气量非常宏大，因此，影响整个国运的五四运动，才能在北大经过了萌芽滋长，终于产生出来。

在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发行一种“新青年”刊物，一般舆论，都认为要不得。当时还有一种文学改造运动，也在北大酝酿出来，那就是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可是想不到在北大里还有两位主张旧文学的老古董存在，一个是译小说的林琴南，一个是中西文都好而挂辮子的辜鸿铭。诸位试想，一方面是陈、胡，一方面是林、辜，都在蔡先生大度包容的领导之下。陈、胡一派的人，质问他为何还用这些老古董；林、辜一派质问他怎么还要这种无父无君、玩弄“他的你吗”的人。我们这位蔡先生，倒一笑置之。我深深了解他有两点理由：有话大家说，一切看群众的倾向怎样，才是民主，这是教育的原则，也就是政治的原则；还有一种理由，当时无法明白表示的，因为那时的北大，尚在北方军阀统治之下，如去掉林、辜，尽用一班新人物，固可取快于一时，但学校成问题了。他这样兼容并包，使人觉得他还没有走到极端，北大才得在这样艰苦危难的情形下支撑过来。蔡先生去世快到十年了，他老先生对于教育、文化、学术思想上贡献了多少，终会使人们明了的。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太深了，群众总是倾向新文学的，蔡子民先生一生贡献的伟大，到底为群众所了解的。

在学校里，诸位同学是群众，我们要和你们站在一条线上同甘共苦，互尊互谅，绝对不为“浮力”掀动。怎样才能站在一条线上，互尊互谅呢？孟子说得好，“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就是良心，既然人人皆有，那么我以为是，你也应该以为是，只要诉之良心就行了。最要不得的，是明知做不得，为了某种好处，有的受不住威胁，有的挡不了利诱，终于做出来了，事实上却违背了自己良心。这种人虽躲在群众中间，不久也会给群众打倒的。因为群众是有是非之心，是则是，非则非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切切实实地服从良心命令，它认为对的，一定要做；认为不对的，一定不做。

总之浮力是可怕的。我们要不被它掀动，坚定地是和是非非的群众站在

一起。

选自《黄炎培教育文选》

老舍 1899—1966

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语言通俗、幽默且纯朴、有力，被誉为“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早年曾在英国从事创作活动，狄更斯式的幽默风格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回国后，努力将东西方民族的幽默传统融会贯通，创造了温和的以“含泪的笑”为特征的东方式幽默。

老舍的这篇开幕词不乏幽默风格。全文主要是谈文联在北京成立的五个迫切需要。其特点一方面表现在层次分明、环环紧扣，说清了问题；另一方面语言轻松明快，使大家一听就明白，不易忘掉，听的时候发笑，日后想想还会发笑。他把“泻药”“补药”比作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容，把“药引子”比作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普通的语言一经老舍的联想转换，便成富于幽默的独创。寥寥数语描述清了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及作用。在谈到北京对全国的影响作用时，处处可见老舍怀着幽默情趣运笔：“专拿文学与艺术来说……只要作得好，他们便会不翼而飞，比什么东西都飞得更远。”从中，老舍常用的狄更斯漫画式的夸张呼之欲出。他还把不同的时期的北京分别比作罗马和莫斯科，体现出幽默的机敏、思想的深刻。

北京文联成立大会开幕词 1950年5月

我代表主席团，首先来欢迎诸位代表、诸位来宾，并感谢首长们到会指导。其次，我请诸位原谅筹备委员会一切筹备得不周到的地方，筹备委员会由产生到今天，才一共不过有两个星期；时间短促，工作就难免因紧张而有所疏忽。在用钱上，筹备委员会是力求节约的；那么，在招待与布置上就难免简陋。不过，我相信，诸位先生一定会由体谅而原谅的。

北京文联的成立，由各方面看，都是必要的。从北京市人民政府看，因为政府是人民的，就理当有个群众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团体，好帮助政府与党，在文艺上为人民服务。从全国文联来看，全国文联若没有各地的文联作基础，便不易推动工作。从北京的特殊情形来看，文联的成立也有它迫切的需要：

一、北京有200万人民。这是个相当大的数目字。比起欧洲那几个小国家来，这个城，在人口上，比一两个国还大。专从人口数字上看，我们就知道；除非把北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总动员起来，是无法把大量的精神食粮奉献给这么多的人民的。

这200万人民都被解放不久。可是，我们已经看见了国家的新主人翁，工人同志们，在各种生产上所表现的良好成绩，而且也看见了他们在业余所产生的文艺作品。这真使我们兴奋，并感觉到一个新时代的确已来到这古老的都城了。在另一方面，北京虽是个大都市，可是离城不远，便是农村与田地。我们不单看见郊区农民的翻身，并且看见不少教授学生和知识分子去参加土改，写出他们的感想、由农民间得来的知识与智慧。这又是史无前例的事。可是，正因为我们对工农大众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才应当热诚的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去描画他们的高尚品质，鼓励他们前进，并在文化上帮助他

们学习。

同时，这 200 万人民之中，可也有不少是久住在皇帝脚底下的，所以他们需要一些泻药，去洗刷干净肠胃中的封建的余毒积滞。同时，他们也需要一点补药，去补心健脑，使他们壮实起来。好作人民政府的健全公民。这种灵药，只有文学艺术工作者会泡治，泡治得既不猛泻，也不乱补，而且是以娱乐、说服、感动、美丽，作药引子的。

二、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首都的许多设施是自然而然的对全国有带头作用的。专拿文学与艺术来说，作品即使是就本地风光而创作出的，只要作得好，他们便会不翼而飞，比什么东西都飞得更快更远。因此，北京文联不仅是照顾着北京的 200 万兄弟姐妹，它也必能间接地给全国以好的影响，而且，我们的确有发生这带头作用的条件，看吧。

三、北京的戏曲在百年来，便已自成一派，受到各处的欢迎。北京戏曲界的名家，也是全国的，甚至是国际的名角儿。今天，全国各地普遍地开展戏曲改进运动；那么，以北京过去的在这一方面的贡献与成就，再加上现有的人才与他们的努力，我确信北京的戏曲改进的成绩要比别处作得更出色，因而发生带头作用。

四、不单戏曲如是，在新文学与新艺术的各部门也都如是，因为北京是人才荟萃的地方。这些人才，而且，是多少保有五四运动的传统的，是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的。这传统，虽然遭受了日本侵略者与国内反动派的暴力破坏，可是暴力并没有使文学家们、艺术家们完全屈服。今天我们有了新的政府，与贤明的领袖，五四运动的精神得以复活而且加上了更新的革命理论与人民的鼓励，于是当年曾被比作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的北京，今天要成为中国的莫斯科了。这一希冀，大概是在每一个在北京的文艺工作者的心中都想起过的。那么，就教咱们团结起来，齐心努力地实现这理想，与莫斯科的文学家艺术家们看齐吧。

不过，这里还有个很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新文艺怎样与民间文艺相结合？如何把新血液灌输到旧形式里去？如何采取民间文艺遗产的精华，去使新文艺成为结实的土生土长的东西，不再像先前那样“狗长犄角，充羊（洋）！”这是个极难解决的问题，正需要新旧的人才团结到一处，经常地交换意见与合作，才会不偏不倚，共同找出创作民族文艺的道路来。

五、我们也不缺乏年轻的干部，北京是一座学校之城啊。文联的活动，必能与文艺教授教员们取得密切的联系；这一联系也就必加强学生们对社会上文艺活动的了解与参加，这不久就会练出一支精强文艺人马，而后分散在各省各地，高悬起文艺工作的旗帜。就专凭这一点，北京文联也有成立的必要。

我想，我在这上面所说的，并没有什么夸大的地方。我面前坐着的，正是我所提到的北京戏曲界、文艺界的名人和工人与学生们的代表。他们会证明我没有夸大，因为他们都愿意顺应着今日的需要，组织起北京市文联；否则他们就根本不会到这里来。

不过，说着容易，做起来难。这就看我们能不能真正好好的团结，努力搞好我们的工作了。更要看我们是否能虚心地向别人学习，以补自己之所短；热诚地拿出自己所擅长的，教给别人；好作到“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似的团结。困难是有的，但团结必会克服困难。

最后，我们感谢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主持人，借给我们会场，并给我们一

切便利。北京市文联能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成立大会，真是“出门见喜”。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方向的指示，不是说文艺须给工农兵大众服务么？

选自《老舍文集》

亚历山大·法捷耶夫

1901—1956

前苏联作家。曾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苏共中央委员。因创作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而著称。

法捷耶夫当时是苏联作协的领导，擅长于演讲，且有一定影响，在这篇创作座谈会上

的演说中，他恰如其分地批评了文学创作中的种种缺点及电影艺术部、艺术事业委员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这类批评性演讲能赢得台下不时发出掌声、笑声，足见演讲者的水平不凡。当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文艺创作缺少个性化描写时，风趣地说：“作品中最倒霉的要数我们这些经营领导，”因为他们满嘴讲的都是套话；当他毫不掩饰地批评小说中爱情描写“基本上是可有可无”时，戏谑地嘲讽道：“作者在生活中从来没有恋爱过。”

他的演讲给人一种很善意的感觉。他一方面毫不含糊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尽可能运用含蓄、幽默的表达方式，使听众的感情在特定的情境中跌宕起伏、毫无拘束感，最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全部观点。

为文学高厦的思想性、艺术性而战！

1952年

人民热爱我们的苏维埃文学。但人民对我们、对苏联作家们的要求很高，常常不满意，有时简直对我们苏联作家的许多创作很不满。他们的不满在于，许多东西我们根本就没写出来。有一个古老的成语说：“说着容易做时难。”苏联人民推翻了这个成语。他们做起事情来迅雷不及掩耳，而说故事看来落在了后面。例如，文学的毛病是它滞后于各类艺术的发展。在人民教育事业中艺术显得十分重要。电影少是因为好的电影本子少；当代题材的戏剧少是因为好的剧本缺；看不到苏联歌剧、芭蕾，也是因为没有什么合适的脚本。

现在艺术散文的情况好一些。由此可见，我国作家敢于从事国际生活题材的创作……我们也出版了一些描写我们工人、工程师生活、描写苏联工业的书，但人人皆知，这一题材的文学创作很长时间不景气。最近几年问世的作品我能列举的少得可怜：只有戈尔巴托夫的《顿巴斯》、拉普捷夫的《道路已打通》、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等。这些作者特别关注他笔下生活中的各方面知识。这都是些有益的书。

然而，这些长篇小说的主要缺点是什么呢？这些书都充斥着专业技术内容、专业技术术语，在许多地方，技术问题把活生生的人物性格描写也排挤掉了。作品中最倒霉的要数我们的经营领导。〔笑声。〕除了个别例外，我们党的领导满嘴讲的都是尽人皆知的套话，他们毫无个性活力可言。篇篇小说都堆砌着许多人物，爱情在我们的小说里基本上是可有可无。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作者自己在生活中从来没有恋爱过。〔笑声。〕那些常常需要以严肃态度表述的真实困难，在书中却又看不见。这些困难必须要由苏联人民去克服。

我们长篇小说的主要缺点是丧失了硕大无朋的真正的双翼，它能使人们屏息静气地飞翔，正如果戈理所说的那样，“将看得见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我想说，我们作家现在必须要有宽阔无比的视野，不要在乎有时最多只能局部地反映出把我国建设成共产主义国家的国家观点。

电影艺术部，以致于艺术事业委员会都应该是影幕和舞台的主人，但是，这些部门的领导不清楚自己在对电影剧本作者、剧作家进行思想、艺术教育时的职能。他们对这项工作的态度是官僚主义的、本位主义的。

当契诃夫和高尔基以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紧密合作时，既没有作家协会，也没什么艺术委员会，可事业发展得也不坏。〔掌声、笑声。〕在戏剧剧本和电影剧本创作中，需要的是更多的简洁；需要剧院和作家、电影导演和电影编剧之间更多的协作。以上列举的机构应该是他们的助手和领导，这样办事就顺当了。

然而，这却不能减轻作家协会在戏剧剧本、电影剧本方面创作薄弱的莫大罪名。我们的整个出版界也同样如此。作家协会错过了及时打击“无冲突论”的机会。这一理论错在否定能真实反映我国发展进程中矛盾冲突的可能性。它妨碍了我们去揭露我们事业中内部敌人的真面目，它还妨碍了我们和存在于人们意识形态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思想作斗争。

苏联作家所具有的创作自由是世界上任何人所没有的。在批评我国文学缺点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它在人类艺术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共产党光明的大旗呵护着苏联文学家以及全体苏联人的劳动。我们，作家们将永远忠于这面大旗，并将孜孜不倦地为我们党的伟大任务而劳动不息。

译自《法捷耶夫全集》
杨伟民 译 红帆 校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

1905—1984

前苏联作家。曾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曾住苏联作家协会理事。1965年因写作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他在第三届全苏青年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这篇发言，话语精练、含蓄。他引用高尔基的话，比喻文学创作从收集素材到伏案写作的过程就像剥树皮到编树皮鞋的过程一样，令人忍俊不禁。他鼓励青年的创作应尽早成熟，不要当老姑娘，嫁不出；告诫他们不能“穿着小娃娃的开档裤时却已经进入了老龄期，”寓意深刻。

值得一提的是，肖洛霍夫尽管不同意阿扎耶夫报告中的某些观点，但他仍然善意友好地引用他报告中的有用词句，从而体现了一种幽默。

剥树皮和编树皮鞋

1956年

在作协领导部门工作的一些朋友们有时真叫我尴尬。照他们的意思，我必须发言。他们说：“你去给青年作家讲些有真情实感的话吧！”

“那么，谈点什么呢？”

“不妨谈谈作家的劳动并不那么轻松，再谈谈这一劳动往往是很艰巨的，作家的职业任重道远，这是一项神圣的事业。”

结果怎么样呢？

我们从年轻作家中挑选出360位最有天赋最有才能的代表，难道还有必要让我来给这些能人谈基本常识吗？我只会与大家平起平坐地作个发言。

若要谈文学，其中包括谈这届的代表会议，我在某些地方无法同意阿扎耶夫同志的报告。

例如，他在正面评价某部作品时，认为没有必要去指责在蜜桶里非得舀上一勺煤焦油的评价方法。这就好比一次能详细分析各类作品优缺点、作者写作风格以及形成作品内涵等等的研讨会，而他却还不承认这是研讨活动一样。难道在这样崇高的讲台上值得来谈论这方面的细枝末节吗？

我感到，在他的报告中，当引用高尔基所说的：“学会剥树皮是一回事儿，而学会编树皮鞋又是另一回事儿”时，他找到了有用的词句。

我不准备占用你们太久的时间。如果谈树皮，那似乎就该在某个非常熟悉的地方，专心致志、好好地剥才是，而不是时间很短，偶尔进行一两次。我们现在不管年老、年少都蜂拥而至未开垦的荒地去寻觅题材、情节，我们发现结果是事与愿违，常常会废然而返。人是在那儿住了一两个月，然而即便呆上半年，树皮也剥下来了，可树皮鞋还是编不出来。

你们大多数都来自各个地区，这很好，和生活贴得很近。

我想祝愿你们在文学创作上不会当老姑娘，老嫁不出去的女郎是有的。但愿你们的创作尽早成熟；但愿你们的成熟会使我们、作家们欣喜，也会使读者、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的真正读者兴高采烈。他们数量庞大，要求很高。

阿扎耶夫（1915—1968），俄罗斯作家。代表作为《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与此同时，我还有一个祝愿：在文学创作上你们千万不可在穿着小娃娃开裆裤时却已经进入了老龄期。很遗憾，我们这儿常有此事。

在我简单的发言结束前，我希望你们不仅在已来临的一年里，而且在整个一生中更加敢作敢为，取得创作上的巨大成就。

译自《肖洛霍夫全集》
杨伟民 译 红帆 校

周恩来 1898—1976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建国以来一直担负着繁重的日常国家事务的运筹安排工作。任劳任怨、坚持真理的务实作风赢得了中国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他在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期间，曾发表的大量演说中，不少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在万隆亚非会议上所作的这篇演讲，倡导了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是其中之一。

该演讲既庄重严肃又风趣幽默，尤其是他说“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派人到中国去看……”的那一段，冷峻里蕴温情，辛辣中透宽容，充分表露了中国人民的光明磊落和帝国主义分子的阴险卑鄙。精彩的演讲终于促使大会接受了我国政府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与会者都被周恩来的演讲技巧所折服。

我们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1955年4月

主席，各位代表：

我的主要发言现在印发给大家了。在听到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一些发言之后，我愿补充说几句话。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

现在，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第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前一类国家并不多，就是某些人所不喜欢的，就是6万万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政治制度，而不再为帝国主义所统治了的国家。后一类国家很多，像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亚非许多国家都是。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亚非国家，中国也在内，不论在经济上或文化上都很落后。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次之，我要谈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

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拥有 700 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因为从挑起那种纷争中得到利益的并不是我们中间的人。

第三，我要谈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超过 100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也经历了近 30 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下所受的苦难是数也数不尽的，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 1000 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了别人。中国境内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共 4000 多万人，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区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去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建立进行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比如在缅甸边境就存在着蒋介石集团的残余武装分子，对中缅两国进行破坏。因为中缅友好，我们一直尊重缅甸的主权，信任缅甸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16 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节选自《周恩来选集》

田汉
1898—1968

中国现代戏剧家。毕生献给了革命艺术事业。30年代曾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解放后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一生创作话剧、电影、戏曲剧本百余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

本篇是田汉在世界文化名人多尔哥尾诞辰 250 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他列举了纪念这位意大利喜剧大师的伟大意义，不仅使我们了解了哥尔多尼，对这位大师产生了崇敬之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所阐明的思想为今天幽默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颇具价值的理论依据。田汉介绍了哥尔多尼“不排斥善意与同情”的喜剧观；指出了喜剧性质的多样性，都能启迪人们对“幽默”的深刻理解。田汉热情歌颂了改革家哥尔多尼的成功在于斗争、勤奋，最后大声疾呼：“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喜剧、需要笑。”需要中国的哥尔多尼！

由于是为纪念喜剧大师作演讲，田汉十分注意遣词造句的轻松明快、幽默诙谐，再加上所举实例本身具有趣味性，故通篇演讲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喜剧式效果。

我们要健康的、战斗的笑！我们要哥尔多尼！
1957年2月25日

尊敬的女士、先生们：

我国清朝康熙四十六年，公历 1707 年的 2 月 25 日，在当时欧洲动乱中已近衰落的繁华城市威尼斯产生了一位伟大的戏剧作家——卡尔罗·哥尔多尼。这位戏剧作家是意大利现实主义戏剧的奠基者；是把意大利的假面喜剧提到写实喜剧高度的伟大戏剧改革者；是通过戏剧反封建、反侵略，为祖国统一、自由呼号的爱国者；也是乐观地对待人生、对待社会改革，坚信一个和平民主的新社会将要到来的文化战士。

哥尔多尼被称为“意大利的莫里哀”、“意大利的喜剧之父”，不只是他的名字至今还活在我们心里，他的几个代表作品 200 多年来，除了在莫索里尼统治时期以外，在他的祖国一直上演着，也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极受欢迎的节目。在苏联，有许多卓越的艺术家和演出他的作品；在新中国，像《女店主》、《一仆二主》等剧甚至最近还引起了我们人民健康爽朗的笑声。这位戏剧家的杰出的作品和戏剧活动对人类进步文化做了很大贡献。今年全世界和平人民都开会纪念他的生日。新中国首都——北京和其他七个大城市的文化界也将隆重地举行这个纪念会。请允许我以中国 1957 年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伟大戏剧家卡尔罗·哥尔多尼诞生 250 周年纪念大会正式开幕！

女士们，先生们！

在全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日益强大，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更加努力建设自己美好生活和艺术文化的今天，我们来纪念这位戏剧大师是有很大意义的。

第一，我们要继承粗宗的优秀文化传统，但继承不等于消极保存，而

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革新改进。越是适当的革新改进，越能发扬光大我们的传统。哥尔多尼对意大利传统的“假面喜剧”的形式和职业演员们的有才华的表演是欢喜的，但对于假面的死笨的袭用限制了演员的面部表情；没有固定的文学剧本，只靠幕表提纲在台上随意抓眼；人物角色和扮相都按照定型，而不按照具体性格发展，都是不满意的。但他知道演员表演程式和人民欣赏习惯的改变是不太容易的，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并且在不知不觉之间进行，因此他先从让个别重要角色有准词和不戴假面入手，并且亲自对这些演员如何表情念白提意见，这样当然把戴假面具和没有准词的都比下去了，因而就慢慢全部接受改革了。哥尔多尼正是这样一位聪明的有办法的戏剧改革家。

他又是一位极负责任的改革家。你既然要求演员有准词，必然要求每次演出都有完整的剧本。但积习相沿只用幕表，剧本被认为是卑微的文格，很少人去写它，一时又哪来那么多剧本呢？幸而这位精力过人的戏剧家，不只是提倡改革，还能用实力来支持改革；他和剧团约定，一年写8个剧本，有时候多到16个剧本，他一生足足写了150多个剧本，这是多么辛勤的创作劳动！我们的剧作家曾在—首十四行诗里这样写道：

命运给我安排了一条卑微的道路，
我只有靠劳动赐给我成功。

这是完全真实的，哥尔多尼的成功正是他的天才和辛勤劳动的结合。哥尔多尼没有当成功大夫、律师和外交官，而干上了打戏本儿的“卑微”的职业，并且用他的全部精力终身尽瘁这个事业，这时意大利戏剧界说来是一桩天大的美事，对人类艺术文化也是一桩美事。

但是哥尔多尼的道路不是顺利的。他主张改革，就有人主张保守，就有人不分好坏死死抱住假面喜剧的传统一动也不许动。那就是卡尔罗·高齐，他甚至在剧本里把哥尔多尼编进去骂街，而他这种骂街的戏居然还在反动派的支持下轰动一时。哥尔多尼跟他们作了斗争，但终于被他们逼得离开故国，远走巴黎。虽说他的改革主张最后终于胜利了，但可以知道戏剧改革也是一场激烈的先进与落后的斗争，而斗争是艰巨的。

第二，这位意大利喜剧的父亲，对喜剧的性质有正确的见解，他认为喜剧虽是在笑骂里进行讽刺，但并不“排斥善意与同情”。他说：喜剧是“教人学好的学校”，它“暴露人类的弱点，只为改正这些弱点”。他的暴露是从善意出发的，而不是不分皂白地仇恨人类。他的暴露是有分析的：他暴露当时外国侵略者的横行霸道；暴露封建贵族的醉生梦死、荒淫无耻；暴露资产者的庸俗贪婪、自私自利。而另一面他却对被压迫者寄以极大的同情，对意大利人民的热情、勇敢、爽朗、机智和其他美德尽情地歌颂，他以坚定的信心鼓舞人民从“胡闹的迷障”救出他们的祖国，争取意大利的独立、统一和民主。

人们都承认这位“意大利的莫里哀”，虽然受过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的绝大影响，但莫里哀只是以资产阶级立场反对封建主义，而哥尔多尼却能进一步同情和尊重劳动人民。就像《一仆二主》里的特鲁法尔金诺，和《女店主》里茶房法勃里修斯吧，他们就常常是丑恶的揭发者，斗争的胜利者，它的积极的社会意义可能还超过我们的《葛麻》一类的人物。毛泽东同志曾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

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在十八世纪意大利的情况下，哥尔多尼的进步当然是有局限的，但在使劳动人民初步成为舞台的统治者这一点就足够说明他的伟大。

第三，哥尔多尼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生动的现实的戏剧作品，一面固然由于他对戏剧事业的积极性，一面也由于他有那么丰富的生活经验，他跟人民群众的生活斗争有那么多的联系。他从就业中，从流浪生活和巡回演出中接触过社会各阶层的形形色色的人们，认识他们的面貌，感到他们的脉搏和呼吸。他从参加戏剧工作起就没有离开过剧团，一直跟演员们生活在一道，他懂得戏，也懂得演员，他掌握演员们的特点，他随时吸取演员们的智慧。他替萨基等名演员们写剧本，也把他们在演出中的即兴创造有选择地固定在《一仆二主》等剧本中。哥尔多尼也最尊重群众的意见，听取群众的反映来修改他的作品。中国有一位剧作家写一个演员因为在旧社会得给老爷阔人们消遣，就否定了自己的艺术，不唱戏了。这是很愚蠢的，他不知道一个有艺术良心和表演才华的演员任何时候也有真正支持他的观众，我们就是有义务为他们服务。哥尔多尼曾在自传中描写当时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者们怎样高踞在戏院的包厢里打牌、谈笑、不认真看他的戏，而他们也正是哥尔多尼的讽刺对象，正是由于哥尔多尼的火辣辣的讽刺，他们给哥尔多尼加上了“国家光荣的诽谤者”的罪名。但我们伟大的喜剧大师却是威尼斯那些池座观众以及看不起戏的穷苦人民最好的朋友。他常常把他写得最好的戏留给这些穷苦观众看。他曾谈到他的《可敬的姑娘》一剧上演的情况。说：“这出喜剧有些场面，我照自然的样子，把威尼斯船夫描画出来，熟悉我故乡的语言和风俗的人们觉得非常有趣……”

池座不满的时候，威尼斯的船夫可以上场看戏，不过他们看不到我的喜剧，只好在街头或船上等候他们的主人散戏出来。他们说起我来，用上一些可笑的怪话，我也听到过。所以我在剧场角落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地方看戏，台上演的又是他们自己，他们看得很开心。我和他们成了朋友。

这些朋友看戏常常采取直率的方式进行批评。他们看得高兴起来就大声叫好，不满意就打嘘。他们才是真正热爱和支持他的，他们称他作“爸爸哥尔多尼”。哥尔多尼感谢他们的支持，采纳他们的意见，也通过他的喜剧作品成为他们最忠实最热情的服务者。他跟这些穷朋友是那样的有感情，以致当1762年8月的某晚，他被迫出国，演出他的新作《狂欢节的最后一晚》跟他故乡观众告别的时候，池座里的老观众们对台上的作者喊出这些热情的话：“爸爸哥尔多尼一路平安”，“再见”，“一定要回来”，当时的哥尔多尼真是激动得“老泪纵横”，他多么想很快地回来，用他的新作报答这些老观众的关怀啊！但他没有能如愿，他到法国大革命为止，在巴黎侨居了30多年，最后是“穷愁潦倒”，埋骨异国。当然，人民始终是热爱他们的朋友的。法国的革命人民曾在国民大会上热烈地通过了每年给他两千法郎年金的决定。他的故乡的人民，更以他为民族夸耀，在他死后用他的名字建造了一个大剧场，而今天全世界和平人民正普遍举行着他的诞生纪念，当时那些反对他的人们呢，却老早被人民忘记了。反人民的剧作家先生们想一想吧，究竟是锐意改革为人民效忠的好呢？还是阻挠改革，脱离人民，背叛人民的好呢？

最后，我们纪念哥尔多尼，并演出哥尔多尼的戏《女店主》，还在于哥尔多尼是那样一位好的喜剧作家。今天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不分日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喜剧，需要笑。中国人民在以前也遭受过意大利人民同样的境遇，受过外国侵略者、国内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我们愤怒的时候多，笑的时候少。现在我们应该大大地笑了。但在剧场里我们的笑声还是太少，能引起我们健康的阔达的笑声的剧本还是太少。我们多么需要中国的哥尔多尼啊！再则我们也需要从笑声里，从深刻而准确的讽刺里，揭发我们内外矛盾和工作中的缺点，而讽刺的爱憎分明正是哥尔多尼喜剧的特点。我们多么需要哥尔多尼和认真地向他学习啊！

选自《田汉论创作》

夏尔·戴高乐

1890—1970

法国总统（1959—1969）。1911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此后戎马倥偬，驰骋疆场，历时30余年。1940年法国沦陷，在伦敦继续领导“自由法国”运动，抗击德寇。1943年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次年任法国临时政府首脑，为打垮法西斯、光复法兰西建立了功勋。1958年当选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任内积极维护法国独立自主，并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戴高乐执政后，为了鼓舞民心，图谋大业，曾广泛巡视法国各个行政区。本篇是他在法国西南部图卢兹大学发表的讲话，语调庄重而得体，造句考究而诙谐，意在与听众（高级知识分子）取得沟通，并激励后者投入他所说的“复兴的高潮”。他用了许多形象而深刻的比喻，例如他自称来到了知识海洋的“边缘”，现代人身上有“魔鬼在作祟”，“天使和魔鬼永远在进行斗争”等等。最后，他“预先”向未来的“非凡人物”表示致敬和祝贺，不但表现了一种领袖风范，而且表现了法国人的风趣。

天使和魔鬼永远在进行斗争

1959年2月14日

首先我应该对你们简单地说一说今天我在图卢兹所见到的情况给予我的印象。当我们看到，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和专心从事这种研究工作的人员，实用科学研究工作和进行这些研究工作的人员，高等教育工作和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都正在密切配合，总之，当我们看到这些工作产生的一切实际成果是相互配合的时候，我们看出来有一种和谐的现象。

我在一生最后的年代，在图卢兹大学感觉到我是处于一个大洋的边缘，这个大洋可以把你们这些研究人员、你们这些教授、你们这些大学生带到发明的海岸，为的是通过这海岸进入进步的未知领域。在这里，到处表现出我们人类的总的发展进程。人类同世界进行搏斗，首先就是同自己进行搏斗。人类想超脱自己，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愿望仍然是无止境的，但是人的天性却不再受到限制。现代的人都怀着热情和敬佩的心情注视着某些人的发现，某些实验室的成就和现代技术的实验。但在同时，现代人身上还有魔鬼在作祟，在支配着他，因为国家间的对立、思想意识的斗争、统治的野心或者是独立的精神，使得那些目的在于改善生活的新手段，部一变成战争武器，天使和魔鬼永远在进行斗争。

因此，在进行科学和技术教育的同时，必须以纯粹的思想，以表现这种思想的哲学，以赞扬这种思想的文学，以说明这种思想的艺术，以及出自良心和理性的道德，来鼓舞和指导这个促进进化的巨大努力。

在图卢兹大学理学院，在各学院师生中间，我用不着指出为什么精神的觉醒和发展——这是通过对于美的认识、对于善的景仰获得的——应该同我们现代的科学教育联系起来。

法国，在研究的领域内有长期的传统和深厚的能力，它现在正处于复兴的高潮。它必须进行选择，或者是衰落，或者就要对现代的事物表现出热忱，我认为法国是满怀希望和满意的心情来欢迎这种转变的。

然而，无论如何，一切都可能突然取决于某一个头脑中涌现出来的、没有料到而且不可能料到的灵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法国将来就不会像过去那样产生一些这样的非凡人物。很可能在你们中间，就有人注定要完成一件卓越的发明。我预先向他致敬，并对他光荣的未来表示祝贺。同样，我通过图卢兹大学对法国的教育和研究人员，对教师和大学生们致以敬礼。我向他们致敬是因为：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正是应该为之服务的对象，简言之，也就是为人类服务。

是的，最好的事情莫过于减轻人类的沉重负担。最崇高、最伟大的事情莫过于为人类提供希望。

节选自《戴高乐言论集》

巴金 1904—

中国著名现代作家。他的成名作为“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其中尤以《家》蜚声中外。它曾对青年的反封建桎梏、反旧的传统势力、追求新生活的斗争产生过巨大影响。巴金是位热爱中国、热爱共产党的多产作家，写过不少散文、特写、小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脱离了文艺界。四人帮粉碎后，他出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第一个站出来反思自己在文革中所讲的违心话，写出了发人深省的《真话集》。他“从我做起”的批判精神震撼了文坛。

这是巴金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他把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作了入骨三分的刻画、剖析，对造成我们文学艺术百花园不能“花红似海、百鸟朝凤”的原因、现象作了痛快淋漓的鞭挞、讽刺。它显示了巴老对生活独到的幽默见解。

他痛心疾首地指出，人们由于这些框框棍棍而顾虑重重，连讲真话的勇气全都丧失殆尽，文学艺术的发展从何谈起？在演讲艺术中运用比喻的手法司空见惯，没什么稀奇，但巴金通篇以“框框棍棍”作喻体，将所有的感慨、情绪、思想统统表达出来，并不多见，很有特色。演讲结束，他巧转话锋，含蓄精练地告诉大家对付“框框棍棍”的办法，妙不可言。本篇演说深刺世弊、启人深思，算得上是嘲讽型幽默演说的佳作。

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1962年5月

请允许我讲出我的缺点和秘密：我害怕“言多必失”，招来麻烦。自己的白头发越来越多，记忆力也逐渐衰退，我不能不着急。我总想好好地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多写作品。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日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像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有一个时期非常轻视文学作品的作用，公开说，“托尔斯泰没得用”；另一个时期又把文学作品抬得很高，要作家对读者们的一切行为负责，好像一本小说就会使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彻底改变。这是不公平的。要一个作家负担过多的责任，使人感到不写文章反而两肩轻松，不发表作品叫别人抓不到辫子，倒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这决不是好办法。我有位朋友去年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短文，不久刊物就收到好些读者的来信，不用说，是迎头一顿棒打，有人甚至说作者别有用心。事实上这位文教战线上

的老英雄不过在文章里批评了一个女售货员，还附带批评了他的一个学生。他没有在文章里重复人们常说的话，因此引起了这一场风波。固然读者有权对任何一篇文章发表不同的意见，但是谁也不能乱打棍子，伤害别人。幸好这几年来编辑同志的胆子大多了，他们接到那些气势汹汹的来信，并不太紧张，也不要作者低头认错。我们不要以为拿框框、捏棍子的人代表了舆论，其实占大多数的不写信的读者并不会同意他们。他们人数虽少，可是到处乱打棍子，整得有些人提心吊胆，不敢有雄心壮志。

谁又不怕挨整呢？谁又愿意因为一篇文章招来一顿痛击呢？许多人（我也在内）只好小心翼翼，不论说话作文，宁愿多说别人说过若干遍的话，而且尽可能说得全面，即使谈一个小问题，也要加上大段的头尾，要面面俱到，叫人抓不到辫子，不管文章有没有作用，只求平平安安地过关。前不久我们好些人谈起现在的文风，都觉得现在的文风跟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和当前的国内形势都不相称。“双巨”方针已经发表好几年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怎么还有那许多框框？为什么我们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还不见花红似海、百鸟朝凤？为什么在我们的报刊上许多人喜欢重复用着同样的词汇和字句？全国人民思想的一致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事情，但词汇的相同就不值得夸耀了。要是许多人都用“众所周知”的同样词汇写文章，那才是人力物力的浪费。我们的社会生活是极其丰富，我们人民的心灵是非常优美，我们的语言文字也决不贫乏，我们作家的头脑也并不简单，我们的队伍中间也不见得有多少懒汉，为什么大家都习惯于使用那些“众所周知”的同样词汇，不肯多动脑筋想出别人未用过的适当的字句，创造不同的形象，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感受来解释、来阐明同一个真理、同一个思想，同一个原则，来描绘、来反映、来歌颂同一个伟大的时代呢？显然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障碍。障碍不止一种，我刚才讲过那些不知从哪里来的框框和棍子和那些但求无过怕挨整的顾虑就是最大的障碍。

我一再提到顾虑，并非在这里信口开河。在公开的集会上虽然很少听见讲起个人的顾虑，但是我和一些作家私下谈起来，我们都认为这种顾虑的存在正阻碍着创作的繁荣。我们私下也会批评某一位作者胆子小，顾虑多。其实我们中间谁又能说自己胆大呢？今天再没有人说《洞箫横吹》是一部坏电影，《布谷鸟又叫了》是一个坏的剧本了。可是当棍棒齐下的时候，有哪几位作家站出来讲几句冷静的话，发表一点合乎实际的意见？我们现在有的是“事后诸葛亮”。然而我们国家需要的却是坚持真理、热爱祖国的文艺战士，即是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来爱护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文艺工作者。今天我更加深切地感觉到坚持真理、热爱祖国的勇气是非常可贵的，热爱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身的勇气也是极其可贵的。做一个新中国的作家就需要这样的勇气，有了这样的勇气才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如何，我们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

选自《巴金文集》

马尔科姆·艾克斯

1925—1961

美国黑人运动领袖。生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贫苦黑人家庭，原名马尔科姆·利特尔。自幼对白人种族主义者不满，曾在波士顿和纽约街头流浪“滋事”，多次被捕入狱。服刑期间改为现名，以示抗议（“艾克斯”即英文字母“X”，表示自己的姓氏无从查考）。1964年在纽约创立非洲裔美国人统一组织，同年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开罗第二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递交揭露美国种族主义暴行的备忘录。他与另一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观点不同，主张黑人有权而且应当进行武装自卫，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争取自由。

马尔科姆·艾克斯是一位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和鼓动家，本篇选自他在访问加纳大学时发表的讲话，从中可以一瞥他的风采。他一开始就抓住了听众，说自己虽然来自美国，却不是美国人，而是美国的牺牲品，美国梦对黑人来说不是“好梦”，而是“恶梦”。接着，他由衷赞扬了非洲，因为他觉得“到家了”，“离家已有400年了”，因为他的非洲故乡正在前进，正在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改变形象”。最后，他把矛头直指虚伪的美国当局，称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国家”，而黑人要获得自由，就必须进行斗争，包括进行武装斗争。通篇爱憎分明，语言简练流畅，富于很强的战斗性和感染力。

我是美国的牺牲品

1964年5月13日

我想把这次谈话作为一次“非正式的”谈话，因为我们黑人在美国的地位也是“非正式的”。〔笑声。〕在全世界，处境最艰难的人莫过于2200万美国黑人。我们的处境非常可悲，因为我们的国家号称民主国家，声称要让每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人享有公正、自由和平等。如果我们生于南非、安哥拉，或其他不自称为自由而奋斗的国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我们生于一个号称是自由世界的领袖的国家，而我们却不得不为喝一杯咖啡而摇尾乞怜，因此我们的处境确实非常可悲。

也许，我首先需要指出，我并不是一名政客。我对政治一窍不通。我虽然来自美国，却不是美国人。我去美国的时候并非出于自愿。〔掌声。〕假如我是美国人，那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就不需要立法，不需要民权等等。所以，我只是想面对实际，并作为美国的一个牺牲品，崇美主义的一个牺牲品，民主制的一个牺牲品，一种非常虚伪的制度的牺牲品，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美国的制度目前正在全球流行，它自称有资格教训别人怎样管理国家，却不能清除自身的污点。〔掌声。〕

如果换一个人前来对你们讲话，他也许会作为美国人讲话，他会用美国人的眼光审视美国。这类人在提到美国时，通常会采用“美国梦”的说法。然而，对2200万非洲裔美国人来说，这不是一场美国好梦，而是一场美国恶梦。〔笑声。〕

在加纳，或非洲任何地方，我觉得自己不是一名观光客。我觉得我到家了。我离家已有400年〔笑声〕，但那不是我的选择，不是我的意愿。我们

的人不是乘坐玛丽皇后号，不是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包机，不是乘坐五月花号到美洲去的，我们是带着锁链，乘坐贩奴船去的。我们不是作为移民去的，而是作为货物，为满足唯利是图的制度的需求而去的。因此，这就是我讲话的范畴，或者讲话的水平。也许我不能使用你们许多人所使用的语言，但我认为你们会理解我的话。上星期五晚上，当我在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讲话时，那里的学生送给我一个讨人喜欢的新雅号〔笑声〕，如果我发音不准，那是因为400年来我没有机会说当地方言。〔笑声。〕那个字的意思是“归来的孩子”。我感到很荣幸，我被称为一个很有心意的、回归故土的即回归祖国的孩子。不是被美国国务院派回来的〔笑声〕，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回来的。〔喝彩。〕这是一片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最富饶的大陆。奇怪的是，我在这里发现，许多美国白人都对着我们的非洲同胞笑容可掬，就好像他们历来热爱非洲同胞。〔笑声、喝彩声。〕事实是，同样是这些白人，在美国却用唾沫啐我们，用棍棒打我们，放狗咬我们，仅仅因为我们想要成为自由人；他们用水龙对准我们的妇女和儿童，仅仅因为我们想同他们融合起来；而现在，他们在非洲却冲着你满脸笑容，想要同你们融合起来。〔笑声。〕

昨天我不得不写信回家转告我的几位朋友，假如美国黑人想实行种族融合，就应该到非洲来，因为这里似乎有更多的白人——美国白人——赞成融合，比全美国的白人都多。〔笑声。〕当然，他们实际上是想同这里的财富融合起来，这里未经开采的自然资源超过了地球上任何一个洲。

加纳是非洲大陆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她有最先进的领导人和最先进的总统。〔掌声。〕加纳总统做了任何美国人、任何美国白人所不愿做的事——嗯，我还是应该说“任何美国人”，因为那里的所有美国人都是白人。

恩克鲁玛总统正在做美国政府不愿意见到的事，那就是恢复非洲的形象。他正在使非洲人为非洲的形象而感到骄傲；每当非洲人为自己的形象而感到骄傲，每当这种积极形象传到国外，迄今对非洲只抱消极看法的美国黑人，就会把自己对非洲兄弟的消极态度自动地变为积极态度，同时也会把对自己的消极看法变为积极看法。

为改变非洲人的形象，加纳正在作出非常重要的努力。在任何地方、任何非洲人群体中，加纳人的个性都首屈一指，因为人们看不到加纳人有任何低三下四之处。你们的总统教导你们说，你们能做天下人所能做的任何事；你们只要有这样一位总统，你们就拥有了一位伟人。〔掌声。〕

我们这些在美国生活的人学会了怎样衡量一个黑人的好坏：我们用美国对他的态度作为衡量的依据。当我们发现一名黑人总是受到美国人的称赞，我们就会对他产生怀疑。当我们发现一个黑人能获得美国颁发的各种荣誉、奖章或受到吹捧，我们就会立即对他产生怀疑。因为我们的经验是美国人队不表扬真正为黑人谋利益的人，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你开始做一些有利于非洲人民的事情，就会触犯另一些人的利益，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些人从非洲大陆的劳动力和财富中得到了好处。所以，我们衡量各种领导人的标准是找出美国人对他们的看法。如果这里的领导人受到美国人的称赞，你们可以马上打开抽水马桶，把他们冲入下水道。〔笑声。〕

你们的总统不招人喜欢。别以为仅仅美国报刊不喜欢他，而是美国政府不喜欢他。在美国，当你发现一家报刊全力以赴而且喋喋不休他说某位非洲领导人的坏话时，通常那家报刊实际上反映了官方意见。但美国政府是个非

常精昭的政府。它如果知道官方立场将引起它想继续剥削的人民的消极反应，就会假装通过一家自由报刊来攻击一位真正的非领导人，与此同时它却站在一旁，声称这不是政府的政策。然而，美国发生的一切都是政府的政策。

〔笑声。〕

不仅你们这个国家的总统不讨人喜欢，而且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也不讨人喜欢，因为他赞成革命，主张所有人一律平等。埃及总统纳赛尔同样不招人喜欢，因为他赞成让每一个人获得自由。他们都被称为独裁者，他们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之后，就会立即被称为独裁者。他们使本国人民团结起来之后，就会立即被称为独裁者。如果哪个国家没有分歧，没有纷争，没有倾轧，如果哪个国家的领袖是非洲人，他就成了一个独裁者；如果是在美国，他就是受到人民拥戴的美国总统。〔笑声、掌声。〕

也许，在非洲大陆，最开明的领导人当推恩克鲁玛总统。因为他曾在美国生活过，他深知那儿的情况。他在美国生活了很久，因而不可能对之抱有幻想，或者被欺骗。凡是当你认为美国是自由之邦，当你置身于美国，脱去民族服装，并被误为美国黑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并未置身于自由之邦。〔掌声。〕美国是一个殖民主义国家，它在1964年是一个殖民主义国家，就像法国、英国、葡萄牙等欧洲国家在1864年都是殖民主义国家一样。它是20世纪的殖民主义国家，现代殖民主义国家，它使2200万非洲裔美国人殖民化了。除了意味着20世纪的殖民主义以外，所谓二等公民还能有什么含义？他们不想让你知道奴隶制依然存在，因此，他们不愿称之为奴隶制，而称之为二等公民。

你要么是公民，要么就根本不是公民。如果是，你就是自由人；如果不是，你就是奴隶。美国政府怕承认从未给予黑人自由，甚至不承认黑人不自由、不是公民和没有权利。它巧妙地用二等公民之类的漂亮话来乔装掩饰。

〔笑声。〕

我们的一位兄弟今天刚从纽约飞抵此地。他告诉我说，当他离开纽约时，警察正在6个人一排地在哈莱姆巡逻。为什么？因为哈莱姆就要爆发了。你们知道我说的“哈莱姆”是什么意思吗？哈莱姆是地球上最著名的城区，非洲大陆任何一个城市都比不上哈莱姆有那么多非洲人。哈莱姆人称之为小非洲，你若在哈莱姆穿行，就仿佛置身于伊巴丹，那儿的每一个人都长得像你一样。今天，警察带着警棍出动了。但哈莱姆没有警犬，因为哈莱姆人不准警犬出没。〔笑声。〕

哈莱姆有几个团伙正在到处杀人，杀白人，警方正在为此烦神。他们对外宣传说这是一些反对白人的团伙。不！这不是反对白人的团伙，而是反压迫团伙，反对灰心丧气的团伙。他们不知道除此以外还能做什么。他们一直在等待政府解决问题；他们一直在等待总统解决问题；他们一直在等待国会两院和最高法院解决问题；他们一直在等待黑人领袖解决问题；然而，他们听到的却都是花言巧语。因此，他们灰心丧气，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此，他们做了他们所知道的唯一事情：他们做了美国人在1776年对英国丧失希望时做的同样的事情——不自由，毋宁死！

美国人当时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并没有甘受英国的凌辱。是的，他们之中有一位受人尊敬的帕特里克·亨利高呼：“不自由，毋宁死！”我从未听

到官方说他鼓吹暴力；〔笑声。〕相反，他们称他是开国元勋之一，因为他很有头脑他说了一句，“不自由，毋宁死！”

目前，在那些能意识到自己没有自由的美国黑人中，有一种与日俱增的趋势——他们正准备告诉白人统治集团，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无论要付出多大代价，不自由，毋宁死！如果美国是自由之邦，那就给我们一些自由；如果它是公正之邦，那就给我们一些公正；如果它是平等之邦，那就给我们一些平等。这就是 2200 万美国黑人——非洲裔美国人——日益强烈的情绪。〔掌声。〕

节译自《马尔科姆·艾克斯对青年人的讲话》
王建华 译 井力校

陈毅 1901—1972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一生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期间，曾作过多次极富个性色彩的演讲，在全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篇演讲是陈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一部分。在这次招待会上，他阐述了我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回击了当时恶意中伤我国，不怀好意的西方国家记者的提问。幽默机智的谈吐体现了陈毅潇洒的外交家风度。

第一句便斩钉截铁地表达了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扑面而来，而后，他又用一连串揶揄的口吻提到，我们作好了一切准备，而这种准备是美帝国主义帮助我们实现的。悖反的思维令人喷饭。紧接着的一句“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令听者拍手叫好。他如此痛快地奚落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既表达了一种蔑视情绪，又富有调侃味道，不失为大气凛然、风趣诙谐的演说精品。

我的头发都等白了 1965年9月29日

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由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来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作出这样罪恶的决定。究竟是美帝国主义灭亡，还是全世界人民灭亡？肯定是美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国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要反对美帝国主义，不下最后决心而始终处于动动摇摇的状态，这只会失败，不可能胜利。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同朝中人民进行过较量，现在正同英雄的越南人民进行较量。美国承认这种较量对它很不利。对我们来说，对全世界人民来说，这种较量大有好处，它把全越南人民团结起来了，把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了，把全世界反帝反殖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它欺负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高棉人、老挝人、印度尼西亚人、刚果人、多米尼加人。连它的盟友法国也受它的欺侮。受它欺侮的人起来反对它，变为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造成的。

如果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打败它。那时，战争就没有界线了。界线是美国打破的，不是中国打破的。我们愿意

遵守界线，而美国却恣意打破界线，横冲直撞。打败了美帝之后，在全世界真正结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时代就会到来。世界真正变为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大家庭的美好前景，一定要到来。为这个伟大目的，中国准备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中国决不采取现代修正主义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

现在的问题是，或者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把殖民主义的枷锁重新加在各国人民的身上，使各国人民遭受奴役，遭受宰割；或者按照敢于斗争、敢于反帝的人民的意志，坚决进行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结束殖民主义制度，使全世界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这两条道路，人们只能选择一条。现代修正主义者苟且偷安的办法，是绝对行不通的。中国愿意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作出自己的贡献。

选自《新华社电讯稿》

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

1916—

斯里兰卡女政治家。其丈夫 1959 年被刺身亡后，曾两度出任总理。她对我国抱有深厚感情。这是她在访华时赠送一头幼象仪式上的讲话。

言语不多、充满童话色彩是本篇的主要特色。我们从米杜拉的种种内蕴含义：“赞赏”、“谢意”、“聪明”、“不忘事”……中完全能联想到斯里兰卡儿童的天真无邪、一片深情。通篇尽管只提儿童，但我们自然而然会由儿童再联想到两国人民。演讲者造成的与听者心灵犀通、精神默契的效果正是幽默所引起的。

在赠送幼象仪式上的讲话

1972 年 6 月 27 日

我们从斯里兰卡远道带来了一只小象，斯里兰卡的儿童要我代表他们把这只小象赠送给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儿童。我们给这只小象取名叫“米杜拉”，在僧伽罗文里就是“朋友”的意思。按照斯里兰卡和中国的传统，一般都把象看作是吉祥的征兆。因此，选择“米杜拉”作为善意和友谊的使者是很理想的。我国有句俗话说，象从不忘事。因此，斯里兰卡儿童把象选作礼物是有特殊意义的，它象征着儿童们的赞赏和谢意。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象是人的忠实的朋友和忠心耿耿的仆人。在斯里兰卡，许多家庭都把象当作宠爱的动物来饲养，我本人就曾愉快地饲养过一只六个月的小象。除此之外，象还是一种高尚和十分聪明的动物。如果训练得当，将能使游览你们动物园的儿童们得到无穷的乐趣。你们将会看到，“米杜拉”披着一件绚丽多彩的象服，这件服饰和我国的象在宗教游行仪式上所披带的差不多。你们看到“米杜拉”身上的象服是斯里兰卡一位最著名的腊染艺术家制作的，服饰上是我国艺术的一个传统图案。斯里兰卡的儿童将从你们伟大国家正在帮助斯里兰卡进行的一些发展项目中获益，因此他们把“米杜拉”作为象征性的礼物送给你们，以表示他们的赞赏和谢意，“米杜拉”将成为我们两国儿童之间友谊的一个活的象征。

我深信，“米杜拉”在它的第二故乡中国将健壮成长。随着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儿童们的成长，随着斯里兰卡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的增长，“米杜拉”将长得日益高大和强壮。

最后，请允许我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使我有机会在这个盛大的集会上赠送这只小象。

选自《外国领导人访华讲话》

东山魁夷

1908—

日本画家，原名东山新吉。1926年进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于1934年赴柏林大学哲学系美术史科学习。1929年起作品多次在日本帝国美术学院、日本美术院展览会展出。1968年被授予日本文化勋章以及每日艺术大奖。代表作有壁画《日月四季图》、《黎明潮》、《山云涛声》等。他还写有一系列优美的散文。

本篇是其当年在日本奈良县樱井市夏季大学所作演讲《大和之美》的最后一节，讲述他之所以成为毕生探索日本美的画家，多亏中学时代一位老师别具一格的教育帮助。他试图以此说明，如同人的精神形成于幼年一样，“我们民族的精神早在古代就已经形成了”，意即日本的古典艺术体现了日本文化的精神实质。本篇在轻松随意的叙述中，用幽默的口吻生动地再现了外表冷峻、个性鲜明而又不乏幽默的植栗先生，温馨可读，情趣盎然。

我和古典

1975年8月27日

当年我就读的神户中学，是一所相当斯巴达式的学校，军事教练非常盛行，学生始终身穿土黄色制服，还打着裹腿。学校热衷于让学生为考取高等学校而学习。

记得上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位年轻的老师，是教授国语的。他就是植栗先生。我想，他大概刚从大学毕业就马上来到这所学校吧。可是上第一堂或第二堂课的时候，他抽冷子就朗读起志贺直哉的《荒绢》来。

先生所朗读的，是与我们学生手头的国语课本毫不相干的小说，大家不禁愕然，只顾听他朗读，他就是这样一位老师。

考国语的时候，教材是《玉胜间》，老师说，可以带任何字典到考场。可以带参考书，也可以带“虎之卷”。

于是，大家把沉甸甸的字典带到考场来了。我心想：这位老师出的试题，决不是查查字典就能找出答案的吧。结果试题是《试述 玉胜间 所表现的本居宣长的人生观》。记得这件事弄得同学们不知所措。由于这个缘故，据说这位老师到这所中学来很是失望。因为当时盛行军事教练，同学不太热心听讲对投考高等学校毫无用处的课。

一次回答

不知怎的，这位老师终于发现我似乎有点艺术天才，就悄悄注意起我来。一天，他问我：“你想当画家吗？”我回答说：“不，不当。”老师说：“为什么？”我说：“我家是小船具商，母亲非常辛苦，与其当什么画家，不如当个普通人，过普通的生活。然而，我自小喜爱画画，心中总是想着将来当个画家。”

日本古时的国名（属今奈良县）。

《玉胜间》，是日本江户中期国学家本居宣长（1730—1801）的随笔集。

“虎之卷”，即讲义等参考书。

可是，当时我们的生活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那时代说要当个画家，父母甚至会气昏的。无论怎么说，人们认为画家是市民生活的叛逆者，画家几乎是穷画匠的通称。

所以，我对先生说：“我不当画家。尽管我自己不怕受穷，可母亲会很悲观的。”植栗先生只是“嗯”地哼了一声，从此就不提这个问题了。这位老师在这学期结束后就离开了学校，再也没有劝说过我一句：“当画家吧。”

因母亲而畏缩了

一天，将油印的国文文法讲义分发到大家的面前，只见空白处印了些奇怪的话。好像有人恶作剧写上去的。乍看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是什么意思。头句是：“有个孩子要立志画画”，接着是：“因母亲而畏缩了”，最后是：“神户的孩子前途无忧无虑吗？我的心头不由地掠过一道阴影”。因为是印刷品，当然分发给大家，大家也都读了。他是位与众不同的老师，好歹是位第一次讲课就突然朗读起志贺直哉的《荒绢》来的老师，所以大家以为他大概要在这里留言，也就不介意了。

然而，这件事多少还是触动了我。老师正面什么都没有说，最终也不曾提及，但他投在我心灵上的这颗石子所掀起的波澜却越来越大。尽管他没有直接说什么，然而他用这种形式所显示出来的诱导——老师所说的“走画家的道路吧”这种启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激励着我。可以说这在我最后下决心当画家的问题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折口信夫先生的扇

此后不久，即在老师离开学校之前，他对我说：“这是珍贵的东西，送给你吧。”说着就给了我一把扇子。扇面上写着折口信夫先生的一首诗，这是折口先生送给老师的扇子啊。后来我回想起来，对先生来说，这把扇子是非常珍贵的，可先生却若无其事地送给了我。在当时的环境下，我并不觉得先生是那样地珍惜这把扇子，就这样接受下来了。记得扇面上的诗这样写道：

森林静幽幽
漫步晨雾中
藤花花盛时
染上了薄雾

当然，这首诗，只要看看折口先生的诗集就会明白了，但是，我今天没有去查找，也许记得不准确。它是遥远的过去的记忆。我十分珍惜地将这扇子保存起来，尔后历经长期战乱和种种遭遇，不知什么时候竟丢失了。

最近，从大和榛原的一位友人的来信中获悉，这位先生后来当了榛原高中校长，其后又当了樱井女子学校校长，最后谢世了。先生教我的时间不长，却要在中学生的我身上灌输对日本古典文化的兴趣，以及对《万叶集》及其他古代日本精神文化的关心。这些东西，日后在我的心中复苏了。在神户送走中学时代的我，同西方文化的接触比较频繁，所以对日本古典文学没有太大的兴趣。只是，这时候高中入学考试有古典文学，也就学了一些，仅此而已。

我的道路和日本古典

可能是受植栗先生的感化，或是受日本古典的吸引，我开始想将《万叶集》等书全部阅读。那时候，《万叶集》集成一册，书虽厚却比较小，可以

揣在衣兜里。记得我在美术学校走读时，每天从简易公寓到学校的电车上都阅读它，不觉间将它全部读完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既有积极摄取外国文化的热情，又开始对日本古典文化产生了执着的追求和爱好，我想大概是这些因素决定我后来走上艺术的道路吧。作为我自己来说，这不是有意识的。我觉得作为日本人，也许本来不就是这样性格吗！这种心情是，一方面不满足于只封闭在本国文化里，以狭隘的观点来考虑问题；另一方面也不愿意整个沉溺在西方文化里，似乎这就是日本文化的特质吧。

倘使探寻日本美术的源流究竟在哪里，一般人大都会说从日本向外寻找，但我觉得日本的美术有一种世界所没有的东西。

今天我的讲话的确很简单，就谈这么一点，我的结论是：只要我们心中有大和，日本文化就不会泯灭。

节选自《美的情愫》

沈从文 1903—1988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生于湘西农村，小学学历，完全靠自己的奋斗成为著名作家。解放后，一度退出文坛，转而致力于文物研究工作，一变而为颇有成就的学者。他的一生遭遇坎坷，充满传奇色彩，国内外对他没能从事文学创作有着不少猜测。

在美国圣若望大学演讲时，沈从文非常平静、淡泊地回答了听众的这方面问题，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崇高风范。

他用回忆叙事的方法，夹杂着谐趣、哲理性的议论告诉听众，他从事写作、从事文物研究都和社会经历、社会运动分不开。他把从文学转向古代文物研究的原因推辞为“社会变动太大”。人们对他始终站在祖国立场上，淡化个人的宽阔胸襟，肃然起敬。他言隐意明的说法正体现了幽默的本质，许多引人深思的问题留给听众自己去品味。他在谈文物研究工作时，调侃的语气逗人捧腹，例如：他以《二十五史》为例，说明“文献是固定的、死的，而地下出土的东西却是活的、第一手的和多样化的”。类似的妙析还有几处，讲得既通俗又幽默。总之，沈从文演讲善于营造出一种温和、淡远的情境，给人以幽默的联想。

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 1980年11月24日

我是1903年生的，1922年到了北京。这之前，我当了五年小兵，当时所见的对我以后的写作有密切的关系。这段时间，正是近代中国史上所说最混乱、腐败的军阀时代，从地方上很小的军阀以至北京最大的军阀的起来和倒台，我都有比较清楚的印象。

刚到北京，我连标点符号都还不知道。我当时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运动提出来的文学革命的理想。我深信这种文学理想对国家的贡献。一方面或多或少是受到19世纪俄国小说的影响。到了北京，我就住到一个很小的会馆，主要是不必花钱。同时在军队中养成一种好习惯，就是，没有饭吃全不在乎。这可不容易，因为任何的理想到时候都要受损伤的。但是我在军队久了，学得从来不因为这个丧气。这也就是后来往到了北京大学附近，很快就得到许多朋友赞许的原因。北京的冬天是零下10几度，最低到零下20多度，我穿着很薄的单衣，就在那里呆下去了。别人不易了解，在我而言，却是很平常的。我从不丧气，也不埋怨，因为晓得这个社会向来就是这样的。

当然，仅是看看《红楼梦》，看看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不会持久的。主要是当时一些朋友给我鼓励和帮助，包括三个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农业大学。当我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靠着他们，做个不速之客。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对社会有更深了解的人都觉得非革命不可。我是从乡下来的，就紧紧地抓着胡适提的文学革命这几个字。我很相信胡适之先生提的：新的文体能代替旧的桐城派、鸳鸯蝴蝶派的文体。但是这个工作的进行是需要许多人的，不是办几本刊物，办个《新青年》，或凭几个作家能完成，而是应当有许多人用各种不同的努力来试探，慢慢取得成功的。所以我的许多朋友觉得只有“社会革命”能够解决问题，我是觉悟得比较晚的，而且智能

比较低，但是仍能感觉到“文学革命”这四个字给我印象的深刻，成为今后文学的主流。按照当时的条件来讲，我不可能参加这样的工作，我连标点符号还不懂，唯一的可能是相信我的一双眼睛和头脑，这是我早年在军队生活里养成的习惯，对人世的活动充满了兴趣。

恰好住的地方是北京前门外一条小街上，向右走就是文化的中心，有好几百个古董店。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三千年间一个文化博物馆。大约 15 分钟就可从家走到那里，看到所要看的一切。向左边走 20 分钟又到了另外一个天地，那里代表六个世纪明朝以来的热闹市集，也可以说是明清的人文博物馆。因为这个时期仅仅隔宣统逊位 12 年，从 17 世纪以来，象征皇朝一切尊严的服装器物，在这里都当成废品来处理，像翡翠、玛瑙、象牙、珍珠等，无所不有。一面是古代的人文博物馆，上至三四千年前的东东西西；一面是前门的大街，等于是近代的人文博物馆，所以于半年时间内，在人家不易设想的情形下，我很快学懂了不少我想学习的东西。这对我有很深的意义，可说是近 30 年我转进历史博物馆研究文物的基础。因为，后来的年轻人，已不可能有这种好机会见到这么多各种难得的珍贵物品的。

按照社会习惯来说，一个人进了历史博物馆，就等于说他本身已成为历史，也就是说等于报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劳动人民的创造成果，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从个人来说，我去搞考古似乎比较可惜，因为我在写作上已有了底子；但对国家来说，我的转业却是有益而不是什么损失，因为我在试探中进行研究的方法，还从来没有人做过。

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那些传说也许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确，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从个人认识来说，觉得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因为在新的要求下，写小说有的是新手，年轻的、生活经验丰富、思想很好的少壮，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写得肯定会比我更好。但是从文物研究来说，我所研究的问题多半是比较新的问题，是一般治历史、艺术史、作考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会接触过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若做得基础好一点，会使中国文化研究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对世界文化的研究也会有一定的贡献。因为文化是整体的，不是孤立的。研究的问题上溯可到过去几千年，但是它新的发展，在新的社会，依然有它的用处。这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了不得的长处，主要还是机会好，条件好。在文物任何一个部门：玉器、丝绸、漆器、瓷器、纸张、金属加工……都有机会看上十万八万的实物。那时又正当我身体还健康，记忆力特别好的时候。可惜我这次出国过于匆忙，没来得及带上一些小的专题来与各位讨论。若将来有机会我能拿我研究中比较有头绪的一二十个专题来，配上三五十个幻灯片，我相信各位一定会有兴趣的。

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因为社会变动太大，我今天之所以有机会在这里与各位谈这些故事，就证明了我并不因为社会变动而丧气。社会变动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 30 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动

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够保留下一些东西。在近 30 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我总相信：人类最后总是爱好和平的。要从和平中求发展、得进步的，中国也无例外这么向前的。

选自《沈从文文集》

丁玲
1904—1986

中国现代女作家。《莎菲女士日记》是她的成名作。1930年起参加左联，开始了革命生涯。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以华北土地改革的生活素材写成，曾获斯大林文学奖。解放后，她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57年错划为右派分子，离开文艺界，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重新开始创作。

这篇演讲是她出访美国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通篇演讲流露出作者对生活的幽默见解和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她以“不知诸位想听我说些什么？”开场，使听众顿生轻松、随意感，就像听她拉家常一样。短短两千字的演说活龙活现地勾画了丁玲从小到老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的思想轨迹：她是如何追寻着“为人的艺术”文学观，“一步一步向左倾，一直走到共产主义”的。她的深入生活，绝非浮光掠影，而是实实在在地到人民大众中间去，去“跟某些人或某件事总是没尽没完地结合在一起”。她形象地把这种交融不分的情状描述成“缘分”。真是微词妙语，恰到好处！

我们知道，丁玲遭迫害长达二十余年，她却毫不怨恨、责怪，只是悲叹党受的损失太大，至于个人反而得到了一些东西。这种看似悖反的思维，一经听众理解，便会迅速改变旧的认识结构，从而豁然开朗，引起说者和听者的心灵犀通，幽默遂生。

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分”
1981年11月6日

讲话是有困难的，因为我和诸位是第一次见面，诸位对于我或许还能有些微了解，但我对诸位却是全无了解，真可说是素昧平生。我也不知诸位想听我说些什么。

来美前有人提醒我，告诉我说，美国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有好的朋友，也有不太好的朋友，还有坏的朋友——已经不能称为朋友，因此你要注意。我不会撒谎，有什么话都直说。我向来处在相当单纯的社会，对任何人都相信，把谁都当朋友。我以前交过美国朋友，一个很好的朋友，她就是史沫特莱。本来我从小不单是对美国人，而是对所有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都很怕，很有戒心。这也难怪，因为过去，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和压迫，但是史沫特莱给我上了一课。她的言行说明，外国人当中也有很好的人。她那时在上海处境就很危险，整天都被特务包围着，但她仍然不遗余力为中国的进步事业冒险奔走，在我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她尽力协助营救我。所以我回答提醒我的人说，我不怕。我从来就是不怕的，因为我是写人的，就一定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这样才能对他们有了解，否则就不可能写他们。我这次来美国，就要尽量多见到一些人，也许我将来回国后能写一些半美国人与美国人。

今天在座的有许多是从事创作或对创作感兴趣的，我现在就讲讲我自己的创作经验和怎样写人的。

我从小就喜欢观察人，那是因为在当年封建社会里没有发言的权利，

只能在旁边听。我家庭的组成很复杂，真有点像《红楼梦》，我舅妈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王熙凤；也有人搞枪，招兵买马，占山为王，这又有点像《水浒传》中的人物；也有书呆子和其他各种特色的人，所以我的家庭本身就是一部有丰富内容的小说。家里人都看我不起，因为我是女的，又穷又小，大小事都不让我参与。这就使我有了一些很好的条件，所谓旁观者清，我可以好好地在一旁观看，仔细考察。所以我对那个封建社会，那个摇摇欲坠即将垮台的旧社会，是确实有些体会的。

我还有个习惯，就是遇到人虽不能记得他的名字，但他的形貌、动作姿态、语言声调等，却在我头脑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对这些我颇能过目不忘。

我要感谢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因为这是个革命的时代。我既不能跳出这个波澜壮阔、多彩多姿的革命时代，我就必须全身全心投入。有一次有人要我题辞，我曾写道，我也很想能有安静的生活环境，可以无忧无虑。可是这是乌托邦，天下哪里有世外桃源？我不幸，也可说是有幸总被卷入激流漩涡，一个浪来，我有时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我又被沉入海底。我这条小船有时一帆风顺，有时却顶着九级台风。因此我得到了很多难得的经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人物，我这样常在风浪中走，等于在不断受到锻炼，对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提到写作，我说一点体会。我原来并不想当作家，而是迫不得已的。美国社会怎样，我不知道；但中国旧社会使我很受不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不愿跟着其他的人争着向上爬。进中学后对学校给我的培养教育，也感到怀疑，他们要把我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老教我老老实实地当顺民呢？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我觉得毫无意义，就算将来能进大学，拿了大学文凭又能怎样？顶多做个平平庸庸的书虫。我由于家庭关系和读了一些书，就懂得忧，懂得愁，很为国家和社会着急。急于想求得国家该走什么路，我该走什么路这种问题的解答。那时共产党刚成立，我就去上海找陈独秀，那时陈独秀比毛泽东有名，我对毛泽东所知不多，虽然我们的家更近，我还认识毛的夫人。

我个人的事，在爱荷华和芝加哥已说了很多，今天时间不多，我要讲得简短些。到上海后，我首先进了陈独秀办的平民女子学校，那是培养女共产党员的。后来又进上海大学，校长虽于是右任，但管实际工作的却是邓中夏、瞿秋白。这个学校我是从后门进去的，读了一年，仍然不满意。我想在座有很多人对此是容易理解的，像我这样小资产阶级出身，又年轻少经验，因此极容易对一切不满。我只读自己喜欢的各种小说，包括外国的小说。我也想去外国，但去干什么呢？自己也不明白。总之，我找不到满意答案，非常苦闷，想找人倾诉，想呐喊，心里就像要爆发而被紧紧密盖住的火山。我于是在无其他任何出路的情况之下，开始写小说，所以根本不是什么“为文艺而文艺”，也不是为当作家出名，只是一吐为快，为造反和革命。这里连带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学，中国的作家历来多是与政治有不解之缘的，无法分开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种关系。当然中国也有一些为文艺而文艺的人，也有一些作品，还写得很好，例如新月派的徐志摩，水沫社的戴望舒，现代印象派的李金发等；连创造社早期也号召为艺术而艺术，鼓吹浪漫主义，如郁达夫、郭沫若，他们也有不少好作品。但他们所号召的“为艺术而艺术”却发展不下去，莫说郁达夫从未写过浪漫主义作品，他一直是写实的，就连郭沫若后来也转了方向。这个国家的人民所需要的不是高雅的脱离人民群众斗争的“纯”艺术品，而是要求反映他们所遭遇的痛苦，说出他们的愿望，这

就是为什么文学研究会（茅盾、叶圣陶等为代表）最早的理论到今天还能存在的原因。他们号召“为人生的艺术”，为现实生活服务，我就是跟着他们一步一步向左倾的，一直走到共产主义。这就是当时30年代鲁迅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所走的路，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到大众里去”。说实话，左联在上海人并不多，同情的有一群，真作事的却不多。但奇怪的是这少数人却能在文艺界起领导作用，他们出版的刊物一上市便抢购一空。另有一些作家如王平陵等的书，却老堆在书店里卖不掉。还有一些作家，打着“民族文学”的旗号，但这批人如今早已不为人知，连我也记不起几位了。另外还有“第三种人”，他们攻击过鲁迅和左联，至今还有一两位写文章的，但他们老说他们的作品没有市场，打不开局面。并不是他们的文章写得不好，只是没有人要看。这也说明了我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不是走到人民中去，不卷入时代的潮流，那么我的文学生命也早就完了。那些人就是因为生活圈子比较狭窄，眼光老看着身边，脑子里老想着个人的得失荣辱，想不到身外的广阔天地，所以多烦恼苦闷，就不能写得深，写得远。在这一点上我是幸运的。一定要把小圈子的生活丢开，到大天地里去，到部队去当干部，到农民中参加斗争，到工人中参加建设，到青年中去和他们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感情。

我的天地比较广大。但是否只要能够到处跑，就能拿回东西来呢？那也不一定。有许多年轻人有过这种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是临时办货性质，是去专门买一点东西，到处找材料，能找到一点就想赶快卖出去，连加工都很少，等于现买现卖的贩子，所以少有成就。那么要用什么方法才能真正拿回一些东西呢？我不知别处是否也有同样条件，在我们中国是你随便走到哪里，你就立即成为该地的一个成员，就可在那里管事，可提意见，可动手作事。我开始也不很懂这些，后来才知道你一到某地，你就是某地的主人之一。例如我到农村搞土改，就是一个组长，要作调查，提意见，听汇报。土改完成后，分房子时，本村人没有想起的房屋，我却能提醒他们，他们觉得很奇怪。其实只是因为我和他们老太婆、年轻人及其他人都能打成一片，所有的时间都跟他们一起生活，向他们提建议，劝解夫妇和好，把大家都当作一家人，所以能很熟悉他们各自的情况。我去到那里，就从来没想过是去拿材料好将来写文章，我只想到是去干工作的，只是想如何能在那里好好长期生活下去，甚至当个村长也很好。

我每到一处，想的都是怎样能在这里长期居住下来。我在北大荒养鸡，不了解我的人很奇怪，认为我是作家怎能干这种活。他们不知道我那时想的是有一天摘帽后能当个好的养鸡队长，我不是为了工资或地位，而是一心想如何能把业务搞好。“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狱中，有的时候就拿旧报纸在床上摆图型，设想何处应是养鸡场、运动场、饲料场等。

我在夜校当文化教员时，就一直想如何干下去。我从未想过只有什么事才是最适合我的。我不觉得干某些事就是大材小用。只在离开那些工作岗位回来写作时，所有那些接触过的突出事件和各种人物，就在我脑中像电影一般不停转动。中国有一个常用的词，不知英文如何翻译，那就是“缘分”，那就是你跟某些人或某件事总是没尽没完地结合在一起。我跟文学也是这样。

我们文学上的确向来是有条条框框的，所谓“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江青大事鼓吹“三突击”，他们就说我写的农民不够英雄。但他们讲他们的，我从来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们爱怎么说是他们的

事，毁誉都不放在心上。

我在爱荷华时，有位台湾来的年轻人来找我。我跟他说，如果有人写文章骂我，我也不在乎。如果有人要在台湾写文章骂我，那就更好，那增加了我革命的政治资本。我还问他，你知不知我是共产党员，你是在跟一位共产党员说话。

当我同一位作家谈话，说到在农场养鸡的事时，那位作家哭起来，说你是位作家，怎可让你干那种事。我说我是个共产党员，任何工作都可以干。他说你虽是共产党，但首先是作家嘛！我说不！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任何事能作：能上，也能下。

有些关心我的人也不了解我，问我有没有受不了的痛苦。我说是有的，那就是开除我的党籍，那使我最痛心。因为它在我和人民之间隔了一道墙。我那时想，我唯一的出路不可能是坐在家里写文章，而是要走到人民中去。文协许可我留北京写文章，我能有一个四合院，但只能困在那个四合院内。我不能过那种日子，我是自己要求去北大荒的。我提这个要求，不是要闯升官或成名的路子，而是要闯到人民中去的路。但闯这条路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已失去党员身份，这很不光彩，你必须不害“臊”，在人民中敢抬头。如果我过去没有和人民在一起的生活经验，那是不敢去的。因为我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相信他们是不会拒绝我的，会给我友谊和前途。事实证明我选择得对，但这要花很大气力的，否则也不行。他们几次三番向上面建议说，应该为我摘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用尽方法保护我，要使我完全不受冲击是不可能的，但可减轻冲击。

中国共产党很伟大，但也有过错误，有时左，有时右，为此受了损伤。党受了很大的损伤，个人当然也受了损伤。我坐了五年牢。有位朋友还坐了十年牢，出狱后我们相遇，我问他们有何感想。他说，党受的损失很大，我个人倒得到了一些东西。我听了很高兴他说，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得到很难得到的经验，得到人民的友谊。如要说损失，也比较小，损失了一点时间。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是很伟大的，敢于承认错误。这口头上说说容易，真正做到很不容易。党又把我们的名誉、地位完成恢复过来，等于承认过去整你整错了。这种事在古今中外似还少见。我现在完全自由说话，我能来到美国就是很好的说明。在我以前已有艾青、萧军来过，今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来。这对中国来说，可说是跨了一大步，但可说美国也是跨了一大步，美国也花了很大的力量。如无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不可能有的今日的中美关系的。

周文中先生去年去中国，我们见了面，很欢迎他；聂华苓夫妇也去了，作家协会很欢迎他们。

我说过，我走到哪里，就常会喜欢哪儿。我觉得我去过的地方都有它的趣味。我来美国前还不怎么想来，来到了爱荷华，我很快就爱上当地的风景；但我仍想，也许是小城特别优美，大城市就不会有什么趣味。可是今日来到纽约一看，虽所见尽是高楼大厦，却觉得它也另有一种风味。这使我想起我本来是只爱国画的，不会欣赏立体画，或印象派的画，今日看到纽约的高大建筑，就想到也许西方人就欣赏那样的画。

我见到了一些美国人，我对他们很感兴趣，觉得他们都是很少城府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绕大圈子。我想能多认识几位美国朋友，也许回去后能写他们。

我这是信口开河，占用了大家很多时间，谢谢大家。

选自《丁玲论创作》

杨绛
1911—

中国现代女作家、戏剧家、文学翻译家。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的翻译者。

这是一篇在塞万提斯纪念会上的发言。大概是因为《堂吉诃德》的译者对塞万提斯太熟悉的关系，她并没有用一本正经的语句来表达怀念之情，而是一开口就使用了一个幽默诙谐的开头：“……他在天上只过了366天，恰恰整整一年。”接着又说，他的堂吉诃德1978年抢先赶到了中国。听众顷刻间有一种塞万提斯就在身边的亲切感。时空距离的缩短创造了轻松活泼的演讲气氛。下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是介绍有关《堂吉诃德》的翻译、出版方面情况。她几乎句句皆以调侃语气，风趣地予以说明，听众毫无枯燥感，处处领略到她的幽默情趣。

天上一日，人间一年
1982年4月23日

我今天有幸，能来参加塞万提斯逝世366周年报告会。我忍不住要学桑丘·潘沙的样说一句成语。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天上一日，人间一年”——就是说，天上的日子愉快，一眨眼就是一天，而人世艰苦，日子不那么好过。我们一年有365天或366天。在我们人世，塞万提斯去世已366年，可是他在天上只过了366天，恰恰整整一年。今天可以算是他逝世的“一周年”。我们今年今日纪念他，最恰当不过。

塞万提斯说他自己“与其说多才，不如说多灾”。尽管他的《堂吉诃德》广受读者欢迎，当时文坛上还是没有他的地位。他一生没有受到重视。我们到现在只知道他在1547年10月9日受洗礼，而不知道他的生日；只知道他1616年4月23日去世，而不知道他的坟墓所在。我们看到的几幅画像是真是假，有很多争论。我最近读到新出版的权威著作《西班牙文学史》上说，那些画像全是假的。有一幅画像，1910年以来一直认为是塞万提斯的真容，挂在西班牙国家学院的大厅里，现在证明那也是假的。唯一可靠的画像，是塞万提斯在《模范故事》的前言里对他自己的写真；我们只能从这段文字里想象他的模样。可是366年过去了，我们非但没有忘记他，也忘不了他，而且更热切地要求对他有更深、更透的了解。因为塞万提斯虽已离开人间，他头脑里诞生的儿子堂吉诃德骑着他那匹瘦弱的“弩骑难得”却马不停蹄，这么多年来已走遍了全世界，受到全世界的重视。

塞万提斯早在1615年告诉我们，中国的大皇帝急着要他把堂吉诃德送往中国，因为中国要建立一所教西班牙语文的学院，用堂吉诃德的故事作课本，还请塞万提斯做那个学院的院长。可惜我们中国的大皇帝太糊涂，忘了送他旅费。塞万提斯因此没来做咱们中国西班牙语学院的院长。但是他的堂吉诃德是最忠诚的骑士，1978年知道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要来中国访问，就抢先赶到中国来迎接国王和王后陛下。这是真事，我和塞万提斯一样没有撒谎。我给叙述堂吉诃德故事的那位摩尔人阿默德·贝南黑利先生补习了中文，又尽力教堂吉诃德和桑丘说中国话。可惜他们没有教我写西班牙文，也没有教我说西班牙语；我至今不会写，也不会说，这是很大的遗憾。

堂吉诃德光生的老乡参孙学士预言，将来每个国家、每种语言，都会有《堂吉诃德》的译本。这句预言已经实现了。当初堂吉诃德听说他的传记印行了一万二千册，已经很得意。可是在我们中国，一版就印了十万册，很快就销完；再版又十万册，也很快销完，还有许多读者要买而买不到。现在第三版将要付印了。世界各国对小说作比较研究的学者，都离不了《堂吉诃德》。譬如前不久来我国讲学并访问的两位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勒文和吉延，都把《堂吉诃德》作为比较各国小说的中心或主脑。堂吉诃德知道了，该多么得意呀！

《堂吉诃德》是我非常喜爱的书。我原来并不是一个翻译者。我写过些剧本、散文和短篇小说；翻译是我的练习——练习翻译，也练习写作。近代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曾经说过，翻译可以作为写作的练习。我翻过西班牙小说《小癞子》和法国小说家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这两部小说都有一些读者。我的领导对《堂吉诃德》这部举世闻名的杰作十分重视，急要介绍给我国读者，就叫我来翻译。我出于私心爱好，一口应承，竟没有考虑自己是否能够胜任。

把原文的《堂吉诃德》译成中文，远不是堂吉诃德所谓“翻译相近的语言”那么现成，远不是抄写文章那样“抄过来就是翻译”。我相信，西班牙文和中文的距离，比西班牙文和希腊文、拉丁文的距离还大。塞万提斯本人对翻译不大瞧得起。他借堂吉诃德的嘴说，他“不是轻视翻译；有些职业比这个还糟，赚的钱还少”。他认为一般翻译好比弗兰德斯的花毯翻到背面来看，图样尽管还看得出，却遮着一层底线，正面的光彩都不见了。译文不免失去原文的光彩，这句话是不错的。再加我们的排印工作，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大地退步了，外文的拼法和符号上的错误多得改不尽。我只能希望，我们的翻译，还比我们的印刷好一点点吧。

《堂吉诃德》——正像一切原著一样，是唯一的，它的译本却多得数不清。我的翻译是从西班牙文译出的第一个中文本，可是决不是末一本。将来西班牙和我国的交流会更多，我国对西班牙文学的研究会更有增进，准会有具备条件的翻译者达到更高的水平，更接近塞万提斯所要求的标准，叫读者分不出哪是原作、哪是译本。因为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翻译者不必谋利，不必为生活担忧，可以一心一意追求译文的完美，不怕费多少心力、多少时间。这一点，只怕塞万提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如果知道，也许会对翻译者改变他那轻藐的看法吧？

选自《杨绛文集》

杨振宁

1922—

华裔美籍物理学家。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曾多次访问中国，为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作演讲，弘扬民族精神、鼓励青年上进。本篇是他在石溪对中国访问学者和研究生作的演说，内容涉及中国人做学问的态度、方法问题。他谈得泛而不乱、见解独到深刻，既体现了热爱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又表达了关怀青年一代的殷殷慈爱之情。

杨振宁先简要回顾了中国派留学生的前因后果，而后提出令人捧腹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研究生考试成绩可以好得出奇，搞研究却不一定？他认为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幽默诙谐的谈吐不时赢得听众阵阵笑声。接着，他从这一命题引申出去，展示了自己的两点结论，大大增强了中国学者做学问的自信心。最后他提出做学问的几点建议，句句都是这位学界泰斗的肺腑之言，给人以庄谐相济的睿智美感。

留学与做学问

1982年6月20日

中国派留学生到外国做研究工作的想法，我想应该算是从1861年开始的。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江苏吴县有一位冯桂芬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中体西用”这个说法。30几年以后，即1898年，张之洞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劝学篇》把它发挥了，变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然要用西学，所以有派留学生的想法。第一次派留学生来美国是在1872年。

那个时候的一些讨论现在再去看是很有意思的。我想总体来讲，那时很多的想法是对的。不过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却没有弄清楚，就是对于中国整个政体的性质没有掌握清楚。所以虽然有许多讨论，有许多枝节的措施，最后所得出来的结果并不是太成功的。这些不成功使得中国人民对于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大为减低。甚至有一个说法，认为中国整个的文化是要不得的。主张把中国文字跟中国语言完全废除，改用世界语。当时这样主张的人们是很诚恳的，而他们胆子之大也是惊人的。〔众笑。〕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今天已经没有人再怀疑中国人的脑筋和中国文化是否宜于发展近代科技。这是很大的转变。转变的原因大体讲来我认为有三个：第一，新中国尖端科技的一些发展快得举国震惊。第二，中国血统的人在不少领域有了重要的贡献。第三，另外一个黄种人的民族，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民族，在科学界、工业界都有了使人敬佩的发展。

中国人丢掉了一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自卑感是好的。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的是另外一个许多中国访问学者和同学都很关心的题目，于此多少有一些相关。

在美国各个校园里中国研究生读书考试一般都相当好；有不少更是名列前茅。在石溪的校史上，好些系里，有些中国研究生的考试成绩不敢说是绝后，至少是空前的好〔众笑。〕这当然使得中国血统的人大家很高兴。不过，我听说最近有了些失望的说法，就是说，考试以后到要做研究工作的時候，问题好像就有点复杂。甚至于有人觉得也许中国人的脑筋不能够做研究工作〔众笑〕，就只会参加考试〔众笑〕。

这个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我在美国 37 年了，我看见过的起步做研究工作的人的数目，单在我这行里边，已上千上。让我跟大家谈谈我的两点结论。

两点结论

第一点，所有的研究生（这与是否中国血统是没有关系的）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通常是做论文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从小念书的时候，学习的经历是一个方式：学习已知的东西。书上面讲的，老师讲的是一些已经咀嚼过的题目，大家做算习题目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个书本上的题目，你知道准是有答案的。准是有答案这件事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多么重要呢？非常重要。因为这启示使学生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问题上。

而做论文的时候学习方法是另外一个方式：要寻求未知的东西，要发现哪些题目是可以有解答的。对学生来讲这是新的经验，学习起来通常是困难的。可是这里头所发生的困难，绝不是中国血统的人所独有的，是大家都有的。我刚才讲我看见过上千的人起步做研究，所以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不是中国人独特的困难〔众笑〕。

第二点，中国文化传统的教育方法是不是使学生不会做研究工作而只会考试呢？我的看法是这样：中国文化传统的教育方法确实使得学生们比较容易在考试成绩上面占便宜。不单在从中国来的同学受到这个好处，从香港、从新加坡、从朝鲜、从日本来的学生都受到这个好处。

相对地，西方文化的教育方法，尤其美国的教育方法着重广泛的知识，不着重一步一步的系统教授法。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胆子比较大，但是不会考试。

到做论文的时候，哪一种学生占便宜呢？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一般性的回答。要看人，要看学科，要看机会，两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各有长短。不过总体讲起来我觉得中国传统教育方式所训练出来的人还是要占一些便宜；多了一些工具，多了一些基本的自信心，总是好的。不过在考试的时候，他们所占有的压倒性的便宜，到做研究工作的时候要打一些折扣就是了。

两个月前我碰到斯坦福大学的寿罗（Schawlow）教授。他是激光原理创始人之一，是重要光学家。他说前两年有几位从华东师大来和他合作的访问学者，他们刚来的时候有一段时期要熟悉实验室的情况，进展较慢。半年以后就都做得很成功了。到临离开美国回上海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随时想新方法，新实验的阶段。寿罗教授说：“只有有设备，他们没有问题会做出杰出的研究。”

几点建议

对大家做学问的方法我有几点建议。第一个建议是随时尽量把自己的知识面变广一些。比如说随时到图书馆去浏览一下，“开卷有益”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是不是一个人会被研究工作跟生活压迫得透不过气来，不能够花时间到图书馆去走走看看呢？我想这当然也是因人而异。不过一般讲起来，不管多么忙，抽空去使自己知识宽广化最后总是有好处的。我可以举一个切身的例子，我在西南联大念书的时候，王竹溪先生刚从英国回来，他作了一系列关于相变（Phase Transition）的演讲。那个时候英国、美国有很多人搞这个东西，搞得非常之热闹。记得听王先生演讲的人很多，我也去听了。可是我大学还未毕业，没有听懂。是不是白听了呢？不然，因为从那以后我就不时地对这个问题注意。

听王先生的演讲是在 1940 年前后，我后来写的第一篇关于相变的文章是

在 1951 年，即是 10 年以后。这 10 年期间断断续续地对这类问题的注意，最后终于开花结果了。以后几十年相变工作是我主要兴趣之一，所以 1940 年前后听王先生的演讲这个经历对我的研究工作有了长远的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个建议是不要钻牛角尖。假如你做一件事情做得很苦，我想也许值得考虑不要做这个东西了，去另外想想别的东西。一个学问的前进的方向是很多的，有许多有生气的方向。最好走向这些有生气的方向。牛角尖不是绝对不可以钻，但是必须保持主动性，保持有见机而退的能力与勇气。

第三点建议其实跟刚才所讲的第一点有很密切的关系。我觉得学习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按部就班的，一个办法是渗透性的。什么叫渗透性的呢？就是在你还不太懂的时候，在好像乱七八糟的状态之下，你就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中国的传统的教育方法是着重按部就班的学法，这确实有它的好处。我想假如我对一组美国学生谈话，我就会讲他们应该多学习一些按部就班的方法。可是对中国来的学生，我想一个好的建议是不要怕不按部就班的学法，不要怕渗透性的学法。因为很多东西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接触，就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懂了。这个学习方法是重要的。

最后我有一点也希望给大家讲的，就是做研究工作到最后必须要做自己所做的东西，不是在那儿跟着别人跑。老跟人跑的研究工作，不大可能是有真正重要的建树的。这当然并不是说一开始就非要独创一家不可，那是不可能的。学问是累积起来的，所以必须要先学习别人所做的东西，然后才可能有自己的见解。不过，在学习过了一个相当程度以后，必须要发展自己的见解。不能老跟着当时“权威性”的看法跑。

我很高兴今天来了这么多的访问学者和研究生。让我代表石溪这边你们所请的客人向各位主人表示谢意。你们在这儿烧饭也不是很简单的〔众笑〕，烧了这么多的东西给我们吃，我们很感谢〔众热烈鼓掌〕。

选自《中外著名演说鉴赏》

罗纳德·里根

1911—

美国第40任总统，共和党人。生于伊利诺伊州坦皮科。1932年从该州尤里卡学院毕业，当过播音员，电影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参加过军。1964年帮助参议员戈德华特竞选总统，踏入政坛。1967年出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971年连任。1980年当选为美国第40任总统，4年后连任。

里根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有着高超的演说技巧。他的演说感情真挚，自然流畅，用语诙谐，而且善于在讲述严肃的内容时加上几句幽默，引起人们的共鸣。这篇发表于人民大会堂的演说即为一例。他从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总理的握手谈起，通过回溯中美两国早期的文化交流，阐述双方在价值观上的共同点，赞扬中国的改革开放，表达了要与中国携手合作、增进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愿望。他不时加上一些恰当的比喻，中国成语，熟语，甚至政治术语，从而缩短了他与听众之间的距离，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越过大洋的握手

1984年4月27日

12年前，前总统尼克松来到北京，他走下空军一号专机同周恩来总理握手。事后周恩来总理告诉他，“你那次握手，是从世界上最浩瀚的大洋彼岸伸过来的手，是经过25年隔绝之后伸过来的手。”

从那次握手开始，美国和中国都揭开了本国历史上的新篇章。我认为现在历史又在召唤了。美中两国携手并进，已经开始为我们的历史撰写和平与进步的新篇章。

说真的，我相信如果我们问世界各地的公民，他们最希望为子孙后代留下什么，他们可能会用英语、汉语或者任何其他语言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要和平。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过更美好的生活。”寥寥数语表达的愿望，代表了人类对安全和实现个人理想的最深刻的追求。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他们实现这种愿望。

我们两国可以本着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精神携手合作。我想，用汉语来说，就是“互敬互惠”。

美国对中国的关心，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对中国为发展文明所作的许多贡献的钦佩，可以追溯到美国立国之初。大家也许很乐意知道，美国最早的三位总统，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私人使用的全套餐具都是中国制造的，这说明我们这几位创始人都被中国高超的艺术成就所吸引。

早在1784年，美国的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开进中国水域，那时候，美国对中国来说还是陌生的。我们当时是个刚刚成立的新共和国，渴望在国际商业往来中取得一席之地。船上的一名美国水手有点想家，他在一封家信中叙述了来到中国第一天的情况。

他写道：“亲爱的爸爸，如果你有朝一日收到这封信，就会知道我们经过6个月零7天，终于到达了黄埔港……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一个新的国家，我们介绍了我国的历史和现状，并说明在

这里进行贸易是重要和必要的，对双方都有利。他们似乎完全理解和同意这一点。”

早在那时起，我们两国就都从人员和思想的交流以及通商中得到了好处。中国移民在 19 世纪为开拓美洲大陆做出了贡献。今天，他们的子孙后裔又和其他美国人一起同你们合作，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新的、繁荣昌盛的国家。

美国人民一向认为，过去的宝贵传统是今后丰收的种子。在我们的传统中，有两个能够产生巨大力量的源泉，一个是信仰，一个是自由。美国的开国元勋，是追求信仰上帝的自由的人，他们相信在生活中上帝会引导他们，赋予他们智慧、力量、善良和同情心。

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导致了美国革命。它是历史上第一个主张人权和独立、反对殖民统治的伟大起义。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愿意和别人共享自由，我们每个人自己也就无法享受自由。我们也知道，除非我们大家都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则我们的自由就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乔治·华盛顿告诉我们，把我们维系在一起的是自由人神圣的兄弟情谊。亚伯拉罕·林肯说：“任何人再英明也不能不征得别人同意而统治别人。”这句话道出了美国民主的精髓。

这些重大的原则一直是美国的精神支柱。还有一些价值观念，如劳动的尊严、邻里的友爱、家庭的温暖等，也充实了这些原则。像中国一样，我国人民从下一代的目光中看到了未来。像中国一样，我们尊老敬老。我们要像父辈母辈一样优秀，就必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00 多年前，当时已卸任的美国总统尤利塞斯·格兰特访问贵国，看到了中国的巨大潜力。他写道：“我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变革的端倪。一旦开始变革，中国必将迅速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中国人民勤俭智慧，善于学习。”

今天，中国的经济欣欣向荣，日新月异；你们实行的新的责任制扩大了农民的个人收益；工人有了新的奖金制度；在利润和亏损方面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改进了市场分配方法；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促进贸易和吸引投资，在四个经济特区中尤其如此，这使中国的经济向世界开放；引进外资和科学知识，为今后打下尖端技术基础——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在国际经济社会中发挥着新的作用，中国决心要使经济现代化，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些国家的政府害怕变革，害怕面对未来，中国和这些国家不同，中国正在开始向新的领域迈进，我们赞扬你们这种勇敢的精神。

中国的发展，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会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当我们看到物质刺激和革新的清风吹遍中国大地，带来许多积极的变化时，我们并不感到惊奇。这些经济增长的数字，包含许多个人努力取得成功的事例，反映了新的进取精神。邓小平主任说要“实事求是”。在中国，今天有更多的小企业生意兴隆，有更多的家庭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生产更多的粮食发家致富，在科学技术方面也进行了更多的投资。这个现实表明，大家都有了更多的机会。约翰·肯尼迪总统常用“水涨船高”来比喻这种社会进步。

我看到，美国和太平洋邻国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以建立起强大的经济和更加安全的世界。美国和中国面临着—个历史性的机会：我们可以扩大经济与科学合作，增强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向和平和更美好的生活迈出

重要的一步。我们能够合作的范围很广泛。我们认为，我们在贸易、技术、投资和交流科学与管理技术这四个方面特别有希望取得进展。

未来要靠我们来创造。战胜风险，解除某些人的疑虑可能是困难的，但是我深信高峰是值得攀登的。人们只有崇高无私，只有鼓起勇气，勇敢地面对不可知的命运，团结向前，以求尽善尽美，才能取得最大的胜利。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见到个人英勇无畏和团结友爱的事迹，这些事迹增强了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并使我们寄希望于更加美好的未来。1981年，有一位聪明年轻的美国学生约翰·蔡德曼曾经前来研究中国和结识新朋友。他心地善良，热情奔放。他曾经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走东串西。他曾经同艺术家和学生们一道野营、促膝谈心。他爱上了你们的国家。不幸的是，他在20岁生日时得了重病，后来去世了，然而他的悲剧却带来了新的生命。

约翰的亲友在华盛顿的西德威尔友谊学校开办了中文班。数以百计的人向这个中文班捐赠款项，这个班目前吸引着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年轻人，它已经成为美国全国各地学校的表率。

一个青年的逝世所带来的巨大悲痛播下了一颗种子，那颗种子萌生为一棵谅解之树。现在这棵树盛开着友谊与合作的美丽花朵。如果两国人民本着这种精神，栽下的不是一棵而是千百万棵这样的树，然后一一加以精心培育，使它们茁壮成长，那么，一个青年的梦想就有可能变成全人类的远大理想。

节选自《外国领导人访华讲话》

